落地生根

社区支持农业之甦动

* “甦动”是本文集编者们想出来的一个词。“甦”为繁体字，以更和生两字合成，简体字写作“苏”。辞海中，“甦”作动词时有多种解释。《颜氏家训。杂艺》解作更生。在“苏息”一词中，则作再生滋长解。社区支持农业在中港台三地践行者的行动中滋长，更生，结出新的果实。三地沿用繁简两种字体。“甦”，见字思意。而广东话“甦动”与“骚动”同音，有多一重想象。如是，甦动。

落地生根

社区支持农业之甦动*

当社区进乡

当城乡甦动

当农活生花

当中港台社区

组圈个中苦辣酸甜甘辛差乐

农

百味纷陈

支持/协力/共好/参与/互助

目录

缘起篇——上下求索

感谢 8

写这些文章的背后 11

是关于身体记忆　是关于生活文化 14

再认识以农为本生活的价值 25

香港篇——近乡情怯

归去来兮？！ 38

共同购买二十年——香港社区支持农业小史 46

香港社运青年的归农路 54

农墟——展现生活的精神 62

大城小事——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静默革命 68

城市连结农业 74

在香港思考农业与社区 84

台湾篇——遍地花开

野地花开、农艺复兴 92

一名台湾社运青年的归农旅程 98

农村是一所学校 112

CSA是一种生活方式 118

让“社群”述说“美好生活”的故事 120

脚踩土地面朝天 126

因农而起、为农而聚 132

劳动的春耕——关于台湾的农事变迁 138

大陆篇——生活革命

乡村重建与城乡协作 148

沃土有好米 156

没有梦想，我们还能活得幸福吗？ 164

对学做“农人”的点滴思考
——香港CSA研习会口示后记 174

守住社区，做生活化的革命
——与张和清教授的一席话 182

当代中国的新乡村建设 190

附录一：“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
分享机构简介 202

附录二：词汇 209

上下求索

缘起篇

感 谢

我们所处的地球母亲，在最近几十年急速工业化、都市化的负面影响下，生态危机频发，地球各群落不能不反思：人类社会可往何处去？愈来愈多民间力量和机构，探索可持续的未来。在这思潮中，许多种子落地生根，其中，落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的土壤里，过去十年，时间和毅力，润物细无声。这新萌芽成长的一群，包括了“社区伙伴”和许多的伙伴团体。

在探索人和自然怎样和谐共处，怎样为愈加匮乏的地球资源寻找更简朴、可持续的生活模式的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走上这样的路：过一个能让我们爱自然、爱乡土、重建社群关系，追求更自主、在地的价值和整全身心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可以有许多的体现方式，两岸三地的许多民间伙伴朋友，用超过十年的实践，寻找到其中一个有效的载体：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2012年10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举行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中，关心CSA的农民、支持者、协作者，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心声，确认了CSA能恢复彼此及和自然的连结，活出更健康、永续、城乡共好的生活。120位与会的朋友对CSA的思考——重建一个以永续农耕为生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秩序——有以下几个面向[1]：

- 反思人和自然关系的历史坐标：
  过去，土壤、农耕孕育了人类的文明，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一个关照整体生态、敬天敬地的自然观；我们的未来必须融合这智慧，以土壤为根源，以农业为本业。

[1] 以文集中的文章为依据。

- 在地农耕与整全社会脉络：
  面对社会体制、发展方向的挑战和环境急剧破坏的困境,要重建能保育生态的小农复耕，需要从“破”到“立”，重建食物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人与农村、土地、农民的结连，食物从田野到餐桌，从农民生产者到消费者，要促进一种互助、城乡共好的关系。

  也有论者认为支持CSA、小农生态复耕，不单是个人层面，不单要催生在生活、价值层面的转向，甚更要介入政治政策的推动，限制破坏生态农耕的阻力，推动更大的文化认同，改变经济发展的优次，让农业也能成为重要选择。

- 重建社区、社群关系：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天，驱动了无数中国青年投身回应广大的基层需要。在新的时代里，要建立生态文明和生计的永续发展，协作者以文化多元为根，培养社区的生态资源主权和团结。

  台湾的经验显示，城市的消费社群和小农社区互助互惠，许多地方的“共同购买”能发展为具使命的运动，是因为组织了一群具共同理念、肯默默付出的社群，不仅仅是“农的汇集”，是对善用生活资源的美好永续生活的共同承担。

- 人心的绿耕：
  在纷纷嚷嚷、挤压甚至扭曲的社会发展中，一些年轻人选择回乡耕作、生活，是为守护心中那亩田、一种更自在的生活。在过程中，他们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对自然谦恭，对别人尊重。都市人务农，乡土人复耕，只要与土地连接，就能吸取沉著和净化的滋养。

  从个人的心田再绿，到社群、社区关系的重建，到整全在社会脉络的定位，和对人和自然的历史的重新凝视，好比一个循环不息的圆，每环互相扣连，生生不息。对照地球面对的生态危机和昏暗，这是一个发光发亮的圆体，引动你我的新轨迹。

感谢组织和参与“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来自两岸三地的各位老师、伙伴和同事，特别鸣谢我们的姐妹机构：“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和我们共同筹办了这次研习会。

感谢撰稿、编写和设计出版论文集的团队及人士，他们投入而奋力的工作，让我们完整地分享这次丰盛的经验交流，此中自有扣动心弦的力量，让我们知道，透过建立共同理念的网络、创造力、勇气和坚毅的互勉，我们永不孤单。

周燕珍
社区伙伴总干事
2013年　秋天

写这些文章的背后

2004年夏天，在四川若尔盖草原颠簸而行的大货车上，我和同伴舒萌紧握著驾驶座后方的栏架，讨论在城市中接连城市居民和小农生产者的可能性。那时的舒萌在北京生活，关注草原的沙漠化和人心的荒漠化。而我在香港，因迁居小岛生活，开始在周末的农耕体验中思考食物和生活的意义。如是，我们开始了对创造另一种生活可能性，与及回归到一种更友善的城乡关系的探索。这样的探索必须与真实生活连结起来，才能够让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带动真实和深刻的改变。我们想到食物、土地、城市、农村、城乡共好的农业。开始想象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可以怎样重新与守护大地的生产者重建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而我们又怎样能在食物的生产和获取上，体现更多与自然万物共生的关系。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这个概念，给了这样跃动的心一个行动的出口。

2005年，社区伙伴开始在北京走访和结连对CSA的探索感兴趣的朋友。同年我们认识了很多也在思考三农问题，以及对日渐疏离的社区关系感到焦虑，对人心回归简朴自然生活响往的同路人。那年，我们碰头，聚会，并且组织了很多有趣的学习。从2006年初开始，我们和这些有共同追求的组织和伙伴，开始了“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也就是一直到现在仍坚持下来的“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

走过这许多年，从实习生项目走出来了许许多多青年伙伴，他/她们在多元的平台里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著这幅城乡共好，丰盈又灵性的食物地图。他/她们的足迹踏遍社区、学校、餐馆、农夫市集、公益团体、企业、生机小店、网络等。他/她们以细腻的心思和坚定的步伐，筑构起一个充满活力和生长点的

绵密网络。因著不同的机缘和经验，大家和努力在土地上耕耘的农人，和被触动著返回乡下的伙伴一起重建健康的食物体系，也编织起一张探索人与人，人与万物润泽共生的关系网。而这些实践百花齐放，生长于在地的特殊条件和内生力量，不是相互复制的结果。在中国大陆正急速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的当下，面对传统乡村秩序崩溃，人际关系原子化与及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下造成的环境恶化，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社群在创造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在这些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伙伴以青年返乡及城市人归农的方式，建构出新的社会协作关系。在反思粮食主权和重商轻农的发展思路下，青年人回到农耕劳动中，去述说一套新的生活伦理，和应著在“乡”的那不远处无数小农生产者在土地被掠夺下仍努力守护的自主，知足又丰盛的“农”生活。而在资本主义深深扎根的香港，青年人集结起来，捍卫在旧区重建中属于小市民的相对自主的经济活动空间与及那深耕多年的邻里情谊。藉著新一代对城市发展迷思的反思，造就了一幕幕青年归农的景象。在这些高调返农的背后，原来九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有一群人在默默经营著共同购买。在企业资本全球化的年代，开始了这场让消费者能吃上本地菜，让生产者的名字能被记起的生活静默革命。

这些伙伴的经验都在真实的相遇和文字的碰撞中为彼此的努力带来滋润和鼓励，也一直挑战著大陆伙伴们延伸想象，以行动去思考“食物”是如何塑造一代人的生活文化和社会关系。而我们又是如何被科技、理性、文明和全球化的发展论述，带向一种被动和依赖的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个中出路，可以是以个人的意志，让身心回归到手作劳动和真实的关系，也回归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区支持农业的探索和践行，在三地源自不一样的社会脉胳。在过去几年的互动之中，我们看到相互经验的差异，看见彼此的发展轨迹，看见当下各自不同的问题面向，也造就了不同的表述和回应方式。但在差异当中，共同的是我们都在回应一个核心，就是关系的重建，生活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新的生活伦理价值的建立。这个新的理解，是回归到幸福生活的再思考，然后是以每个个体再结合到社群的行动，去守护你所相信的。这场生活起义正静静发生，悄然为社会带来真实的改变。

2012年秋天在香港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为这样的探索力量提供了碰撞和相互学习的机会。因著这样的机遇，伙伴们相识，共聚。四天半研习讨论的内容，成就了这本书的内涵，文集内部份文章源自研习会的纪录和沉殿。其后，在研习会的讨论基础上，新的思考和想象冒起了，对三地各自的历史脉落和社会处境的好奇也被挑动了。如是，新的学习过程再度启动，开展了延续下来的访谈，书写和努力，最后成为你现在握在手里的文本。

在此感谢三地伙伴愿意为这个长达一年的纪录和梳理过程付出，成就了今天的出版。也诚意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这甘甜的果实。

邓文嫦
编辑委员会
2013年　秋天

是关于身体记忆　是关于生活文化

远方的骚动

形容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是中港台三地近十年慢慢发展出来的一门显学，也许有点夸张。但毫无疑问，因不同机缘在不同社区由不同人和机构致力推动下，CSA是近年一股回应主流发展主义的新生公民行动。

在网上搜寻CSA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历史，找到社区伙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下称PCD）[1]在2004年首次跟大陆伙伴一起学习CSA 这个舶来品的记录。究竟CSA缘起自日本还是瑞士还是美国，兴许会引来一阵讨论。但清楚不过的是，它得以在不同地方生长，甚或落地生根，结成硕壮花果，个中自有玄机。顾名思义，社区支持农业面向农业。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欧美等地，义无反顾地要跟农业建立关系的，大多是那些质疑主流科学理性文明、批判以资本为上的发展导向的城市消费群。他们对农场作出承诺：愿意互相支持，分担生产风险，共享收益，建立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社区域经济合作关系。个中强调生态和资源的保育、社区情感和文化的承传、以至共同承担和分享的社会关系。这不光只是一个消费者运动，不单指向生态和生活的永续关怀，这是一整个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反思和重整。

路弯且长

多年来，PCD跟内地伙伴们在CSA路上携手探索，过程不免崎岖，也走出一些青绿花香小径。2004年的中国大陆，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市场

[1] 社区伙伴简介见附录一。

化、城乡贫富两极化、三农等问题，浮出历史地表，赤裸裸呈现眼前。PCD与伙伴们跟著外地CSA的足印，学习不同经验，尝试探索如何反思和回应时代的种种叩问。PCD支持年轻实习生在行动中思考，结合年轻力量和小规模的尝试，既有焦点，也不断扩宽CSA的思考和想象。慢慢地，CSA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和尝试。年轻实习生一个一个毕业，要试试牛刀，发现前路有大大小小的阻困。然后，出现揭不尽的食品不安全黑心事件，CSA骤然成为救生圈。大大小小的CSA农场、农产品市集和消费者共购组织应运而生。有机有危。CSA光谱一下子变得有点混杂，除了一些努力不懈默默寻索，扎实而细细的耕耘外；是一些突然冒起高举著CSA牌子的规模投资。CSA被简约成安全食品的质量标签，是田园生活的浪漫消费……在大陆这块土壤中长出来个甚么样的CSA？这些尝试和努力，回应当下些甚么问题？究竟它们引向何方？

PCD的姐妹机构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下称嘉道理农场）[2]一直致力支持香港农业，于21世纪初开始在香港推动社区有机大使、社区农圃以及城市农墟等等活动。是关于（城市人）陌生的农业、是关于城市发展、是关于两者的互动、是关于有别于主流生活的可能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走著，埋头做著，生活细碎，外头疾风暴雨，一不小心也许就会迷失方向。近年，都市发展越加急速凌厉，村落因兴建高铁被迫拆迁的事件，给香港人一记当头棒喝。无论是机构和伙伴，都感到是时候好好沉淀经验，思考一下下一步该如何走？往哪里走？台湾朋友起步得早、走出丰富多元的经验。如是，中港台三地CSA经验研习似乎是很自然的一步。如是，PCD和嘉道理农场携手于2012年10月在香港搭建了一个相互看见的交流学习平台。

[2]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简介见附录一。

落地生根

研习会决定以落地生根为题。舶来品CSA来到中港台，落到不同土壤不同社群中发芽生长。这次，我们尝试钻进CSA的肌理中去，希望能够更明白不同社群和操作的指向与追求。我们把目光聚焦在CSA中的C-社区、S-城乡互动、A-农的主体性、以及CSA作为在地经济这几个主题，逐个细嚼。社区就是土壤，不同社区有不同的品性素养和可能性，CSA种子能否落地成长？是否能铸炼出生活价值，并有延续推展的生命力？而城乡互动有如耕地，究竟在这个生产和消费的流转过程中，土与人、物与心、情与理、城与乡的关系，是否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至于农（民/村/业），三地经验让我们反思土地话语权，农的主体位置……等等。当这个A不再是被动的客体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不同的C，不一样的S，以及不同位置上的A，如何在本地开花结果，成为互动各方的生活和生计？这一直是CSA操作中既艰难繁琐，又极富创意和启发的环节。研习会把三地丰富的经验[3]按不同特点放在这些主题下梳理，个中细节不免有所遗漏。只是，人类的局限正如许真实，就如台湾合朴农学市集（下称合朴）[4]的陈孟凯先生说，“我们都只有24小时”，要有所选择，做符合心中求索的事。

从CSA再出发

明正言顺。CSA或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概念和翻译，究竟能否涵盖刻下的努力和追求？这些年来，他山之石换上新装，融入本土脉理。有人琢磨修正社区支持农业这个翻译：因为在CSA中C和A两个部分是双向合作支持的关系，不是一方站在道德或社会经济高地，向另一方施加扶持和支援。我们看到双方以至各方一起做农。如是，支持应该改为协力[5]、互助、合作……等等。有人觉得社区这个说法不够清晰明确，不同社区除因地缘或利益组合外，还必须共享一些理念，指向包含人与人、人与土地和自然的生活文明价值。如是，社区该改写为社群，或者是“以农为本”[6]的社区、或者乾脆不叫社区……有人感

3 被邀请分享经验的机构来自中港台。四天半研习会在2012年10月16日开始到20日结束，日程包括一天参观香港机构；三天主题研习和半天总结讨论。第一天接待参观的香港机构有：老农田（城市农庄）、马宝宝农场（自设销售点）、菜园村生活馆（城市青年经营的CSA农场）、长春社元朗塱原稻米复耕项目、土作坊（社区经济）。参与主题分享机构有：社区—— 农村阵线（台湾）、大陆华德福教育（四川）、爱农会（广西）、大埔运头塘共同购买小组（香港）、台湾合朴农学市集（台湾）。城市互动和农为主体——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大陆）、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台湾）。攀枝花互助合作社（四川）、苗栗湾宝农户（台湾）、中港台农产品市集、绿心田·生活汇（四川）、主妇联盟（台湾）；在地经济—— 微风市集（台湾）、土地正义联盟（香港）、土作坊（香港）、绿耕（大陆）、长春社元朗塱原稻米复耕项目（香港），以及古巴城市农庄。

4 合朴农学市集简介见附录一。

5 点评社区主题的杨宝熙（在香港积极参与推动共同购买和在地可持续生活运动）认为社区协力农业包含不同群体共同努力，形容一种紧扣的互相支持的状态。协力这个名词近年在台湾CSA运动中响起来，觉得其含义更符合CSA的追求。

6 点评社区主题的香港岭南大学老师陈顺馨提出应重新思考社区这个概念，她觉得不同的社区有不同基础，CSA是一种以“农”为本的社区探索。

到农所蕴含的内容应该更丰富，不只是生产者或接受支持的对象，而是反过来，是照顾、支持和丰富城市生活文化的来源。如是，这个翻译该写成农业支持社区、城乡共好、提携……等等。有人早从农场加消费者的简单运作，衍生出超越买卖的互动平台……有人强调CSA是要建立另一种供需关系，另一种社会秩序，是要在“每一天生活”[7]中反思，并用行动去改变，就正如六十年代日本消费者运动提出的生活革命——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活著心中的理想。

四天半研习下来，我们理出一堆含丰富“微量元素”的“堆肥”，继续滋养各种称为CSA的努力和探索。从CSA再出发。

关于农

“堆肥”这个说法，对CSA的同路人来说很形象很直接很丰富。台湾农村阵线（下称农阵）[8]的蔡培慧用一张老农赤足翻晒花生的图片展开农阵的分享。照片中农民以脚趾头翻动花生米，颗颗完好无损，老人家身体里藏著一个纯熟精妙的农用农动程式。“农耕不只是劳动，还是身体记忆，是对自然和环境的一种技艺！”培慧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农是要通过脚、手、弯腰和锄头去体验，是与自然和环境发生深厚认识后发展出来的一种知识、一门技艺、一种生活方式、一道人与人互动互惠、人与自然有质感又无奈的社会关系；它超越主流科学理性和技术的理解范畴，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生活文化的想象。

农阵是在2008年台湾政府推出《农村再生条例》[9]后组成，这个跨界别联盟以知识分子及学生为主要推动力量，回应农村被城市化金融科技挤压的主流发展趋势——农村是被观看的对象，是城市人田园牧歌的生活想象。所谓发展农村，就是征农地他用，把生态多元的小规模农作变成工业化规模生产，满足城市需要，这是一个去农化的过程。“都市生活文明的绝对自信，让人失去对环境，对农的深入思考。”培慧说。

7 杨宝熙认为“每一天生活中有食，食在农。每一天生活就有社区”CSA就是反思生活，改变生活。

8 台湾农村阵线简介见附录一。

9 2008年台湾立法院一读通过《农村再生条例草案》，被关注农村发展的人士批评为以“促进农村永续发展和农村活化再生”为借口，实际上是为大型土地开发计划开路。草案缺乏农业或农村政策的愿景，有人称之为《灭农条例》，有叫它为《农村再见条例 》。

台湾农民2010年把稻米栽种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抗议发展商的怪手（推土机）蹂躏农田作物。凯稻影像鲜活，跟大陆和香港面对同样困境的农业隔岸呼应。在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策略下，大陆的三农是各级政府都必得处理的课题。农村政治基础薄弱，民生不保，近年土地被征收事件无日无之，钉子户[10]和怪手[11]成为农村一道风景。在香港，过去短短30多年，曾经蓬勃兴旺的农业因发展亚洲金融中心之名，差不多完全由进口粮食替代；乡郊零散的村落淹没在发展的大潮中，怪手唤起香港人对农耕生活的思考。大家同样面对社会资源严重向城市倾斜，土地、自然资源如水和林木，还有青壮劳动持续往城市跑，村里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

在/再农化

三地不同的CSA直面当下。研习会中，大家不约而同深情地谈农。

台湾：农阵因农（出代志[12]）进入CSA，他们开展农村社区工作，让青年进乡，实验城乡互动，学习到一整套关照自己关照大地的农文化；城乡互为主体。起步更早的是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下称旗美）[13]，2001年设立时已经清楚定位为一所农村型社区大学，以“农村是一所大学，向农村学习，在农村学习”为目标和方法——办农村工作坊、农村体验、农民市集、推动城乡有机互动网络等等，“透过种田去认识土地和人，认识人在土地的位置。”旗美的张正扬这样说。他们一方面凝聚结晶农村的生活智慧和文化，另一方面则满足农村强大的学习需要，要建设一个有现代意义的城乡网络。

大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下称梁中心）[14]，自2000年代初开始送大学生到农村，他们做调查研究，“勇敢介入”[15]大陆农村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被快速撕裂出现的激烈震荡，鼓励种养结合的循环农耕体系，建立农民互助组织跟城市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出现知识的转移、关系的调理，以至生命价值的重建。

10 指在城市建设征地时，不肯迁走的住户。
11 挖土机。
12 出代志是台湾用语，意思是出事了。
13 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简介见附录一。
14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介见附录一。
15 蔡培慧在其点评梁中心的经验时，如此形容支农行动。

香港：土地正义联盟（下称土盟）[16]和菜园村生活馆在2010年前后成型，在城市发展对（农）土地和生活空间的强暴面前，思考和慢慢建立结连自然生态和农耕文化的价值认同（根）。土盟在新菜园村所在地八乡支持复耕、推“八乡人吃八乡菜”CSA、搞社区厨房和社区导赏。生活馆那群积极参与反高铁护菜园村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农耕为生活和（兼职或全职）工作，老老实实种地。

“农家谦卑自抑求诸己的简朴生活观，不是透过货币获得生活所需，在面对地球资源渐趋枯竭的当下，为人类文明出路保留一种可能。”张正扬如是说。进入农中的CSA或CSA中的农，通过劳动、经验累积、观察和互动，让我们重新学习跟人和土地相互依存的知识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简单、实在、纯粹又绞缠的关系，个中的厚度、温度、味道……深深融入日常的琐细大小事中，深深刻蚀在身体筋肌脉络间……是一次文化回归：回归文明的本源和精神家园。

农：简朴。共享。舍得。感恩

也许，简单说就是三地的CSA经验把A-农这个概念打开，呈现一套相对于现代科学理性城市知识的文化知识体系。农，这不光是一种产业、一个被关怀和扶持的社群……更是蕴含丰富智慧、简单踏实、与有情众生和谐共生的生活文化。

来自四川攀枝花的刘占红和台湾苗栗湾宝的洪箱，现身说法，展示脚踩土地的农民本色——坚持、分享、舍得、自利利他和感恩的精神。洪箱说自己“认命”，知所能与不能而为之，认清自己跟土地的关系，安守本分。她因征地抗争和生态种植，跟城市支持者和消费者建立亲密关系。而刘占红则为保障生活开始做CSA，希望有一天抓著心中那美味的“蛋糕”[17]。他种菜、配菜、搞消费者互动等活动，样样亲力亲为，

[16] 土地正义联盟简介见附录一。

[17] 占红一直用“蛋糕”来形容他那美好生活的想象，里面包括富足、温饱、美丽、快乐的意思。

要分享家里山里的味道。很快，他放弃单打独干，选择跟乡里合作，“不能以自己为主……我学会平等交流、互惠互利、钱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情感、朋友、环境……”。刘占红和洪箱都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强调健康的环境和护土、强调跟城市人建立情感、强调下一代的承传、强调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如台湾甲仙爱乡协会曾瑞昇说：“让做农成为孩子的一种人生选择。”

农：小而美。越土越健康

研习会上，广西爱农会[18]两位年轻人给我们具体描述他们的农文化——小是美、越土越健康、保育和传递原生品种包括手艺、认识和学习传统、建立一个适合本土的可持续可循环的种养结合的农作系统。也许，就是他们在一次活动中写的对联：“好山好水封河养鱼。土鸡土鸭圈坡浪猪”。

爱农会的土生良品餐厅是因城市人要吃好东西慢慢演变出来的——食材来自周边小农，合作农户留种和种养原生品种、建立循环系统、互相合作。在大陆，狂飙的现代化农产业还及不到一些零星散布的小农家，他们仍然勤勤奋奋的从大地耕耘生活各种需要，保留著传统物种和手艺。“爱农会”以一个“CSA餐厅+农户”的商业平台回应食品安全、信任危机、城乡二元、农业产业化等等逼在眉睫的问题。饭店以及其后发展出来的餐厅CSA导赏员、社区农墟、传统食品加工、农户探访、农夫节等活动，建立多途径互动界面，帮助调节农产品的供需，也促进城乡间重感情重文化重互惠的交往，让大家互相看见、互相感触到。

“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外，还有其它可能吗？我们还相信甚么吗？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丁华明和刘胡佳都曾经是PCD的CSA实习生，扎到“爱农会”，游走过多个岗位。“在大陆找非主流是很困难的……我们用主流的商业模式去回应非主流的理想，土生农业、饭店和CSA实习生和导赏员成为一个探索的平台，是梦想出发的地方。”

[18] 爱农会简介见附录一。

农：梦想出口

吊诡得很，当农村持续老龄化的同时；农，却又是年轻人当下的梦想出口；三地皆然。洪箱和刘占红希望农耕和农村是下一代美好生活的选择。刘占红两个10来岁的儿子爱流连田间嬉戏和帮忙。洪箱的老二（高中生）不太适应主流教育制度，和几位大学生协力，在家联系CSA消费群体以及搞农耕体验活动，并获得基金资助拍摄一套关于老家湾宝的纪录片。丁华明和刘胡佳通过饭店和相关活动平台，返回土地，一步步实现非主流梦想。他们的非主流兴许就如点评老师说的："从疏离出走、对物质主义反思、寻找社会现实。"CSA让年轻人有直接简单又富温度和深度的人与人的互动，是具体鲜活的生命的碰撞和观照。

交流。转移。调整

梁中心的支农学生大多来自农村，背负著父母亲"知识改变命运"的沉重期盼。但因现代教育与生活割裂、因城乡二元差距、因三农问题……他们带著建设乡村的概念再回到第一线农村。眼前的现实更沉重。支农是再农化教育，个中牵涉资源的交流，知识范式的转移，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他们与农民一起尝试走向新的可能性。原来看似是简单的买卖供需关系，因土地、食物和农，纵向串通文化根源、横向融汇社群学科，变得丰满多姿。梁中心长出绿盟直销农民合作社产品，成就年轻人城中公社生活实践。

大陆：华德福学校[19]年轻的家长和老师，是内地CSA最早也是最坚实的参与者。农、园艺和食物是学校的重要课程，自然是最慷慨的老师。年轻的家长送孩子上华德福幼儿园和小学，慢慢地，有人一家子搬离城市，长住郊区，租地开田。

[19] 成都华德福学校简介见附录一。

台湾：进乡青年为小农创品牌做土农、北部宜兰穀东俱乐部[20]用CSA方法让要回乡种米的年青家庭愿望成真。

香港：城市农夫搞天台种植、半农半X、CSA配菜共购、在城市边沿建立一个活力十足既生产又搞活动的马宝宝农场。在行动中得到力量。看见、感受到更厚更深更坚实的来自真实的泥土和人的力量。此刻就是未来。

近乡情怯。流动身份

有认为人类身体中本来就有跟土地联系的基因。所以，城市人（因为离开土地）总有乡愁：近乡情怯，CSA回应了乡愁这个核心问题。在大陆和台湾，乡的观念很重，为根之所在。离开后，乡就出现。过去也有城乡互动，大势却是单向城主乡客不平等的关系。当农的主体出现，重新掌握对土地的话语权，小农身份进入CSA的论说中，这种城乡互动，遽然开豁，枝繁叶茂花果盈硕。相对大陆和台湾，香港人的乡愁比较淡薄。香港只有乡郊，那股“回乡”的感情，也许是更纯粹的一种身体的原始呼唤，是一份社群关系以及自己内心浓重的疏离感在发馊。这些年，我们看到城中原来也可以有“乡”，回应内心对自然对有厚度的关系的愿念。

我们看到“城乡”可以更为松动，就像有朋友说的“水泥屋子松了，可以筑起木房子”。在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中，在台湾心脏地带的101大厦旁，每星期有人头耸动的农产品市集，农夫与消费者快乐相聚。在台湾高雄市中的微风市集[21]，农民与外地媳妇团体等一起展示手艺。四川绿心田·生活汇[22]的朋友们与农友打开生活的面向。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只是二元的买卖关系，城乡没有边界，身份是流动的，农是一种选择，正如“半农半X”里面的“X”是开放的，大家共同分享著对土地对自然对生命的谦卑和尊重。此刻，再回到CSA，我们看到社区和社群原来不单是住在同一个地域的人和自然，也是一群拥有或追求或关心或思考共同课题和生命价值的人群，他们正在用不同方法，协力朝这个方向走去。

[20] 参考本文集台湾篇另文：〈一名台湾社运青年的归农旅程〉。
[21] 微风市集简介见附录一。
[22] 绿心田·生活汇简介见附录一。

生计在地。生活回归

主体互动转换协力，在地上流淌漫溢，形成美丽多姿的图案。永续栽培（permaculture）提醒我们向大自然中恒久美丽的图案学习——蜘蛛在树丫间结的轻丝网、雪花的排列……等等，这是大自然的语言，展示能量流动汇聚的稳定和谐状态。从日本欧美等地的CSA，我们学到共同购买、市集、消费者合作社……等等。这些互动大部分都是小而美，强调在地互助、协力、合作……个中流转的除了物质外，还有身份价值、感情、生活方式和文化美学……香港岭南大学许宝强老师提出本地这个概念要有“社区的人文面向、有生态的可持续面向、还有文化身份的感情和价值面向”。

香港社福机构圣雅各福群会从2000年初开始推动社区经济，回应城市边缘社群的贫困问题：先是物物交换、社区货币、然后是城乡劳动力转换、土货店、CSA、还有食品加工的土作坊[23]。不同的互动/活动，重新整合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和交换经济和非经济效益。刚刚起步的“八乡人吃八乡菜”在健康蔬菜背后，带著一个让农村农业在香港继续存活的悬念。搞得有声有色的台湾微风市集，服务小农生计及其他共生的非农社群，市集里面有吃的、有用的、有感情文化的……蹲在台中的合朴，则从农民出货的市集开始，提出“好好务农。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合朴的陈孟凯说，合朴要成为一个坚实的经济体。在合朴，人们学习不同的生活手艺，如务农、如做豆腐、如调咖啡、如制做生活所需品……生产自己生活需要的，以及可互相交换所需要的。生计在自己手中创造，生计在每天的生活中重整。

研习会中回荡著一个清晰响亮的信息：要回应眼下种种疑惑、失落和困难，改变人心、社区、生活的衰败，需要一种自下而上，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行动，要一种（相对现代科学理性和市场资本主义）文化转化。文

[23] 土作坊简介见附录一。

化是细水流长的积累，要求每个人每天每夜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反思。意识很难改变，无论是知识分子或农民。行动是起点。广州中山大学的张和清老师认为，希望在日常微细的生活中，从建立简朴、自在、实在、多样性、多元的生活开始，让我们学会舍得、坚持、感恩……让社区包括小农的主体性出现，让地方如农的知识和智慧得到尊重。

是关于身体记忆

曾经认真做过堆肥、锄地、收割、煮、买、卖、碰触土地和从自然长出来的东西的你我，除了学习到相关理论知识外，都应该经验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两者其实不能分割，这是现代社会缺少的一个重要链扣。不同的CSA提供各种各样的链扣：接通，看见，感触。研习会中，本来我们以为可以为CSA找出更好更清晰的翻译，或对当下的一些探索正名。最后，大家抱著一团充满微量元素的堆肥回家。这些元素好像有点杂乱有点沉重，应该有各种各样味道和质感。我们期望它继续发酵，供养你我每天每夜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践行和思考。

陈惠芳
“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协作者
2012年　冬天

再认识以农为本生活的价值

农的情结："每个人都是农民"

成都华德福学校的周远斌老师在研习会上介绍华德福的教育理念时，曾经说到："每个人都是农民"。听到这句话，我的脑海突然"叮"一声，好像打通了天地线一样，因为跟我准备要讲的重塑社区与农的关系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我尝试从两个角度理解周老师称为"农的情结"的这句话。首先，农民跟土地（代表整个大自然）生死相联，从本源的角度看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跟土地密不可分：一方面，没有从土地生长出来的食物，我们无法存活，或者我们的血肉筋骨跟气脉本来就是食物或土地的化身；另方面，今生结束后，每个人的躯体都需要回归土地，化作肥料或春泥，滋养新一轮的生命。只是现代的城市人远离农和土太远了，忘记人类原始的农民身份，以至无法了悟"身土不二"的道理或智慧。如果我们都能在精神这个层面上认同"每个人都是农民"的话，城市市民会对仍然在四季中周而复始地辛勤耕作，让土地长出粮食来喂养众生的农民，生出多一份的认同感、敬佩情和感谢心，甚至愿意回到土地，尝试发掘耕作的本能或掌握农耕的知识，把人类被遮蔽的农貌，展露出来。

其次，从生活的角度看，农民聚居和劳动的地方，被称为农村。农村其实不是一个地域或地方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发挥著多种功能、维持著多层关系、让多样文化生长和得到实践的空间。就此，不少农村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著作都有讨论。这种以农为本的生活社区，其实是非农为本的

城市社区的原型。上述人的生命与土地的互相依存和循环关系，也见诸于人与人之间。有别于狩猎、采集和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是人类以固守土地的方式生存的表现，但要维持整体的自给自足生活，是非单个的人努力能成就的，而是需要人与人之间日常的互相沟通、帮助、支援、交换和情感交往，这样，群居是自然的，并因而出现不同的群体或集体，形成不同形态的自然村落或社区。这种互相依存的生活（无论是物质的或是非物质层面的）也产生知识的互动、积累和传承的需要，所以出现不同的文化形态（如祭祀、庆典、市集、传统的私塾或村校等）和不同秩序和价值的建立（如敬畏自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互助互补、尊师重道、尊老爱幼，等等）。

可以说，传统以农为本的生活社区是一个整体，人与土地、人与人、生产与知识、生活与学习等关系和功能是分不开的。反看今天去农化的城市化社区，这样应有的整体生活的不同面向，改由个别（很多时是互不相干的）的现代功能组织来承担，例如工厂、公司、学校、社会服务机构、政府部门等。由于已经失去“农”所产生和支持的基础和价值，生活容易变得切割、疏离和不可持续。例如，在学校学的知识，很多时跟生活是脱节的，更无法回馈社区。因此，“每个人都是农民”可以成为城市人从本源出发，思考如何以恢复一些农本的元素，重新搭建现代生活社区的始点。在未就个别案例如何以农为中介，还生活一个原本的面貌，并促进社群的结连和社会的变革作出评论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中港台三地的农民/村/业独特与共通的去农化历史脉络与处境，好能更清楚三地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实践，是回应著怎样的“三农”问题与引起的生活危机。

两岸三地去农化的历史过程

无论在台湾、大陆或者香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都经历过用作服务（直接或间接）于政府政策、资本/市场需要的历史过程。日治时期的台湾，农业是被发展来支援日本的工业发展的，被突出的是其经济性，而做法是将之产业化，以进行资本积累。1920到1939年间，为了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殖民者在那段时期已经引进化肥等使用技术。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农业政策的重心放在全面增产，除了要养活大量因迁移和自然增长的军民人口外，更重要的是满足政治或管治上的需要，例如以“反共抗敌”的意识形态，激励经过土地改革重新拥有土地的农民，加紧努力增产，养活自己的同时配合政府“以农养工”口号。政府则以农业创造的外汇发展国力和轻工业，推进的具体农业政策包括第一波绿色革命的措施：品种的改良、化肥的使用、机械的投入等，还有对农民不利的“肥料换穀”等政策[1]，这是1945年到1968年的情况。台湾农村阵线（下称农阵）[2] 蔡培慧指出，七十年代以后的台湾小农，虽然因政府保价收购稻米而稳定了收入，但却要面对政府越来越自由化的农业政策，例如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施压下，“由生产导向的生存农业，转为‘市场导向’的竞争农业”，九十年代之后，台湾政府更“放弃粮食自主、开放农业市场、要求农民离农休耕，埋下了粮食依赖与农村凋敝的恶果。”[3]可以看到，台湾农业服务于政治，不仅导致整体粮食生产离自给自足越来越远[4]，农业工业化，小农在各种政策的调整过程中被剥夺，近期更因越来越多政府征地的行为而恶化。

1. “肥料换穀”政策是政府以统一供应化肥给农民，换取其粮食，作为税收，发展本土工业。其对农民不利的地方在于农民需要以低于市价20%的稻穀买政府统售的肥料，但由于肥料是公营独占事业，政府订定稻穀与各种肥料间的交换比例，以稻穀计算的交换比例来看，呈现出肥料价格过高，而稻穀价格偏低的现象。例如在五六十年代，台湾农民比日本农民约多支付50%的价钱，来购买台湾农田施用最多的硫酸铵，可见政府从这里获得的税收是如何庞大。见萧国和（1991）：《台湾农业兴衰40年》，台北：自立晚报，页86。
2. 台湾农村阵线简介见附录一。
3. 蔡培慧（2011）：“选择另一个未来：农耕、阳光与「伙伴们」”，《种好菜，过好生活！社区协力农业完全指导手册》推荐序。
4. 据统计，2007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到30.6%，是历史新低。参阅蔡培慧（2010）：“油菜花田背后：农业结构与粮食安全”，《新使者》第120期（2010年9月）。

大陆方面，五十年代以后农业服务于政治的形态，跟台湾类似，也是以农养工，即通过计划经济对农业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不同的是，在冷战思维与格局的情况下，加上大跃进期间“以粮为纲”的口号，共产党在农业生产上不仅必须做到自给自足，还需要以增产来显示社会主义集体化生产模式的优越性，并连同工业上的成就，达到“超英赶美”的目标。不幸的是，这个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的目标不但没有达到，农业与环境、农民与农村在五十年代末那段时期还受到历史性的创伤：农业产量没有如“放卫星”般增产，反而因天灾和其他原因而严重减产；土地则为要应付不切实际的高产量要求而被过分开发（例如“围湖造田”的做法），造成生态上的破坏；“农民”作为“工农兵”革命符号的一员，虽然获得了历史主人翁的位置或光荣劳动者的身份，但无法统计的大量活生生个体农民，在严重的饥荒中饿死；农村制度和生活经过集体化的改造，从上而下指令性的合作式生产和社会化生活（例如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缺乏较长的意识转化和民间自发组织力量承托的情况下，当七十年代末面对另一次的意识形态转折时，很快便瓦解了。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曾经指出：“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亿计的、以全民所有为名而以部门垄断为实的国家资本，供后人以各种改革的名义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留下一个城乡分割、矛盾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5]

在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后八十年代，在代替集体生产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8年改称“家庭承包制”推出后，中国回复了小农经济的传统，但变得“零散化”的农民却难以像以前一样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因为市场化经济成为了主导，传统的农村文化也被社会主义历

[5] 参阅温铁军（2009）：《“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页18。

史改写，“单干”成为主旋律。与此同时，在引进外来资本和设立经济特区等政策的刺激下，大大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遗留下来而未有解决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变得更为严峻，不仅导致大量农民往城市流动，成为农民工，在涌进的外企打工，或者为城市人盖房子、当保姆、服务员等，农村在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变得空虚：不少农地丢荒、仍然耕作的农民越来越依赖农药化肥增产增收、传统知识与文化无法传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等等。这些都导致农的运作、文化和价值崩溃。近年中央政府指示加快“乡村城镇化”的速度、地方政府不断征收农地发展工商业或加快城市建设、从农村到城市读书的大学生不能恢复农村户口、农民工想长久留在城市、留守农村的农民觉得农耕没有出路、农村小学停办、一般城市人（甚至农民）对农民（自己）或农村的想象仍然与“落后”、“愚昧”、“老”和“贫穷”扣联等等。在如此去农化或农村被城市化大潮挤压的情况下，农业逐渐萎缩，生产则越来越向企业化和规模化（也就是单一化、科技化）倾斜，粮食则越来越依赖进口，可以说，无论从生态环境与民族生存的角度看，都危机重重。

香港面对的去农化问题更为严重。不少外地的朋友，都以为香港只有高楼大厦、商场、金融中心等地方、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确，“三农”没有构成社会关注的议题，因为香港的农村/乡郊（新界）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农地逐渐变成住宅地、货柜场、停车场、废物场等，农民也因土地可以直接转换为现金、市场受到进口粮食的冲击和政府缺乏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而逼得弃耕转业，因此，在整体的经济体制中，农业、渔业等基本生产的产值，真的已经少得微不足道，粮食越来越依赖进口。1997之后，高度城市化发展主导著政府政策。农村/乡郊土地和村民受到更严峻的挤压，情况一直没有停止。近年政府因为要修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而清拆元朗八乡菜园村和附近村落，以及以发展新界东

北区成为新市镇之名，正计划清拆粉岭多条村落，这都是最好的例子。可以说，以金融、地产、商业、旅游和服务性行业支撑的香港社会，主流价值必然认为农业应该为这些行业让路，仍然从事耕作的农民被边缘化，传统的农村文化和知识被忘却。

社区即农业，农业即社区：以农为本的生活实践的启思

综合上述两岸三地的去农化过程，我们看到一些全球共通的问题：由政府和资本操控的现代农业，已经将原来承载丰富文化元素的作业模式（agriculture），转化为积累政治经济资本的环节（agribusiness），传统农业文明在农村和农民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消亡；今天生态的危机及现代生活的割裂和不可持续性，很大程度跟农的规律与文化价值（我理解的“文明”的含义）的失落相关。我认为“我们都是农民”这个理念能对应这种危机、割裂和不可持续性，并不表示我不切实际地提倡所有人回到农村，从事耕作，或者浪漫化地视农村和农民为能救赎人类的妙药灵方，而是因为它能提醒我们农与生活的关系。我相信，只有农的规律被恢复和农的文化价值再次被确认，甚至提升为一种普遍价值，或者说能持续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再被正视时，危机才有机会缓和，割裂和不可持续的现代生活才有被整合的可能。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对社区支持农业中的“社区”和“农业”，可以作不同的理解：两者不是分开或者是二元的。意思是说，不简单地将CSA理解为城市消费者“支持”[6]小农的有机作业（甚至反方向小农支持城市消费者），而是视市民与农民均同体同源，城市与农村都是以农为本的生活社区，只是形态不同而已。当地域或行政意义上的“城”与“乡”、功能意义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以至理念上的“中心”

6 台湾农阵翻译为“协力”，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翻译为“互助”。

与“边缘”的界线被消解或解构后，“支持”、“协力”或“互助”的实践，便可以赋予新的含义：社区即农业，农业即社区；我们都是农民，农民都是我们，在不同平台实践的CSA，让我们看见原本由农业文明支撑的生活社区的循环性、共生性、整体性和丰富性再次出现。

成立于2008年的台湾农村阵线，是一个包括农民、农村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媒体工作者、学者、作家、律师、工程师、艺术家、青年等的联合阵线。这个发源于反《农村再生条例》抗争运动的阵线，高举维护农村的旗帜，却能够吸引众多不同背景的市民参与，可以说是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个突破，说明对于不少人来说，农地被破坏、农业萎缩、粮食生产受制于外部政治经济等，已经不是农民单独面对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体台湾的存活，农阵以支持“小农经济、永续农业、粮食主权”作为其主要行动理念，背后有其对这些整体问题的批判思考。不过，有意思的是，农阵不停留在政策倡议、社会游说、组织农民等方面的行动，还以农耕带动年轻人，从土地出发，向农民学习。学习什么呢？

首先是学习人如何跟土地建立关系。懂得与土地建立关系的人才称得上是农民。农阵希望青年学会这个“基本功”，一方面是对应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的问题，看协力下的小农经济是否能吸引年轻人返乡务农。因此，在2009年八八风灾后农阵支持台东和高雄县的小农进行复耕、转型友善耕作、组织合作社和开拓多元销售渠道时，都放置年轻人的参与角色。正如项目的负责人陈芬瑜总结说：“现阶段中老年农友是田野农事的主力，然则年轻人所扮演的穿针引线、连结各方的角色，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角。”[7]尽管成为全职农人仍然是极少数青年人的选择，但懂得与不同人建立关系，也是城市青年学习的重要内涵。农阵发言人蔡培慧在这次CSA会议上曾经说过，田间劳动、“弯腰生活节”、“弯腰农夫市集”、“夏耘——农村草根调查营队”、小农复耕、抗争等行动给青

[7] 陈芬瑜：“小农复耕计划中的青年实践”，发表于2011年“乡村社区发展国际研讨会暨台湾乡村社会学会年会”。

年所提供的教育，是让他/她们从疏离中走出来，看到社会整体的脉络与关系，学会承担，在组织中扎根，为土地伸张正义。我认为，农阵这种以农为本的实践，已超越一般青年/大学生返乡、留守农村或支农的“支持”涵义，涉及生命循环、身体劳动、生活社区、文明系统、社会结构等面向，像培慧说那样，是在解决台湾整体的生活可持续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与生活脱节，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不仅是一般台湾城市年轻人的问题，香港也是。幸运的是，跟台湾一样，香港有机会在土地抗争的土壤中，培育了一大批青年走近乡郊与农耕：2008年开始的反高铁运动，以守护受影响的菜园村不被迁拆为行动核心，引出香港主流发展对乡郊土地的侵蚀、农业受到蔑视、我们要过怎样生活等方面的讨论。过程中，被称为“八十后”的青年发起在中环等城市心脏地带，手端著米粒一步一叩的“苦行”游行，引起很大社会反响。这种首次出现在香港的土地行动，场面虽然没有农阵在台湾发起的“凯稻米”那么震撼，却同样对不少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后有人成立“土地正义联盟”（下称土盟）[8]，监察香港土地规划与使用是否公平、正义和生态保育原则。有人通过开展有机农耕，与土地和更多的建立关系。例如在村民向政府争取“农业复耕”资格的同时，一帮人（包括大学老师、艺术工作者、社运活跃分子、大学生等）以“菜园村生活馆”为旗帜，在还没有被拆的菜园村中开地耕作，并自己制作食物，希望展示以农为本的生活在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地方的意义和重要性。2011年，菜园村被清拆后，生活馆移师到附近一条村，成员继续租地耕作，三位青年更成为全职农夫，还开始种植在香港农地上已消失多年的稻米，以及展开共同购买、农夫市集等活动。另一边厢，土盟属下的“八乡绿色生活社”与一些村民在菜园新村合作组成“菜园农业先锋队”，恢复耕种和推动“八乡人吃八乡菜”的CSA计划。过去几年，出现越来越多类似“生活馆”和“菜园农业先锋队”的小型的CSA实践，虽然远远未能扭转

[8] 土地正义联盟简介见附录一。

香港的去农化趋势，但越来越多城市人把农纳入其生活中，在天台、花园或阳台堆肥、种菜，或者当假日农夫，有些则从改变生活著手，减少废物和循环用水等。最让我感动的是看到更多“八十后”和“九十后”年轻面孔，愿意向土地/农民学习，在田间动手，以身体和劳动参与正在展开的土地保育和生活运动。

同样深深触动我的是华德福教育的理念与行动。华德福的人智学理念是将教育建筑在人与自然和生活的密切关系上，人是融合在教育和社区之中，而校园是社会和文化运动的载体。在成都的经验中，教育的持份者不仅是孩子、家长和老师，还有附近的邻居和村民。如果说农阵和土盟的工作把农业社区变为学校，华德福教育则是把学校变为农业社区。校园的选址大多在城市周边，所以会有自己的耕地或农场，在让老师方便地教授园艺及生态农耕课之余，家长亦可以参与进来。最让我欣赏的是学校没有把身处的农村只看作一种环境，或者只是提供土地的空间，而是视作其中一分子，让孩子、家长和老师跟农民建立情感关系，通过如协助农民卖菜等工作，让学校融入农村生活，向农民学习。为了更接近土地和学校，有些家长（大多是城市中产人士）甚至整家搬到学校所在或附近的村子。可以说，华德福教育很有效地通过以农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做到社区融合，这是一种打破市民与农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头与手、生活与知识等隔阂的共融。

同样将农与学、生活与社群/社区有机地结合起来的CSA实践者是台湾的合朴农学市集（下称合朴）[9]。合朴的召集人陈孟凯和他的伙伴们是最早（2007年）在台湾举办农夫市集的人。但他们搞市集，并不是为有机农夫提供销售场地和让消费者买到健康食物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共同（农友、志工和消费者）建立美好生活的实践行动。他们相信，“健康而永续的美好生活需要众人合作、尊重大地、简朴过活；适当使用

[9] 参考本文集台湾篇另文：〈让“社群“述说“美好生活”的故事〉。

资源的简朴生活，则需要从农艺生产和学问反思开始，一群人互相支持，在“合作、简朴”（合朴，hope）的实践中，自给自足，共同成长。”[10]跟农阵和华德福学校不同，他们的学习平台包括每月一次的市集、一个固定的永续农业教育中心和一块公田，方式是定期举办如生活色彩非常浓厚的“好好吃饭”系列课程（如有支持台湾恢复种黄豆含义的“豆腐农艺”课程）和“共同厨房”活动（学习食物加工技巧与文化等)、体验靠天吃饭的智慧与辛劳的“好好务农”系列课程和增进智性认识的“好好读书”系列讲座。他们还利用“部落”的形式，组织长期关注如保育台湾米（通过农民保种、消费者吃本地米等推广）、经营市集和务农的农友、消费者和志工，让工作和关系可以较稳定地持续下去，进而形成“一个互助互惠、自给自在的小而美社群生活新型态”[11]。难怪创立人陈孟凯认为合朴最大和最珍贵的价值在于“拥有一群相互信任的伙伴”[12]，而这些伙伴是跨界别的，台湾社会总体忽略和漠视农业、现代生活让人变得越来越疏离、食物工业化生产等问题，可能是以“农学”[13]集结小农、市民和积极分子形成行动阵线推动改变得以出现的原因，而“农学”的核心精神，正是陈孟凯所归纳的“遵行大自然的法则，回归自然”，这不仅是农法，更是美好生活的法规，用最“合朴”的说法加以阐释，那就是：好好务农，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读书。

[10] 陈孟凯：〈合朴与社群支持型农业〉(2012年9月10日)，页1。
[11] 陈孟凯：〈合朴与社群支持型农业〉(2012年9月10日)，页4。
[12] 陈孟凯：〈合朴与社群支持型农业〉(2012年9月10日)，页1。陈孟凯：〈合朴与社群支持型农业〉(2012年9月10日)，页1。
[13] 陈孟凯：〈自给自在——合朴社群生活与行动〉，收入合朴农学市集出版的《合朴幸福抱》第四号（2012年1-3月）。

结语：“落地生根”

这次CSA研习会，还有很多在过去十多二十年中默默耕耘的CSA实践者，如以餐馆为实践平台的广西爱农会、在大陆多处推动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乡建中心、运营台湾第一家扎根在农村的社区大学旗美社大、在香港组织基层妇女通过食物加工连接有机农耕的土作坊，等等。但这些不同形式的实践，让我看到“农”不仅在一些农村社区得到某种恢复，还因为其生活性、文化和行动性，可以在其他生活社区落地生根；在这个空间“耕作”的农民，不仅只有老人，还有是小孩、大学生、工人、年轻职员、家庭主妇、老师、艺术工作者等等。农的作业，不仅在生产粮食，还在改善环境、搭建关系、营造社区、移风易俗、建构价值，真的如农阵所概括的“农很有用”（“农用”口号的含义），或如生活馆的理解，“农”在“生”与“活”中间，落地生根。

农生根，风调雨顺，生活长得健康，就算遇到不测风雨，也不倒。是为2012年即将结束时我对未来的愿景。

陈顺馨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012年　冬天

近鄉情怯

香港篇

近乡情怯。乡，对大部分香港人说，是成长的大厦屋村小巷，是儿时居住的某个区域，城市某个角落……。而情，扎不稳长不深，高速生活节奏叫情快来快逝，忘记，也就不自觉没乡无根的滋味。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当健康食物成为稀品，在农耕乡郊被挤压要成绝响，而生活和工作空间越缩越小再没有多少选择馀地，甚连文化教育都让人感到异化疏离……如是，香港人慢慢在石屎堆上开辟可让身心安住的生活。

人们返回农。香港有农，那原是不远的昨天。五六十年代新界西北元朗平原还在生产远近驰名曾上贡朝廷的丝苗米。蔬菜方面，即便到了地产起步的80年代，仍然能供应本地三成需要（**文：归去来兮？！**）。地里山上河谷深海，我们都不缺。那是80年代，香港人赫然发现毒菜在每天的菜篮中。一些人开始反思城市与土地的关系，拿起锄头归田。有人开始推动从外国学过来的社区支持农业，实践不一样的消费与生产关系，叩问金融资本发展的伦理逻辑，探索生活持守的价值，重整在地资源。扎根。然后，是一连串必然和偶然。（**文：共同购买二十年——香港社区支持农业小史**）十年人事几番新，好些名字，如丰之谷、如陈皮村等等，今天仍然坚持努力（以不同形式）耕耘的，都俨如文献中的构成。

今天，香港这弹丸之地，有越来越多不单靠农耕为生的城市农夫，个中有四五十岁的退休人士，也有年轻的七八十后，他们选择下地，尝试用劳动，一手一脚创造以农为基础的生活文化（**文：香港社运青年的归农路**）。位处新界八乡的生活馆正蹒跚摸索一种可持续农耕生活之法。那种清早摸黑收割，然后走到市集摆卖，养活一家几代的故事，已经很难找到。然而，城中的高楼大厦天台有菜田，豪宅的阳台有跟鱼儿共生的蔬菜。我们有不一样的农。然后，繁忙的金融中心地带农夫市集每星期摆开（**文：农墟——展现生活的精神**），各个社区有不同形式小规模的共同购买（**文：大城小事——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静默革命**），乡郊有跟地产城市发展殊途的复耕运动，闹市中则有扎根社区以社会资本为经脉，重整生活资源和文化的在地生计（**文：城市接连农业**）。跟农互动的社群底面貌越来越丰富，互动的深度和厚度都提升了——从生产到加工、城与乡劳动交换、生产与消费共好等等。（**文：在香港思考农业与社区**）如何重新思考“社区”，如何重新理解城中的“农”，如何丰富之间那支持/协作/共好/互助等关系。

在香港与大陆东北边界沙头角的南涌，一群自称养地人的香港人集（人和财）资，尝试保育这块一度是农耕群落聚居的地方。时代更迭，现在大部分房屋和田地都丢空，自成另一种详和的生态环境。就是这么一群数目不多的城市人，一点一滴地累积（人和情），建设梦想中的生态生活社区。如果选择一种颜色、一种气味、一个形状去形容香港这十来年的经验，你会给出什么答案？

归去来兮？！

※ 周玉珠

本文综合整理土地正义联盟朱凯迪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上发言及相关资料而成。作者周玉珠为本文集编辑。

偶尔和初来埗到的外地朋友闲聊，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大家不约而同都提到处处都是高楼大厦，建筑物之间的间隙很小，甚至抬头“不见天日”云云。这样的比喻听来可能有些夸张，但至少和应了少时教科书对香港的描述：地少人多，寸金尺土。

土地何价？

2013年的香港楼价直逼甚至超越1997金融风暴前的颠峰时期，升斗市民尽在高呼地产霸权，在漂亮的经济数字背后，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和质素却变得越来越狭窄和恶劣。如何脱离香港政府长期以来那种将土地与经济数字挂钩的思维，似乎是美好生活的出路。曾几何时，脚下这片土地本来是一大片绿意盎然的农田，农人辛劳种植的稻米和蔬菜作物，滋养一代一代人的生活和生计。元朗丝苗更曾是一级名米，教许多香港人引以为傲。其实，只要翻看香港近代的历史地图，就会发现，香港原来曾是农业聚集之地，而且就在并不遥远的数十年前。

粮食安全＝维稳＋形象工程

前英国殖民政府一直关注香港的粮食供应问题，特别是1925年爆发省港大罢工后，大陆供港粮食出现紧张，殖民政府意识到个中危机，认为需要自谋出路[1]，自行生产农作物，因而积极资助成立新界农会，又每年举办农业展销会，以推动本地农业。1934年，更成立农业专职部门，向小农贷款，成立合作社，并鼓励及指导小农种植等等[2]，务求在粮食上做到自给自足，以免受制于人，因粮食不足而引起恐慌，触发社会动荡。战后，大批难民涌到香港，港英政府实施合作社条例，让新界移民种菜或养殖禽畜维生。

不过，农业真正成为政策，是港英政府于1946年成立蔬菜统营处（下称菜统处），建立蔬菜统销制度，保障农民免受中间剥削及获得较合理菜价之后。政府推出扶持与保护农民及农业生产等一连串举措，当然也有政治上的考量，改善农民生活，在在都能为英国殖民管治赚取分数。不过，农业的黄金岁月，很快就因为香港经济转型、政府政策转向及大陆改革开放而备受冲击。一方面，香港经济从农业慢慢过渡到制造业、工商业和金融业；另方面，政府陆续收地发展新市镇，以纾缓日益膨胀的人口压力。随著整体土地政策出现转变，土地用途发生转向，越来越多人放弃务农，农业逐渐萎缩，而来自内地的蔬菜大批涌入香港市场，也使本地蔬菜生产一蹶不振，至今差不多已经要完全依赖进口粮食。

过去二三十年间，香港的荒废农地一直维持在4,000公顷左右。虽然农地面积急剧下降，农民的数目亦从1961年11万多人，骤减至今时今日的4,000多人，不过香港的农业并没有绝迹。根据政府公布全港还有1,875个点，包括传统的菜场，也有上年纪的菜农耕种，另有大概100多个有机农场等，但多定位为休闲农场。[3]不过鉴于许多农民都是租地耕种，只要地主一卖地，多年心血就马上化为泡影。

城市人对农的感悟

近年，因政府收地开展公共工程而迫迁农民的事件，屡有发生，其中因兴建接连深圳广州的高铁项目而引起的菜园村抗争，就是一例。在收地抗争过程中，有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青年或关注香港土地公义的团体，为受影响的农村和农民发声。关注不同土地议题的组织者及社群组成的社运团体应运而生，土地正义联盟（下称土盟）[4]便是其中之一。

土盟认为，“城市与乡郊不能割裂，城市侵占乡郊绝非必然，而近年城市旧区的士绅化发展，更非港人所乐见的发展模式”。土盟相信，“只有恢复本土农业，香港的乡郊生活才得以持续，唯有捍卫老区的草根生活和社区经济，城乡关系才可持续发展，共存共生。”[5]

在支援菜园村抗争运动的过程中，声援的社运人士深切体会到政府的土地规划混乱，对农业及粮食冷漠而缺乏远见。此外，在所谓发展的过程中，影响最贴身的居民往往只是被谘询的对象之一，遑论民间的参与。土盟对征地趋势进行的分析追踪发现，香港人对农业感到陌生和疏离，抗争运动只能抓住媒体对激烈场面的短暂注意，土地运动若要延续下去，必须得到更多香港人的认同，明白土地的真正价值。

菜园新村——新农村试验场

菜园村，一个没没无闻的新界农村，因香港政府2008年底正式拍板兴建高铁香港段的方案，宣布收回土地，触发一场“反高铁，保菜园”的社会运动，也唤起不少香港市民，特别是年青的“八十后”和“九十后”对何谓“发展”的觉醒，反思与探索。

虽然兴建高铁最终仍一锤定音，传媒对菜园村的热情亦已逐渐降温，但运动的火苗并没有就此捻熄:在菜园村留守到最后的47户村民最终另觅新址搬迁，重建菜园新村，而在事件中一直与村民并肩同行的城市中人，如土盟成员之一的朱凯迪甚至迁进八乡居住，与村民一起，尝试在这个城市中建立农生活的空间，营造一个城市中的农耕社区及生活方式，向大家展示农耕的价值，一种有别于事事以“经济增长”衡量价值的发展观。

“我并非喜爱危机，也不是喜欢被人赶走，我的问题是，若我们不被人赶走，是否可以过比现在好的生活？”朱凯迪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集体搬村的户数确定下来后，“那便是一个新的社区。”[6]从不迁不拆、搬村建村、社区营造[7]到推动永续农业[8]，他们要建设的是一个以居住、生产、及社区的组织组成的乡村，一个香港史无前例的新农村计划就此展开。

生态村的示范 展现农的可能

社区要营造起来，需要社区民众的共同参与。从抗争到建村，村民在外界支持及声援中获得力量，变得越来越敢于表达意见，据理力争。虽然菜园新村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面对很多挑战，例如造价高、每户承担力不同等等，但村民经过讨论和商议后，决定将14万呎土地的四成多，归“菜园新村有限公司”所有，日后若要变卖土地，必须得所有股东通过。此外，又决定以集体公有制方式，规管土地、房产、公共事务和合作耕作。

为了将边缘化的农业与社区结合，并建立以保育土地为宗旨的社区，土盟及新村居民邀得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王维仁协助设计。按照规划，菜园新村还加入生态元素，尽量保留原有的生态系统，如村内原有的龙眼树林及鱼塘，而家居废水则透过排水系统循环，用作树木灌溉等。对村民来说，新村，不止是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也是一种示范，透过新的生活模式，展示人对土地应有的态度。

地区报 导赏团 实践社区营造

菜园村位于八乡，但在菜园村抗争运动中，村民并没有得到作为“本地人”的八乡村民的声援，反而是“外来”的城市人进来撑他们，使之成为全港性的事件。若当地人都不关心自己的土地，可以怎么办？究竟怎样才能提升当地人对自己土地的情感，以及发动人关心土地和农业？在土盟成员及菜园村村民的共同探索下，一个将八乡居民连系起来并凝聚社区共同归属感的社区营造方案，逐渐成型。

菜园村村民和土盟为营造社区而设计的内容很多，包括种菜、开设市集、发动集体厨余回收、出版《八乡锦田地区报》让八乡人互通消息，设立八乡绿色生活社和举办行为艺术表演活动等，希望藉此逐渐把不同类型的人组织起来，并且向大家证明，社区和农业，应该并存，不应分割。

地区报的原意是想增进在当地居住的“过客”对八乡历史的了解及农业的支持，始料不及的是，地区报的忠实读者竟然是长居于此的“原居民”[9]。这也不难理解，这些本地人对八乡历史及事物多了如指掌，也特别有情感，而地区报误打误撞，因而打开与他们对话的一扇窗，都有助今后凝聚社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与此同时，为了把土地保育精神推广出去，现在每逢周六及隔个周日下午，菜园新村的村民都会举办导赏团，让外来人走访，参观耕地和临时屋，更会提供点心和农家菜，让城市人一起见证新村成长，可说是城乡互动的一个实践场所。

八乡人食八乡菜 重建社区关系

说到营造社区，必然牵涉到建立社区网络。由菜园新村村民冯汝竹等发起，土盟成员支援的“八乡人食八乡菜”，正是透过种菜、卖菜，希望能在八乡的本地人及外来居民中建立一种社区归属感，希望社区中人都能支持社区内的农业种植，并唤醒人们对土地的关心，珍重食物生产过程。

过往农民收成后，会把作物拿去合作社换取酬劳，但村民为了证明“就业就在家门口”，务农也能够糊口，于是组成了实践有机耕种的农业先锋队。

农业先锋队中坚份子之一的冯汝竹本是菜园村村民，后来到城市读书及工作，因菜园村抗争又返回农田种菜。冯汝竹说：“香港不是只有服务业和金融业，香港需要绿色经济，香港需要有自己的农业，为自家提供安全粮食。”

要让“八乡人食八乡菜”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可能，需要社区中人的支持及参与。概括而言，八乡一带的居民可分为三类:当地原居民、租田耕作的佃农以及在其他地区迁居当地的住客。“区里面的人是分裂的，从城市搬进来的人只是住在一个屋村里面。这里有开放式的原居民村、散村，也有封闭的乡村，他们与外面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与宠物散步时才会出来户外。”冯汝竹说:“但是这些都是我卖菜的重要市场。”

一般有机农夫割了菜，都是租辆小型货车，交到有机菜店或农墟摆卖；但农业先锋队会骑单车把瓜菜亲自送到订户府上，或运到锦上路西铁站，跟乘铁路回家的客人面对面交收。“八乡人食八乡菜”可说真正实践了“原区种植，原区运输，原区销售”的“在地吃”精神。

有时，冯汝竹等也在菜园新村内举办展销会，提倡健康生活概念；也有提供来电即时收割送菜服务。如果遇上公众假期，村里居民外出度假，冯汝竹就把剩下的菜，用来堆肥或留种。虽然“八乡人食八乡菜”也有在面书Facebook上卖广告，给公众订菜，但最主要的顾客还是八乡人，因为该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在社区内凝聚一股力量，让吃有机菜的人，渐渐关注农地保育。

有消费者当然亦要顾及生产者，“八乡人食八乡菜”还建立一个市集，让其他农夫的菜一起放出来，让大家共同选择。

新生活馆 农生活的自主自足

菜园村村民并不是唯一对新生活怀抱梦想的人，在同样的土地上，一群汇集了大学生，教授和摄影师的城市人，在声援抗争后期，成立了菜园村生活馆，要体验和实践农耕生活。2011年初，新生活馆农场在离新菜园村不远的八乡谢屋村几万呎农地上建成，当起半职农人来。

这批城市青年认为，保护农村须从亲身实践农务工作做起，因此，和过往因生活压力只能种田糊口的菜园村长者不同，新生活馆的成立旨在重构农业运作中的生产和生产关系，希望重回土地及大自然，思考、想象、探索从而栽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学习过程，他们跟随香港永续农业关注协会的袁易天老师学习永续农业，明白到不能无止境地向土地苛索，在耕作时特别考虑如何令土地愈种愈肥沃。“我们尝试轮流以旱田和水田形式耕种，把握两者相辅相承的关系。单做旱田种植不能全面护养农田，水田可以让泥土处于另一个状态，补充旱地的缺失。旱田与水田，两者轮替种植，是实践农耕的全面体验。”新生活馆的周思中和李俊妮解释道。

更重要的是，在新生活馆里，这群城市人透过耕作，明白到人与土地的连结，也从务农中体会到何谓自主生活和自给自足。的确，大自然有一套城市人不易察觉的运作法则，只有亲近它、明白它，与它和谐共存，才能明白如何过自足自在的生活。新生活馆，为这个城市社区开拓了一片农的天地，让人重新审视农的价值与及农耕生活的可能。[10]

战线的蔓延 农业的再生

在菜园新村为农耕未来，努力开创天地之际，战线的另一端，是位于粉岭且被新界东北发展计划[11]包括在内的马屎埔居民。和许多其他农地一样，由于政府并没有规定土地发展的时限，许多地产商在多年前已向居民大肆收购及囤积农地，马屎埔的农地早于七十年代已被地产商收购，一俟收地发展，村民就随时有被赶走之虞。

一群关心永续农业发展的年轻人几年前跟在马屎埔剩下无几的菜农携手合作，继续农耕的生活方式，向公众介绍香港农业状况的例子，以及呈现社区农场与社区互动的方法，以引起更多人对香港农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认识和关注。他们于2010年仲夏在马屎埔成立“马宝宝有机农场”，努力筹办连串推广活动，包括社区农墟、导赏、演唱会，支持独立音乐人，以及为农村开展艺术活动等文化表演，其中农墟更是城乡互动的重要实践场所，组织各种食品制作班及耕种班，村民耕种的有机蔬菜，其中一个销售渠道为隔壁大厦的市民，并跟隔壁的大厦收集厨余堆肥，藉此相互交流的方式建立关系，争取对方成为其抗争运动的支持。

结语

或许，正如朱凯迪所说，顾客即使知道蔬菜来自哪个农场，却未必会主动关心那片土地，但如果自己每天食用的瓜菜，来自附近的农地，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摧毁农地形同影响自己的粮食供应，因此“当人和农地亲近起来，就不会对它的生死漠不关心。”

环视世界各地，不少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在城市化的洪流中，仍积极保育农耕，例如法国针对大巴黎区于2008年制定了“都市农业发展政策”，新加坡规划出2.1%的土地发展本土农业等等。相反，曾经豪言说要成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却没有同样的识见。按政府数字，本港农地占土地总面积的5.4%，但绿田园却指出实际数字只有0.7%，远远低于大巴黎的52%、上海的32.5%、北京的24.7%，甚至比伦敦8.6%和新加坡1.1%都要少。[12]

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包含设法为农耕赋予新的功能，

例如德国建立“市民农园”，由政府将公园土地租予市民，进行非商业模式的种植，让居民体验农家生活；日本则发展都市农业模式，如观光型农业、现代化农业及生产具特色农业品等。

近年有机蔬菜在香港本土多有推广，令香港市民对农业的支持度，比十多年前大为增加，而休闲农场就更是消费者教育的好去处，有助推动香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社区农场的实践纵然只是开始，前路漫漫，但至少是一步一步，将脚下的土地开拓出一小片天，该怎扩大农耕空间，重现农的可能性及价值，并在农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可能性，则是所有心系香港的居民需要共同思考和探索的。

1. 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37
2. Strickland C.F., Repor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a co-operative system in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of Hong Kong, 1935, P.139
3. 摘自土地正义联盟成员朱凯迪在2012年10月“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发言。
4. 土地正义联盟机构简介见附录一。
5. 摘自土地正义联盟成员朱凯迪2011年7月5日在香港独立媒体撰文〈土地正义联盟七一香港家书：打倒地产霸权　重建尊严生活〉。
6. 摘自《菜园留复往来人》148-154页，菜园村支援组影行者出版，2013年。
7. 参考附录二：“社区营造和社区大学”。
8. 参考附录二：“永续农业”。
9. 指在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即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前已在各乡村定居者及其后人。
10. 参考本文集香港篇另文：〈香港社运青年的归农路〉。
11.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是香港政府的土地发展计划，将古洞、粉岭北和坪輋/打鼓岭的农地划出为新界东北新发展区，作为住宅和商业发展，不过，由于发展计划大部份面积为中低密度私人住宅，公屋比例太低，并且破坏香港自然环境，因而引起不满。
12. 参考香港独立媒体2013年1月29日曾焕琳刊文“香港农业论坛一碗叉烧饭——反思香港农业出路”。

共同购买二十年
香港社区支持农业小史

※ 郑依依

本文根据林志光、杨宝熙和陈惠芳三人一次深谈，加上资料搜集写成。作者郑依依为民间组织工作者。

在香港这个石屎丛林里，在这个连提供人类粮食的农业都像是没落行业的城市，社区支持农业（CSA）自始至今，似乎是一段在金融或地产的浊浪滚滚潮流底下，一股微微翻动的暗涌。

廿年起起伏伏：CSA细说从头

寻溯香港CSA历史，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是朱佩坤（人称阿Pad）的丰之谷。1989年，香港发生毒菜事件，其后香港人开始关注食品健康，亦从而留意环保与农耕的相关议题。自美国修读艺术设计回港的朱佩坤，1995年与农夫林镇盛合作开办丰之谷，因著个人对健康食物的追求经营农场，并开始在市场蓬勃发展的香港，以一种带著挑战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信任与忠诚意味的CSA方式，营销农作物——虽然，当时CSA这个概念可能甚至尚未为香港人所知。

杨宝熙与朱佩坤是同代人，也在差不多时候开始关注农业和永续生活，她们一起组织香港有机农业协会。宝熙回忆：“丰之谷最初开始时，已经采用Box System（装箱卖出），顾客预订了菜后，便根据那个星期收成的菜的数量，全放在一个盒子里送出，不能挑选。当时连‘社区支持农业’这个名词也未流行，只一味以‘订菜、订菜’称呼。”

Box System是热爱美食的朱佩坤从美国学回来的方法。尽管她没有将之称为CSA，甚至，可能这对她来说并不很重要，从她的角度而言，或只是想吃健康的菜，销售的对象也针对比较关心健康、新鲜菜的消费者而已。菜价订得比较贵，与后来名正言顺打著CSA旗帜、明确地想支持某些农夫的理念不太一样。可是，朱佩坤的形式是CSA，她曾经在2003年一篇媒体访问中提及消费者三种参与其中的方法：例如一伙人一起做农夫，另外找想吃的人来买；或者农夫自耕自吃；或消费者不下田，只是集资供养农夫和农场，然后大家分享农作物。总之，不同方式也可以投入生产有机菜的不同环节之中。初期，有机菜价格昂贵，朱佩坤在那篇访问中如此说到CSA的好处："就是想更多人可以吃到有机菜，我们才搞这个新概念，例如，现在有些家庭是吃不起有机菜的，但透过CSA协议，你可以用劳力换取蔬菜。又因为共同购买没中间人，农夫便直接（接触）到消费者，所以，现时超市一斤有机菜，去到20几至40蚊[1]一斤，到时，可以10元以下便吃得到。"[2]

甫开始，丰之谷为香港的CSA炮制了一个关于有机蔬菜的美味开端。而真正扛著CSA旗帜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则是1994年冯冰罗在南丫岛开设的有机农場。冰罗九十年代在绿田园基金接触有机耕种，其后爱上南丫岛宁静开放的气氛，1994年跟两名拍档在岛上开办Green Cottage Farm，打开香港CSA的序幕。

从量变到质变：2000年前后的分水岭

金融风暴造就返农契机

97年金融风暴后，香港进入经济低迷期间，农业这古老行业，重新被当成一种社会经济出路而提起。

"当时很多三行[3]、建筑的师傅，因为行业低迷，而他们又不想领综援[4]，便问政府会否有土地可以开农场，他们自己懂得搭棚、拉水喉、开田。"一直致力推动香港本土可持续生活，曾经在嘉道理农场[5]工作的林志光回想当年："这刺激了政府，原来香港还有新人有兴趣耕田的。"

直至2000年，政府渔护署推出"有机转型计划"，协助一直使用化肥农药的农夫转营有机耕种。而且当时确有一批外行人去开农场，也间接刺激政府思考香港的出路，支援农夫转型，推出措施和政策鼓励有机耕种，为之后几年的共同购买发展铺路。

CSA新内涵：强调生活和人与社区关系

志光认为2000至2003年这段时间就像个分水岭。有机耕种不但从量上有所增长，也带来CSA质的改变：扭转了内涵，加入了人与社区关系的元素。“此之前的参与者，比较倾向关心环境、或经营农场，他们的特性是很看重如何经营好有机农场，前期的角色是如何成功地种出有机菜，而不是太著重社区连结。”早期，香港有机耕种的讨论很长时间停留在食品安全、环境教育层面。但2000年以后的阶段，参与者理念开始深化，重新聚了人气的农业，除了生出有机这门如今为大众关注的耕种方向，更酿出CSA这株至今仍然是小众的奇葩，其后由一些包括社福机构和劳工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NGO）借著申请政府基金，在07、08年间更有一阵子的蓬勃小阳春。

2003年的非典疫症（SARS）之后，政府开始构想如何振兴本土经济，推出可持续发展基金。由于政府2000年已推出有机农业计划，至04、05年，有些农夫已经耕种几年，因此市场上有机菜多了，有机农夫也多了，这些客观因素存在，一些民间组织发现能够以食物为媒界，通过共同购买的形式，申请资金；也打著本土经济的名义，进行共同购买，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论述亦开始扩充至社区的建立、社会制度等人文关系。例如由屯门仁爱堂于2002年成立的草根妇女团体绿色女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绿色女流成员来自社区的基层家庭，这些妇女每天为日常生活大小事务忙碌：买菜、煮饭、清洁。既要确保市场上食物是否健康，又要懂得烹调，还要让家人吃得饱吃得好，警惕清洁液是否安全等等，事事在心。为了让妇女们买到便宜的本地有机蔬菜，并体会农耕的苦与乐，她们成立了“有机农妇组”，既下田也进行共同购买，后来甚至在大厦中堆肥，以及开展收集区内食肆废油做环保肥皂等小组。

绿色女流从个人和家庭开始，搭建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助互利的关系，视野更扩阔到整个屯门区的发展、香港农业和生态等问题。这个由农活搭建的平台，也促成个人和小组的成长。例如草创阶段已经参与的成员陆少琼，就一直积极参与跟区内以至香港整体环保运动。绿色女流数年后解散，陆少琼跟另外一些姊妹组成绿慧公社，继续生产废油肥皂，并在全港各地参与和举办环保教育活动。

带著农的视野的发展观

在民间组织以外，另外一个将有机耕种延伸至社区的转折点，是“一些热心人，例如TV（袁易天）[6]，差不多在这段时间在上水的白沙搞农场，他们的社会关怀和背景，也为香港有机农业运动注入更广泛的社会视野。部分人虽然不太善于耕种，但他们很快将农业讨论拉阔了很多。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分水岭上，他们创造了一个条件出来，让更阔层面的人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志光说。

差不多同时，嘉道理农场亦开始与一些社区组织合作，包括一些住宅区的居民组织和学校等等，进一步向社区推出去，深化再扎根。有些朋友在推动社区农圃；另外，有一个群体讲究“食”，出现了“有机大使”这概念。还有香港有机农业协会的成立，集合有机农夫的力量。这背后，嘉道理农场整体的思考是，只要把工作延伸到社区，就有机会将“农业与生活”结合，有别以前只会谈有机耕种，还会讲“有机生活”。

“有机大使最初是想推广有机，从食物入手。但如果一开始就很理论性的话，对市民大众来说过于深奥。因此一开始就用一个烹饪班，借用社区中心的厨房，例如先搞四课的烹饪班，然后招募有机大使，之后才开始讲理论、环保。”曾经在嘉道理农场工作的宝熙说。

有机生活的诞生：农业与生活相结合

嘉道理农场的有机大使计划，孕育了后来的大埔共同购买小组[7]，成为至今仍然坚定地运作的CSA参与者。2003年底，嘉道理农场召开一个正式以CSA为名的“社区为本的有机农业”研讨会[8]，很多社会工作者参与，包括大学讲师和社区工作人员，为日后整理CSA的社区脉络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在2000年退下教学前线的大学老师文思慧[9]与其伙伴的CSA实践也陆续成形。2000年，文思慧脱离在中文大学的正规教学生涯，开始耕田。三年后，人称“舅夫”的退休农夫加入文思慧的团队，她亦在大埔旧墟开办陈皮村书店，店内供借阅的书种包括农耕、具人文视野的科学著作，以及在地公民运动等书籍，希望读者能在阅读中反思生活意义。文思慧农耕之余亦努力笔耕，写作推广理念，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深刻批判，并在中大教职员间组织共同购买小组土生合作社。

2005年初，文思慧和伙伴在油麻地开设短暂的土生良品店，亦是CSA走进社区实践的重要一步。土生良品店出售每天由大埔林村农场新鲜运到的有机蔬果，包括平日在街市鲜有见到的连根花生和大蕃薯，也有常见的西兰花、南瓜、萝卜、芋头和红菜头。除有机蔬果外，土生良品店还出售没有化学添加剂的柑桔酱、腰果酱、面包、印度尼西亚糕点等制成品。尽管小店只试营一个月，已足够教人念念不忘。

谁退场了，谁留下了，谁被记住了

回头看一些曾经办过共同购买的民间组织，高峰时期达10多家，例如沙田杨震青少年中心、民协社会服务中心等等，但几年之后，留下来的并不多；反之，坚持下来的共同购买小组，或即使艰苦经营，或有过昙花一现的美丽时刻，却深深刻入人们的脑海。若说其中“成功”或“失败”，又是为何？

文思慧06年筹办的土生合作社共同购买小组，运作了约一年时光，而宝熙是土生合作社第一批支持者。她认为土生合作社的艰难，在于它只连系个人。即使小组成员充满理念，愿意预先付款、支持农夫，又有开会、入股等等要求，但“会员制是个人的，影响力有限，也死得很快。会员即使付3,000元，甚至8,000元，以至过万，也只是个人而已。”宝熙分析：“我正认为它理念太强，变成框限自己。它一开始即接触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其实自己不煮饭，买回去就丢给母亲。他们或许个人很想支持，但家人倒不一定，甚至觉得很难煮，买回来要摘掉许多叶。另外，土生合作社卖的是五谷食粮，较难销售，而且货品的流转很慢。我买十斤米可能两个月后再买，而不是蔬菜类会天天去买。所以卖什么食物亦决定了土生合作社不能持久。做生意始终还是要看流量。”

至于由民间组织带动的共同购买也多不成功，志光认为跟其出现的社会背景与条件有关。“他们中有些是有理念的，也想做好这事，但当初的切入也许有点机会主义：本身对行业不熟，只是觉得这议题某程度上与自己社区工作有关，便贸然投入，想边做边学，但真正学成功的却

不多。”良好的农场生产与销售的模式未能有效建立，是故民间组织申请的资金完结后不易成功地变成一些较持续的运作。宝熙指提出，绿色女流的结束，与仁爱堂负责计划的主任离职有关，共同购买做不下去，是因为没有了组织者。“但也未必很遗憾，因为培育了不同的人出来，后来在不同岗位上做。”正如上文所述，元老之一的陆少琼如今仍然活跃，全情投入环保肥皂的公社式生产，实践一种民主的合作经济模式。而文思慧的伙伴们到今天仍然协作两个以本地农友为主的共同购买小组，成员预先付半年买菜钱，每星期吃到当季蔬菜。

农产品耕耘的社区厚度

至于文思慧当年另一将CSA带入社区的土生良品店，虽只在2005年初农历新年前，以年宵临时档的形式，存在短短一个月，但却教成员如陈惠芳（芳子）不断回味：“开始的时候整个事情是很刺激的，第一是有店，第二是店内有些想象不到咁‘正’[10]的食物，包括用农场产品自制的副产品，例如新年有萝卜糕。这一点当时对我来说是很新颖的：原来除了通过农产品本身支持一些健康理念外，食品加工还多了一重社区关系，有人物的进入。土生良品虽然很短暂，但有些新的东西出现。”

CSA的延展：饮食自主、手心相连、永续明天

宝熙亦补充土生良品店如何帮助传递CSA的理念：“店接触到的是街坊，它成功在于透过街坊散播理念出去，很快。而且来店里的是主妇，她们很支持，结业时甚至很不舍，所以土生良品店虽然这么短，它还是成功的。”稍顿，宝熙继续：“而话说回头，土生合作社因为理念很强，所以提出来的都是一针见血，或者是很根本的问题。当时在一些展览中，土生合作社开宗明义地反对超市，撑小农户。我记得有一句口号是：越洋商品非关绿色生活，克制消费始有永续明天；其他还有：自耕自造，超越超市；饮食自主，身土不二；我煮我吃，心手相连；爱劳动，爱土地，爱健康等。这些当时看似很前卫的说法，都在圈子内外播下种子，成为今天CSA运动很基本的理念。”

近年，亦有农场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例如“八乡人吃八乡菜”之于菜园村的建设在地农耕经济、例如马宝宝社区农场之于马屎埔的农耕生活保育，共同购买衍生出更丰富的社会意涵，甚至深深根植于追求社会公义的理想之中。

CSA与大社会：要冲破哪些限制或创造什么条件？

香港CSA跌跌碰碰20年，成功成熟的经验不多，然而，当中几许原因乃“非战之罪”，抑或只是这方水土尚未适合？

也许，从2007年底宝熙一手促成的自在生活为例，可以看到端倪。香港社会目前“客观”的限制逐一浮现——或许，未来的改变，还要竭力开创出有利的条件与土壤？

宝熙说，自在生活自始便吸取了土生合作社个人会员的局限，鼓励民间组织用共同购买的形式与农场合作，“我们送货只送去一个共同购买点，能省很多运输的费用。”然而，自在生活与土生合作社有同一死穴，“就是卖的并非日常产品，平时没有卖菜，只在农夫收成太多，卖不出去时，我们才帮忙卖一些。”明确地要支持小农的自在生活，不论卖米或蔬菜，很强调直接去到农村，认识生产的农夫有名有姓，即使加工食品也一样，甚至最好是在本地制作，“可豆腐这种可以卖较高价钱的产品，又不能只买几砖豆腐就驾车去送。”宝熙说，营运成本仍然高昂。

制作副食品的另一重限制，在于严格的食品条例。“我记得有次想请爱华[11]造鸡屎藤茶果，但碍于食品条例的限制，当时不敢大肆宣传，因为我们没有牌照，也未至于想要用这事来做公民抗命，‘就随你来控告我吧！’只是很小圈子内有朋友来买，还要很勉强地让爱华亏点车费。”在扩阔本土经济的可能性上，自在生活有所讨论，还没及实行，直至由后来圣雅各福群会的土作坊[12]著手跟进。

芳子很欣赏CSA从耕种到副食品生产的转变，因为这向食品多元化又迈进一步：“圣雅各其实也是后期才有食物加工队，最初也只是协助会员买卖制成食品。当年土生良品店制造什么辣椒酱，令人很高兴，我们可以从种植之后，进入食品加工，慢慢建立起在地性和紧密性，那个社区又会多了所谓社区经济[13]的层面，丰富共同购买，发现和重整社区资源，看看社区中人的能力，结合食物生产的可能性和机会。一般来说，人们70%的食物来自加工食物，蔬菜农夫与消费者之间的结连有限。并非每个人也想做农夫的啊，但多了一些人可以进入这个经济和劳动交换的层面，会很有趣，使CSA的发展又多了厚度。而且有名有姓，我们开始去了解食物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芳子说。

香港的食品条例固然严格，此外，要发展CSA，生产者、消费者以至社会制度都需要改变，作为一场运动，就应该深入分析社会，又或不得不探索新的社会可能。芳子提出法律条件以外的困难："生产都远离香港，令我们很难搞消费者运动。香港政府的政策快速地将农业杀死，六十年代我们还有米、不少蔬菜，但很快农田缺水、土地价格上升，令香港没有了生产者，于是很难去推消费者运动。台湾有很清楚的生产者，很容易建立起关系。而且香港太方便了，我为什么要共同购买？而且又不能选择。"

共同购买作为社区支持农业的一种现存模式，也许目前仍有局限；但整合调动社区的资源，使食物生产变得多元，可能正是我们要创造条件、冲破限制的方向。

1. 粤语"货币"的称谓，即港元。
2. 〈香港有机革命最前线〉，《明报周刊》，2003。
3. 指从事泥水、木工和油漆三个行业的工人。
4. 全名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是香港社会福利中的一项入息补助，作为经济上无办法自给自足的香港市民的社会福利安全网。
5. 嘉道理农场简介见附录一。
6. TV从2000年开始积极推动生态农耕，是香港永续农业关注协会成员。协会曾经在香港与大陆边界沙头角的南涌进行耕种，后推动养地运动，希望保留乡郊农地和生态，平衡主流社会以地产发展为尚的狂飙，质疑这种一面倒以城市资本和市场为终极追求的发展观。几年前，协会在新界北粉岭的马屎埔跟当地农户成立马宝宝农场，推动可持续农耕社区。至2013年冬，马宝宝农场的有机市集，已经是周边大厦和其他香港市民购买有机菜，以及经常探访的农耕社区。
7. 详见本文集香港篇文章：〈大城小事——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静默革命〉。
8. 详见《三斤半菜开始》一书的附录，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作者江琼珠。
9. 文思慧老师于2013年12月17日安然离世。她的挚友分享2008年初思慧写的题为"古道西风瘦马"的文字。在此，我们也记下。怀缅。共勉。
"希望变身一头马，瘦也好不瘦也好，呆站于古道边吃西风，西北风也好。怀念那冻、那幌荡的风景、那通往远方而有很多前人踩得亮晶晶的石头狭路，路狭相逢或不相逢，都知道大家曾经走过，也希望后来者一直可以走下去，有时仰望著星河—— 天上更亘古的道路，很多光照应著，便不怕夕阳西下，也可安慰断肠人了。词写至尾，瘦马早已溶入西风古道，不用刻意多提。"
10. 广东俗语，意谓"好"。
11. 爱华是屯门区一位全职家庭主妇，曾经是绿色女流成员，以一手好厨艺见称。
12. 详见本文集香港篇文章：〈城市接连农业〉。
13. 参考附录二："社区经济 / 社会经济"。

香港社运青年的归农路

※ 杨宝熙

作者杨宝熙为香港永续栽培学苑顾问

“我现在没有参与反东北发展[1]的抗争，一星期到田里工作四天，像闺女般守在自己家里，一步都不踏出闺房，心无旁骛的守在家园里。”

“刚开始种田时，什么都种，怕蚀底[2]。休息棚搬了三次，以前什么东西都留下来，都想要。后来领悟到只要保留有用的和需要的。原来还是城市模式和心态。也以为可以控制一切。现在是根据土地和人的能力，可以做到多少堆肥，才决定种多少和种什么。”

“有些时候种得不好，原来是忘了照顾土地。现在七、八月不出菜，是因应香港的天气，休耕。”

说这些话的是一个30岁刚出头的年轻女生李俊妮，他[3]是菜园村生活馆的发起人之一，现在是生活馆农场的农夫。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挺感动的。俊妮是反高铁、保卫菜园村[4]的积极人士，一直走在反高铁运动的最前线；很多反高铁的青年现在都加入了反对新界东北发展的运动，我以为俊妮也一样。想不到他按捺得住，没有追随火热的抗争行动，反而从高昂的抗争情绪转为踏实耕种，留守在寂寞的、辛苦而毫不浪漫的农务之中。

“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前后，我一直在想香港的社运年青朋友为何会选择归园田居的生活？这些朋友都很优秀，绝不是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工作或散漫无聊的青年。究竟他们是退？还是前进？

台湾农村阵线[5]（下称农阵）发言人蔡培慧老师在研习会第一天的社区主题，分享农阵的经验时提到年青人的疏离感。我想，本地归农的青年或多或少也是从疏离感开始的。

香港踏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社会状况

香港在这十年间发生的与社区重建及土地利用有关的较为突出的保育抗争事件：

- 2005年底世贸（WTO）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召开，南韩农民因为诉求得不到回应，引起一连串的示威，其后与香港警方发生暴力冲突；
- 2005年湾仔利东街[6]（囍帖街）因为旧区重建而迁拆；
- 2006至07年天星皇后码头因为要解决中环塞车问题，建新的海旁道路而清拆[7]；及
- 2009至2010年，位于新界锦田的菜园村因为要建高铁而被迁拆

现时参与务农的青年，大多是从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中走过来，而不少在这之前亦经过反清拆喜帖街、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的洗礼。这两个运动当时被主流传媒称为保育运动，认为是保育市区中一些有历史价值的旧建筑物，不要因为发展新的道路或新市镇或重建旧区而随便拆掉。有些人把这些行动列为怀旧，还说不明白为何带头的、参与最大的、最激烈的是一些年青人。其实这些保育运动，不单是怀旧，不单是保育这个或那个建筑物，而是牵涉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运用。还有，政府在发展城市时，市民有多大的参与？又有没有让市民参与这些发展的讨论？所以，与其说这是个保育运动，不如说是个觉醒参与空间使用权的运动。社运电影《码头与彼岸》在2010年公映时有以下介绍：

>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天星码头，“引发”一系列保卫天星、皇后码头的示威。然而，示威者一而再地表示，他们是湾仔的旧区运动培育、召唤出来的。……“规划民主化”、“保卫公共空间”、“解殖和确认本土文化历史”是保卫码头人士的人文价值目标。这些目标和要求，都在无数论坛、文艺晚会、抢铁马、围警察的示威情景中，不断重复的提出，可惜，最后在主流媒体中都化作“集体回忆”和纯粹关于物件的“保育”。[8]

青年们担心这些打著发展旗帜而来的举动，其实正一步一步在蚕食香港社会的民主和公义，牺牲掉多数人日常的已经非常卑微的生活，以满足少数人不断追求最大利润/利益。所以，清拆行动引发一个一个的社会运动。韩农的出现，更令香港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有血有肉的农民，这些真正把自己的生死存活与土地缚在一起的农民，给港人带来很大的震撼，也看到全球化与农业及农民的关系。青年朋友们经过一连串社会运动的洗礼和启发，从争取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再进一步思考生活自主权的掌握。

另一方面，在生活上，随著全球化和地产霸权的日趋严重，楼价租金飙升，家族小铺执笠（结业）的执笠，卖铺的卖铺，香港一些小型的生产者或商铺已无法维生。以前家里楼下的士多（卖汽水饼干糖果等零食的小店）已慢慢消失，由连锁的、24小时的便利店取代；冰室、茶餐厅、云吞面店等普罗大众日常光顾的食肆，亦变为大型的饮食集团酒楼或连锁快餐店。更不要说以前的杂货铺、成衣百货店、鞋铺（卖一些没有牌子的学生鞋、波鞋、兵乓球拍、羽毛球拍等运动用品）、家庭用品店等，更加是愈来愈少。代之而起的是名牌手袋、名牌衣饰店、几个品牌的化妆品店、地产店铺、金饰店、电器及电子产品店等（满足大陆自由行来港购买内地买不到或没有品质保证的货品）。惟一能守得住的是药房，可能是因为自由行和水货客对入口奶粉、尿片、鱼油丸等的需求很高，可以养得起它们，甚至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以前，这些店铺只出现在尖沙嘴、旺角等游客区。现在，铁路沿线所有设有商场的铁路站内，由沙田、大埔、太和、粉岭到上水，都看到这类店铺林立。若闭著眼随便在某一个站下车，根本说不出自己身处那一个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住处已经没有了社区的特色，我们的生活根本已毫无选择的馀地。工作，就好像为大地产商打工；而衣食住行，全都不能逃脱大地产商和环球资本家的五指山。

社运启蒙　青年人的自省

近年来，随著中国大陆的“发展是硬道理”，随著香港回归顺利过渡，“发展”成为了政府和大商家们无往而不利的托辞。把一切反对政府要发展的人定为反对改善社会经济民生的人。政府以为，只要为年青一辈想办法置业，给他们一些甜头，他们就会安定下来，就不会再参与社会运动。谁知我们的社运青年不是如此思考。他们对主流经济中的地产商垄断、大企业连锁店霸占大部份的市场感到厌倦；觉得工作是“把灵魂卖给了大财团”[9]；对上一代或主流社会/学校整天叫他们好好应付考试（一方面却空洞地宣传读书不是求分数）、找份高薪厚禄的好工、想办法升职及储钱买楼等，感到烦厌。他们根本不想住进一些装修豪华的住房，因为这样只会带来更大的疏离感，与草根阶层的疏离、与小生产者、小商户的疏离、更有一些开始觉得是与大自然、与土地的疏离。

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的疏离，主要还是与工作/生产有关的，当时香港还有很多轻工业，包括纺织、成衣、电子零件等制造业，人们的工作是大机器的一部份，不知自己所生产的东西是整件货物的哪一部份，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当时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多少保留一些农村社会的伦理关系。小时候过农历新年时，我们会与亲友们互赠一些自己家造的油角、煎堆、年糕等过年食品。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父亲的同事来拜年时，带著两个很大的盒子，每到一家就放下一些自己造的、未经包装的糕点。平常的日子，也会有一些小贩把自家制的糖水豆腐花等上门兜售。饮食方面，不少家庭都保留一些与农有关的习惯。例如节日前几天会把鸡只或生鱼等买回家中的厨房饲养数天；每家每户的门口除了有垃圾桶之外，还有一个猪馊桶，是盛放不能吃的菜头菜尾或骨头或食物残渣（即现在我们称为厨余）等东西，有专人收回去煮过后喂猪的。日常的生活，也还有很多手作的工艺，如裁缝、鞋匠、木匠、毛冷店、打铁师傅等。

但今天社会的疏离，已经从生产的层面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在大资本家不断膨胀，电子科技急速地发展，在愈来愈大的各种生活压力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已经从一种病态变为一种常态。人与土地之间的割裂，更悄悄地进入。年轻的一代，可能连有这种疏离的存在都懵然不觉，从来没有想过土地与食物的关系[10]，更加不会思考土地与自己的关系。

因为疏离　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天星皇后码头的保育运动之后，社运青年们感到愈来愈多的疏离，希望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他们开始觉得，如果自己一方面谈公义，谈社区关怀，另一方面却过著没有原则的生活，好像怪怪的，也完全说不过去。社运青年很多是自由工作者，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的朋友，他们选择住在旧区，帮衬[11]有人情味的小店或街市菜档。不过，他们当时只是停留在消费购物上尽量自主，尽量不与大地产商、连锁超市、快餐店酒楼、药房、眼镜店等进行交易。直至菜园村不迁不拆、反高铁运动一开始，大大开了他们的眼界和思维:原来香港还有农田，还可以自己种菜。生活馆有了自己的农场之后，更加发觉香港甚至可以恢复种稻米[12]。

有了这样的视野，农村可以是一个出路，参与务农就成为理所当然了。他们在过程中发现可以用厨余做堆肥，又跑到街市收集几乎变成垃圾的鱼杂（内脏）做鱼肥，自己留种子……等，这些几乎零成本的可持续农业，原来是一种自主的生产。社区支持农业的共同购买方式，原来可以自己决定把产品卖给谁，或者不卖给谁，身边没有自己下田的朋友也可以吃到有名有姓的菜蔬。以前尽管避开超市间接剥削不知名农夫的菜，但街市的菜仍

然经过重重批发商零售商的压价。当打开了这方面的视野的时候，不难想象一直在运动中追求自主生活的人都会跃跃欲试，而当中对农特别有兴趣，又有条件立即改变现时生活方式的人就会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开始搬入乡郊，投入与农有关的生活。

务农：是革命　是运动的延续

所以俊妮说他们务农，不是倒退，不是返乡避世，而是向前走，寻找生活应该走的道路。但他们其实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农夫，因为他们的生计也不是倚靠务农，因为他们还有一份可以维生的半职，他们只是开始尝试半农半X的生活。“以前，社会的宣传和经济结构，只把我们推向消费和不断工作的无底深坑，只把我们推向货币系统的无奈循环：工作——消费（被迫的或主动的）消耗能源——浪费食物（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超市和食肆都在大量地浪费食物[13]）供楼/交租——再拚命地工作赚钱进入下一个循环，让我们无暇思考疏离的真相和如何摆脱。”

开始农耕生活后，农的经验进一步让他们觉得踏实。一方面感到自己实实在在掌握生产，用双手创造生活，另一方面一开始劳动，一弯下腰，一蹲下来，就开始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问自己以前手脚都是用来干什么的？自己懂得干什么活？重新认识/建立自己与土地的关系，认识阳光空气水源的重要，重新认识自己与食物的关系，与其他农民/村民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重新认识身边其他人，开始更深层地思考城乡关系。原来香港的乡郊不单只是绿化地带，假日的好去处，还可以是农地。乡郊的耕种不单可以生产缩短食物里程的环保低碳食物，更可吸纳城市的厨余，不单纾缓堆填区爆满，更完满食物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共同购买订购本地农产品不单可以吃得健康，还可以重拾人与人的互信，而不是像主流社会的靠一纸冰冷的第三者有机认证。

原来与现行经济体系保持距离，尽量少卷入货币系统之中，不单可以从消费——拚命工作中走出来，还可以摆脱疏离，与人、土地建立和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原来反高铁抗争之后转向务农，不再参与反东北发展的抗争，不是停滞不前，不是抽身而出，不是流失了运动的支持者，而是运动的延续，是激情后的创造和深化，用自己的双手双脚，过充实的自主自决生活。原来拿起锄头，耕的不单是农田，还有自己的心田。原来务农，也可以是一场革命。革命，不一定要在广场，不一定要在示威集会之中。

以农为本　摆脱垄断与疏离

透过反高铁运动，社运青年开始觉得乡郊的发展，不只是乡事委员会[14]的事，而是与我们住在城市中的人不能分割，特别是与自己息息相关。但是为何在2000年第一个十年蓬勃发展的本地有机耕种，未能让他们投入？因为当时有关有机的宣传和教育，主要集中在环保、健康、支持弱势农夫、拉近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等议题。后来，香港的这种有机运动发展到今天，更比较像一场大型商业活动，而非一种生活运动。售买有机食品的超市排除了小型农户的参与，所谓的有机食品，仍然是大企业、大商家的天下（这次是农业企业agri-business）。所以我们的社运年青人不满足于所谓的有机运动、乐活（LOHAS-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甚至是可持续发展运动，因为它们都已经变得极度商业化了。

而务农可以自己掌握生产资源。采用天然循环的种植方法，甚至可以是零废弃，不但可以达到环保的目的（至少在自己的生活上不加速全球暖化），也可以把成本降到最低，同时可以摆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累积的循环，相对地可以从主流市场经济中抽离。

从一些走天然种植和循环农业的成功例子中可以看到（特别是台湾的例子），农民要摆脱被制肘的状况，摆脱被大批发商、通路商控制价格不是没有可能。在城市中生活和在主流市场中找工作，要摆脱大地产商和资本家的阴影可能更难。因为只要走社区支持农业的道路，就可以自己找到市场，找到自己的客人，找到懂得欣赏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可以实际上支持自己的生计，就好像台湾宜兰赖青松的**穀**东俱乐部[15]，或者广西柳州和南宁的土生良品（爱农会的餐厅和社区农墟）[16]，实行自主生活，可以以自己（农民）作主体性思维。

一个八十后青年在他的脸书上留言："我们每天放lunch（午膳）时都抱怨食嚟食去都系食个d嘢（每天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每天都无能为力地继续食嚟食去都系食个d嘢……"这反映不少城市中人的心声。

现在不要说在香港，就算在两岸的农村，要实行"以农为业"确是十分艰难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像菜园新村、或者生活馆，或者马宝宝社区农场做基地，建立"以农为本"的生活体系，尝试从资本主义生活模式中突围而出，是有可能的。这种以农为本的生活，可以治疗全球化和大资本垄断下带来的疏离，可以摆脱束手待毙、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助感。因为农耕生活的脚踏实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己亲手采收自己种下的成果，比在大都市中不知什么时候被炒鱿鱼（辞退），每天下班拖著疲累的身躯，吃著不知所谓的晚餐，然后睡觉，然后第二天又开始另一个循环，要来得有意思。至少，如果连以农为本也说不上，亦可以说是以农为傲。

务农是快乐抗争

或者有人会说，社运青年走到农之中，只是那么十个八个人，没有代表性。但这是个从无到有的状态。俊妮说：我们之中有人务农，才有农的汇语，才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探索。正如前几天有一个八十后青年搞的旧书节和讲座，题目就定为“种读”。现场除了有书、有讲座，还有生活馆的菜和加工食品出售。如果没有了几个八十后青年的务农，就不会有这样的题目，书节就不会有本地农产品的出售。而俊妮他们在讲座中的身份，就可能只是反东北发展的一份子，没有什么特别。

农的工作，不一定是全部都拿锄头下田才算是归农，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所以也包括做宣传、找消费者、田间导赏、做财务工作、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等。当然，要明白大自然的道理；与泥土、天气、植物和各种昆虫等建立深厚的感情和从中的领悟，还是得靠在田里工作中得来。“因为耕种时用自己的一双手，所以耕种后对生活更有信心，更认识自己的能力，对世界与自然更能尊敬。”这是俊妮在归农后的改变和体会。

在务农的近三年时间里，他们从渴望过自主自决的生活开始，到跟附近的小餐厅用自己种的姜和米等农产交换餐厅的咖啡渣、废纸皮来造肥料和覆盖，发觉自己原来已创造了一个社区经济[17]。不断学习种植的知识，学习腌制等加工食品的技术，到开始追索食的文化，把研究稻米传统和有关的文化变成一种兴趣。归农，是一个不断实践和创新的旅程。

反高铁期间，青年人们提出要快乐抗争，就算当中有一个叫“苦行”[18]的环节，抗争还是用快乐的调子进行的，因为抗争是为了追求幸福快乐。现在的农的生活，是辛苦的，也一点都不浪漫。但这是追求自主自决、脚踏实地生活的重要一步；也是脱离大都市、脱离一个不知道谁在操控的金融体系带来的不安和疏离的重要一步。因此，务农，也是以快乐的调子进行的。

后记

我总是觉得，社运青年参与农的出发点和过程，跟我们九十年代或2000年开始投入所谓有机农业的人很不同。我们多是从环保、绿色、食物安全、照顾土地、照顾农民的角度投入。是社运青年教育了我从食物话语权、生活自主自决的角度去看务农。如果我以后从生活自主自决这个思维去看务农，不知道会否努力一点种菜，让收成好一点？

作为两个八十后儿子的母亲，希望社运青年朋友继续走下去的道路，会愈来愈多绿色和健康的元素（譬如戒掉吸烟的习惯，早点睡觉等）。作为一个支持社会公义的香港公民，希望他们可以把更多农的元素带到社运界之中；也启发更多其他青年人/城市人归农。这是我的两个心愿和对他们的祝福。

1.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是香港政府的土地发展计划，将古洞、粉岭北和坪輋/打鼓岭的农地划出为新界东北新发展区，作为住宅和商业发展，不过，由于发展计划大部份面积为中低密度私人住宅，公屋比例太低，并且破坏香港自然环境及农地，因而引起不满。
2. 即吃亏。
3. 这篇文章全部采用“他”字作第三人称。不用“她”，是因为笔者觉得无理由男生是人，女生就不是人，“他”字应是中性的。
4. 2009年下旬香港政府推动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计划，被批评草率上马，工程与铁路及公路路线重覆，并且破坏居民生活及造成空气及噪音污染，其中石岗菜园村村民因高铁兴建被迫迁离家园。
5. 台湾农村阵线简介见附录一。
6. 参考维基百科有关利东街（俗称囍帖街）如何因市区重建而迁拆以至消失。俗称囍帖街的利东街，位于香港岛湾仔区，昔日以印刷喜帖著名。2004年初，香港政府计划重新开发此区，引发居民及民间持续抗争，要求保留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翌年政府收回业权，展开清拆行动及招标工作，利东街最终在2010年2月25日凌晨零时封闭。
7. 参考香港独立媒体2007年1月31日刊出由朱凯迪撰文的“由保卫天星到皇后码头的运动论述（回顾与前瞻）”及维基百科有关保留天星及皇后码头事件。2007年，香港政府进行中区填海第三期工程项目，把有48年历史的旧中环天星码头（正式名称为爱丁堡广场码头）及中环天星码头钟楼拆卸作道路和商厦用途，引起民间团体不满，认为此举摧毁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保育团体策划一连串论坛、静坐和绝食，阻止码头拆卸，事件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
8. 参考香港独立媒体2010年11月8日发表，由香港一家制作社会纪实影片的民间组织影行者撰文的“码头与彼岸 · 第八届社运电影节介绍”。“码头与彼岸”是由影行者于2010年制作的145分钟电影，讲述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天星码头，“引发”一系列保卫天星、皇后码头的示威。四年后各参与者已各自继续发展了自己的社运道路，并回顾这个爆发点。
9. 香港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边一个发明了返工》（意思是：谁发明了上班）其中一段歌词。
10.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笑话是：小孩子以为食物是从超市生产出来的。现在的笑话是：儿童未见过完整的苹果，因为吃的时候已经给削皮切好；也未见过一株连衣连须的粟米（玉米）。
11. 粤语，光顾之意。
12. 香港七十年代未已经没有商业性生产的稻田，环保组织长春社在塱原的稻米复耕计划只在环保界传颂。2009年之前，完全没有打入社运青年的心中。
13. 参考《剩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7月21日出版，作者陈晓蕾。
14. 香港新界的一个乡事谘询组织，其主席可以成为区议会的委任议员。
15. 请参考本文集台湾篇另文：〈一名台湾社运青年的归农路〉。
16. 请参考本文集大陆篇另文：〈没有梦想我们还能活得幸福吗？〉。
17. 参考附录二：“社区经济 / 社会经济”。
18. 从世贸部长级会议期间韩农的示威中得到灵感，示威青年手中拿著稻谷，列队而行，随著鼓声每26步跪拜一次（深港段的高铁长26公里）。这个行动，于反高铁期间在香港不同的区域举行。

农墟
展现生活的精神

※ 林志光

作者林志光为社区伙伴项目统筹

旧情复炽？

送走最后一批大陆及台湾的朋友后，这次“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三地交流会正式宣告曲终人散。躺在梧桐树荫下，松一口大气。心想，选择在香港办一个认识农业的地区交流会，也许需要一定的底气，从中港台三个地区看来，香港乡土上的原居民早已选择脱农，而默默守著土地的佃农，却又是离乡背井的移民，原乡情怀的味道也许经已淡忘。战后出生的一代，远于青年时代已被卷进工业发展的浪潮，造成对农的冷漠与疏离。

这种冷漠的情绪，合理化了30多年前农转工的社会改革，我们只花上短短数年实践，便完成这么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来得既淡然又平和，那时候，大家仿佛并没有留下半丝犹豫。

适逢前几天，我们正在为保护新界东北这一块香港最后的农业腹地抗争，冲击起新一幕社会运动，看来有点理所当然。研习会的前一天，我们正与大陆及台湾的朋友，前往探访区内一群老农进行的稻米复耕尝试。路上，看到满眼捍村卫土，保护农业的横幅，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再去关心农业这位老朋友？

听到成都华德福学校[1]的老师谈到他们的教育理念——每个人都是农民。也许，近年层层的社会变化正在不断启动我们身体里那些静默久已的农民基因，重新在编译我们各式各样的反应及行动，溢出农业再生的气息，刺激社会大众的神经。

接著，听著嘉道理农场[2]的同事介绍香港有机农墟的发展故事，顿然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当大家再看看十年来有机农墟的布局，我们不难发现香港农业的再生点究竟在哪里？

传统墟市：自主生活的支点

记得2000年，嘉道理农场园内举行了一次有机农产嘉年华，算是有机农墟的前身。尽管只是两天的活动，也算是突破了有机农户与消费者的零距离接触。两年后，我们出现了第一个固定的有机农墟——大埔农墟。

大埔农墟的选址是原来太和市（大埔新墟）的一部分。二次大战前，新界是一个农业社区，乡村散布。居民主要以种稻为主，禽畜饲养鱼捞和小手工为辅。生产所得供自用以外，剩馀的便会定期挑到约定的墟市买卖。

墟是指村野摆卖土产的空地，倘若我们仔细看看每个墟市的这些土产，不难解读当地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跟自然的关系。那时，乡民挑担往墟市售卖的剩馀农产品，包括鸡鸭、果蔬，柴薪，以及在山野采集的草药与捕获的鸟兽。摆卖的产品让我们感觉到四时的变化，叫卖声中，散发原始季节的感觉。

因为路途遥远，他们便得大清早出发，摆卖时总是习惯性的讲价，交流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因此提供了创造新的知识及生活智慧的养分。一般来说，乡民中午前便将带来的产品卖掉，然后将钱再在墟内采购其他日用品回家，完成生活资源的调节。墟市不单是城乡交接的经济活动中心，墟市是以人、以生活建筑的场所，以关系及智慧酝酿的人文空间。

这样，通过传统墟市的联结，乡民无论从物资上，或是生活智慧上均得以丰富。那时候的生活，体现密切的人际关系，亦反映高度的自主性及自力自足。

新市镇：压缩生活的时空

至80年代大埔被规划发展成新市镇，带来一场社区空间的重新布局，原来属于万物的田野乡土被水泥覆盖后，转化成人类的私产。借助电气化后的铁路连接，从饱和的城里输入一批新的人口，白天进城工作晚上返家，塑造了一种过客式的生活状态。随后，传统的邻里空间迅速瓦解。此外，人们对于时间的概念亦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四季感消失了，变得平面化，忘记了四季其实是万物心境的交替。生活节奏随著铁路的提速而加快，快速移动的身体，不断地削弱我们感受环境及关系的能力。

大埔有机农墟：香港农业发展的逆向逻辑

2003年我刚准备离职[3]准备进入大陆工作，离开前，与当时的同事正在组织新的大埔有机农墟。原意在连接当时零散的有机农户，怕万一不赶快做点事，我们看到这微弱的农业前景也恐怕不保，一帮合作伙伴感觉责无旁贷！

因此，今天大埔有机农墟这个选址更多是考虑它邻近有机农田最集中的锦田平原，运输成本优势较大。同时，位处新老交错的大埔社区，紧靠背后的是相对草根的太和村。此外，大埔有机农墟的出现也在尝试挑战社会对有机蔬菜针对中产消费者的局限，利用地理条件的优势，销售有机蔬菜的价格比传统专卖点要低。通过农户与消费者长期直接的交流与理解，一点一滴累积的情感与信任，吸引每天几千人前来趁墟。

转眼十年，大埔有机农墟依然每个星期天洋溢市井的叫卖声及欢笑声。重新再看看这个有机农墟，放在原来大埔墟市的兴衰脉络来思考，我们有一个逆向的发现：如果说从前的大埔墟市是乡村往城市的延伸，今天的有机农墟则是城市往乡村的探知，想到今天越来越多人关心香港农业发展，同样的逆向逻辑，我顿然得到了一些模糊的启示，戚然而笑！

湾仔农墟：本地、本土的思考

2005年发生了两件原本风牛马不相及的社会事件，一个是连锁超市的毒菜丑闻，另一个是湾仔旧社区重建的抗争。两件事因缘际遇，踏上交叉的轨迹，交织出后来“湾仔有机农墟”的偶然。

湾仔旧区的重建计划，掀起一场为时五年的社区保育运动，成为香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一向习惯于线性经济发展逻辑的我们，顿然给湾仔的旧街坊唤醒，一众街坊对维护“社区网络”的执著，对空间规划的批判，颠覆我们对发展的习以为然，以及对规划的既有理解，启发我们重新认识社区的概念。

与此同时，沉睡逾十多年的毒菜风波卷土重来，犹如重新爆发的睡火山，震动全港。

多年来，新市镇导致的社区过客式生活，早出晚归，造就了连锁超市的普及，对连锁超市的依赖，继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传统墟市只向我们提供就地取材，因循时令的产品。超市的产品来源则打破全球地域及季节的界线，这是人类生活史上一大进程，我们从此相信只要有购买能力，生活便不再受自然环境限制。

这种对超市的依赖，一直是建基于对超市的信任，也解释为什么这次毒菜风波来得这么震撼。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种依赖的危机，超市虽然让我们摆脱了限制，但亦等同放弃了对事物认知的争取。

当时，从太和有机农墟获得经验后，我们[4]正准备在香港岛市区再组织一个农墟。毒菜的恐慌迅速转化成对“港产”有机蔬菜的支持。这样，顿时成就了港岛农墟的必然性。在湾仔区议会的支持下，我们争取到湾仔政府合署外面的公共空间作为农墟的场地。

那时候，湾仔的街坊提出挑战发展主导的社区重建价值观，他们提出另一个版本的香港故事：香港的本土特色、社区经济[5]及社区网络。在这样独特的时空条件下，让湾仔有机农墟顺势诞生，并尝试呈现本土及社区这些核心价值。开幕第一天，一条写著“支持本土有机农业”的横幅耀眼地跨越农墟的中心地带，远远向街坊的本土运动致敬！有趣的是，一夜间，“新界有机菜”突然易名为“本土有机菜”。

想深一层，“本土有机菜”其实替香港农业添上新的历史意义。从前，香港自己生产的蔬菜我们一般称为“新界菜”或“本地菜”，“本土有机菜”意味著一种新的身份意义。为什么？

以前，我们只有“地”的概念，没有“土”的概念，放在香港的发展脉络上并不难理解，我们对地的理解非常狭窄，受到地产发展必然性的潜移默化，甚至形成“地”跟“产”是分不开的概念。因此，过去我们对农的理解相对狭窄，可以说，我们普遍只理解“农产”，并不太认识“农业”。从来我们只有“本地新界菜”，没听说过“本土有机菜”。

没有土的概念，无法真正认识农业

“土”是地球上的公共财产，支持著万物的生命。农夫活在土上，洞悉各种生命相互依存的关系；传统的智慧告诉他们，农业不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温饱，农业是如何让我们能够与万物共享，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点。

尽管湾仔有机农墟只短暂地维持了两年，但是，她却为香港农业留下重要的遗产——“本土农业”这个概念的萌芽，触发我们重新思考农业与人。在落地生根研习会中，台湾旗美社大[6]的正扬及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宝强老师都在向我们解析对于本土的理解。这几年，我们也经常在农业论坛上争论本土农业的地理定义，纠缠著怎样才算合乎食物里程的本土范围。

慢慢地，我们方意识到“本土农业”其实是一个关系的概念，而不纯是地理的概念。

回想起来，湾仔农墟的启发，与当时的社区运动一脉相承。街坊反对以地产为本的发展逻辑来重建湾仔社区，锐意维护社区原来的关系与网络。衍生出来“本土农业”的思考，让我们超越了从前对本地蔬菜的市场思维，我们必须通过建立对“土”的认识来理解农业、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点，可以说，本土农业其实是对关系的认知与尊重。

重回地面过生活

湾仔有机农墟的位置在告士打道侧，有说这条主道是我们经济的龙脉，每次农墟完结后，我需要走过一条长长的天桥，跨越几条大道，从这里连接到湾仔旧区的地铁站。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桥上派发“赶赶本土农墟、支持本土蔬菜”的单张。

偶然累了，站在桥头枋枋，突然发现我们原来都活在悬挂的空间里，在高楼大厦里居住及工作，走路则在连绵不断的天桥上。现代城市仿佛都不为人所有，街道只强调人车流动效率的资本空间，不再享有亲近土地的生活文化，而是流浪于一区区管理下的城市空间中，生活在半空中的我们要认识泥土，尊重关系，谈何容易？出路只有一条——我们必需要掉头往下方走、往地面去！

天星农墟：编织慢生活空间

很长一段时间，坐落香港核心维港岸边的天星码头，是我们城市生活的地标，占市民生活中重要地位。因此，2007年当大家意识到原天星码头拆迁的时候，难怪触动大众如斯汹涌的心理情绪。

天星小轮象徵80年代以前的生活节奏，依著渡轮拦河摇摇晃晃的情怀，让人醉心。进入今天的速度社会，却显得有点格格不入。2010年，我们正忙于寻找替代湾仔有机农墟的地点。一天，接到天星小轮公司的电话，船公司的同事说，希望可以在新的中环码头办一个有机农墟。

几年间，有机农墟意外地成为本土农业精神的使节。从最高的大帽山脚，战战兢兢下山，移向维港海岸线边际——天星有机农墟；一批一批“土头土脑”的瓜果菜蔬，构成了中环海滨的装置艺术。每个星期两天，仍然守护香港第一产业的一批有机农夫，突破城乡界线，把我们的乡郊生活文化，自然而然地呈现于此。有时候，我们会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下方，散置几十张小竹椅，与市民分享慢生活的逻辑。

2004年台湾作家龙应台提出中环价值代表了香港价值的论说，今天，渡海小轮、有机农夫与本土蔬菜，汇合于中环核心的维港海滨，联合编织慢生活的空间，开放让市民进入、投入。

结语：落地生根

谈到这里，十年过来，为什么农业变成社会热话，重新找到新的生长点？

几年前，曾经听国内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说过，城市人关注农业的原因，是因为感觉到不安全、受威胁。二战后，美国及西方国家向全世界输出线性的发展模式，从以农业为本的第一产业过渡到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但是，美国自己并没有跟从这条轨迹，他们以大量补贴保护自己的农业，同时，亦推出多种政策保留一定比例的工业，因为，真实的经济及生活，总是依靠实物的生产。

然而，农业是最为实在的，往往当大家感到生活不安，自自然然会想到农业，对上一次，我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也曾看到回归农业、农耕生活的热潮。

传统市集的消失，意味著我们失去自主生活的支点。新市镇后的规划，把我们生活的时空大大压缩。架空的生活空间，让人际关系脱离，社区网络瓦解，心悬半空而变得浮躁不安。这些年来，我们逆向地试图透过有机农墟让大家认识保留农业的意义，透过接触农业而理解本土生活价值。今天，我们庆幸农业的存在，让大家可以选择掉头往泥路上走，返回地面过生活，重建内心的安全感。

今天的香港，我们欣然看到，农业的根钻出泥土，蔓延到城市社区，纠缠人心；农业与社区，相扶相生！

1. 成都华德福学校简介见附录一。
2. 嘉道理农场简介见附录一。
3. 志光当时是嘉道理农场职员。
4. 志光正式工作之余，积极参与推动永续生活的民间机构香港有机生活发展基金Sustainable Ecological Ethic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SEED)。
5. 参考附录二："社区经济 / 社会经济"。
6. 高雄市旗美社区大简介见附录一。

大城小事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静默革命

※ 陈宇辉

作者陈宇辉为社区伙伴城市项目经理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1]的分享，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的各个案例中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不管从个案的性质本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扎根在一个社区、“只”涵盖那么数十个会员）、还是从分享者的内敛（没有雄辩滔滔的大屏分享，而选择更为即兴更为家常对谈方式）——但对我来说，小组三位成员李启娟、陈春凤及吴蓓蒂的真诚分享，却是整个研习会中最为震撼的经验。

那种深刻的程度反映在我这名“廖化作先锋”[2]式的传译员身上。我至今无法忘怀分享者带来的感动，使我不得不哽咽把喉头的泪水控制住，勉强用普通话继续传译，并担心两岸的朋友听出我震动的声线，或因为我的情绪波动令翻译进一步失效。

结束了这次研习会以后，我曾经多次抚心自问:为什么这几位妇女的分享能带给我如斯震撼？这种震撼，究竟打动了我哪些方面的情感？它是否反映了某些我已不再相信却能从这批妇女身上重新找到的价值或曰人性光辉？还是因为她们以看似卑微的姿态，在日常活动中有意无意地挑战著世界的不公，充份演译出香港电影《无间道》那句经典的“做人不应该是这样、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电影对白？

一切 从有机大使说起

说到小组由来[3]，每件事情的发生当然有其因缘，但亦不一定像老掉牙的故事那样有什么桃园结义或怎样密谋革命。为推动香港本地有机农业的发展，2002年起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简称嘉道理农场）[4]开始举办有机大使培训课程及其他其他其他消费者教育项目，而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发起人（包括现任组长启娟）便是透过参与有机大使认识有机农业、土地友善的耕种方式以至共同购买的理念。

作为有机大使，发起人希望能做到知而后行、实践有机生活，推动社区居民和农夫建立关系，遂于2003年在太和妇女中心尝试举办共同购买。及后虽然因双方对购买小组的定位有不同理解而于半年后停止运作，但于2004年有机大使获仁爱堂大埔运头塘村邻里社区中心支持，借出场地，小组重新运作并正式命名为大埔共同购买小组。

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八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真不短，小组既留下了像启娟那样从盘古初开撑到现在的中流砥柱、亦有及后加入的新组员及核心义工。像同场分享的小组成员春凤便是透过区内另一个消费者组织接触到大埔共同购买小组，而蓓蒂则是先从媒体认识到食品、本土农业乃至共同购买的讨论，并慢慢去接触相关领域，及后于2009年参与小组的义工[5]工作。

迄今已有约700人次曾参与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现今约有50至60名活跃的组员。要顺利分配农友送来的蔬菜，小组每周四都需要八至十名义工到社区中心协助诸如布置场地、收菜分菜及收银核数等工作，八年下来曾协助小组运作的义工约有50名，现时的核心义工则有15人左右。

超前的“蚯蚓”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网志[6]没有什么花俏的设计，简洁实用。网志主要用来发布订菜的消息，而管理员在发消息时同时会加一两句问候（像2012年11月29日的标题即为“气温低了，要加衣……”），不禁又想起启娟在分享时提到她现在学会以计算机与组员连系时脸上的笑容。生活总是可以很美好的，不是吗？

小组组员列出的共同购买理念：

1. 建立没有中间人的、直接和透明的买卖关系，让生产者得到合理回报，消费者得到新鲜而来源可靠的蔬菜；
2. 透过集体订购模式，支持安全生产的本地生产者；
3. 提倡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话，建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互惠互利的关系；
4. 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过程，认识有机耕作，明白农产品的质量会因应天气和季节而有参差；及
5. 尊重大自然，保育生态环境，追求可持续的生活道路。

有些时候我们会很“怕”一些“阿妈系女人”[7]式的宣讲，好像说了等于没说那样。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为什么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比如小组罗列的理念——却成为必须去“倡导”的事情？难道有人不想支持安全生产的生产者？是什么原因让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和互惠互利变得奢侈？农产品会随天气变化，以及人们应尊重大自然，岂不是应当信守的老生常谈吗？

然而若我们把小组的理念放回历史脉络中去审视的话，亦不得不佩服她们“当年”的远见。

小组走在一起的2003及2004年，香港刚从沙士[8]所象徵的“集体瘟疫”中舒一口气，惟社会精英却没有反思以往的发展路径为香港带来了什么问题，反而是因著CEPA[9]、自由行等让他们初尝甜头的政策，将香港又推往新一个“概念股”，为今天香港埋下各样矛盾的“中港融合X金融地产”的祸根。

其时，农业——遑论“社区支持农业”——根本进入不了主流的视野，而社会的焦点也许更多放在民主步伐的争拗上。苏丹红、孔雀石绿及蔬菜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丑闻，当时还没有爆发，意味著市民大众对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产品的认可，还是十分有限。虽然湾仔旧区重建的讨论已经引起了一些人对城市发展的关注，但在流行曲《囍帖街》还未播到街知巷闻、还未经历韩农反世贸示威、天星皇后码头抗争及菜园村运动的2004年，城乡关系和本土农业等议题，在香港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而偏偏就是在这样“贫瘠”的土壤里，大埔共同购买小组却开始扮演著蚯蚓的角色，日复一日的、迎难以上的把这片土地变得更适合耕种。谈起以往的困难，比如消费者对有机种植有机蔬菜的陌生，或者是小组曾一度缺乏订购的成员而面临暂停，再者如缺少义工去维持每周那看似简单其实极耗人手的配菜工作，甚至是到今天仍不肯定的场地问题（难保借出场地的机构一日改变政策）等等，小组成员说来轻描淡写，听众却自然能听出那粒粒皆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实践一直在响应过去七、八年香港的许多争论，但某程度上又是静静的走在社会讨论的前边。当地产霸权、大集团垄断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时候（虽然其实那把刀早已架在香港人的脖子上好多年了），小组已提出要建立没有中间商的、公平的产销关系；当食品安全还没有挑动香港消费者的神经前，小组已跨过一般消费者的焦虑，进而寻找可持续的生活道路；当本土论述还没有成形时，小组已坚定地以行动支持著本地的生产者。

令人敬佩的是，今天我们若斗胆拿著小组在网志上列出的理念去“检视”她们的工作，不难发现她们正以每周的实践去落实和推动自己的理念。她们与农友相识于农友最困难的时候，因此今天虽然部份农友的农产品已不愁出路，但仍然会确保小组有足够的蔬菜供应，那关系早已超越了主流市场中冷冰冰的买卖。虽然不少初加入的会员也许十分挑剔、对农友农耕认识有限，甚至只是因为小组的有机蔬菜价格较市场低而加入，但义工仍然坚持在每周的会面中、定期举办的农友探访活动中、乃至发布外间的活动讯息时，把对有机农业有机生活的理念传递给组员。

“小莫小于水滴，汇成大海汪洋；细莫细于沙粒，聚成大地四方”[10]，从大埔共同购买小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滴水穿石。

“师奶”进社区

身为全职工作的一名男性，我对家庭主妇（或是俗语里的师奶）的认识十分贫乏，大部份的理解只能透过观察身旁的家庭主妇、以及透过阅读去尝试感受她们的生活。“独守空帏”的说法也许太过哀怨，但在高度原子化的香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十分疏离，进一步去理解被“赋予”照顾家庭的任务、每天游转在家庭成员及家中四面墙之间还要被社会污名化的家庭主妇之困难，也许亦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

在分享会上被问及坚持了八年的共同购买小组为她们带来什么收获，小组组长启娟的回答在我听来既谦虚、真实又令人无比动容：“我想最多收获的是我，由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家庭主妇，到走出社区，到现在懂得天天用计算机和义工沟通，生活不脱离社会的，都是透过共同购买的机构实现的，以前在家带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不敢表达，而现在，我能有这个组织、坐在这里和大家沟通，我也感激一直为我带来帮助的人。”

岭南大学的陈顺馨老师在响应时指出，日常生活与妇女角色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小组的成员、义工和组织者也许从关心家庭健康出发深入到这件事当中，慢慢的发现了她们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而组织者在维系小组的运作时，某程度上也是以“养育”的角度去为小组劳心劳力。

分享者启娟、春凤及蓓蒂都提到，参与大埔共同购买小组丰富了她们的社交生活，而顺馨老师的点评则指小组的活动一方面建构了很强的社区网络，包括与社区的连系（如社区中心、业主立案法团等）以及与农友的支持，更遑论小组妇女之间深厚的“姐妹情谊”了。

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的讨论中，有朋友提出“社区支持农业”这一命名并未能充份反映在这事情中的内涵以及价值。的而且确，在大埔这案例中我们见到一方面小组的发起人因著对有机生活的热忱

发起共同购买，但过程中农户不是单向的“被支持”、同时亦支持著小组的运作；而因著有机农业这件事情，一帮妇女能聚首一堂建立起姐妹情谊、参加者亦走出自己的原子家庭，进入到更大的社区网络，拓阔自己的生命经验（包括写网志及与来自两岸三地的朋友做分享等）。从这角度来看，社区和农业是相互支持、互惠共生的关系才对。

名可名，非常名，真实的事情总是被名字要大要厚。

持久之道：双赢的营运方式

陈顺馨老师在回应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分享时提到，小组之所以能够维持八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也许包括它们的目标不为做生意、甚至不为自己的生计，以清晰理念凝聚到农友及会员的支持。顺馨老师这里的“生意、生计”是源用日常主流话语中的意思（即现金收入），并不代表她觉得经济生活只能以主流论述般去解读，我甚至可以肯定她是反对如此单一的去看待经济活动。这里请容让我“反斗”[11]一下，推演推演顺馨老师的点评。

如果我们把生计、经济的理解超越赚取现金而扩展到经营日常生活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说小组能够维持八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是它在营运著对生产者及消费者都有利的生意、照顾了生产者及消费者的生计，并因此凝聚到农友及会员的支持。所谓对生产者及消费者都有利的生意，就是小组一直强调的“建立没有中间人的、直接和透明的买卖关系，让生产者得到合理回报，消费者得到新鲜而来源可靠的蔬菜”。这么有“利”可图，生意自然能长期营运下去。

至于说小组的运作照顾了生产者及消费者的生计，生产者那边比较明显——小组支持了多个本地有机农场，农友及土地因而得以生产及再生产。对消费者或是小组成员来说，如果我们抛开了主流的经济论述（如GDP，增长，利润等概念）而把经济理解为解决生活中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具体需要，那小组的运作为组员提供了“价廉物美”的蔬菜，改善了组员家庭的食品质量、增进了组员之间的感情、搭建了社区关系网络等效益彰彰甚明。多少人辛勤工作数十载不就是为了上面提到的好处吗？

说实在的，我很难想象在跨国金融机构能找到如此有经济效益的工作呢！

妇女与农业
为反思主流价值注入养份

相比起我们耳熟能详的香港主流对发展的想象，农业所承载的是另一种范式。比如说土地对政府及大财团来说只是地皮，而对农夫来说则是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伙伴；比如说城市要年终无休的不停转动才能产生利润，而农耕是需要休养生息；比如说GDP必然能不断增长，而除了像大跃进的荒谬年代，我们都知道没有卫星田这回事，以及大自然会给予我们应得的份额云云。

妇女及农业某程度在主流中也是被边缘化的一群，而我依稀感到她们之间有很多共通的特性,为我们反思主流价值观提供养份：养育，爱，强调关系，需要经营，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温柔而充满力量。大埔共同购买小组以其貌不扬、温柔而坚韧的方式保守她们的价值、展示了改变如何发生。在这有时冷酷、经常无情的城市中，她们的存在有如初春的阳光与露水，软化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相信生活可变得更美好。

1.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简介见附录一。
2. 三国后期，蜀国名将相继死亡，才干平常的廖化就成了突出的人物，后人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比喻没有杰出人才，平庸者也侥幸成名。
3. 资料取自研习会分享及《从三斤半菜开始：重拾久违的真味与真情——社区为本有机农业的感人故事》（2006）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出版。
4. 嘉道理农场简介见附录一。
5. 即志愿者或志工。
6. http://1613.mysinablog.com/index.php
7. 广东话，即显而易见、轻易理解之意。
8. 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或称非典型肺炎，SARS。
9. 2003年，中国大陆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简称CEPA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两地的经济贸易联系，回应两地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沙士事件而引起的低迷经济。
10. 这是香港恒生银行的储蓄曲“小莫小于水滴”的歌词。
11. 粤语，调皮捣蛋的意思。

城市连结农业

※ 蔡毓毓

作者蔡毓毓为民间组织工作者

香港一直被视为经济发达的社会，但实际在这城市里面，大多数人内里已是五痨七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几十年来专业主义和资本垄断一路狂奔，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本是社会主体的劳动者，不断受资本压榨，变得贫困，然后又在提倡不断消费的社会中沦为没有选择的消费者，被二度压榨，逐渐失去自主。

除了城市无产劳动者，香港的农民同样日渐孤立无援，互相间却陌生隔膜。香港有1/3土地属于乡郊地区，农业式微，极少数农民虽然仍出产蔬菜，但是城市居民的菜篮子早已被外来大农场作物所占满。劳动者要重夺生活自主权，便要有办法打破资本垄断，让城市重新连结农业，居民以菜篮子支持乡郊农民，强健社区经济[1]，便是其一。

香港的社区经济

2001年，香港出现由团体牵头，学者参与研究，联手提出实践社区经济，以应对社会经济低迷造成的就业问题。当时学者研究中提出来的几个概念：社区经济，社会资本，社区货币[2]等，可以说一新当时汲汲于经济低迷、资本垄断中寻找另类出路的社会基层和团体的耳目。研究还指出，外国已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及例子，证明社区经济发展的方法对重建社区经济、加强社会融和及推动可持续发展均有成效。

相继开展社区经济的几个香港社会团体，都是在社区里服务多年，对社区有著深厚的了解和群众基础，它们因应自身的地区特色，发展出不同的社区经济模式，例如共同购买、回收及二手店。发展社区经济，必须进行生产及交易，基层民众有什么资本以供生产呢？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经济超过100年，资本早已垄断了经济发展，掌握在愈来愈少数的人的手里。社区经济必须另辟蹊径。因此，社区经济的生产注重运用社会资本，而不是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劳动者本身便拥有的一种资本，即是个人透过社会网络和联系而获得的经济资源、信息或机会。

在过往，基层民众的社会资本被忽略了被压抑了，没有真正释放出来成为生产力，改善生活。反而，它遭到经济金融资本的侵蚀，不断在萎缩，也即生产力在降低，其结果是导致民众生活日益困顿。社区经济重新强调社区资本，令日常备受大财阀剥夺的基层和社会团体得以共同反思，重新审视自身在生产关系中的角色，基层民众不是一无所有，不仅有劳动力，也可提供生产所需的资源和信息，也可以主动掌握生产过程。

湾仔社区与社区经济实践

按香港政府统计处每年公布的资料，湾仔常年占据全港最富裕地区第一位。不过真相是，湾仔贫富悬殊，是个天堂与地狱并存的地方。多年来湾仔面对的问题，主要是社区网络因为城市重建被瓦解，城市发展却导致社区居民生计困难，社区贫弱普遍，人口老化严重。

圣雅各福群会（下称圣雅各）是首批践行社区经济的团体。圣雅各1949年起在湾仔服务居民，至今已超过60年，在地区上提供综合社会服务，历史悠久。2001年圣雅各与街坊和学者得到非政府组织赞助，落实推行“社区经济互助计划”，将专业、低收入和新来港、长者和康复者、单亲、综援街坊等等社区不同群体紧紧扣在一起。

圣雅各的社区经济互助计划自2001年开展至今已超过十年，所发行的时分券[3]，是香港最早开始运作的社区货币，目前已发行70万时分，其中流通中的有30万时分。12年来该计划先后设有：开设来墟[4]、时分报供计划成员进行交换，还有时分合作社，天衣无缝车衣队，资源运转站，两间时分天地店等。计划也开放给其他社区的会员参与，但当年初期时分券运作的网络，只集中在湾仔区。

土作坊：从思考食物开始

实践社区经济，是重构劳动资源，将基层民众的社会资本结合自身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让基层民众从中获取生活所需，达到改善生活的目标，进而推动社区的自主发展，才能摆脱大财阀资本的控制。但是，观乎香港团体推动的社会经济基本都在旧市区或住宅区进行，只在本区运作，集中在区内居民和消费者身上，对生计的促进著眼在消费互助方面，更好运用被浪费的资源，涉及

生产方面的非常有限，生产者一直以来在社区经济的角色并不如居民和消费者般重要。而缺乏生产者社群，也令社会资源的整合十分有限。因此，2007年圣雅各获政府“伙伴倡自强”基金拨款，成立绿色生机社会企业土作坊[5]，透过有机生产和加工，在整合社会资源、消费者和生产者互相结合上，实在是迈进了一大步。

土作坊位于湾仔坚尼地街街尾，这一街上都是旧唐楼[6]，地铺多是车房或工场，土作坊铺面并不特别起眼。它主要是由一班街坊[7]妇女为社区居民提供各款绿色有机生活用品。土作坊还推行共同购买有机菜，加工有机产品如有机腰果糖、有机姜饼等等。其中，节令食物的加工是土作坊非常重要的生产项目，节令食物加工采用本地农业产品为原料，生产有机月饼、五行萝卜糕等。

土作坊的创立源于社区经济计划里一班街坊对食物的思考。圣雅各社区经济负责人郑淑贞说也是机缘。早年刚开始发展社区经济时，她曾和个别有机农场谈过合作，虽然没谈成，却也就此认识了有机农场的农夫，彼此有了联络。后来她带圣雅各的年青人去有机农场学种菜和堆肥，而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正是时分券计划里的成员，因而将有机食物的讯息开始带到时分券计划成员之间。

2006年参加圣雅各时分合作社的街坊，正针对社区里食物浪费问题，向大酒店收取面包，然后与想换取面包的会员交换，而面包交换收到的时分券，则支付给时分合作社付出劳动的各成员。因为有了有机农作物的讯息，逐渐地合作社的街坊开始由食物浪费问题，思索到食物健康问题，食物是每个人的基本所需，为什么劳动有价，却不能让街坊换来足够的健康食物？街坊如何可以享受到健康食物，改善生计？

坐言起行，街坊没有停留在收取大酒店面包。在圣雅各的支持下，他们联系有机批发，虽然有了有机菜，但是有机菜价格昂贵非街坊能够承担，销售困难。街坊也去蔬菜统营处批发蔬菜，但逐渐发现问题，这些菜的生产者是什么人呢？在批发零售过程中，究竟有多少钱付给了农民呢？街坊是不是没钱没资源就没有出路和生计呢？

共同购买，关注农业生产

他们转而开始了了解香港农业、寻找香港小农合作之路。香港农业虽然已逐渐式微，但仍约有2.3%的新鲜蔬菜是本地供应的。香港也有农民，但从事有机生产的比率不高。香港出产过很多美味的农产品，像元朗米，荃湾川龙西洋菜、粉岭鹤薮白菜。近十几年，有机农场在有

心人孜孜不倦的实践下正在滋长，这些农场通常为小规模经营，以种植叶菜和瓜果为主。他们面对中国大陆大农场的大量输入（即使是有机蔬菜，大农场也在和大超市互相配合，占据有机市场），小农场，特别是有机农场个体户，他们的生存一点也不容易。

圣雅各和街坊在新界联系到六个农场，农地规模基本都很小，有的才几斗[8]地，有的农场里干脆就是主人农夫一个，别无他人帮手。街坊决定支持小农场，是因为考虑到小农場的农夫无法生产、运输、销售全部自己承担，支持小农场，可以释放农夫的劳动力，让农夫更专注在自己擅长的耕作上。土作坊对现行的认证制度也有所保留，因此，对新入行、刚起步的，想在农业发展但又面临销售困难的农夫，土作坊最多支持，也不要求农夫像大型有机农场那样搞认证。

找到农场后，街坊于2006年开始了共同购买有机菜。开始时，街坊找到六个订户，共订购36斤菜。后来订户多了，订菜增长到100多斤，再后来到现在就是稳定的200多斤。这几年间，他们支持过的农场共有13个，像沙埔村的明哥、林锦元岗村的王菱、大江埔的昌哥、绿怡农场、欧罗农场、琴姐农场等等，当中有的农夫得到支持后因生产销售稳定下选择离开不再合作，也有新开始种有机菜的加入。土作坊的街坊从来没有介意农夫的进进出出，反而替那些能渡过难关稳定下来的农夫高兴，然后又高高兴兴再寻找新的合作小农夫。

土作坊直接向小农场购买有机菜，付给农夫的是现金加时分券，20港元（下同）一斤菜，农夫收10元和二时分。农夫收到时分券，也可以用时分券聘请街坊帮忙，而街坊帮忙农活后可以用时分券换有机菜，不再吃不起有机菜。社区的街坊支持农夫，从而赚取时分券，结果是自己可以吃得健康富足，又以较合理的价钱在社区中购得日常用品，帮补生计。农夫的生产则得到城市社区的支持，稳定持续发展。可说是城市居民与农夫双方互有来往，各得其所。

目前街坊以时分券换有机菜大约有几十斤，占土作坊共同购买的三成。三年来，土作坊的有机菜售价一直维持在20元一斤，没有加价，街坊以12时分加八元现金买到有机菜。这几年，土作坊每年向农夫购菜的现金达20多万，每月约两万元。他们希望做到更多资源再分配，比如菜价能提高，付给农夫的也多些，对街坊则维持收较大比例的时分券。

土作坊参与的街坊以妇女为主，她们直接采购农产品，还有销售、推广、运输、配送等工作，整个过程工序很多，街坊觉得一点也不容易。而土作坊要配合农夫的步伐，例如有机农夫不时不种，土作坊强调对消费者教育，让消费者知道源头生产者的理念和处境，知道不时不吃，这全然是挑战。香港一向以消费者为王，而消费者本身却带有矛盾的价值观，例如讲究不时不吃，但又希望在香港炎热多雨的夏天吃到菜心，土作坊便需让其明白这种要求给农民生产和土地带来压力。

对于土作坊目前在社区支持农业的规模是否足以扩大影响，圣雅各另一计划负责人谢振民认为，规模可以指共同购买支持农场的量多量少，而香港的地理和人文与外地不同，无法大规模进行，重要的是这种不以消费者为王，结合街坊参与和时分券的模式，有无可以借镜给其他社区的经验，而其他地区也不能照抄土作坊模式，要根据在地情况，在学习之余加以修改，走出自己的路。比如与天水围的基保券计划[9]比较，湾仔土作坊比较侧重有机，相反基保券街坊更有乡间生活经验，更清楚有机认证不代表真正有机。

食物加工，深化生产

土作坊从一开始提倡身土不二，在成立之初，先有共同购买支持农业，后来相继成立社区生产队、食物加工队及土作坊当值队。其中，食物加工队是土作坊从消费支持农业，进而走向生产支持的重要里程。经过几年的营运，目前营业额已增长到每年120万元，扣除货款，已经有少量盈馀。从年度销售额中看出，食物加工的销售额占重要比例。

土作坊生产的加工食品有节令食品，比如端午节的粽，中秋的月饼、新年的萝卜糕，还有常年食品，比如有机花生糖、腰果糖，有机菇酱、腰果酱等等。为了确保食物是最新鲜的，街坊因应定单数量不定期制作各种产品，并不大批量生产。土作坊售卖的有机产品更多，包括了米粮、干粮小吃、饮料及日用品等几十种有机、环保产品。

土作坊曾组织街坊在湾仔种植——菌，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市区内种植似乎并非因地制宜，社区生产队在2010年前停止了运作。土作坊开始摸索食品加工，在为个别有机农夫大量收成的萝卜寻找出路时，土作坊街坊运用自己的生活常识，做出了香港人喜爱的日常食品——萝卜糕，有机的。几次这样的经验引发土作坊考虑，以新鲜农产品做食物加工最能响应支持农业。土作坊有的是街坊，以及她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处理食品的经验，而香港与大陆联系密切，农产品多，也会造成浪费，加工可以令食物更耐放，比如酱、饼及糖果等，不仅耐放，像加工生产姜饼比姜更容易得到接受和购买。

除了售卖有机产品，促进绿色有机生活，土作坊街坊利用共同购买建立起来的消费、生产网络及有机信息，开拓出生产加工食物，采购农产品支持农业这条道路。不论是采购有机产品还是加工原料，土作坊的采购都以“本地本区本国”为原则，尽量向小农采购产品，除了要稳定供应以供加工销售，土作坊也希望农友理解、同意、相信土作坊的理念，不是交货时有认证土作坊便会合作，土作坊还关心种植方法，甚至是包装这些细节。比如土作坊也在内地寻找货源，但是如果农场的产品本身在内地已做得开，有大批的销售，土作坊便不会特别与之合作。反过来说，土作坊会倾其所能，支持和自己理念相符的农产品。比如和平妇女项目[10]中的妇女，在山西用传统工艺生产苹果醋，苹果醋百分百由山西黄土高原野生苹果发酵而成，土作坊为支持她们，以大笔现金直接支付购买苹果醋，让妇女马上有资金再投入生产。比如粤北连山的地禾糯是传统品种，糯性好、香味浓但产量低，少人种，土作坊便选择入货以支持种植的农夫。土作坊的街坊还会出门去考察，更多了解所采购的农产品，也更了解农夫的处境。比如街坊去江西，那里有有机糙米、山茶油、茶仔粉等等，她们寻找农夫合作，同时加深互相的理解。

多元生计，增厚社会资本

土作坊街坊可说既是销售者、采购者，又同时是生产者，身份多重，一方面需要招徕顾客支持其有机产品，另一方面又是小农的支持者。街坊以前不是不知道有机产品，但香港人做惯消费者，拣饮择食，不会想到生产者农夫。当自己成为销售者，甚至当上生产者进行加工生产，有机会和农夫沟通时，街坊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新的想法，她们为农夫的产品销售著紧，不再是以前的消费心态。而她们支持的农夫也会来买土作坊的产品，大家身份互换，促进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了解，身为消费者时，了解更多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学习尊重生产者的处境。

郑淑贞在一次分享会中指出，食是人类基本的福赐，可是市区人往往不会考虑食物来源，也不知道农民的困境，透过食物让社区居民重新思考与农业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像制作月饼，街坊认识了本地种的有机莲子，像制作真正有姜的姜饼，增进了街坊与农夫的感情和信心。

当土作坊无法直接向农夫采购时，街坊会找一些公平贸易机构供货，像香港的公平栈、公平点，同时又帮这些机构生产加工食品，生产腰果糖、花生糖，这些交易更促进土作坊街坊改善加工的技术，开拓新产品之时，也开拓了新的社会网络，累积新的社会资本。

土作坊是独特的，它做自己的品牌，理念和实践并重，建立起本地加工消费生生不息的社区经济，使有机产品不再是有钱和中产人士的舶来玩意。土作坊从接触消费者，到联系本地小农，外地小农，公平贸易机构，已经能跳出湾仔社区迈向更广阔的天地。它通过食物，关注食物来源和农业发展，透过发挥街坊的开拓能力，整合了更广义的社区资源，把城市社区与土地和农业生产串联起来，使两者不再是分割的孤立的，而是互相认识和互相支持启发，进行更公平的贸易。由此，大家的社会资本都在累积增厚，真正得以减少中间商之剥削，抗衡大财阀的影响力，不仅改善生计，共同都获得更丰盛的生活。

郑淑贞表示和一班街坊搞土作坊，大家不懂可以学，但不可以沮丧。圣雅各拒绝大财团，不希望受大财团牵制，支持街坊充权，发挥所长。土作坊要做到本地化，能够因地制宜，小而美地扎根社区，大财团便无法抄袭，不能以大资本取代。未来她还想推动民间集资，成立董事局，包括消费者和支持者，拉入更多人加入在这场运动中。

街坊阿瑶

土作坊有三大原则:社区支持农业、参与式管理、社区生产。土作坊有20多名街坊参与在各项工作中。街坊阿瑶，就是早年开始参与土作坊的各项发展。2007年初她参加有机生产队，参与种菇菌，土作坊生产时令食品需要人手时，她也参加食物加工。不过她后来当上土作坊的推广员，去农墟、嘉道理农场市集、学校、青年广场、工展会、美食节，到处推广土作坊产品，阿瑶最喜欢推广工作，到处去，样样可以学懂。目前她星期一至五下午在土作坊当值，按她的说法，参与式管理，大家是一个团队，既分工清楚，遇什么也会一齐上，一齐做，连清洁也一齐做。不懂的可以学，也不怕叻人[11]，叻的人要教其他人。

阿瑶逢星期四都会先照顾好儿子放学，迟些回土作坊当值。阿瑶说现在照顾家庭之余，可以兼顾工作，有收入，又有得吃健康食物。阿瑶以前也在外面茶餐厅兼职，她说土作坊最大的不同，是老板和员工关系不同，在外面工作，要求入职要有经验。谁是土作坊老板？阿瑶觉得是圣雅各负责推动土作坊的淑贞阿民等人，又有点犹豫这个讲法，因为他们虽然是管理，但不会摆款。在土作坊自己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提出来，都会得到帮助，不懂都教到懂，没说嫌弃，不会骂人，因此她做得开心无压力，有安全感，甚至家庭有事不懂也问，因为土作坊上下是可以信任的人，圣雅各的各人从一开始教懂了她很多事物。

事实上，圣雅各一直扮演著推动者和中介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组织街坊，另一方面帮街坊结连各个不重复的网络群。郑淑贞认为，圣雅各与其说是管理者，更多的是一种职责，土作坊街坊不喜欢的，税务、牌照、会计、核数，交由圣雅各的组织者处理。谢振民也认为和街坊一起做事，与商业机构不同，土作坊不是请人回来做事，做不成就走人。要因应街坊的情况，遇到问题要了解是不是系统有问题，背后原因是什么，初时也担心太管理主义，但大家一起倾，讨论什么是人性化管理，时间一久连带圣雅各帮助街坊的能力都提高了。

现时土作坊的20几位街坊的报酬是每小时三时分加30元现金，其中三位收全时分。土作坊利润透明，每年三、四月都会交出帐目，一开始也与街坊谈好，会将利润分给参与工作的街坊。阿瑶说不出一年营业额，她知道现在土作坊可以自负盈亏，但也担心它有天会倒闭，她说，所以大家都好努力，好齐心。

农夫阿杜

阿杜不是农民出身，2007年开了自己一个人的有机农场，两年之后开始出产有机菜，到处找地方卖自己的菜，这时土作坊辗转找上门，从此开始长期合作至今。初期他一半的出产都交给土作坊卖，每星期几十斤，每斤可以收到11元现金加二时分（后期因为运输成本高，改为收十元现金加二时分）。现在每星期土作坊仍然向他要几十斤菜，他的农场也已稳定发展，给土作坊的菜现时只占他农场产量1/4。

阿杜的农场现在也只多了一个人帮忙，所以他无法到农墟去卖菜，只能每年两三次参加节日农墟、粟米节等。参加这些大型节日展销活动需要额外人手，他也不愁，便用平时卖菜给土作坊积存得来的时分券请湾仔街坊来帮忙。街坊赚了时分券也会用来买他的菜。

阿杜说，一来一往，大家都好。如果没有时分券，大家便是买卖的金钱关系，没有了交流。时分券让大家可以交换劳动力，有了互助，便多了意义。

阿杜每年有一两次和其他农夫到太和与土作坊成员开会，商量种什么菜，大家之间互相配合不会重复生产。土作坊也会去探访农场。对于社区支持农业，阿杜觉得好，做农夫就喜欢种菜，能把菜卖出去就行，有人中间帮助农夫卖菜当然好。社区支持农业，目的让农夫种菜更加专注，也分担农夫的卖菜压力，预定菜蔬进一步分担农夫种植风险。不过土作坊也无法做到提前预订，阿杜认为如果能做到提前预订，会让他做事更有计划，未下种就有人订自然是开心，但他也明白不是每个有机农夫喜欢预订这个做法。

结语

外面的人看香港金融发达社会繁华，但香港也有许多劳动阶层居住的社区和老旧社区，这些社区基本都被排除在这些刻板的繁华想象之外，社区街坊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社群。香港社区经济发展所尝试的是一种非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交换生活，是一种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自下而上的参与及动员，发挥结连各个网络群的才能、技术与经验，社群中的成员互惠互利。土作坊透过食物的摸索实践，一方面改善居民生活质素，另一方面更令参与者重获生活的意义及尊严，这些社区内形成的社会资本，一旦运用起来，可以成为生产力，连结城市社区和农业社区，把四分五裂的个体粘合起来，重建社区关系，夺回社区生活自主权。

1. 参考附录二："社区经济 / 社会经济"。
2. 参考附录二："社群 / 社区货币"、"社区经济 / 社会经济"、"社会资本"。
3. 时分卷是一种社区货币，价值以劳动所需时间来计算，而劳动则无分蓝（领）白（领），工种平等，大学教授与一个清洁工如果同样工作两小时，会得到同样数量的时分卷。时分卷开始时为市集"来墟"的交易货币，"时分报"则是为了推动这种新货币和社区经济概念而办的刊物。
4. 圣雅各福群会"社区经济互助计划"举办的一个环保以物易物墟集。透过时分券系统以墟集形式为区内不同阶层提供以物换物的空间和平台。
5. 圣雅各福群会土作坊，始于2007年。宗旨以社区为本的经济模式，达至产消二者，和合共利。改善基层街坊生计，连结各区共筹好事，建立绿色公平之"产、消、销"网络。采购以"本地本区本国"为原则，减低碳排，身土不二。以街坊之能力，实践共同购买，社区制作有机食物，支持本土同业小企。现全力发展社区为本农业之销售及加工工作，希望以商业模式推动可持续之社区发展。详见附录一。
6. 唐楼是中国华南地区、包括香港及澳门一带于19世纪中后期至1960年代的商住混合建筑。香港的唐楼一般楼高四至五层，有的分前、后座，前面多设骑楼（即露台），楼底较现代住宅为高。地面一层为商铺，楼上则是住宅，大多不设电梯，一般是一梯两伙，邻里关系相对密切。
7. 意指城市中在邻近街巷居住的人。
8. 斗是一种农人用于土地的度量衡单位，一斗指一斗种籽所能播种的土地范围。
9. 是一种制度，帮助低收入人士在严重通胀情况下，透过共同购买，维持基本生活保障。低收入人士借著协助入货、分货、联络及落单等工作，换取按工时计算的基保券，再用基保卷以优惠价购入货品。
10. 和平妇女项目指"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及延伸的一些活动。活动是2003年由瑞士女国会议员Ruth-Gaby Vermont-Mangold发起，理念是和平不光是停战会议桌上的结果，也不光是各国领导的专利。世界各国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在不断地调解各种不同的暴力：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性别的、种族的……等等。和平就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缔做。活动在世界各地自下而上地推选1,000名不同界别的妇女，冠名和平妇女，凸现她们对建立和平生活的努力和贡献。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当年共提名了108名和平妇女。
11. 粤语，指聪明醒目的人。

在香港思考农业与社区

※ 许宝强

作者许宝强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012年底，先后参加了两场有关农业和社区的研讨会，从不同的讲者学习到不同的资讯和观点，也刺激了一些新的思考。本文尝试初步整理这些思考，并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本土与农业

“本土”和“农业”这两个关键词，日渐成为香港社运及文化批判圈子的焦点，反映了面对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愈来愈深，以及全球金融膨胀下的贫富两极分化，本地民间社会的一些文化政治取态。

同事马国明对“本土”的精简定义是：“本土是与被压迫的祖先相认”。他以丝袜奶茶、刀削梨和“大笪地”[1]为例，尝试说明本土文化其实是“源自升斗市民为了生计而发挥的无限创意”。不过，殖民者以至南来文人却对这些老百姓的地道文化视若无睹，结果是“香港那种由低下层人士在艰苦的挣扎求存的过程里实现的事物都无缘被视作文化”，只被视作“社会的负累”或“文化负资产”。对马国明而言，香港本土文化并非什么“中西文化荟萃”、“岭南文化”等空洞无物或互相矛盾的陈腔滥调，也不是坊间不少根据粤语流行曲、电影或电视剧集的研究所“想当然地以某些人的本土意识作为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相反，“本土”其实是产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从这里出发，再经过众多被压迫的祖先

的经历也许便是久违了的香港本土文化”[2]。马国明提出了研究本土的方法学，就是从街头巷尾寻找本土文化的生母，包括透过深入阅读街道社区的名字变化，理解本地语义系统所呈现和反映的老百姓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本土文化，有寻根究“本”之意，也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土”壤。

根据辞海，“本”指树木的根或茎干，以及事物的根源或基础，也含“自己”之意。由此理解，“本土”除了包括“自己的土地”之义外，还同时蕴含土地之根本的意思。中国古代把农业称作“本业”，大概指向土地之根源其实与殖谷相关。然而，香港过去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意味著土地被转化成为“资源”、投资商品、买卖中介，是衍生今天各种问题的根源。为此，真正爱护“本土”的朋友，自然会抗拒把土地、房屋转化为投资/投机工具。循这思路，我们不难理解，同是针对地产霸权的香港本土社运与农业复耕，在保卫土地上的汇流。

全球各地近年兴起的复耕农地之风，尽管人数不算太多，规模也不大，但除了家传农户及由环保团体组织的农场外，确实还吸引了不少城市的中青少年的投入。这股世界性的都市务农风潮，一方面受全球生态危机的意识觉醒所推动，另一方面也在都市急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下加温。在香港，部份城市人之所以务农，与近年反地产霸权的保育抗争 —— 反高铁、保新界东北 —— 兴许有关。故此，保卫“本土”，除了向把农地居所转化为可供投资投机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说不外，还要同时反对地产商和地产代理狭隘的利益诉求，以至禁止私人会所和高尔夫球场占用大量可供民众耕住的土地。视土地为孕育动植万物和让人耕住栖息的根基，拒绝把它视作为投资/投机工具的发展模式，这大概才是真正的“本土需求”。

在这样复杂多样的因素下展开的农地复耕运动，当中对农业的理解，自然不仅是指狭义的经济生产活动，而是同时承载了自然生态保育、重建社群关系、追求身心自由、改造价值准则、反思教育知识等多元目标，因此包含了文化、政治、社会、身体、精神/灵性生活等丰富面向。换句话说，本土的农地复耕，指向的是广义的农业活动。

事实上，农业本来就包括了宽广丰富的含义。《汉书·食货志第四上》以“辟土殖谷曰农”简要地定义农业。“辟土”除了开垦土地之意外，还因为目的是“殖谷”，因此，如何“辟土”，使土地能不断殖养各类植物，便需要因应不同的天时地理，调动及生产不同的知识技艺，上至天文日历，下至水利灌溉，再伸延至各式组织规划、自然生态。中国古代的农艺百科全书《齐民要术》，探讨的问题除殖谷种菜外，还包括园艺、植树、饲蚕、竹木、禽畜、养鱼、酱醋、酿酒及食品储存等技术。

欧美的agriculture，拉丁文的词源，包含田野/土地（agri）及孕育/文化（cultura）之义。与中国类似，agriculture除了包括种植外，还同时意指畜牧等多元的活动。此外，在南美、中东、非洲和亚洲其他其他地区，也存在丰富多样的农艺传统。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农业，《商君书·垦令第二》有云："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而"士、农、工、商"之说，也彰显了过去农业的社会地位，比今天得天独厚的工商业的地位还高。然而，经历了工业化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再饱受当代金融和地产霸权的蚕食，农业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当中丰富多元的意义，也被约化为一种狭义的经济考量，只计算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金钱贡献。在这种狭义的经济价值准则下，农业于当代香港自然微不足道。

不过，2013年1月27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香港农业论坛：农业是都市的重要构成"，几位讲者仍然努力从宗教、环保、美学、居住质素、永续生态、经济地理、国家安全等角度，尝试说明农业的多元价值，为我们重思农业的丰富内涵提供新的语言和理据。更重要的是，这样对农业的重要性的反思，并非仅以在当代香港独大的单一金钱价值作为衡量标准，而是尝试另觅蹊径，重新争夺对价值的定义，这是很可以开拓本地偏狭的视野的。正如人类学者David Graber所言，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在既有的价值准则内争取更多利益，而是争夺对价值准则的定义[3]。换句话说，复耕农业的原因和目标，并不在于其对经济产值的贡献，也不在于追求本土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是为了改变过去现代化、都市化框架下的单一价值坐标，超越一种以金钱或物质利益来衡量成本vs效益、有用vs无用、好vs坏、善vs恶、美vs丑等单一价值准则。恢复务农，正是要回归人类的"本业"，重新以永续的方式和丰富多元的价值准则，校正社会发展的方向。

自然，社会不断改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很难（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或想象中的理想农业社会。如何在当代急速都市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浮现、有毒食品泛滥、全球生态危机逼在眉睫的社会脉络下，重申"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以至打开窄化了的农业想象，思考农业是否香港（和世界）的"本业"，同时告别"本土"狭　排外之义，或许是反思以至改善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否想社区

如果农业本身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内涵，那么抗拒把它约化为狭义的经济生产活动，是否应该将农业与"市场"或"经济"等概念切断，然后再把它与"社区"和"团结"等概念接上？这是一种流行于部分非政府组织的想法。例如，某种社区支援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论述，强调的正是"社区"对农业和生态的友善角色，隐含的是减少甚至割断农业对"市场"的依赖。

不过，2012年10月在香港大学嘉道理中心举办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来自台湾微风市集[4]的朋友，却分享了他们对“市场”的丰富多元的看法。除了生活美学、在地知识、土地友善、社会关怀、交流学习和健康快乐外，微风市集也同时追求不恶性的竞争、合理的利润、技术的提升和营销推广。尽管大会的主题是社区在支援农业中的角色，但台湾微风市集的朋友的汇报中，仍有不少篇幅谈及政府的介入和作用，并强调订定规章守则的重要性，以至在制度和运作上不断进行自我检讨，这些都是十分有启发性的。

微风市集的经验，彰显了农业除了需要社区支援外，还需要市场以至政府的支援；或用另一种说法，社区支援农业中的“社区”，其含义应该也是十分广泛的，除了包括农业所在地的周遭社群外（例如同场香港菜园新村的朋友所倡议的“八乡人食八乡菜”），还涉及地域范围更广的市场和政府，以至由不同机构所组成的网络，甚或是互联网络上的社群。

要有效复兴农业，自然需要广义的“社区”的支援。然而，反过来说，也同样重要。缺乏优质的农业，在地社区、市场、政府以至其他机构社群，显然也难以永续，因此在倡议社区支援农业的同时，也必须高扬农业支援社区的现实。循这角度回看，“落地生根”与“香港农业论坛”这两场研讨会，可以说是互相补充的。

要协助农业的复兴，除了可提出社区支援农业的方向外，也许还得强调农业支援社区的价值。而在思考农业与社区的关系时，恐怕必须同时拓展“农业”和“社区”的丰富含义，包括让多层次的市场/市集（和政府社群——例如以时间界分的天光墟、夜市、十日墟、月市、年市等，或以地域、功能和规模划分的小贩、店铺、墟市、商场等——可以进入“农业”和“社区”论述与计划的视域；而农业复耕和社区营造的计划也应包含多层次的市场/ 市集和政府社群的连结或改造[5]。

为此，本地的农业复耕和社区营造的计划，不能自外于其置身的更大的社会脉络，应更积极介入各种直接或间接与农业和社区相关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议题，例如工人运动、本土主义、中港关系和政制改革，以至性别、宗教、种族、代际、艺术和教育等议题。事实上，香港近年陷入的社会困局，其实或多或少都根源自过去30多年兴起坐大的全球劫贫济富政策，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两极分化，因此本地农业和社区面对的最根本问题，与本地大部份妇女、同志、少数族裔、工人、甚至正向下流动的中产所面对的问题相仿，与占人口少数的“占产阶级”[6]掌控甚至垄断了金钱、土地、知识等资源，排拒大部份社群的权利和价值标准有关[7]。

小结

在当代香港，带多元含意的农业和在地社区之所以被边缘化，自然与官商倾向发展主义有关，而这又为本土长期以来不民主的政制所支撑。发展主义与不民主政制之所以当道，部份的原因，恐怕源自本地万事以金钱衡量的单一价值准则，其背后则是装载各种陈腔滥调的语词概念，例如农业“附加价值”低，又或将社区与市场分割。这些语词习见，隐含著特定的价值定义，亦人为地切割了本来整全的社会生活，假设农业真的能独立于社区或市场，又或相信经济能够不关涉政治、文化，以至发展竟然可以与保育分离。

因此，要彻底反思农业与社区的关系，必须同时思考它们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概念的连结；而想有效地强化或巩固社区支援农业和农业支援社区，仅在个人层面提出价值和生活的转向，显然并不足够，还得介入政治，推动政制的民主发展，限制官商的权力扩张以及改变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和产业优次，让农业也成为本地（广义的）经济及日常生活的“重中之重”，并同时在社会文化层面，根本地松动既有的概念习见，重新建立一个语言秩序，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整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此，仅局限于提出农业及社区的价值或重要性是不够的，还需介入改造语言秩序的其他部分。

例如，要让本地带点洁癖的中产文化接受农业及其置身的在地社区的美学及健康的价值，除了展示农村及植物的漂亮外观以外，还必须同时改变流行、偏狭、以西医及城市中产视野主导的“公共卫生”概念，不视泥土、粪肥、昆虫等同为污秽或病源[8]，也不再视晒黑了的肤色、被汗水雨水浸湿了的衣服为丑陋或失礼，更不会视没有大型商场、宏伟地标的社区为缺乏文明甚至是“落后”。为此，关注本地农业和社区发展的朋友和团体，除了可与学校合作，把师生带进农村菜田外，恐怕也不能回避介入大众传媒的表述和学校课程的编排，包括追求改变香港中学的通识教育科“公共卫生”单元的课程内容，在偏狭的西医及中产视野以外，引入原住民、中医等与农艺社区相对亲和的视角和概念，改造和丰富现有的语言表述系统。

本文以两场研讨会的讲题内容开始，或试以两场研讨会所提出的一些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作结：“农业”是什么？复兴本地农业，应否包含非有机的农业？还是只推广有机或永续农法？为何上海、北京等中国大城市的农业自给率，远高于同受中央政府统治的香港？社区支援农业的“社区”，又包括什么？如何才能够让学生离开学校、走入农场/社区，重新学习并建立另类的价值坐标？最后，总括而言，如何分析和克服各类阻碍社区支援农业和农业支援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或如何扭转改造过去几十年的劫贫济富大计？

❶ 香港八十年代前一种民间夜市，一般称为平民夜总会。

❷ 马国明2006：〈告别陈腔滥调〉，发表于岭南大学主办“我们的未来”系列“文化、政治、香港的未来”研讨会，2006年12月10日。http://www.ln.edu.hk/mcsln/future/06_07/our_future_sp1_3.html

❸ Grossberg, Lawrence (2010): “Considering Value: Rescuing Economies from Economist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❹ 微风市集简介见附录一。

❺ 推而广之，其他相关的概念，例如城乡、环境、生态、美学、文化等关键词，恐怕亦需要更彻底地思考它们丰富的含意。

❻ 这里采用的“占产阶级”概念，指的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2010在“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一文中所谓的“被选中者”（Included），也就是透过知识产权、专利垄断等手段、占用了原本由公众共享的自然资源、生物基因和知识资讯。因此，齐泽克认为，当代的阶级，应依据占有文化知识、自然资源和生物基因的能力和程度而划分为“被选中者”（或“占产阶级”）和“被排拒者”（Excluded）两种阶级。此文章收录在Costas Douzinas和Slavoj Žižek合编的The Idea of Communism 一书中。

❼ 许宝强2013：〈本土与农业——为什么要反对新界东北发展模式〉，发表于明报，2013年7月7日。

❽ 例如香港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宣传海报“小心登隔热　齐来把蚊灭”之类的广告。

遍地花開

台湾篇

用“野地花开、农艺复兴”来形容近年台湾土地上一股新气象，许不为过。

野地，总是生机勃勃。台湾天然资源丰富多元，被称为宝岛。只是，经不起近代垄断性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狂肆，弄得粮食自足率竟下跌到当前的30.6%，良田大规模休耕、一度富饶活跃的农村变得零落荒芜。在这些被放野的宝地上，过去十多年开始出现变化。是钟摆的惰性返还？是人性、以及土地和自然中纯粹的、原始的、朴实的、稳定的与和祥的潜伏因数驱策？是身体、感情和灵性的欲欲的向往？是科技理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寻索和回归？（**文：野地花开，农艺复兴**）抑或，是最简单纯朴的生命经验，例如孩提时在山林间放浪劳动记忆的呼召？让不同年代不同历练的人回到土地，做农，努力耕耘新的农村社区，希望“日久他乡已成为故乡”？（**文：一名台湾社运青年的归农旅程**）

他乡不远，就在咫尺。农家集墟成镇成市，城乡本是亲密的一家，相互依存分工合作。自称社运青年的赖青松从小城乡两边跑，儿时经验是定居城市，岁节返乡。这确是不少台湾城市中青代的常规。有人说，心定下来的地方就是乡。青松在不远的他乡的稻田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带著深刻城市经验的这些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揉捏脚下粘绵的泥巴，尝试编织和建构现代社会一套新的生活方法和伦理，里面包括知识教育、组织社区/社群、市场生产、以至情意、理念和信仰的传递流动。**（文：农村是一所学校）（文：CSA是一种生活方式）**南部美浓的农家子弟张正扬在老家低头努力耕耘一种新城乡，说到底是人与土地，人与人，以致是人与自己的关系。过去六七年间，新的小农市集在小岛上如繁星冒现。在这些人与人直接碰触的场合中，人们获得力量，进入各种美丽想象和践行。**（文：让“社群”述说“美好生活”的故事）**一些简朴的互相合作的存活，脚踏实地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以互助互惠、资助共用、用手用劳动创造社群的认同和生活的厚度，在日常琐细事中磨练。

是从再回到农开始，是政府一些令人摇头的农业政策和叫不少人握腕的行为，逼著台湾城市人不得不直面农和眼下的生活。台湾农民2010年在权力中心凯达格兰大道冰冷的水泥地上，铺上一方青翠秧苗，抗议政府重工商地产轻农的偏颇发展策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拉起手来，就深深感觉到、清楚看见响亮听到、真正知道：农，的自主、的知足、的传统、的技术、的美学、的肌体艺术、的态度。**（文：脚踩土地面朝天）**如何“破”和“立”？如何走向真实的“城乡共好”？如何并肩而行？学者学生、媒体、律师医生等等不同界别人士，在熟悉如文宣行动，和不熟悉如农耕劳动中反思，建构更整全的世界观，更流动开放的社群。**（文：因农而起、为农而聚）**小农间的社会协作、有制约的生产规模、以小单位生产分配基础，似乎都在回应社会各种逼在眉睫的危机。**（文：劳动的春耕——关于台湾的农事变迁）**现代美好生活的原乡，在手上、在脚下。

野地花开，农艺复兴

※ 蔡培慧、陈莹恩

作者蔡培慧为台湾农村阵线秘书长、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

宝岛台湾的长期发展与农业密切相关包含几组复杂而丰富的面向：最重要也最基础的，是战后政府支持的台湾小农体制，当然，随著经济作物的引进，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扩张而重构的资本农业，也在台湾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台湾的农业体制，是小农生产与资本农业[1]双轨并置的型态。规模化利润导向的农业并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特别是当前我们仅有30%的粮食自给率，即源自于对国际农粮市场体系的依赖，这使得台湾的农业经济陷于既要外向的追求利润，同时，又要内向满足内部消费的两难。然而，此一矛盾处境是以GDP为衡量指标，仅仅将“农”限缩在经济部门，却忽略了“农意识”、“农文化”、“农生活”、“城乡连结”的社会人文面向。

尽管维持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是至关重大的议题，不过，我们想在此展开巨观的生产结构与总体政策之外的面向，从而转向思索“农”的复杂多义。故事从当代台湾正蓬勃苏兴的农艺复兴谈起——这里的“艺”指是艺术、工艺、美学，理所当然的，也是一种以农为本、以人在土地上的劳动为根的深刻经验。我们一方面试图处于广角的位置展开对当代台湾“农艺复兴”的探讨，也思索如何在“小农为本”与“城乡共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足以松动支配结构的论述和行动，这是一条多线展开的路径，各自在不同的位置踏出实践的履迹。

农很有用、为农所用

挟带著西方现代性（modernity）眼光的台湾主流社会，农村被视为“过去的”、“传统的”、“不合时宜的”、“土的”。然而，农村的“土气”，若进入历史脉络以梳理地方的人文肌理，是以小农耕作体系为基础，串起绵密而互惠的社会网络，是因应生产与生活而迭起丰硕、涵纳了深刻底蕴的小农文化。而这些文化或所谓“农村文明”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人们又如何在现代城市与工业文明当道的台湾社会，再生及转化“农”的文化符号？再者，城市居民与消费者，与农村/农业的互动方式或关系会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可能、也不该得出一个绝对的答案，而是凭藉实践与思考，进行的持续辩证的过程。我们也期待那会是多元且不同层次的尝试。

试图阐述“野地花开、生气蓬勃”之前，我们先从“农用”谈起。往年的台湾，只要在报废的车上喷上“农用”二字，就可以在乡间小路行驶，无需缴交牌照税。“农用”在这里头，有两层意义：一来，“农用车”是被现代国家体制视为“无用”的，然而，“农用车”实际上仍具有实质且重要的功能。当台湾农村阵线将“农用”印上那只深绿色的帆布书包，便是希望将“农用”转化为积极意义的诠释，“农”是极富能动性的实践——农很有用、为农所用。然而，“农”的本质与价值是什么？而“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其空间和文化意义为何？我们能如何伫立在现实的基础，扎实的论述“农很有用、为农所用”？“以农为本”在当代的台湾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农”的美学与生活实践

让我们从年轻的创作队伍谈起。一群艺术学院的学生与艺术工作者，从“农”的思维中萃取、创造文化的元素，挖掘台湾的农村并行承载的生产意义与文化厚度，比如2011年7月矗立于凯道、用稻草扎编成的永生树，这不只是作为传承“农”文化与生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这群年轻人在发想与创作的过程，群起而自发的劳动，是在另一个时空体现了传统农家“换工”[2]的互惠关系。这群年轻人因抗议浮滥土地征收而集结为“美农小组”，在这场政治意义强烈的行动中，使“破”的同时也开展“立”的美学实践。当然，农村美学的行动不局限于社运场域，更多的队伍已遍及艺术创作、美术设计的各个领域，举凡：立足于南台湾的“野上野下”、甫成立的“土沟农村艺术馆”、在诚品设柜的“小农主意”、丰富节气美感已有多本专书的“种籽设计”，农村美学被带进常民的生活空间。

再者，是著墨于日常生活的反思与实践。“传统”意味著什么？“传统”和“现代”是否在本质上抵触？“绿兔子”是一个牌子，却并非仅只于此，他们反省工业文明的高效率与便利性，也从现实中发现它的两面性——因为大量与规格化生产，是以自然环境作为换取的代价，于此同时，人类遂逐渐失去尊重与感知自然的能力。“绿兔子”从“传统”的元素里头，找到顺应环境的智慧与生活态度，将人重新置入于自然之中，发展出“自然民具”与

“节气生活商品”，试图藉由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以及使用生活用品的习惯，在人与自然间、生产者与消费者间重建“共好”的关系。

那么“共好”的关系，如何在不同的节点之间——如生产者与消费者、城与乡，长出友善的连结，或其他异质的可能？若以“食物”的层面谈论“农”这件事，生产者与消费者、城与乡，理应是生命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思考，如杨儒门倡导的“粗食”概念，简约朴实的食材，都是来自小农友善耕作的生产，这些耕种以及渔民捕捞与养殖的方法，以符合生态循环为原则，善用生态系服务功能的互惠关系，维持或营造生物多样性的种作与养殖环境。“共好”也坚持“适切”的原则——适地适种、适量生产，进而透过“食物”和“小农市集”的平台，例如合朴农民市集在产销和城乡两端，构筑了相互看见与交流的空间，并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协作部落，使小农“取之于大地、还之于大地”的意识，进入这样的空间，触发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点点滴滴的看见彼此，从生活经验中省思工业生产模式。当小农向消费者分享他们的种植理念与方式、或返乡归农/土的动机与历程，“农”即不再是远在天边的他者，它的价值透过食物被直接体现，而食物生产过程的农务劳动——广义而言的耕种知识与技艺、以及农人与环境的互动，也因此有了被理解的机会。于此，“共好”是一个理想，从看见与理解落实“共好”得以发生的基础，且厚实的深根。

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断裂的城乡，大多数的我们失落了“农”的视野，于此，“共好”的可能需要各个位置的人进行不同的行动，串起有机连动的网络，媒体则在这工程中，拓展了更宽广的相互看见的视域，特别在网路书写盛行的当下，从“小地方”到“上下游News&Market新闻市集”[3]，与长期投注心神于农村和农业议题的独立媒体工作者和公民记者，善用网路的“一人一媒体”的便利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上下游”提供了小农（特别是新兴农民）在网路平台写下自己友善耕作的经验等，使种作过程引发的思考和尝试，能分享给各个角落关注著的人们，广义而言，这也是互惠的社会网络。此外，平面媒体维系著一定程度的重要角色，比如丰年社于1991年发行的《乡间小路》，作为“农业生活月刊”，透过采访纪录，挖掘农业在经济生产层次之外的生活型态，以及农人的价值观——时间观、身体观、环境观、人观等等。

在生产意义层次的“共好”，是扎根在土地上实践“身土不二”的友善农耕或另类农法。台湾是以小农的生产模式为农村的主要型态，农户间互动频繁，知识与资材的交换、品种改良等技术，时常在关系紧密的人际网络中进行。然而，因为第一波绿色革命[4]，以及台湾的农粮市场被整并进新自由主义架构下的自由贸易市场，农药、化肥与大型农机具被广泛使用，以追求更大规模的产量为目标。使得长期以来依循著节气的农耕劳动，所发展出顺应当地环境的地域性农法，因为工业化农耕而逐渐失传，人与生物共存的田间渐渐被换上一幅机械作业的地景，

“农业”遂也被窄化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标准化作业模式。近年来，许多小农与关注在地农法的NGO工作者及研究人员，积极投入各种尝试，并试图重探老农的农耕技艺与智慧，他们重新学习观察环境，试验因地制宜、对自然环境之干扰程度最低的农耕方法，包括开展生态农业（eco-agriculture）的论述、另类农法（alternative farming）的国际经验交流与实践，将可持续性（sustainable）农业/耕作为努力的目标。透过这些尝试，也使小农得以渐次掌握耕种过程的自主权——粗浅而论，即小农拥有自主决定其生产方法与生产资源的权力，进而逐步减少对农药与化肥的倚赖。

然而，只在农法上著力仍不足以集聚更广泛的改变，小农得面对攸关生存的产销问题，若欲讨论小农的产销问题，则又不能忽略战后台湾的历史进程，以及农业产销结构在历史进程中被形塑的政治经济脉络。前已提及台湾的农业在发展主义的计划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已呈现小农生产与资本农业双轨并置的轴线。换句话说，摆在眼前的道路，不仅仅是农的多元实践与以农为主的意识型态的美学阐扬，建立永续农业、小农耕作的思索，不可能自外在现实的生产关系，因此如何在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依归的思维中，创建符合小农耕作多元实践的社会关系与交换模式，亦即建立起在地经济的小农耕作经验，就在人们既存的结构中，缓步前行的介入。

台湾农村阵线与浩然基金会[5]共同执行的“小农耕作、绿色消费”计划，包含著合作组织的摸索、地域农法的整合、小型加工的尝试、常民文化的展现、城乡连结的建立。正是秉持在地经济的实践，从既有的小农生产体系推想与拓展在地经济的模式，著建于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建立。因为生产者与消费者有了厚实而多样化的关系——这也必然包含合作与某种程度的情感连带，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推行的小农复耕计划，是试图重新找回小农经济的可能，并藉此使小农得以突围现有的农企业规模经营模式，以及跨国际的、远端的粮食供应市场；另外，在生产的层次，则透过小农复耕发展出“适合当地生产力及环境条件的产业重建模式”。

另一种类型的“在地经济”实践，是社区协力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透过小规模的社区农场，将生产的粮食作物或蔬果，不直接进入一般市场被秤斤论两，而是透过支持会员的营运机制，生产者与支持者是互助的关系，因此“支持者”与市场机制下的“消费者”有多重意义上的差异。社区协力农业是因地制宜，因为不同的地方脉络而有不同的运作方式，然而可归纳的基本原则是：小农在生产的过程中，利用友善环境的耕作方法，实践永续农耕，支持者则与小农共同承担天灾与其他环境风险，收获的农作物则与支持者共享，是以为当代的“在地经济”模式。社区协力农

业的尝试，是试图突围现下农粮产销体制对小农的不友善，包括中间盘商[6]的层层剥削。“社区协力农业”是以“社区农场”的概念，将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直接连结，也将失去“农”视野的人们拉回土地，重新使人们意识到农与工、城与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没有谁比较高位，而是互为主体的位置。小规模的、位处城乡交界地带的社区协力农业，农民的生产并非进入市场体制，因此有条件拒绝采行追求产量的大规模或惯性农业的路径，那些使土地超过其承载力的方法。另外，小农与支持者在互助的关系网络得以共同对农耕方法进行沟通，因为沟通而取得共识，小农有更多的空间去尝试适切的、与环境共存的种作方法。社区协力农业是值得努力的在地经济模式，在宜兰的**穀**东俱乐部是台湾最典型的CSA模式，近年宜兰小田田，以及新竹彩虹农场，都有不错的进展。然而，台湾也需要更多人投入实践，以滋养更多于在地长出的经验，进行相互的参照。

这场正在发生的台湾农艺复兴，是一场慢革命。“慢”的概念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强调高产能、高效率的“快”，以及带著绝对自信的、过度信仰市场经济理性的姿态；“慢”同时也是关照彼此、关照环境的状态。“慢”的概念也类似于杨儒门的“粗食”，带著一点“土气”与“人气”，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习惯，慢慢调整生活型态，人们也可能因而意识到——人作为自己及其生活的主体，并敢于试验主流价值观之外的选择。而“慢”，也将使农民和消费者更敢于共同尝试友善环境的农耕方式，这将是扎根于在地的、顺应环境而持续修正的“地域性农法”实践。“农艺复兴”绝非架空现实的烂漫之词或乌托邦狂想曲，而是在历史涓流中梳理台湾农村在国际政经结构、与政府主导的发展主义下的变与不变，也梳理“农”的社会位置与文化意义。稳稳的扎在现实基础上，我们思考“农”何以作为“艺”——除了可言说的技术与操作原则，还有许多无法透过语言文字表述的、透过身体或经验传承的农耕技艺，是小农之于自然而有的细腻的、恣意的却又敬畏的关系，是小农在劳动过程中养成的肢体艺术。“艺”也是从农村（耕）淬炼出的象征性符号，如农农文创、美浓野上野下的美学实践。

从角落长出的芽，或深或浅，如何在象征意义的行动之外，能够凝聚更多的论述或实践，进而足以处理或松动更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而所谓的结构性问题也非囿限于台湾内部，面对国际与区域间政经局势的讨论，比如ECFA[7]及TPP[8]，仍待更细致深刻、根植于在地经验的论述，这是我们需要反省且持续著力的。落笔至此，我们思忖：这波的农艺复兴的发生是可贵的，然而如何增强力道？如何更深化农艺复兴的内涵、如何扎根？也反省到我们在行动的过程中，是否已然接受了现存的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流的、正典的（normative）、高的，从而自居/自限/自甘于边缘或另类（alternative），而不自知？之所以自许或定位这波农艺复兴为一场“革命”，即意识到它需要更多样性且多层次的论述与实践，仍待缓步而行。在行走的路途中所激发出的思辨，不会有单一而绝对的解答，思考与行动的交互辩证才能找到农民之路。

1. 资本农业指以资本为纽带引入大量现代生产要素。
2. 指交换劳动力。
3. 上下游News&Market（新闻市集）是一个关心农业，以及友善土地议题的社会企业，主要推动三项工作：1）建立一个关注农业、食物与环境议题的网站，一方面聘请专职记者进行专题报导，同时也邀请各界作者，在此发表包含食物、耕作、农地保存、食育教育、绿能生活的文章，交换更多元的讯息；2）主动进行农产品开发，提供给消费者健康的在地食物，也让农村的经济更活泼；及3）提供其他对友善土地有帮助的相关产品，让消费成为改变的力量。
4. 参考附录二：“绿色革命”。
5. 1913年，殷铸夫在东京成立学舍，名为“浩然庐”，呼应革命份子浩然正气之意。其后，其子之浩于台北成立“财团法人浩然基金会”，以**奬**励文教事业、促进文化交流为宗旨。1999年，浩然基金会美国分会正式成立，推动多元宽广的交流活动。
6. 指收购农生产品的中间商。
7.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2010年6月，台湾与中国大陆签订。
8.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美国主导的，台湾已表达循序加入之意愿。TPP亦译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议。反全球化运动团体认为TPP的实质内容并不只包含降低关税促进贸易，还赋予跨国企业侵犯消费者权益、劳工权益及破坏环境的强大力量。

一名台湾社运青年的归农旅程

千寻百觅只为安身立命，血汗泪水浇灌终成故乡

※ 赖青松

作者赖青松为穀东俱乐部农夫

从少年时代关心环境议题，青年时期参与社会运动，直到迈入中年回归田园生活，这一趟路走来，虽称不上千回百折，个中滋味却也足够让自己刻骨铭心。

至少在30岁那年，自己选择离开作为台湾政经中心的台北市，回到雪山山脉另一头的农乡宜兰，心中对那曾让我热血奔腾、费心计较的社会议题，有一股再也努力不下去的疲惫与挫折！“不如归去”是当时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谁知道，汩汩的涌泉与肥沃的土壤，却为一颗伤痕累累的种籽，带来未曾有过却又似曾相识的抚慰与滋润，让生命获得落地的沃土，寻著生根的勇气！

感谢社区伙伴以及所有参与这次研习会的各地伙伴，我从没想过这条人迹罕至的幽秘小径，竟有一群同路人，与我扶持同行，也让我有机会回溯这趟与农结缘的过程，并有勇气整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归农半生记……

“农”的出现

农家出身的父亲与终生务农的阿公，给了自己一条剪不断的农的脐带。然而，定居都市，节岁返乡的生活形态，在儿时留下的农家印象，总是带著某种疏离却又熟悉的异样感觉。

直到升上中学，家中发生经济变故。“你阿爸的工厂倒了，赶紧上车走吧！”阿公口中声声著急的催促，一家大小被迫离开城市，回到台中乡下，自己才真正学著拿起锄头，牵起牛绳，过起乡下孩子的田野生活。在那短短不过一年的光阴里，映照在一个11岁孩儿眼中的真实农村生活，与年节偶尔返乡的轻快情调及玩乐气氛自然大不相同。

老实说，在那样靠著几分地种稻勉强糊口，住的是泥土砖外敷灰泥的三合院，没有抽水马桶及卫生纸，耕作要靠牛犁田，人力插秧与刈稻，就连学校注册费也缴不起的穷困农村生活里，“当一个农夫”这样的选项从来都不曾在心里浮现。

新鲜的传统“生活文化”

尽管都市孩子回到乡村，生活充满了不适应，却也处处充满了新奇！因蛰居乡间而必须融入在地的生活，学习以乡下人的身分过日子，反倒让自己看见许多原本未曾发觉的农村场景。

“这里居然没有卫生纸？”面对著眼前的茅坑，以及摆放一旁不知名的米白色细木棍，还有永远不曾减少漫天飞舞的苍蝇，这大概是回到乡下生活的第一堂课。“瓦斯炉在哪里？”原来乡下的晚餐得从烧柴取火开始，虽然这样省了瓦斯费，却日日见到大伯母劈柴、结草引火种的忙碌身影。有个爱种菜的阿嬷，孙儿们便成了现成的除草跟挑粪工。而双手灵巧的阿公，总是能用屋边的各类竹丛变出畚箕、竹箩等生活用品，看在自己眼中有如神奇的魔术师。

然而诸如此类代代相传的乡村生活技术，却在现代化的大义名分下逐渐失传。这种技术与生活能力的集体退化，直到旗美社区大学标举“农村是一所学校”，陆续开办暑期的“农村工作坊”，才见到有人在农村的主体意识之下，关注并促进城乡之间的技术与文化交流。

另外一项让都市孩子印象深刻的，要数农村里的集体劳动文化。住在都市里，生计是专属于父母亲的工作，然而乡村却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少的生活共同体，所有人吃一口饭，便需要有一分的劳动，生活就是一连串劳动的连续。而自己也在各种农活劳动中，养成了藉由参与劳动并融入新团体的习惯，说得夸张些，袖手站在汗水涔涔的劳动者身旁，便足以让自己感到局促不安。

绵密而沉重的乡里“关系”

总是听人家说，乡下是人情味浓厚的所在，然而，当自己真正在乡村生活过之后才知道，绵密的人情味背后，却是复杂而沉重的乡里关系。当大多数亲友质疑或反对我们一家大小，回到乡间倚靠种田的阿公抚养时，“难道咱家里差多这几双碗筷吗？”年已花甲的老人却说出这么一句话，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孙儿，却也加重了自己肩上的重担。

走在乡间的小径上，与都市巷弄截然不同，遇到的几乎都是熟识的人，也因此一举一动也成为众人的话题。自己常以为，或许是乡间有限的土地与资源，让所有人的权利义务紧紧相依，也因此有时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即使是亲友之间的友善馈赠，也难免带著期待回报或巩固彼此关系的隐约意涵。这样的氛围让年少气盛的心难以折服，直到离开乡村到都市生活，才发现邻里不相闻问的疏离更令人难受。从日本生活俱乐部生协或主妇联盟[1]共购中心的经验都发现，积极参与合作社活动，乐于承担各项劳务者，通常都是乡村出身的都市生活者，反思己身，似乎多年来也在一路摸索，人与人之间绵密与沉重之间适当的关系距离。

“大自然”的生命导师

“我长大的志愿要开动物园！”这样的文字虽未出现在儿时的作文本上，却是心底始终难忘的最初。打从有记忆开始，各种形态的奇妙生命总是吸引自己的目光，生物课也是学校里的最爱，上菜市场最喜欢的是卖活鱼虾的海鲜摊，下课返家途中，两旁零星的菜园沟渠便是最佳的自然观察教室。

回到乡下生活之后，与自然界生物接触的面向更是大大打开，还记得与蜜蜂的第一次遭遇，竟是徒手捕捉之后，久久不愈红肿疼痛的记忆。乡间同龄的玩伴仿佛知道所有小动物的藏身处，先找到一处腐熟的堆肥，挖开堆肥找蚯蚓，绑好蚯蚓钓青蛙，钓了一袋青蛙再喂鸭子，那满地青蛙乱蹦惹得鸭群花枝乱颤的兴奋模样依旧令人难忘！生活在乡间的生活，又仿如一堂活生生的实用生物课，年轻力壮的母牛是耕作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猪圈里又肥又臃肿的母猪除了能吃馊水，每年生出的小猪仔可是重要的现金收入。成群的鸡鸭则是逢年过节，拜拜请客最称头的上等料理。出了家门外，沟里的河蚬随时可以成为晚餐饭桌上的佳肴，果园中枯叶下捉迷藏的锹形虫则是男孩子们捉夺的宠物，春日的翩翩舞蝶到盛夏的唧唧鸣蝉，转眼便成为野孩子手里的囊中物！还有那完美保护色下成群躲藏在相思树上的巨大毛虫军团（大灰枯叶蛾），转眼成为泥丸炮弹连环攻击的最佳目标！

除了这些动物之外，阿公亲手栽种的各类果树，更为窘困的童年带来难得甜蜜的滋味。从门口随时结果的土芭乐树，到沟渠边上高大的莲雾树，鸭舍中挺立的杨桃树，牛寮旁的硬桃树，处处可见的土桑葚，还有夏日里孩子们最期待的荔枝，以及暑假中仿佛永远吃不完的龙眼……那种放学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爬到树上饱食整串在丛红荔枝的豪气，似乎只属于那段年少轻狂的青春，再也不会回来。还记得在那样一段与自然相伴的岁月里，年纪稍长的堂兄是我们最佳的自然老师，每个不同的季节里，只要一早见到他神秘的表情，就知道这天又将有趟神奇的探险，或许是翻寻蓊郁绿荫下野生的木耳，或许是溯溪上行探觅传说中胪鳗的踪影……即使多年之后，那份稚气未脱的兴奋与紧张却仿如昨日。

我有时会开玩笑的说，选择当个农夫，是另一种完成儿时梦想的方式，因为在友善耕作的稻田中，慢慢地，又能见到那些儿时记忆中的小生命，这也是当初选择带著儿女返回妻子家乡定居的一大动力，只是儿时乡居经验短暂的自己，十分清楚无法扮演当年堂兄孩子王的角色，这确实让儿女们的乡居生活失色不少，更别提农地重划后的水泥化沟渠早已失去大部分的生机……

“农”的反思

升上中学二年级，跟随著命运的脚步，一家人来到了台北都会圈生活。应该这么说，当自己离开了农村，或经历了农村生活，“农”的反思才真正开始，农村才进入思考的视野。

具体地来说，来到台北之后，自己才第一次离开土地（地面）生活，大约20多坪（1坪＝3.3平方米）的狭窄公寓楼上，摆上一架缝纫机便成工作的场地，摆上一大张木板床便是歇息的卧房，再扣除必要的厨房及卫浴，所剩无几的才是读书消遣等作息空间。

这跟农村的生活环境大不相同！农村的生活场景是一连串空间的连续，大清早离家上学，从柴香扑鼻的厨房戴上便当，走出晒谷的稻埕，迎著早晨特有的迷蒙雾气，步上坎坷不平的田埂路，穿越门前芭乐[2]树下的绿意，跨过潺潺溪水奔流的竹桥，桥下是孩子们经常摸蚬的所在，再过去是水牛避暑戏水的石阶坡……座落在四面水田的农舍家屋，对于孩子们来说，四季里几乎有无数种返家途径的组合，端看当日哪棵树上开了花、结了果，也看哪片田里熟了瓜，哪条溪里有鱼游……

渐渐地，自己开始学著关注环境的议题，知道了惯行农业使用的农药对化肥，对环境的遗害，也想起住在乡下时，帮忙阿公喷洒农药后，阿公催促孙儿盥洗淋浴的吆喝声，以及阿公急忙用盐巴漱口的背影。循著这条脉络，进入大学的环境工程系就读，来到台湾最为广袤的嘉南平原，正值87年戒严令解除，台湾反公害运动开始进入最高潮，高雄市后劲地区居民反对第五轻油炼解场的抗争运动现场，成为自己修习社会学分的最前线。

当时映入年轻眼帘中的不公不义，是坐拥污染设备的中国石油公司与城市边缘农民的对立，高墙之内的中油员工拥有健身房、游泳池、图书馆及宽敞的绿地公园，高墙之外的后劲农民面临的却是用地征收的压力，无止境的空气及废水污染，更让自己永远难忘的，是那自地底不断抽取而出的清澈却充满油气味的地下水，依旧灌溉著厂区外一望无际的青翠稻田……

“自然”生态的破坏

回首1980年代的台湾，如果要为这个时代注记的话，称为“反公害/环保启蒙的十年”决不为过！或许是台湾进入快速经济增长阶段后，一切行为仿佛只为一个目的：“向钱看”，导致各式各样的工厂污染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焚烧废电缆所引发的戴奥辛空污事件（高雄茄定）、高银化工镉米污染事件（桃园观音）、三晃农药厂公害事件（台中大里，庶民抗争最终关厂）、李长荣化工厂污染事件（新竹市，教授参与抗争最终停工），乃至于高雄后劲的反五轻运动，都是民间在长久积怨之后，所引发的自力救济抗争行动。

此外，1979年所爆发的米糠油多氯联苯事件（台中，彰化），则为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拉开了序幕！接下来1986年的西南沿海因溪水污染引发的养殖绿牡蛎事件，也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1988年的农田镉米外流事件（桃园观音），再加上1993年发现的核二厂秘雕鱼事件（台北金山，变形鱼事件），乃至于媒体对农药污染以及化肥滥用的环境伤害等报道，在在都让台湾民众开始对食品的安全深感不安！

也因为在这样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下，催生了诸如消费者保护基金会、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以及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等环保团体，而自己也利用大学课业之余与寒暑假的空档，积极参与台湾环保联盟的各项活动，也藉由一次又一次的营队与田野访调，认知到台湾的土地已经为经济的发展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其中，又以桃园观音所发生的镉米污染事件，以及核电厂的核废处理以及核安问题让自己最难以释怀，毕竟这些瞬间、点状而不可逆的严重污染，形同即刻宣判土地的死刑，天地生万物以养人，人类为何有权力伤害自然环境至此地步？受到这股内在驱力的鼓动，上街头游行、静坐示威的现场远比空洞的教室来得有吸引力，但也在与政府一次次的正面冲突中，发觉自我内在的无奈与恐惧……

“迷信”的传统生活文化?

在农村的传统生活文化中，最特殊而鲜明的应属信仰与祭祀的风俗。即使是离乡进城的游子，也多会带著祭祀祖先或初一、十五祭天地敬神鬼的习惯。犹记少时回乡寄居他人篱下，面对生疏却紧凑的劳动生活节奏，心情难免时时紧绷，唯有到了农历初一或十五，在返家的田埂路上，远远便能望见门埕上难得点亮的晕黄灯光，一桌素品供奉，加上作为背景音乐的诵经梵唱，在这样异于平常的气氛下，一切平日的俗务紧张与人世烦忧似乎都得以暂时忘怀，多年后回想起来，似乎觉得每个月四次周末仍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而每个月两次敬奉天地的拜拜，才是真正属于农民放松的假日。

进入大学生活后来到南台湾，才发觉比起屡经外来政权统治的台北都会，南部早期汉人开垦的农村与城镇，明显保留了更多传统信仰的元素，甚至还可见到尚未彻底汉化的平埔族习俗。在那些个上山下海踏查环境污染现场的年轻岁月，开始觉察语言的问题，作为都市生活必备工具的共通语（国语），在农林渔牧的现场根本无法通用，这才发现来自北方的国语（普通话），在南方水稻文明地带的局限性。

也在同一时期，在反对公害/保卫环境的社会运动浪潮下，开始有人重新省思并肯定传统庶民生活文化的价值，进行全岛农渔村的信仰习俗的调查（如台原出版社），年轻的自己也才知道，乡间流行的八家将阵头并非主流价值偏见下的不良份子集团，而是先民将春夏秋冬日月星斗的变化，结合四肢动作与鬼神信仰所产生的身体记忆型农民实用艺术。

直到后劲反五轻事件中，在地居民首次在反对行列中出动了神轿与宋江阵，也曾抬出假棺木为中国石油公司进行逼真的送葬仪式，甚至还曾留下逼迫警力撤退的成果。还有一次在台湾首次进行地方公民投票决定五轻案存废的前夕，后劲信仰中心的庙宇出现发炉的异象，让不断进行笼络与分化的中油公司意外吃下公投否决的苦果。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地方居民拒绝统治菁英的价值观，甚至反过来将民间的仪式文化强力加诸于政府权力之上。这样的片刻深深刻印在年轻的心底，乃至于后来在穀东俱乐部[3]的活动形态中，自己也采行了仪式性的插秧祭、收获祭及冬聚，并且在插秧前与收割前聚众到庙里拜拜，让都市消费者也有机会间接感受农民与天地之间的真实互动。

“农” 的连结

相较于离开农村之后，不断增加对农村关照程度的自己，当年留在农村同辈的堂兄弟们，却早早选择了离农的道路！“当个土农夫一辈子没出息！”有次返乡自己照例大谈农民自立、兴农救国的高论时，堂兄不客气地扔下这么一句便离开，留下无言以对的自己。

难道不是吗？相较于待在都市不断强调农村的价值，留在农村面对真实的生活显然要困难得多了！然而年轻的我始终不解，为何在过去物质水平不高的年代，不识字的阿公与阿嬷能够靠种地养大八九个孩子，当年轻一代具备更多的知识，累积较多的金钱之后，反倒无法继续生产农作物，维持耕种土地的生活？不过显而易见的，除非务农能够挣得更多的收入，填补日益增加的生活花费，否则几乎没有理由，能够说服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继续务农。

离开大学之后，这样的疑虑依旧埋藏心底，直到遇见日本生活俱乐部生协，才仿佛见到一线曙光！生活俱乐部源起于1960年代的日本东京，以消费合作社型态组织都市的家庭主妇，集结稳定而持续的购买力量，取得与农民/制造商直接交涉的机会，希望获得更合理的价格及更理想的品质。如果农民愿意改变滥用农药或化肥的习惯，生产的农产品就可能获得更高的价格，如此生活在农村方有实质的生计基础。

运动者的“生计”

然而道理说来简单，如何集结原本即疏离的都市消费者，愿意为相同的价值而采取行动却不容易。幸好在1990年代初期，台湾社会已累积十年以上的环境保育意识，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也在此间诞生，当时基金会内关注的面向林林总总，包括了妇女地位、教育、自然步道乃至于消费品质等，而消费品质委员会便顺理成章成为共同购买运动的起点。

从刚开始在极为有限的品项（葡萄、稻米）与局促的空间（基金会办公室一隅）中展开的共同购买，难免有种扮家家酒的气氛，任谁也想不到竟然会有后来的发展与规模。但不可否认的，第一批参与的成员都有高度的理想性格与行动能力，愿意忍受超时的劳动与会议，并且尝试各种非主流的另类组织手法，例如在都市社区中集资成立劳动合作社（台北县潭墘社区合作社），藉以满足都市核心家庭生活机能不足的困境，同时也作为共同购买的取货据点。

虽然投入之初，薪资微薄，但是劳动时间的弹性安排，以及不断接触新鲜事物的学习空间，都让自己愿意留下来尝试这份工作，也得到专职运动者难得的生计支持。而其他兼职参与合作社劳务的朋友们，也多以时薪计酬的方式，从在地社区劳动中取得微薄的收入，虽不足以真正补贴家用支出，但至少减少家庭成员对此类时间支出的抱怨。

直到后来共同购买的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对料理感兴趣的成员筹组“妈妈生产班”，除了活用稍有瑕疵或盛产过量的农产品进行加工贩售，同时也提供了参与成员更稳定的收入来源，甚至还引进精神障碍的劳动伙伴，建立一个多元友善的社区劳动环境。

至于有机农产品的定价，也采取产消双方合议的模式，也就是日本生活俱乐部所称的“生产者原价方式”，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决定自己劳动成果的价格，也学习建立合理的产销流程及园圃管理。

理念社群/社区的存在

提到共同购买的推动或合作社的组织，总少不了要提到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在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成立的历史中，却可以看出理念型社群或社区的关键性存在，正是这些活跃的社群，扮演了推动消费者教育的主体。

台湾社会历经1980年代初期的反公害运动，以及1980年代末期解严的政治震荡之后，社会上充满了对生活现况不满，并且愿意行动图谋改变的张力。其中，从生活面向做出改变，并且在社区中扎根的应属主妇联盟为首。不少在主妇联盟的成长活动中汲取养分的新女性，在90年代初期也开始回到社区，因应各自社区的不同需要，而开出各种美好的人间花朵。例如由陈来红女士发起的台北县书香文化推展协会（1996），便是集结一群育儿阶段的妈妈们，从满足母亲学习成长以及幼儿阅读童书的双重需求，由各乡镇的袋鼠妈妈读书会所发展而成，这些社区读书会也成为各地最初的共同购买据点，甚至还催生了第一个社区共购取货站—台北县潭墘社区合作社。另外，同样缘自于妇女成长需求而成立的奇岩社区发展协会（1994），从一条自然步道的解说训练开始，慢慢发展出共同购买取货站，社区厨房以及社区生活空间，同时提供妇女二度就业与发挥天赋的机会。而台中地区的共同购买运动，也与主妇联盟台中分会（1990）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一个台中共购据点—三民好所在，便与台中分会共处一个屋檐下。而台南市绿的关怀协会也在1997年成立第一个共同购买班，其后发展独立成为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南社。至于新竹地区的共购行动，初期也曾借用新竹市公害防治协会的场地作为据点。

回首共同购买草创十年，若非许多在各地社区默默付出，推广共同购买理念伙伴们的努力，主妇联盟合作社将无法打下如此深厚的基础。因此，许多人也觉得早期的共购组织规模虽小，却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运动性。相较于今日合作社规模虽成长近十倍，或因理念社群的参与日渐减少，运动推广的重担回到合作社有限的专职人力肩上，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信基础与互动距离也渐次疏远。

“农”的实践

2000年，时值30岁的自己，生活仿佛陷入一场难以脱出的泥沼……离开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后，原本在城乡之间频繁往返的节奏慢了下来，再也不需要赶早出门驱车市郊，遍访菜圃农夫运搬进货，也不需要总是利用假日拜访都市消费者，举办各式宣传活动了！有一两年的时间，生命有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唯一的收入来自零星的日文翻译，终日活动的空间只在家中的电脑房与厨房、厕所之间打转，心中原有对于自然或乡野的渴望，竟然只能寄托在阳台上那几盆寒酸的绿意，以及一缸来自朋友水塘的小小大肚鱼群。

“倒不如你也出来搞个通路吧！”有些共同购买时代结识的农民朋友，提出这样热情的建议。当时，以公司形态经营的主妇联盟共购中心，仍是台湾少数的有机农产品运销通路，再加上网际网路开始普遍化，如果以此串连过去熟识的有机农民，或许有机会另辟新局也未可知。

但是这样的想法很快便沉淀了下来！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并不在消费端，而在于生产者这一端！藉由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所属的消费品质委员会长期的经营，确实在都会区集结了一群主体意识明确，诉求清楚，同时也具有行动力的积极人士。然而，在与农民往来的过程中，却发现到以小农家户生产为主的环境下，愿意及早投入转型有机或减农药生产的农民，通常有较特殊的个人或家庭因素，而且四散各地，除了少数外部资源介入的案例之外（如台大城乡基金会所辅导成立之台北县三芝蔬菜生产班），大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彼此间在蔬菜盛产季节也容易产生排挤作用，无法更进一步建立有机农民的论述，与都市的消费者产生运动性的对话。在如此的前提下，继续留在都市经营消费族群，即使另起炉灶亦须同样面对产销对话失衡的问题，有可能的话，是否该沿著这条产消长河溯流而上，直接进入农村生活，甚至扮演农夫的角色……？

华德福社群/社区

2000年的春天，为了脱离台北一成不变的都市生活，也为了带领年幼的女儿接受华德福教育[4]，下定决心举家迁往宜兰县，租屋落脚在一片稻田绿意之中。

或许受到过往填鸭式升学教育经验的影响，自己始终对教育改革抱持关注，直到辗转听闻宜兰有人推动华德福教育的消息，经过初步的接触之后，直觉这便是自己理想中的教育形态，便头也不回地选择远离台北，来到宜兰县冬山乡的慈心幼儿园，这也是台湾的第一所华德福学校。这所学校完全颠覆了自己脑中“学习”的概念，以配合生命节奏为宜，以快乐学习为本，在没有课本的教室里，老师必须使出浑身解数，铺陈出孩子得以想象与翱翔的自由天空！

为了进一步理解华德福教育的概念，自己除了担任学校的日文教师，同时也透过研习课程学习生机互动农业[5]的基础。由于华德福教育极为强调家长社群的共同成长，透过频繁的师资培训与学习课程，帮助自己快速建立在异乡的人脉基础，同时也激起自己实践农作的动机。后来，在翻译工作之余，开始借用岳父老家的农地，尝试种植一两亩的蔬菜和两三亩的水田，每有多余的收成，便用木箱装盛送到学校的办公室贩售，成为幼儿园第一位非正式合作的农夫。

2001年夏末，第一次试种的稻米收成，辗转分送之后仍有不少余量，再度求助于华德福学校的家长网络，也得到许多正面的肯定与回馈，成为日后选择种稻维生的一大助力。还记得当时第一位买米的妈妈，透过电邮捎来这样温暖的讯息——“读著青松米手札，望著黄澄澄的米粒，仿佛看到太阳的能量饱满的蕴藏在其中。能吃到这种米真是一件幸福的事，要分外感恩、珍惜，谢谢你们的努力和用心！”

在市集里协力“关系”的摸索

不过，2001年的青松米生产经验，以务农为业的角度而言，仍以失败收场，生产出来的稻米虽然卖出一半，仍有一半是赠送给熟识的朋友，总结来说仍是不敷成本，只能勉强算是半农半X。尽管这样的生活，在身心上带来深深的满足感，但是却无法寻得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线。最后，下定决心暂时离开台湾，寻找到其他地方学习农作的机会，其中也考虑过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或是澳洲的生机互动农场，不过最终却在命运的安排下，重新踏上日本的国土，进入研究所攻读环境法。

在日本生活期间，虽然没机会直接接触农业，却发现农夫市集与农产直卖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有机农产品或自然食品的另类销售管道。2006年，在旗美社区大学的发起下，开办了台湾第一个示范性的农夫市集，以推动“地产地消，自给自主”的理想。同年年底，合朴农学市集亦在台中诞生，成为目前台湾历史最久的农夫市集。2009年夏日，宜兰的大宅院友善市集也在梨山阿宝的发起下诞生。老实说，刚开始自己对市集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市集是一项高度动员的行动，尽管每次持续的时间有限，但幕后却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这对自己而言是项不小的负担。后来幸运地，得力于慈心华德福家长社群的积极投入，才让大宅院市集在宜兰站稳了脚步。回顾日本生活俱乐部的经验，平日系以点对点的方式直接传递农产品与资讯，而每年一度秋季的生活祭则像是大型的食农嘉年华，除了传达合作社的运动理念外，同时也作为招徕新社员的手段。

不过在参与大宅院友善市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市集作为人际关系触媒的重要性。平日忙碌的农民可在定期的聚会中，交换最新的资讯或者寻求协助。而对食品安全或有机农业有兴趣的消费者，也可在自然的接触下获得值得信任的讯息。更重要的是，农民有机会在一起策划与布置场地的同时，藉由完成共同任务的经验形成团体意识，进一步谋求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在这样的启发下，从2009年起，穀东俱乐部也利用每三次田边聚会（插秧、收割、冬至）的时机，邀请宜兰在地的小农伙伴们设摊集市，增加消费者在稻米之外的安心选择。另外，也邀请有意愿的穀东朋友们，在穀东市集上展露自己的料理才华或手艺，也藉此增加参与俱乐部的面向。

“农” 的未来

2004年春日，结束了在日本法学研究所的学业，历经几番内心的交战，终于选择回到台湾宜兰下田务农。旁人看来这是放弃了博士学业而选择了农业，但是自己的心里非常清楚，自己选择的是立刻投入农业，而放弃的是过几年再投笔从农！简单的说，务农已经是心底唯一的选择。

还记得那年春天，回到秧苗新绿的兰阳田畔，望著五甲多地宽广的水田，心底只有一个深深的感受——“我终于还是回来了！”毕竟经过前半生种种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奔走，对自己的了解逐渐沉淀而清明，明白城市并不属于我，而我更不适合城市！但是回到农村能干什么？务农能活吗？

当时，好友何金富先生已经透过农会关系租下田地，并且募集了一群都市的消费者，约定以“预约订购，承担风险”的契约种植方式支持农民，这对于自己而言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无论如何都值得一试！于是在返家之前，便受托草拟了穀东俱乐部第一份穀东招募说明，题之为“相招来种田，让都市人也能吃到自己种的米”，以每台斤50元/每**穀**份30台斤，亦即每谷1,500台币的方式募集谷金。如此不但确保了受雇进行耕作的田间管理员的劳动所得，也让自己有了起步的信心，仿佛也看见农业新的未来。

穀东社群的“关系”

老实说，穀东俱乐部最早的发想其实来自于共同购买，只不过将共购多样化的品目简化至最低，只有一项稻米！另外，为了强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选择了“风险分摊”的合作生产方式。而且，为了与购米的穀东保持一种持续互动的管道，特意选择每月定期配送到府的方式，一方面减轻了穀东家中保存稻米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稻米的新鲜度。更重要的，藉由每个月配送的机会，将田间工作的情形藉由文字传递出去。

如此一来，穀东便有机会从单纯吃米的消费者，进化成为理解甚至有机会参与田间劳动的共同生产者。2006年起，除了纸本的田间讯息报之外，还增加了部落格[6]作为讯息沟通的管道，无论是春夏或秋冬，还是台风多雨的季节，穀东们都有机会透过文字或图像，与田间的作物一同成长，与田里的农夫同喜共忧。

依照这样产消紧密互动的设计，原本可以期待更多元的组织发展，甚至另外诞生一个由生产端发起的共同运销管道，乃至于一个更多农夫得以参与的社群支持农场。而这样的气氛，早在第一次穀东会议时便已浮现，甚至有人提议直接成立协会组织。只不过当时在第一批的穀东成员中，并未出现有意愿积极投入协助非营利组织运作者，反倒是有若干穀东从营利的角度，认为穀东俱乐部有机会在日趋激烈的有机市场中做出区隔，这使得后来的发展慢慢趋向田间管理员中心制，由位于产地的田间管理员同时肩负生产与行政的工作，也因此减弱日后穀东社群正常发展的机会。

农户的多元“生计”

在穀东俱乐部发展的初期，历经过两次供应价格的调升，第一次在于不了解水稻耕作的成本，低估了全年度管理稻田所需的人事费用；而第二次则因为转移耕作的地点，需要重新摸索耕作的方式，因而减少耕种的总面积所导致的单位产量成本上升。幸运地，由于彼此之间稳定的信任关系，这两次供应价格调整都未对产消平衡引起太大的影响。

然而，到了2009年，穀东俱乐部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取消穀东分摊风险的义务，只维持“预约订购，计划生产”的精神，目的在于适度拉开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因为在组织人力（包括支薪与非支薪）尚未顺利发展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穀东联系事务，以及非穀东的体验推广工作，已让田间管理员的工作负荷到达极限，透过这样的切割，也让自己从受雇的田间管理员身分，重新回到自产自销，自负风险的小农立场。

在失去穀东制度的收入保障之后，自己必须重新思考生计的问题。劳动力是农夫唯一的生产依凭，但随著年龄增长势必降低劳动能力的同时，该如何才能确保小农户的生计所需？除了台湾政府所鼓励的发展农企业之外，难道没有一条属于小农的道路？

在近十年的穀东代耕经验中逐渐发现，当小农选择透过市集或直卖方式与消费者接触时，除了原本所生产的主力农产品之外，也有机会配合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生产各类农家自制的加工品，除了降低因盛产导致的浪费之外，更可以创造附加价值并开拓新客群。另外，随著都市不断扩张，农村生活经验日益珍贵，接受消费者直接到农场参访或体验，也成了另一笔收入的来源。只要农夫愿意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便能够让小农户在原有的产销基础上，创造出多样而稳定的生计基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依据农户自身的生活所需，配合自己及产区特有的条件，恰如其分地发展出永续经营的环境。

小农社群/社区的再生

从2004年开始的穀东俱乐部，对自己而言，仿如一趟神奇的归农返乡之旅，让自己从一个汲汲于外在追求桀骜不驯的青年，转化成为安住当下甘于平淡的中年。

细细思索这一趟来时路，过去无论从事环境教育、生态调查、共同购买乃至于日文翻译工作，似乎都只是一种贴近梦想的手段，直到专职从农之后才发现，原来务农本身可以是梦想的目的地！这一点无需旁证，因为心中的满足与平静已说明一切。

在生计上，穀东制度不但确保了基本的温饱所需，也提供了诚实做自己的宝贵空间。只要将田间农作的过程如实公开，便能够得到有心人的坚定支持，效果远比有机认证来得直接。

在生活文化上，藉由学习传统农耕与酿造技术，主动传承乡间的传统智慧。再藉由穀东聚会及市集等活动，让都市消费者得以进入农村生产者的生活场域，让从未接触农作的年轻人与孩童，也有机会在心底留下土地的印痕。

在人际关系上，则藉由农耕的实践赢得乡间农民的认同，进入同一套沟通语言与思考逻辑，进而有机会在原本疏离的农都产消关系中，居中扮演转译的桥梁角色。

在自然环境上，则藉由友善耕作的方式降低农地的使用压力，在稻田的田埂、沟渠间保留小生物存活的空间。虽然在乡间土地开发的压力，以及农作物产量维持的前提下，无法积极保留较多的生态多样空间，但仍旧尝试透过各类田间参访体验，拉近消费者与田间生物的距离，希望提升消费者对于农耕现场生态永续原则的重视。

最后，也是目前自己正积极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一个新的农村社区形成的可能性！回首过往农村的历史，是由无数小农的生活交织而成，关注今日农村的破败，同样也是因为越来越多小农放弃农村出走所致。当年，许许多多的农村青年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涌入都市；如今，唯有让更多新世代的年轻人愿意离开都市投入乡村，实现自我生命的梦想，方有可能重启农村的新生命！十年前，穀东俱乐部的出现，看似提示了另一种乡村新生活的可能性，然而意外地，愿意起而仿效的人却寥寥可数。

尽管如此，时代的巨轮依旧不停地转动，农业与农民议题在台湾社会持续发烧，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试著摸索返乡归农的另类道路。而经过10年的岁月，穀东俱乐部也开始赢得乡间农民的信赖，愿意将农地主动出租委托代为耕作。慢慢地，员山乡深沟村也成为友善小农的聚集地，目前进行无农药稻作栽培的户数约有十户，耕作面积约为15公顷，其中还包括了由台湾农民阵线的学生支持者所发起的宜兰小田田，今年将首度聘任一名兼职的田间管理员，负责耕作约一公顷的水稻田，另外也与在地老农契约认购约一公顷的稻米。

这样的波及效果看似缓慢，却在宜兰员山的乡间如实开展！总觉得都市的特质首推善变，但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农村的特质看似保守，但是一旦发生改变，就是彻底而长远的改变！纵使花费一辈子的时间，只要能够改变自己居住的村子也是值得，只因为在这个心血灌溉的过程中，日久他乡已成为故乡。

❶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简介见附录一。
❷ 中国大陆称番石榴。
❸ 穀东俱乐部简介见附录一。
❹ 成都华德福学校简介见附录一。
❺ 由华德福教育发展而来的生机互动农业(Biodynamic Farming) 主张把土地上的动植物、生态环境和地球运行与星辰变化，视为活的有机体；以回归自然、不污染环境的方式，恢复土壤活力，使作物展现强健的生命力。不过，生机互动农业必须建立在有机农业栽培方式的基础上，若一块以惯行农法栽培的土地，受到化肥农药毒害，必须休耕数年，直至回复为有机农业无污染的状态，才能施行。
❻ 香港称blog，大陆称博客。

农村是一所学校

※ 陈莹恩

本文参考与整理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主任张正扬于“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之发言内容而成。作者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

离乡或返乡、离农或归农，是个人的选择或被迫选择，却不能忽视这些选择也紧密嫁接于国家的整体产业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各地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与社会脉络：在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与政治力道推动著工业发展与城市扩张的欲望？而农村与乡村又如何卷进这场角力战、以及如何自处？在资本主义与城市文明当道的主流社会，那群已返乡/归农或欲返乡/归农的人们，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与情感，决定迈步与重探农村、农业以及小农文化的价值？又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也许我们都先得在自己的土地上，细细探究那被耙犁出的历史轨迹与地方的人文肌理，那一落落的土堆和一道道或浅或深的痕迹，会是线索。

位处台湾南部的高雄美浓镇是个特别的地方，她的特别，可以从一所社区大学的故事说起。高雄美浓是一个北回归线以南、中央山脉以西的山区平原，为种植烟叶为主的客家农村。自1992年始的美浓反水库运动[1]，众志之士与地方乡亲会聚、集结，并于1994年组织成美浓爱乡协进会，从初始的反水库运动，后逐渐于地方落实社区工作，直到后来的旗美社区大学，有著一脉相承紧密连带。2012年10月于“社区伙伴与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共同主办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研习会分享旗美社大办学经验的张正扬先生，就曾同时

参与美浓爱乡协进会与旗美社区大学的工作，在协进会的工作经验，对他个人与社大而言，都因著协进会与社大极为深刻的关系厚度，而延续了绵密的社会网络。以反水库运动起家的美浓爱乡协进会，到后来转而扎实在社区经营工作，十年之久的经验逐渐累积社区与社会连结的脉络，而这些脉络在旗美社大的经营，因为伙伴的关系及人际网络的共享，而常常相互支援与搭配，比如美浓黄蝶祭的筹办，以及共同推动水库预定地成为国家自然公园等。

除了共享的社会网络，持续在工作过程中反省自身的身分与位置，是正扬与其他社大工作人员殷殷自诫的，因为无论美浓爱乡协进会与社大的办学，“回到故乡做事”这件事情，并非轻而易举。虽然在故乡，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模式和故乡内既有的生活和工作是截然不同的，正扬就提到：“以往人在社区里，但和社区没什么联系的状态”。因为升学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多数农村的年轻人被鼓励在教育体系中磨练学识与能力、进而步步高升，而这意味著势必得离乡、离农。父母与亲戚长辈，多半不希望也不期待子女留乡，到现在都传著这样的说法：留下的人是没才的。也因为这样的背景，旅外的青年多半和原生地有著熟悉却疏远的距离。正扬与社大工作人员透过沟通与理解，积极的试图与地方乡亲建立关系的厚度。如此持续带著走一步、反思一步的方法与态度，正是旗美社区大学重要的办学基础。

定位为“农村型社区大学”

旗美社区大学于2001年3月3日成立，钟铁民老师是草创阶段的校长，在甫办学之际，社大即自我定位同时也期许自己为——在农村的“农村型社区大学”，原因是旗美社大在2000年筹办期间，当时台湾已有超过20所社大，但这些已成立的社大皆位于都会中，亦即广大的弱势农村还没有社区大学，因此，旗美社大的筹备团队决定成一所“立足于农村”的社区大学，这样的初衷，后来发展为“学习之地、组织之所、结晶之处”的农村型社大的三层目标。旗美社大的成立背景可梳理出二条轴线，一是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后，约莫于1990年代中持续到现在的教育改革运动，旗美社大传承了“社区大学”作为“解放知识”与“建立公民社会”的平台之初衷，顺著衔接上另一条轴线——前文已提及的美浓反水库运动与之后的社区经营工作，旗美社大将“农村是一所学校”作为办学纲领，致力和旗美的地方与乡亲搭接起真实而紧密的连结，透过课程和各种形式的工作坊，理解乡亲的实质需求、进而开展互动关系的多种可能。旗美社大一开始成立时须面对整个高雄县的区域，至第三年，才因地方意识主张社区大学应各自对应其行政区，落实一个行政区一所社区大学的理想，旗美社大才就此顺势将办学区域专注于旗美地区，而在2009年的经历县市合并后更名为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

旗美社大是台湾第23所社区大学，但是为首个位在农村、且非常有意识地将自我定位为“农村型社区大学”的单位。从美浓爱乡协进会到旗美社大，不只是工作形式与内容的转型，也从美浓的单一乡镇扩大为旗美九乡镇，面对的是多元族群与空间形态的社会结构，包含小城镇、农村、原住民部落。“农村是一所学校”作为工作目标，意指旗美社大将工作方法定调为“向农村学习、在农村学习”，看似朴质，却是历经一连串审慎思辨的工作原则。社大的工作人员反思原来设定的“让农村学习”，其实预设了农村是弱势且破败的地方，不讳言的，台湾农村在发展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是有些农村因不堪如此结构性力道的摧折而逐渐垂弱，但这并非必然、也非台湾农村的全貌。当只有一句话定位它的时候，误解是容易产生的。作为自许为“农村型社区大学”，旗美社大的工作伙伴在讨论后，认为“在农村学习”更能回应“农村是一所学校”的目标，同时也是一种谦卑的、再农村化、社会化的治学态度，就此基础而展开观念、议题、组织、区域的串联工作。

“在农村学习”

“在农村学习”会是怎样的一种学习或工作方向？持著时时刻刻的反思，旗美社大的工作人员常经常走访地方的农户、农家妇女与小生产者，在相互认识的过程中，去摸索地方是如何看待社大和社大的工作人员。具体而言，“在农村学习”是一个“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从认识与理解中牵起社大和地方的关系，也牵起土地与人、城与乡的关系。社大也在近年透过“种田”，参与农务和农作的生产过程，将“认识”成为更为扎实的实践、而非浪漫或概念的想象。“种田”，并非成为农民，他们很清楚成为农民是有力道的选择，正扬就在研习会中提到，他认为在某种准备好的状态下成为农民，这种选择才会是比较有智慧的。“种田”之于社大和社大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劳动和农务过程中的知识和技艺，提供了他们理解在地居民的中介、桥梁，也因此，“种田”是认识农村与农民的方法之一。

“在农村学习”，同时旗美社大时时的自我提醒：唯有不断的贴近工作的场域与对象，才有可能将工作细腻而谨慎地进行。在这样谦卑的、贴近土地的思维与身段，旗美社大扎稳了理解农村的基础，进而开展城乡交流的推动工作。因为社大办学的范围并非仅于农村区域，也涵盖了小城镇，如何在居民需求、课程内容与形式、讲师等层面的考量，不锁定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优渥的人群？如何让培力[2]的范围能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与分享，乃至于如何回馈在地社区？这些思考是旗美社大在开设课程时念兹在兹的。

将课程与教室送到村子里

如何因应区域的异质性而进行课程内容与形式的调整，大量的分班便成为旗美社大的特色。一般而言，城市内的社区大学多将课程集中于校本部，因便于管理，且容易形成学习的集体感，然而这样的作法并不适合农村，因为农村的幅员广阔且交通与大众运输不如城市便利，旗美社大于是决议“将课程与教室送到村子里”，从一开始的两、三成，到近三年，社区分班课程都约莫维持80%的比例。

“双轨制”则是旗美社大为对应区域所开展的另个工作方法。包括原先规划的“学程”的课程概念，目前已开发了四大学程——环境与健康、农村与农业、族群与文化、社区与成长，后来发现，区域的脉络无法从课程里切割出来，因此又增加了“区域”的脉络，使课程的规划成为双轨制，分工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由于“农村型社大”的自我定位，旗美社大原本即发展了农业重建课程与有机农业课程，2009年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旗美社大在重建区开设了农业重建的课程，并意识到作为一个跨区域的组织平台的角色，在灾后在以有限的力量协助救灾与重建，在灾后半年的2010年起，进行对地方30多个组织的陪伴与培力工作，包括在六龟与甲仙的长期驻点，协助在地较有力量进行灾后重建的组织，并建立“莫拉克重建站”，将整个救灾与重建工作整合一起。社大与在地的重建团队透过文字及影像的纪录，也进行电影的放映，希望能在看电影的过程慢慢将人拉回一种较为紧密的关系，以及生活的常轨。

从犹疑到尝试：经验交流改变农民态度

除了工作站及重建相关工作的进行、农业重建课程的规划，旗美社大也开发了“有机农业”课程。台湾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多为农会推广部负责开设农民技术培训的课程，而社大作为农会之外的非营利机构，开设农业技术等课程并能与农民的经验进行交流、进而产生实际效益，正扬坦白而言，这样的空间并不大。而“有机农业”课程的开设，是社大在第一年便进行规划与执行，那也是当时农会并不想做的。有些农民在课程中对有机农业的实作渐感兴趣，便慢慢组织成产销班，并某种程度的对农会的课程理念与走向发生影响，正扬提及，近几年也可观察到农会对“有机”的态度与十几年前不大相同。在有机农业课程里头，当面对极富经验的有机讲师，熟练地讲解糖醋液或有机肥料的制作方法，或者田间植物的管理、如何可以减少病虫害而影响收益，一些务农经历较长的农民在过程中是裹足、犹豫的，不确定有机农业是否值得尝试。之后有农民提议是否到有机农田的产地现场参访，社大便著手安排，将课堂拉到实行有机农业最为进步的台东。正扬发现，三代以前从美浓移居到台东的农民，和社大的农民用客家话讨论，谈话内容并非与有机肥料制作或其他技术相关，而是灌溉渠道上下游的关系、邻田的关系、种出来的米如何销售等等，这些技术之外的考量，正恰恰是农民对有机农业裹足不前的症结点。透过农民之间的相互学习，某种语言形式、内容与经验的交流，也使得社大的农民对有机农业的态度渐渐不大一样、愿意跨出尝试的脚步。

城乡交流促进“农”的反思

课程与论坛的经营之外，旗美社大也推动城乡交流的工作。从美浓爱乡协进会的经验，正扬认知到在农村工作，必须在与地方建立全面性的关系为基础，以培养观看地方问题的视野，这样的工作经验与态度对旗美社大形成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教育平台，旗美社大期待自己能成为跨区域、跨领域的中介、桥梁，也思考自身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如何使农村的真实样貌与议题能够得到回应，顺著这条思路深探，农村的问题与待正视的各种现实现状逐一浮现，然而却察觉农村面临的问题很大很多，但投入到农村工作的人却很少，一个跨域连结的发想于焉而生：“如何透过一些活动或机制，邀请更多城市的朋友来到农村，甚至参与到农村、看见与改进农村可能的问题或潜力”，旗美社大就此延伸许多的作为，总称为“城乡交流”，是社大目前很重要的办学内容。实际的工作比如“农村工作坊”，透过实地进入农家、住进农家，参与农户的生活，包括食衣住行、劳动与闲聊，在其中面对的是被不同的生活型态与思维模式所撞击的身体与情感，那是非常直接而真实的。也许外来者想象中浪漫的、牧歌似的田园风景，却可能在进入农村后才觉察其灰暗朴拙的面容，然而这是农村的生活现实，但也只是部分的样貌，在“进入”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慢慢从“部分”拼凑出“全貌”。正扬说到，是这样如此贴近的共处，孕育了许多有趣的经验与对话，对农村与农民较为理解与反思才由此而生。

城乡的相互认识，除了空间上的直接移转，旗美社大也进行“食用校园”的推广、农民市集、农村工作坊、发行月历等，特别是已届12年的农村工作坊，讨论的议题举凡社区协力农业、在“农”与“志”的生活实践去探讨“半农半X”的想象与实践的可能、在地知识、小农与永续发展等。正扬强调，从事这些工作都有很强烈的与教育有关的思维，希望透过社大的平台，从劳动、从议题的讨论、从实作、从对于农村与小农的重新想象，去建立实质而扎实的人与土关系，也去认识小农耕作之价值与底蕴丰厚的文化体系。正扬从这些工作里，反思小农的一些作为与态度，包括五感和劳动与环境的连结、也包括反求诸己的态度，是有机会在未来面对气候变迁与资源匮乏的窘况下，成为新生活模式的参照——关照整体的、观天观地与敬天敬地的、反求诸己且简朴的，这些都常见于台湾小农在生活中的身体力行。

在全球共同议题内重探“农”的价值

无论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即使各地的社会脉络与政经结构各有差异，然而两岸三地在城市化与现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中，农业与乡/农村同样面临了程度不一的困境。若将视野再放得更大，有更多议题是全世界需要即刻共同面对的，包括进入后石油时代，食物的重要性、食物生产条件与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将会与日俱增，而作为食物生产基地的农村，在这样的趋势下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农”的价值之于当代人及当代社会，意味著什么？其二则为气候变迁与灾难更为常态化，以台湾莫拉克风灾的经验为例，几乎颠覆了许多农人对于气候的认知经验，而这样的灾难将更为频繁、且将有其他不可预期的状况会发生，正扬思考著：“作为关注教育与环境的平台，社大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自许为“农村型的社区大学”，也许稳稳扎在地方上，思考与实践这些课题，不求获得单一的解答，而是在交流与思辨的过程中摸索从困境中突围的方法或方向，这大概是旗美社区大学作为一个扎根于地方的教育平台，可进行的长远而有意义的工作。

❶ 1992年底，美浓乡亲从公听会中确认传闻已久的水库兴建计划。面对家园即将被淹没的威胁，返乡知识青年结合农民、地方政治领袖及乡土艺术家，发动抗议、政治游说与社区文化活动，最后促使陈水扁于上任后的2000年宣布任内绝不兴建美浓水库。

❷ 即empowerment，有赋予权力之意，因此有译作赋权、充权。

CSA是一种生活方式

※ 张正扬

作者张正扬是台湾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主任

我的家族务农，从祖父，或者更早就开始了，母亲的家族也是如此，几块面积不大的农地分散在各地，典型的台湾小农耕作。打从有记忆开始，农业就开始进入到生活中。晒谷和抢谷[1]、收割黄豆和香蕉、运输农产品……，这些劳动片段也沉淀在各时期的生命中，对我后来人生的发展造成可观的影响。

这些农务的参与，绝大多数都局限在“生产”面向，是的，早期“生产以外”的工作和农民是没有太多关系的。在以往，农民的生产成果，不论种植的是什么，大抵只有两个去处，交给农会，或是卖给盘商[2]，只有非常少数的例外。换个角度看，农民对市场的网络和游戏规则因为缺乏接触而陌生，中间隔了层盘商，也无从得知消费者这一端的反应。经年累月，这样的关系就形成结构，农民也就成了那个结构的一部份——只要负责生产就好。

一直要到这几年，这样的结构才开始松动。农民开始透过各种管道，例如网路、农民市集，甚至办理收获体验活动，才有机会接触到消费者，自消费者口中得知别人如何看待自家生产的作物。生产者能够看见消费者，以及消费者能够看见生产者，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让农产品不再只是单纯的商品，而具有了某种人格，透过农产品而传递流动的，也不再只有金钱，还有情意、理念，甚至某种信仰。

在所有松动这种传统结构的作法中，社区协力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以下称CSA），无疑是最具企图心和挑战性的。由于各地社会情境不同，CSA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在CSA蓬勃发展的美国，国家农业部（USDA）对社区协力农业是如此界定的：

> “基本而言，社区协力农业，包括一个致力支持某一农场营运的社群；而这农地，也在法定上或精神上，成为这社群的农园。在其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支助，共同担当粮食生产的风险及丰收。农园或菜园的成员或股东，事先支付农场营运预估的费用，及农民的薪资。他们回头得到的，是在整个生长季节中，农场收成的一定份量，以及与土地重新连结，而来的满足。成员也分担因天灾、虫害等而欠收的风险。”[3]

CSA：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风险和收成

从美国农业部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CSA的基本精神：这是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参与，共同承担生产过程风险和收成的作法，这样的作法有别于传统，由无法决定价格的小农生产者，单独面对生产风险；也不同于另外一种有能力决定价格的企业经营式农业，由企业主掌握收成。其中，预先支付农产品的金额，更极大地颠覆了农人的认知——有经验的农民常说，“会种不是本事，会卖才是本事！”过往，农民不仅要面对生产过程中，天灾等造成歉收的风险，还要面对丰收时，价格崩盘的风险。CSA的中文说法，社区协力农业，其中“协力”非常传神地说明了这种意涵。

美国CSA实务工作者Elizabeth Henderson女士，作为一名CSA运动的推手，这几年曾经数度应邀前来台湾访问交流。在与Elizabeth数次的接触当中，她有两个对于CSA实践的谈话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作为一名CSA的经营者，他在招募会员时，即明白将自己的成本，以及需求算出，需求的计算是建立在基本的生活满足之上，亦即对Elizabeth而言，会员们提供的购买费用只要能满足他这些基本开销需求即可，她一点也没有打算透过CSA赚更多的钱，这种作法相当大程度地区别了“想要赚更多钱”的动机。第二是她将成本计算出后，并没有硬性规定各项农产品的价格，她将农产品的购买价格交由会员们自行评估决定，因此白领阶级可能会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农产品，但是蓝领阶级则会以较低的价格购买。

两项作法，对于我们认知农业和生活，充满了启发性。前者的简朴风格，对于资源益趋匮乏的地球，创造了一种友善的互动方式；后者则对于一个人，应当如何在一个群体和社会中，衡量自身能力以善尽相关责任，无疑具有重大启示。

这么说来，CSA其实不仅只是一种农业的新形式，其意义不仅局限在经济，而毋宁是一种具有前瞻性、进步性和全面性的生活方式。

❶ 使用风车，利用风力和重量的原理，自收割下来，含有各种杂质的谷堆中将谷粒筛选出，客家人谓之“抢谷”。

❷ 指收购农产品的中间商。

❸ 引用自青芽儿杂志第13期(2005.09/10)，在该篇文章中，作者舒诗伟先生第一次使用了“社区协力农业”的说法。

让“社群”述说“美好生活”的故事

※ 陈莹恩

本文参考与整理台湾合朴农学市集召集人陈孟凯于“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之发言而成。作者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

来自台湾合朴农学市集的陈孟凯先生，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研习会”上的分享，一开始的发言，就坦白直言自己最初因为半导体设计的工作背景，在早些年前，对于“社群”和“协力”的概念是陌生的，也认为自己“很不左派”，不若一般台湾社会运动工作者多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惯用左派理论的语言与思考方法。然而，因为曾经在商业领域的江湖闯荡，加上近几年读的书，孟凯说自己有办法用“用右派的语言把左派的制度史说出”，因为他“懂得资本家的想法”，说得更具体些，孟凯善用他的管理学知识与工作经验，学习面对每个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累积养分，这都培养了他在合朴农学市集与人际互动、创造社群、将问题视为“共有的”并学习从中寻找解决方法，这样一种处世接物的能耐与哲学。

“社区” vs “社群”

首先，是对于“社群”这件事或这个概念的强调与诠释。孟凯认为合朴推动的，是“社群”而非“社区”，虽然英译皆为“community”，然而在华文语境与台湾的社会文化脉络，这两者对他而言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差异在于“社区”是属于地理区域性质的范畴，而“社群”则是因

共同理念而聚集的群体。“社群”里头的人们不一定居住于同一区域，而也因为“社群”初始的聚集是来自共同或相近的理念，所以经验的分享与彼此的对话较“社区”来的容易发生。而这也是合朴农学市集著力于建立“社群”而非“社区”，即在于理解“知”难“行”易。“社群”内部已有“知”的基础，虽“行”亦不易，但在有共同认知基础和对话平台的前提下，孟凯认为“行”会较容易开展。

合作简朴＝合朴＝Hope

而所谓“社群”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在合朴农学市集，“农民市集”只是合朴的其中一个工作项目，其他常态性的活动包括产地拜访、幸福学课程、“藏种于农”工作坊、共同厨房、咖啡沙龙、各种类型的“部落”等等，族繁不及备载的活动，正是藉由此实践“合朴”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行动。“合朴”，“合作简朴”，英译为“hope”，孟凯坦率地笑说，“美好生活”就是合朴的基本思维，因秉持这样的基本思维，合朴的活动与希望透过“社群”来实践的生活态度，并非以赚更多的钱或消费为前提，而是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以简朴的方式善用资源，而非无止尽的利用，依靠众人协力合作以及共享资源。孟凯说，这种互助互惠的方式就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让市集变成“使人感动的地方”

因为有这样对于“美好生活”的认知，孟凯并不将合朴农学市集视作单纯进行买卖的“市场”。他说，一定要想办法让市集变成能“使人感动的地方”，让市集可以产生“人与人”面对面互动的氛围，比如每个月一次[1]的市集，除了农友的摆摊，也有各式样不同的活动，像是“荷松开讲”，邀请农友以及合朴的志工分享自己的故事，透过轻松的聊天，建立起“群体”的氛围。除此之外，市集也设立“手工厨房”，使用农友的农产品，在现场教导市集的消费者料理烹饪，从中实践“吃在地、吃当令”的理想。这些都使得市集不只是交易的地方，而是透过各种方式与资源，让市集创造“社群”，慢慢凝聚理念，以及人们对市集的认同和信任。孟凯说，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推广教育”是市集很重要的工作，一方面要让市集的消费者成为市集的爱好者，再从爱好者成为市集的推广者。

另一方面，孟凯认为办市集的核心精神是让吃健康蔬菜的人变得更多，因为健康蔬菜不只是善待自己、更是善待生产的农民与种作的自然环境。在台湾，健康蔬菜大多时候是和“有机”画上等号，然而“有机蔬菜”的种作方式不一定是友善环境与生产者，常常因为市场机制的相互竞争逻辑，农友投注更多的资金以扩大产量，这通常是仅有小规模资金的小农所吃不消的。而往往为了增加产量，有机农业倾向单一作物大规模种植，这样的种

作方式对农友与环境仍会造成伤害。也因此，孟凯强调并不要求市集农友的蔬菜要有“有机认证”标章，反而是透过“合朴市集”作为一种“认证”，这样的认证不是商业模式的标准化认证，而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

市集作为平台，消费者可以直接和农友聊天，认识农友与其种作方式，合朴也安排定期的产地拜访。也因此友谊关系的厚度逐渐增实，农友与消费者间有足够扎实的信任感，彼此相互关怀与尊重，蔬菜的买卖遂然在友谊的关系内进行，而“交换”行为也才有可能于焉而生。另外，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的友谊，使得市集渐趋凝聚为“群体”，农友和消费者对于市集的认同感也由此慢慢孕育而生。陈孟凯即说，在“群体”里头，自利就会利他，而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利他”才会长久。

共同管理 共同学习 实践美好生活

“社群”做为实践美好生活的载体，孟凯说，其实，农夫市集只是其中的一个行动。谈论“社群”、或凝聚与实践“社群”有几个层次，其中一个即是如何形成互助互惠的关系。孟凯认为“社群”的关系是需要透过机制来培养的，是要练习的。因为台湾的教育体制，我们被灌输的观念就是不断的竞争、竞争、竞争，所谓的“力争上游”，就是藉由竞争打败对方，那个排他性是很强的，人与人之间也容易形成对立。然而，“社群”却是完全相反的逻辑。若竞争是为了达成更美好的生活，那么“社群”就是一种另类 (alternative) 的方法。由“个人”成为“群体”，并酝酿出互助互惠的关系。

首先，要认知到资源的有限性，进而学习处理“共有资源”的方式，一般而言，公共资源或共有资源通常是政府管理，政府是主人。然而，在台湾的经验，政府管理的共有资源——包括山、海、森林、土地，很容易沦为财团的生财工具，本来应属于全体的共有资源，成为特定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这即是所谓“公有财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2])，这与“竞争”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若在整体的范畴思考，也就是所谓的“社群”，陈孟凯认为，共有资源可以不必交由政府来监管，或成为私有经营，因为人民是与这些共有资源最密切相生的，这就是我们赖以维生的环境，理所当然是亲密而熟悉的；而因为熟悉，管理和经营自有一套与环境共生的方法。从凝聚“社群”并意识到其重要性开始，学习如何共同经营公有资源，而透过经营的过程中，人们学习沟通、理解个人的差异，并找到方法共同面对问题、处理问题。

孟凯以合朴农学市集的经验为例，为了减少一次性餐具[3]造成的垃圾增量，市集伙伴参考东京地球日，想出“食器贷出”的策略，于是对外募集一批碗筷。然而新的问题由此而生，有农友反映若消费者已走到摊位前面，准备购买热食，若还要求他去租碗，甚是不好意思。于是，市集工作伙伴与农友即针对这样的问题，讨论出改

善的方法：让农友在开市前先租是个碗筷，预先支付，把支付的碗筷租金加入买给消费者的熟食费用，农友告知消费者食用完毕后，请到食器贷出摊位清理归还后，由食器贷出摊位把租借金额还给消费者。孟凯说，因为农友与市集的伙伴之间已有一定的关系厚度，所以大家面对问题时，会将之视为共同的问题，而共同的问题就有共同的解决方法；若视为个人的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彼此僵持不下，关系闹不好，问题也无能可解。进一步而言，陈孟凯认为学习管理与经营共有资源、共同面对问题，同时也是在创造一种学习作为“公民”的方法。

“藏种于农” 免遭垄断

其实，农民耕种的土地、使用的种子，也是某种意义的“共有资源”——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公共性，也在于农夫生产的蔬菜水果，是直接和消费者息息相关的。也因此，陈孟凯很强调种子的重要性，以及友善生产者、友善环境的种作方式。合朴参与推动的“藏种于农”工作坊，强调农人保种选种育种、在地当用。如何能让种子不成为跨国企业所独占的商品，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生产者保存种子，除了是掌握生产资源，使得农人保有种作过程的自主性，保留种子也是留种子的多样性。又因为自主掌握生产资源与种作方法，农友理当是最熟悉种子特性的人，不同的种子有不同的适合播种的季节与管理方式，这都是经年累月的农耕智慧，而非一套一体适用的、标准化的流程。在藏种于农的计划中，合朴推动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能自行选种与留种，合朴与专家并农友合作，与农友交换育种的知识与方法，增进农友育种与留种的技术，也让专家能直接和现实中劳动的生产者，进行交流，让他们研发的技术与知识，与农友在现实中遇到的状况更为贴近。这样称作“参与式育种”的方法，实则对双方而言是互惠的。

“部落”+“社群货币” = 美好生活

在讲演的最末，孟凯进一步分享“美好生活”的另类途径，很是启发。在当代社会，唯一最公平被分配的就是“时间”，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因此，很重要的即是我们要如何思考运用时间的方法。孟凯认为，不要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拿去工作，而是建立“自己动手做”的能力，去做你有兴趣的事情。台湾教育的评量学习方式，让大部分的人都不再相信、更很难有机会或空间发展自己的创造力，这创造力包括手做的能力，可以是做木工、种菜、做豆腐等等。以合朴的经验而言，发展了

“部落”这样一种“社群”的形式 —— 是一群共同兴趣和理念的人，凑在一起做事情，并从中建立关系，举凡：市集经营部落、社区豆腐坊、台湾米部落、公平贸易、物流部落、预购取货部落、舍得部落、务农部落、芽菜部落、社区货币小组、共同厨房等，都是先前提到促进互助互惠与人际关系厚度的机制，由“个人”凝聚成“社群”的练习的平台。

在这些“部落”里头，以社区豆腐坊而例，合朴以师徒制的方式，毫无保留教导学员以手工制作豆腐、豆浆，也开发包装的豆制品，然而，合朴希望豆腐坊不只是卖豆浆豆腐与豆类制品，更希望形成一个社区可以共同参与、一起做事、一起交朋友的空间，希望使豆腐坊的成员变为豆腐坊的伙伴，那是一种认同感与群体的建立。当学会了制作豆腐的技能后，学员可以用自制的豆腐拿到市集交换，这就是使用“社群货币”的具体实践。

孟凯说，在社群里最重要的不是经济资本（钱），而是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逐步累积的，是人与人之间慢慢相互连结成人际关系网络。在这样的人际网络里——亦即“社群”，其本质是互助互惠，也因此关系的品质与厚度是重要的，而“社群货币”只有在这种关系里头才有可能发生。因此“社群货币”只能在社群内部使用，一旦离开社群就失效了。孟凯提出另一个有意思的经验分享，就是社群货币是很容易赚、但不太容易花的，社群货币要在一定时间内消费，否则社群货币会坏掉。政府货币不会坏掉，因此可以不断累积；相对而言，社群货币因为取得容易，因而是平民化的，且有时间效力，等同于鼓励消费（交换），而交换是在“社群”关系之中发生，交换的同时也在建立关系。

如同前文不断述及的，孟凯十分重视“社群”作为在当代实践另一种生活的方法，重新建立关系，从“社群”这样的小单位去展开改变的可能。这其实正是孟凯的哲学，他画了两个圈，一个是较小的内圈、一个是较大的外圈，内圈是自身能力可以形成影响力的范围，外圈则是关心的范围。陈孟凯提到，在影响范围内，可能的行为比如扫地、自制豆腐和他人交换、当市集志工[4]；关心范围则是难以或无法使上力的事情。在台湾，孟凯认为很多年

轻人把太多的力气花在关心的范围，虽然议题涉略广泛，但因为著力不深，没有花太多功夫进入议题，理解议题的复杂性，进而起身行动，在实际的工作间慢慢形成促成改变的影响力，而只能漫无目的的批判。“要专注而扎实的投入在自身能力可及的影响范围，你在你的影响范围非常专心做事，你的影响范围就会越扩越大”，孟凯在咀嚼与反思自己与合朴的经验，如此说著。

也许，合朴农学市集正是孟凯和他的这么一群伙伴所共同实践，而得以和他的哲学相互映照、辩证的具体作为吧！“美好生活”呀，这不应该是仅止于乌托邦式的信念，毕竟架空具体脉络的信念是虚无的，若能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去磨练能耐、磨练处事接物的方法，以及与人建立真实而厚实的关系，这正是我们得以从合朴农学市集的经验里头，掘到最质朴诚恳而弥足珍贵的启示了。

❶ 从2013年9月起每个月两次。
❷ 这是一篇学术文章，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3859): 1243–1248. 大陆译为“公地悲剧”。
❸ 意指即用即弃餐具。
❹ 即义工，或谓志愿者。

脚踩土地面朝天

※ 洪箱

本文由台湾苗栗湾宝农民洪箱口述，陈莹恩整理。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

苗栗县后龙湾宝里，位处台湾中部的靠海地带，也是洪箱和一群辛勤朴实的农人的家乡。湾宝的土地本来不甚肥沃，是仅能旱作的沙地。1976年，湾宝的农民配合农委会进行土地重划，自愿捐地，更花了好大的功夫改良土地，如哺育孩子一般的费心照料，才成为现在年年产出甜美的地瓜与西瓜的良田。

这样的沃土，也被投资客相中，第一次是十多年前，新竹科学园区四期预计将湾宝作为工业区的预定地，再来是2005年，苗栗县长争取高铁在苗栗后龙设站，第三次则是2008年，县政府要求征收湾宝的土地作为后龙科技园区用地。三次的危机，湾宝的农民们群聚，几乎可谓使了全部生命的力气抵挡以“发展”之名的无义夺取。再多的文字也道不尽抵抗过程中的辛酸血泪与无奈，尤其对抗的是位居权力高位的政府：那个本来是湾宝农民（也是许多台湾的农民）寄望能保卫人民的政府，竟然反过来向他们强征土地；可稍稍体会的是，湾宝农民的心境是何等愤慨！

幸而，值得庆贺的是，湾宝的农民把土地坚守下来了，也卷动了台湾各界亦步亦趋地回望农村，思索著“土地”意味著什么、“农耕”和“农村”意味著什么，也试图在当代重建“农”的价值:那比用金钱作为衡量的资本价值更深厚和珍贵的，是农民的生活、生命与文化的底。也许，这正是农人那“脚踩土地面朝天”的意义吧！

洪箱的自白

“我是家庭主妇，是一个种田的人。我拿起麦克风的时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财产和生存。”

我们的村庄的人都爱这块土地，我们虽然并不特别富有，但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不会特别想追求什么身外之物，也安于自己的家和土地，不像城市人对“家”的想象，也许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头感觉快乐，那也很好。

我是快乐的人。我每天做农，早早在4点钟就出门工作，那是我的习惯，我可能早上八点就下工回家。身为农人，我可以主宰我自己的作息，活得很有尊严。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彼此应该相互尊重。比如我们湾宝里，社区里头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也有不同的职业，大家生活在一起已经有三代了，村里的人都可以互相包容、接纳。但是，如果你换了一个环境就不一定能遇到这些人，你要重新认识一个地区，找到另外一个工作，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调整自己。

我们的村子小，500多户人家，总共也才1,000多人。我们的村落有几代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地区。当时为了抵抗土地被强制征收，开始在村里头集结，要站出来反抗，但其实也有很多人说：“没用的啦！”，几乎所有的人觉得和政府抗争是没用的，说：“不如卖掉了再找个地方来住”。可是我觉得很不甘心，我不想我的人生就被这些财团和政客主宰。民国101年（2012年）4月14日，政府终于看到我们下定决心要保护土地。我们说，如果政府没有办法照顾这些老农，要强制征收土地的话，那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把60岁以上的老人都带到天堂，一次就超生！不要让这些老人因为失去土地而下辈子过得不好。

“他们说要‘经济发展’，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的。”

我认为政府就是要照顾我们，而不是剥夺我们。他们说要“经济发展”，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的，“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的。我是容易满足的，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不能把每个人拿到一个框子里，资本主义就是那一个框子，政府强制要求每个人都要跳进去，我觉得这对我们农人是不公平的。

当时我很生气，因为土地是我的财产，如果没了土地，生活也会破灭，我不甘心。我们去台北陈情或抗争，每次都是自己出车钱。老人家舍不得离开土地，我们每次去陈情的时候，他们政府官员就坐在办公室，理都不理我们。到第八次北上抗争的时候，我直接向他们大骂，说："你们政府官员都不要脸，你有用纳税人的钱，可是都没有为我们做事！"我常常觉得我们老百姓很可怜，像是我都有纳税，也都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我的权利在哪里？如果真的要征收，也不应该这样蛮横，应该是来跟我们来沟通。这样强制征收对我们农人是不公平的。

我们是在民国97年（2008年）时被突然通知征地的。一开始我们就出来抗争，维持大概两年半的时间，那个过程所面临的压力很大，让人有点受不了，但同时也有很多的鼓励，像是有教授出来声援。这个时代虽然很坏，但还是有人站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多，比如教授和关心农业的学生们。我很感激，常常觉得我们这个地方能保护下来，是这么多人爱护这块土地，也更觉得我们应该更要爱这片土地。

"我常常觉得，我是活到50多岁才学习成长。"

土地征收的抗争过程中，我认识很多人，看到有很多人愿意一起为土地和农村努力。我一个种田的人，从来没想要帮人，为这个社会做什么，但是面临征收的危机后，我有了新的想法，决心要帮助和我一样的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我就会去了解各个议题，也会参与抗争行动。

在这些过程里，我学习到：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培养能力去反思，一旦遇到挫折时该怎么把心里的力量拿出来。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应该讲出来，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痛在哪里。你一定要讲。看到好的东西要讲给孩子听。好的要讲，不好的也一定要讲出来，才会知道不好在哪里，才能改善。

土地被征收的危机解除之后，我们在想，农村和农业的价值在哪里？未来我们要活得健康和自信，就得格外注重"吃"下去的东西，赚多少钱反倒不是那么重要。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好好的把农人的角色做好，照顾好土地，就会照顾到人。

我们湾宝是很好的地方，土地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暗管，水质很好，水库的水直接通到农田。可是政府和财团好几次想要我们的地，我们当然不给，这不仅是我们的财产，更是我们的生命。我觉得政府不应该继续开发工业区了，说要经济成长，但谁过得更好了？何况，这么好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留给下一代？而不是在这一代就残害它们。因为这样，我开始想怎么样的农作方式是对农人和土地是最好的，也开始号召村里的人一起做友善环境的农业特定区。

我的专长是去种花生、地瓜、西瓜。做农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土地要适地适种，也要适地适用。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要有能力去规划土地的使用，不同的土地有不同的用途。

我们在地坚持的农作方式，不是外来人看得到的，那是很长而且很辛苦的过程，大家需要一直沟通、一直尝试。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在地文化，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土地，学习不是全盘接收，而只是做参考。虽然学习的过程常常很辛苦，但是也让我们村庄里的人感情更好，大家都很认同湾宝、认同自己的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团结在一起，不让我们的土地轻易被抢走。台湾很多农村都面临土地征收的危机，有的地方被征收得很快，在地也没有什么抗争，很多是因为那里的人已经不继续耕种了，比较年轻的子女对土地或对家乡也不像老人家一样，有那么深厚的感情，所以就比较愿意想把土地卖掉，但是当然还会有人不想卖地，比较糟的状况是因为政府或者建商的介入，本来和乐融融的地方就被分化。

我常常觉得，我们湾宝很幸运，大家就是不想卖地，想把土地留给下一代，老人家也觉得“我现在就过得很好”，不需要卖土地来花钱。

我们那边的西瓜节，办11年了，目的是让离乡的人每年都能回来，会觉得这是他的家，这就是凝聚力。虽然年轻人在外面赚钱，但每天他们都会带孩子回来，因为这是共同的回忆。我们会向县政府申请筹办经费，但政府没有给过资助，即使如此，我们湾宝的人有志气，就自己分摊。我们很欢迎从外面来湾宝的人，返乡务农也好，当实习生也好，我们都会接待。有些过来帮忙搞西瓜节的年轻人，学农做农，亲身体会农家生活。大家都很热情，请他们来吃我们种的西瓜，中午也一起吃在地的午餐，这些不要钱，但都是我们的心意。我家儿子还申请了一个青年行动计划，在湾宝办农耕体验、拍摄纪录短片，这很好，让这一代和世世代代更多的人，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家的，都知道农的事情，让这事情一代代传下去。

“这些都不是上课会学到的知识，但是很有用。”

我慢慢改变以符合生态的方法来耕种，并用了三年时间来改善土质。因为长期使用化肥的关系，土质已经变成酸性了。农地就像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了就不会生病了。土地改善后，也用对环境比较好的耕种方式，慢慢地让土地变得肥沃，到了最近这几年，收获也开始很不错。

我们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心想，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出好的成果，也很难说服已经做农很久的人，所以我跟我先生就很努力地尝试，希望成功。老实说，喷农药对农人是很不好的，因为第一个接触到农药的是你自己，浓度也很强，比起消费者，使用化肥，我们叫做“惯行”的农人面临的健康风险是更大的。后来我们做得还不错，慢慢有人主动要加进来，2011年有三个，2012年增加到八个人。虽然遇到很多问题，但我们总是要努力走下去。

我们要努力的还很多，很幸运是能和主妇联盟[1]合作，她们很照顾我们，也会提供很多资讯和支持，比如遇到病虫害，农人就需要指导，主妇联盟会请农业专家来看我们的状况，再提供建议。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说：“做自然生态方法的就不能用农药，不过一定会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你缺少一种酶，可以用树枝烧后的灰来撒。”在我们看来这是很土、很传统的，但是种这种东西就是要这样，没有比较快的方法，这是对理念的坚持。其实，台湾现在很多人在做的自然农法，我们的老人家都知道，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化学农药和肥料，都是就地取材。这些都不是上课会学到的知识，但是很有用，而且是我们可以自己制作的，不用依靠别人或花很多钱买的资材。

我这样一路走来，遇到很多人都愿意为这块土地努力；我常常觉得，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就会有希望。我常跟儿子和女儿说，如果你觉得土地没用，那是你应该要反省。我们湾宝里有一句话："钱沾酱不能吃，但是地瓜是可以吃的"。没错，现在科技很发达，但手机可以吃吗？如果到最后你只有地瓜和手机，你是要选择哪个？我们的政府强征农民的土地去发展工业区，赚了很多钱，但没有土地也就没有粮食，那个才是真正的危机，而且几乎没有机会弥补。另外，现在全球面临的粮食危机，台湾越来越依赖向泰国进口稻米，但2011泰国遇到水灾，就禁止稻米出口。这种情况会在未来越来越频繁，我们的政府应该有这种警觉，应该反过来照顾土地和农民。我们应该要把土地好好留给下一代。大家一起耕种、一起生活，这就是农村的样貌，我们湾宝里的老人家不会像城市里的老人家，常常很孤单，在农村，彼此可以信赖，都是老人。这个不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而是政府本来就应该让人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讲得很像在聊天，不是很有营养，希望大家一起互相鼓励。

❶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简介见附录一。

因农而起、为农而聚

※ 蔡培慧、陈莹恩

作者蔡培慧为台湾农村阵线秘书长，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

一种“农”的认识论的反思与重建

关于台湾农村阵线的跨界参与，可以从2008年对于《农村再生条例》的抵抗与修正过程中，对于“农”的再思考之中谈起。当讲到“农村再生”，总要知道“到底要‘再生’什么？”在《农村再生条例》，农村被官方定位为都市人的后花园，立法要旨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即为：“要打造一个让都市人流连忘返的新农村”。农村在官方的想象中成了被观看的对象、一个旅游的地方；然而，乡民生活与粮食生产所在的真实状态被忽略了。吊诡的是，农村与农民在法案中却是缺席的，集结为台湾农村阵线的伙伴认为有必要打破农民与权力者间的资讯不对称，于是连结过往的社会脉络主动到各农村办理说明会，与农民讨论法案良窳，农阵大概主动办了17场，而各地方各团体所举办的场次则超过50场。经过密集缜密的讨论，农阵提出民间版的《农村再生条例》。也是在地方互动过程中，让参与在这波行动中的农阵朋友，反省资讯掌握是权力的工具，进行法案的攻防往往是知识份子语言与游戏，农民真实的声音在这之中却一直是被消音的，因而，农民现身与现声成为农阵工作的重要认识。

举行地方说明会的期间，一位种芭乐[1]的农民曾如此诉说："这个条例就好像农村又黑又瘦，可是政府只想在我们脸上涂脂抹粉。"这样极富生命力的字眼，是农家在生活中操练的语言。另有农民提到："任何法律都要避免农地的蚕食鲸吞。""农村不是不需要建设，而是要'基础建设'。"因为台湾以前主要是以水稻种植为主，所以灌溉和排放系统是同一个沟渠，然而现在大都是多样化农耕，加上农村常有小型工厂进驻，造成的污染，以及农药与化肥的使用，有必要将灌溉与排放设置分离的水道，才能减少农耕过程与农作物受到污染的风险。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农民经验，是根植在现实的基础的主张。在这个过程中——农阵成员——多数是离乡的知识份子，再次地面向农村，再次被农村所滋养，也使得对于《农村再生条例》以及之后与农村农业相关的法案，农阵的友朋总时时提醒自己要更为谨慎地面对不同的思维模式，在分析上在思维中，真正地贴近农民农村。

一方有难，八方来援

另外一个则是在"大埔事件"的行动连结。这是发生在台湾中北部的苗栗县，当地地方首长预计征收一块地给鸿海子公司群创公司设厂，原定25公顷、后扩大为28公顷的征收范围，县长最后裁定征收160几公顷，扩大征收的目的为开发住宅、炒作房地产投资，而非公益与必要。是以，被圈划在征收范围内的农民起身反抗，有人坚决不愿妥协，县政府便于2010年6月9日的半夜，由200多名警察随行，开动20几台怪手[2]，直接将已结穗的稻田铲掉。此一事件召唤出许多受土地征收之苦的农民共同集结、声援。农阵与各地被征收的农民，共同发出"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的决心，并多次到台北陈情，然而苗栗县长却再一次以怪手突袭，刻意将田里的泥土挖走，以了断农民的盼望：田土都挖走了，如何再耕种。如此以公权力侵害基层人民的生产工具与生存权的政府，引发台湾各界的愤慨，为了将这股力量凝聚为更具政治力度的抵抗，农阵便于同年的7月17日在台湾权力中心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土地正义！圈地恶法，立即停止"的抵抗行动，当天参与其中，夜宿凯道的，除了上千位农民，也包括了许多的学生与都市家庭，出乎意料的，人民自主参与抗争或声援的人数共约3,000多人。

这场夜宿行动的凌晨，从南部运送一批批的秧苗，众人同心协力铺设于凯道广场的水泥地上，以青翠秧苗与劳动弯腰，提醒政府人民团结的意义，在呼喊著把田种回去的同时，凯达格兰大道冰冷的水泥，由人民协力"铺"上一方青翠秧苗，象征农民力量生生不息。当农民铺秧苗时，自然的以手势轻佛秧苗、顺手抖落露水滋润地土，即使在高度张力的凯道，农民的身体节奏仍映证了"农"

作为一种身体技艺，是农文化的深刻内涵，是透过生活与身体实践所体现的，而也正是知识分子的言语文字系统的知识系统、工业的技术和操作原则之外，另外一套伴著身体劳动经验而超越于语言技术之外的知识/技艺层次，这是农耕与小农文化的生命力。抗争行动中，众人从凯道上铺秧苗，之后将秧苗送至高雄美浓种植，历经120天后的生命循环，待稻谷长成饱满而垂首的稻穗后，再订于预订收割的同年11月14日，农阵与各地受土地征收之苦的农民，集结于美浓，在稻浪中穿梭，以几乎难以复见的手工割稻，在田地上割出了“土地正义”四字。这场极具意义的行动，有力地向政府宣示：“没有错，我们的田被强权给铲了，然而，我们可以扶起稻穗，我们可以把田种回去！”

“破”“立”同行

秧苗都长成了稻谷了，但法律的修订却不见显著的改进，与此同时，农阵成员提出了民间版的《土地征收条例》，并于同年11月12日面见最高行政负责人吴敦义，要求加速修法。即使面对牛步的政府，农阵以及各地关心台湾农村的朋友从未被动地等待，而是开展一连串的行动，希望藉由各种形式的表达或作为，彰显农村、农耕与小农文化的价值，农阵认为关于农意识型态的辩论正在发生。无论《农村再生条例》或“大埔事件”，均非单一法案或案例，而是一个总体发展方向和体制结构的问题，换言之，台湾的政治体制已往财团倾斜，台湾的社会认知正窄化为利润取向消费主义。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农阵思考介入体制及松动结构的可能，并试图开展出农村行动美学。透过组织性的行动，集聚各地农民组成捍卫农乡联盟，也藉由营队及各种形式与内容的讨论，深化认识的基础，包括连结国际组织农民之路（La Via Campensina）的经验。此外，“小农复耕”的在地行动、“弯腰生活节”的平台，试图在“破”的抵抗，也长出“立”的积极作为，使“农”的价值并非只是在论述文字中发生/声，而是化为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实践，透过食物与餐桌，重建食物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所有人与农村、土地、农民的连结，加强农民耕作与食物消费的互动，以及拓展小农生产与环境脉络依存的讨论。或许，在城市里头举办农民市集，同时也是一场软性的“占领行动”，农耕与农民的软性“占领”意味著“现身”，当“农”的劳动化身为“食物”具现在常民生活空间、当“农民”以具体形象出现在城市居民与消费者眼前，那个论述中的抽象概念或城市人对于“农”的浪漫想象，进一步的有了现实的牵引，因而有了互相看见和真实理解的机会，所谓“城乡共好”及“绿色消费”[3]，一点一滴扎下深根/耕的可能。

走向真实的“城乡共好”

社区支持型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便是摸索“城乡共好”如何可能的其中一种概念与实践方案，而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与对于词汇的定义，也将长出不同的尝试路径。对台湾农村阵线而言，作为一个因社会运动而起、汇聚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的组织（或群体），“社区”在哪里？也许从“Community”进行定义上的思索，从具体空间上的“社区”、到较为抽象范畴的“社群”都在其中。以农阵的经验而言，它意味的“一群人”的聚集，而这“一群人”是怎样的状态？这样的人群组成，它不一定是在空间上的紧密连结，也可能是象征性的、在意识上对“农”有共同认可而群聚的人们，那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对话的、看见彼此的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往前走、保有动能进行改变，是必要的，于此同时，我们也在路程中持续反省自己的社会位置、和思考农村与农民之于己的意义，而“CSA”的“Agriculture”需要超越的诠释。总而言之，“CSA”即“一群人与农的关系”。“农”有几个层次，从生产以供应多样化的食物，以及连系这种生产队伍的农村社会，而架构在农村社会背后的文明系统正是小农文化的底。若说华人文化的文明可从“农文明”回溯起，应该不为过。在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文明或城市文明，创造了文明间的阶序，使“农文明”被侵扰与藐视，让我们变得不太有自信。然而，“不太有自信”也不见得是件坏事，也许人不需要有太绝对的自信，因为一点点不那么的自信，在迟疑彷徨中仍维持著前进的步伐，大概反思才可能发生，有所反思或许能让这条路走的深、走的远、走的扎实、走的谦卑。

此际，或许是时机更进一步探寻与建构“CSA”的想象。在2011年，农阵有许多朋友参与《种好菜，过好生活：社区协力农业完全指导手册》（Sharing the Harvest）的翻译工作。“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是本书原作者美国Elizabeth Henderson与朋友使用的词汇，是经历过一番讨论（或辩论）才拍板定案。在华文语境与台湾社会，如何翻译才能够最贴近台湾的脉络，也最贴近台湾的小农文化、农耕与产业模式，在这些基础之上开展最合宜且最开放的想象框架，而非仅是创造另一个西方的典范（paradigm）？高雄旗美社大的张正扬与我们多番讨论，便提出了“社区协力农业”的建议。早于美国的“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日本已有“提携”的概念与实践模式，两者都是将空间上的“社区”与“农业”，透过食物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串起关系，在“提携”（Teikei）系统便意味著“相互帮忙”的关系，若转换到中文的语汇，“协力”应涵盖了最完整的意义，强调动态互动而信任的关系，也避免在尝试新的实践方式的过程，再制了农/工、城/乡的二元分立。农工城乡、

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是相对的、互为主体的关系，并无谁较为高位，或“我来支持你，帮你站起来”的意涵，因此翻译小组当时并没有选用“社区支持型农业”作为译文。更进一步而言，“社区协力农业”有这样的想象：这是一群人为土地、为“农”而建立起的友善连结网络，因为彼此相互看见对土地与农的关注与心力，且亲身参与到食物生产的农耕过程，而长出较为整体的、全观的视野，人们得以渐进地意识到：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和大环境里头的其他人和事物相互嵌合，于此，对于他人与土地的关照，才有可能萌芽。

在倾斜的天秤上扶稻

农阵在自2008至2011年以来开展的工作和社群/区连结，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实践与抵抗行动，并不是农阵的功劳，而是受惠于台湾长期的在地行动与社会基础，这些支持始于近年来台湾社会开始开展对发展主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物质主义的反省与思辩。因为工商发展为主的经济模式，我们得到便利、效率的生产与多样性的消费选择，但所有“得到”的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把现有的土地、生态环境、地方文化、底层人民的劳动力或生存尊严给交换出去，而将这些存续的基础让渡出去的，除了财团，也包括渐渐与财团连成一气的政府。也许经济仍持续发展，但是大多数的资本却不再与付出劳动力的人民共享，而进入钱滚钱的投机市场，人民承担的，是资本主义扩张与工业密集发展带来的各种环境效应，包括2008年带给台湾极遽影响的莫拉克风灾，而这仍只是冰山一角。除了这些反思，1994年的社区总体营造[4]及同时期发展的社区大学[5]，使得台湾打开许多讨论公共议题的空间，如果没有这十年，相对而言较缓慢、稳定的地方力量的革命，公共议题的讨论或许不会如此快速扩散到地方。

在一条荆棘路上的并肩缓行

农阵的跨界参与，以及聚集了许多有志青年的连结和实践，能够发生且持续下去的原因，大概可归出下列几个原因（尽管农阵仍然是一个初生的行动团体，它的走向也还有许多可能，此时所写下的，或许也是对往后工作进程的时时提醒）：其一，“学习”是持续不断的进行，而“学习方法”是推著自己和团体做具体的议题分析，行动必须有强韧的论述作为基础，如此才走得稳当与扎实。另一个则是“劳动”，劳动之于农阵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大多已然离农太远的青年人，这个“劳动”特别指的是农耕过程的劳动，是透过身体技艺的拟仿、或实作，进而可能更为贴近农民与农村的方法，因为劳动而习得“能屈能伸”的姿态与心态，农耕之于大多是学生的青年人而言，有这么一个自省与自我砥砺的意义。再

者，“脉络”是重要的，谈论“脉络”意味著一种关照整体的思维，以农作而言，农耕过程需要考量的太繁复，那是一门细致的认识与知识系统，且并非抽象的思考范畴，而是与自然环境的紧密互动的关系与观察，那同时也是长期的农作与生命的累积，台湾小农文化的“敬天敬地”，即是关照整体、重视脉络的人观与自然观，这或许是工业文明的绝对自信、城市文明的人我疏离，所需要作为参照的一种生活与生命态度。第三，则是看重“运动队伍的再生产”，农阵每年连结各地农民的具体抗争行动，针对青年再认识农村的夏耘，以及鼓舞青年进乡落户的支持，都是为了建立一批批自主开展的农村工作的可能性。最后则是“在实作中摸索更好的行动”，在农阵社群的讨论与意见，往往有机会落实为具体的分工，在开放的人群空间，各种想法与行动的点子都可以丢出来，而提出点子，找到伙伴就要去执行，因为人是在行动中琢磨的，琢磨组织的可能，也探讨合宜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磨练心性，如何让事情能够完备谨慎地被完成。很多事情因而开展，不疾不徐的，透过这些行动，农阵尝试去重探“农”的价值、实践“城乡共好”。

这些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宣称，而在于朝著某种方向前进，个别工作的路径未必一致，深耕的脚步或急或迟，只要持续的走，或许也能与鲁迅所言相映之：“其实地上本是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❶ 又称番石榴。
❷ 即挖土机。
❸ 参考附录二：“绿色消费”。
❹ 参考附录二：“社区营造和社区大学”。
❺ 参考附录二：“社区营造和社区大学”。

劳动的春耕

关于台湾的农事变迁

※ 蔡培慧

作者蔡培慧为台湾农村阵线秘书长、
世新大学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0年11月14日，当全台湾的农民在稻田上，手割“土地正义”四个大字，身在其中，打著赤脚的我感受到，“土地正义”的大字不只彰显在美浓的田地间，它仿佛某种集结、某种象征，重重地击向远方，形成多重超越的力量。我知道一篇文章以此落笔，免不了要招致许多朋友的奚落，你怎么愈来愈不进步。是的，让我们从进步谈起。我们往往正面地接受物质生产力的提升，正向肯定生产力的价值的同时，我们无形中也就接受了某种标准，藉此检验或者安置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型态以及支持此一社会生活型态的生产方式。正典——安于主流的认识与追求，让我们取得理解世界的座标，同时也让我们习于某种社会生活型态。但凡无法安置或者无法理解的社会生活型态，要不，我们称其为保守，要不我们视之为异端。农乡认同、小农耕作或许就是被视为保守的那一边，尽管论者惯以“浪漫”、“怀旧”、“乡愁”（Nostalgia）来理解“小农立场”，但与其不假其索地认为小农生产是明日黄花，不如让我们重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关系与矛盾。

“生产扩张”使地球资源面临耗竭

支持现存高度消费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资源不竭，这个假设如今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能了，随著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地球资源正面临耗竭，而长期以来不加节制的生产扩张也改变了地球环境气候的运作基础。可以说，现行的社会生活型态根本不可能持续存在，倘若我们不根本地思考如何抑制生产扩张，很可能危及我们所生存的社会。问题解答不在于造成问题的方法，因而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扩张”必需要扬弃，转而寻求“生产循环”之道。而与自然环境互惠共生的生产循环，证诸人类历史，农耕以及相生相成的农耕文明或许可以带给我们借镜。请注意，仍然只是借镜，因为我们与过往的任何世代都处在不同的物质基础上，我们也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权力结构之上，我们必须在时代的要求中，找到我们这个世代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简言之，我们可以归纳出某种回旋前进的辩证关系：生产扩张已经造成资源耗竭，人们必须找到生产循环的方法，而支持此一方法的意识与社会生活显然不可能等同于当代的生活模式，是以我们借镜小农耕作的农耕文明，寻思当代的路径与方法。

借镜小农耕作，寻索生产循环之路

小农耕作有几个特征：

以家户为单位，这意味著家户作为经济生活（生产与分配）的基础。附带一提，历史以来，家户的组成通常是血亲连带，如何开展出某种因认同与自我选择而来的家户型态也是另一个需努力的焦点。

小规模的社会协作，家户生产受制于劳动力与家庭生命周期，它的农耕尺度自然有所限制，同时也无法独立面对家庭以上的社区（社群）的公共性事务，诸如水利、运销以及社会文化惯习的要求与礼俗。因而相应发展出多元活泼的协作模式，这一点是我们所必须特别注意的。我们应当专注于鼓励多元并置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而成的多方连结的社会关系。千万不可执著于某种单一模式，或者单一的社会连结，即使它已非常成功的运作。

因需要而生产，小农耕作的特点在于因需要而生产，当然也可能因需求无法取得适当满足而必须加强劳动，因而处于自我剥削的状态。此一供需的逻辑绝不可忽略，它所引导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规模，必然相异于以追求利润为动力的生产扩张，比较有机会在有限资源与理解自我需求的前提下，建立起生产循环的模式。

小农社会当然也存在著诸多限制：
例如，也是最显著的：累世的社会关系往往形成强固的规范，从而限制了个体的能动性与自主发展，在台湾的历史经验中，性别与年龄阶序的限制无所不在。因而，当我们取法小农耕作多元协作，从而主张以家户为生产单位之际，也必须经常地检视作用于传统家庭关系、并且映射为社会惯习的父权体制所形成的张力，以及其对应之道。

此外，小农耕作无法自外于当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即便是台湾历经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建立起农会、农田水利会、农改场等半公共化的农事服务体系，都未必能确保小农体制的存续。证诸1980年代中后期迄今的发展轨迹，台湾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脚步、总体资源朝著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移动、外部资本趋利而竞逐农业生产与食品加工，都使得台湾的小农耕作体制岌岌可危。

更何况，发展主义以降的强势、单一的线性发展观，独尊GDP增长的经济思维，作用于教育体制、传播媒体乃至于家庭世代传承的价值选择，都使得农民农村农业被简化，被主流观点视为传统落后、没有竞争力的社会残余，从而小农耕作的意识型态既要涵括小农生产的社会意义，也必须发展出与主流经济意识型态对话的意义模组，也就是说，小农耕作，要证明此一生产模式在最窄化的经济思维中仍深具意义，却又不能停在经济范畴，有必要自为的[1]发展农意识——重新定义农民农业农村的社会政治文化价值。

台湾农业饱尝全球化苦果

正是在前述思维的辩证中，我们——在台湾从事非单向经济生产的农耕与农事队伍，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以农为主的空间与自主的农认识的野地上，绽放绿意草花。这本文集另篇文章〈野地花开、农艺复兴〉概述了流动的春意。在此，则想花一些篇幅，介绍台湾农业的发展轨迹与结构限制，并探讨这一波的农艺复兴从怎样的砾土挣扎新生。

台湾曾经作为发展主义的典范——名列亚洲四小龙，如今却正承受著发展主义的苦果：贫富差距扩大，粮食自给率低落，乡村社会文化濒临解组，此一系列的苦果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结果。尤其是19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扩张所形成的全球化现象，就是以垄断资本利益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所推进的历史进程，类似台湾此类小型后进的发展社会莫不受制于开放市场、去管制化、公共资源私有化的游戏规则。在1980年代之前，台湾或许因土地改革建立起刻苦的小农生产机制以及鼓励加工出口建立的中小企业，致使台湾在早年取得了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国民所得分配相对平均的双重成就，然而此一成就却于1980年代后期台湾开放市场后而难以维系。尤其，因台湾受制美国贸易逆差，开放大宗物资（玉、米、黄豆、小麦等杂粮）进口，1980年代对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乃致1990年后期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由市场导向取代计划导向；农业资源比如土地、水资源，被大规模、大范围地移拨为工商用途；粮食生产由自给自足改为进口依赖。如此压抑农业生产、漠视国民消费的结构调整政策，使台湾付出了粮食自给率低至30.6%，以致物价频频波动、22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近40%)良田休耕、部份农村荒芜的代价。

让我们从粮食自给率与土地权属管窥台湾农业结构改变。

粮食自给率创历史新低

台湾粮食自给率在2007年降到了历史新低30.6%（以热量计算），这意味著高达70%的食物热量来源，仰赖进口。现代化生活使人们的饮食习惯西化，双薪家庭以及高度劳动压力造成的庞大外食人口，加剧了依赖的强度。其中，台湾的小麦自给率接近0%，年消费将近100万公吨的小麦，几近全数仰赖进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则是玉米，台湾的玉米自给率为2.6%，这些进口玉米大多提供给猪、肉鸡、蛋鸡作为饲料，因而当我们看到台湾的猪肉自给率高达95.9%而感到庆幸之际，若理解的猪只的饲料来自玉米，也就明白这个95.9%的数字处于虚浮的基础。这是一连串市场开放所形成的结果。甚且，台湾为了加入WTO而进行农业结构转型，要求小型农户离农离牧，1995年台湾农业政策白皮书直言，将台湾“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改为“粮食供需平衡”，也就是说，过去台湾的农业计划生产体制，改为仰赖国际农贸体制的自由贸易，此一政策造成台湾的民生物资价格与国际连动。自2008年起每一次国际农粮价格的波动，都直接的造成台湾民生物价上涨。根据官方统计，相较于2005年，台湾2012年5月的民生物价在沙拉油（黄豆制油品）涨了1.6倍，面粉面包（小麦制品）涨了1.4倍，肉类鸡蛋等仰赖玉米饲料的产品涨了1.35倍，这是过去30年来不曾出现的涨幅。

农地总面积持续减少

土地权属的改变及休耕现象也值得注意。台湾于1947年至1953年进行的“土地改革”确立了台湾土地平均化，家庭农场的生产基础。尽管如此，台湾的农地总面积仍持续减少，根据官方统计，台湾自1995年迄今农地减少49,711公顷，导因于都市扩张、工业区兴建，以及非正式的农地滥用。2005年的调查显示，全台湾771,579户农家中，99.44%的农家拥有自有农地，其中87.52%所耕种的土地全部为自有，其馀则为部份所有，前述农家拥有553,930公顷农地，农企业所有农地为43,508公顷之5.82%。台湾农民的耕作面积普遍较小，耕作面积未满1公顷者占78.7%，换言之，可耕作地在1.0公顷以上者仅占21.3%；其中3.0公顷以上者，仅占2.6%，显示大部分为可耕作地规模在1.0公顷以下之小型家庭农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休耕，从近两次农林渔牧业普查得知：2005年，台湾农户从事农耕有713,386户，拥有土地却未从事农耕占5.6%，高达101,044户休耕，占全体农户13.10%。相较于2000年的统计数字33,183户休耕，占全体农户4.58%。休耕户数急剧上升，主要的原因有三：第一点为台湾于2002年正式加入WTO，强制进口基期年消费量8%的稻米，即147,200公吨，为了去化多馀的稻米，迫使政府强制要求农民休耕；第二点为大型的开发项目夺取农业用水，致使农业用水不足而休耕；第三点则是农业人口老化，加上政府为平息休耕的争议，发给休耕补贴，因而部份老农放弃耕作，转而领取补贴。

政府为“入世”促小农休耕

台湾的农业结构转变形成了极端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苦于粮食依赖而形成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二方面以政府资源鼓励休耕。之所以如此，受制于长期的演变，二个主要的力量影响台湾农业结构转变，二战之后迄1980年代是发展主义的力量，1980年代迄今则新自由主义的扩张造成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历史考察即知，国民政府于1945年迫迁来台，当时多数作以维系台湾人生活的生产方式，是农耕，约莫有80%的务农人口。考量现实状况，且为了巩固政权治理基础，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者蒋中正实施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从1949年至1953年，依序包括：“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三个阶段，一方面藉此打破地主阶级，使战前封建式的地主佃农制逐渐步向解体的趋势，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政权则透过土地改革，使地主佃农的关系瓦解，政府遂然成为另一种型态的地主，直接治理这80%的农民。即使因为土地改革的过程，看似平均分配而使农民拥有了土地，使之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关键在于，所谓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由上而下推动的、作为发展主义方向的一环，政府变装成了新的地主，并透过一套粮政的设计，比如：肥料换谷制、随赋征购办法、田赋征收实物实施办法及基层金融制度，进行农民的劳动剩余的转换，说白了就是剥削农民，换句话说，政府要小农用稻谷换取生产必须的农业资材——肥料，然而由于当时公定的肥料价格高于米价，政府因此从中赚取差价，累积资本，并将一部分收购的稻谷外销至日本，累积外汇，形成了日后农转工的契机，却也同时逼得农村逐渐破产，但农业与农村并非直直地往下衰颓。政府于当时开始推广经济作物和农业专区，将本来一部分种作主粮的农民辅导为香菇农、花卉农、果农等等，随著经济发展上了轨道，社会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民的饮食习惯渐趋多样，也为了满足内销市场，农村生产了相对多样化的农产品，城乡仍维系著一定程度的连结与较为均衡的状态，当时是农村较为富裕的阶段。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及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加上台湾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造成台湾自1980年代中期之后，频频以开放农业市场为代价，以加速自由化的脚步。

暂且不论美援时期的粮食援助而西化的饮食习惯，以及1980年代起因外交因素，年年派出访问团赴美采购大宗物资。就新自由主义以降的开放市场脚步而言，首先，台湾于1985年开放烟酒市场，影响了政府规管的烟叶、酿酒葡萄契作，近10万公顷土地投入市场作物的生产，造成替代与排挤作用。此后，1990年代，随著台湾被纳入新自由主义体系中，频频开放农产品市场。易言之，台湾长期地产地消的农业政策，受新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压力，转而开放市场，进行“农业结构调整（1982-1991）”，由计划生产导向的生存农业，转型为“市场导向”的竞争农业。农业结构调整是台湾农政转型的开端，受制美国透过一连串的谈判，要求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台湾为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86至1993之间GATT（WTO的前身）的农业协定谈判过程中，台湾也在外在压力与单向的经济思维中，逐渐往农业贸易自由化前进。台湾政府为了争取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中，陆续在1992年于六年计划中宣示农业零增长，1995年农业白皮书中甚至明文表示放弃粮食自主，一步一步地以牺牲农业发展换取工业发展与国际参与的空间。

此一阶段称为“农业自由化（1992-迄今）”，台湾放弃粮食自主、开放农业市场、要求农民离农休耕，埋下了进口粮食依赖与农村凋敝的恶果。从此，农村滑入快速衰败的下坡道，为什么呢？一来是因为台湾的农民面临的竞争者变成更多来自国际的农产品，常常因为他国政府对国内农产品的补贴，使得进口到台湾的粮价，相对于国内农产品更低廉，由此显见，自由贸易的现实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被蚕食鲸吞；二来则因为台湾人逐渐西化的饮食习惯，肉类与其他非本土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提高，比如小麦与洋菇，农村和城市在食物层面的连结因此断了一大块，而政府认知的问题来源，是小农缺乏竞争力，因此鼓励规模经济，比如发展兰花与有机蔬菜等需投入大笔资本的规模农企业。然而，小农却未曾消失，这也就形成了当今台湾农业双轨制的产销结构——农企业与小农。那么，发展规模经济成为政策的方向，小农的机会在哪里？一个具体可行的可能性是：重新连结小农生产的队伍与有意识的城市消费者，创造在地经济体系。

小农耕作的发展新模式

创造以小农为主体的在地经济，意味著将个别生产的小农进行再连结，并与消费者形成合作经济体系。换句话说，当前的工作，不仅仅是田间劳动与生产面的改变，同时也是意识型态之战。小农耕作意味著健康的食物、丰富的文化肌理、绵密的社会网络，以及涵养这一切的环境空间。我们——有志于农村工作的群体，不论从支农、援农甚至是从农的角色，我们在面向历史、面向农村的方向上，试图在资本主义已竭泽而渔的荒芜焦土上，重新耕耘一片新天地。传承老农边做边学的智慧，适地适种并照顾土地，同时连结绿色消费[2]，开创任何互惠协作的可能，甚至更主动介入体制政策，见缝插针地松动结构，扭转城市偏向的当代社会关系。小农耕作是经，社会需求为纬，小农耕作正在创造可循环社会生产交换的新模式。

❶ 有意识的行动的意思。自为与自在是马克思分析人是否处于异化状态的差异。自为指对自身处境有所觉悟，起身行动。

❷ 参考附录二：“绿色消费”。

生活革命

大陆篇

在农业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近几十年间社会经济猛转弯，进入了极高速的工商财金化城镇化和都市化的发展轨迹。情愿或不情愿地，大量以农耕为生的人离乡别井，跑到城市寻找（更）美好生活。这种（不）情和（不）愿，不光是个人的选择或因缘，个中的推力和拉力，更多是源自非个人能掌握的政治谋措：远至上世纪衰弱的军事外交政策和各式苛捐杂税；又或是近如1949年后资源配置一面倒向城市倾斜，基层管治失效，传统乡村秩序崩溃等等。城市知识分子回到衰败的农村，帮助乡亲们建立幸福生活，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快百年历史。近十多年，参与乡村建设的队伍中，多了年轻人，他们以及一些同行者，在土地、在农（家生）活、在城乡不一样的互动中找到希望。（**文：乡村重建与城乡协作**）

这个队伍，背著城市化的大潮，持续增加。里面的年轻人大部分游走在快速凋零的家乡，以及五光十色的城市间。离家渐远，以为人生意义在眩目斑丽的城市可以圆就。然而，繁嚣背后，却是更深更重的疏离和无力感。家乡的匮乏，父母的压力，让很多年轻人望梦想之门却步。他们成为了在城市的农村人，在农村的城市人。

回家，原来可以有不一样的版本。高中时代已经立志返乡的农家青年小郝，在城市安家，努力寻找和建设好土好水好米（好生产者），努力寻找知音（好消费者），为有心人圆她/他们的田园返乡梦，发觉自己的田园比梦想的遥远，但却更为广阔，在每个立足土地的人的脚下寻获。（**文：沃土有好米**）在城乡继续来回，广西土生良品饭店支持和挂靠小而美的自足生态小农，通过食这个平台，实现幸福生活的价值。饭店成为了寻找有温度有厚度可以自由飞翔的生活的年轻人的练羽场。在城市居民与边陲的小农户之间，年轻人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理想生活。（**文：没有梦想，我们还能活得幸福吗？**）在主流发展推崇规模效率和资本价值的大潮中，这些中国大陆的寻梦人，在那些被认为被时代掉在后头，重视生态人文伦理、尊重自然规律、持守共生共好的价值规律等偏远小村落和零星小农身上，发现出口。

有人回到土地，拿起锄头、卷起裤筒、老老实实学习令自己心灵安住的生活。（**文：对学做“农人”的点滴思考**）改变，从自己做起。当城市人和知识分子走到村庄，看清楚农（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真貌，也更清楚反照自己身处的城市。青年人返乡，城市的精英也返乡。新的生活在原来的农村可以觅得空间、新的生活可以在依托土地的社群中朔造，只要警惕日常平凡的琐细事，从你我的根本做起。（**文：守住社区，做生活化的革命**）日常生活就是彰显城乡珍宝的场域。中国乡土社会曾经练就资源节约、循环利用、追求精细优质等美好的生活态度，而这也正是现代世界求而未得的梦想。城乡如何协力，答案应该不需他求。（**文：当代中国的新乡村建设**）

乡村重建与城乡协作

※ 尹春涛

作者尹春涛是芬芳田野文化书院研究员

“中国的问题是社区的衰败，日常生活的衰败。中国的改变要从社区开始，从日常生活开始”。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下称绿耕）[1]的张和清教授在社区伙伴(PCD)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上的点评，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原本对这次研讨会没有过多期待，因为这几年关于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报道和研讨会越来越多，那些案例已耳熟能详，然而在这五天的分享讨论中，从“落地生根”的角度重新审视台湾、香港和大陆的CSA实践，回到各自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脉络之中，去理解其背后的思考与价值追求，仍带给我不少新的启发和触动，尤其是从乡村社区重建及城乡协作的视角去理解CSA的社会意义。

传统乡村秩序的瓦解

尽管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下称梁中心）[2]已相当熟悉，但在该中心国仁绿色联盟[3]的负责人李昭的讲述中，仍不免为当初那些大学生下乡所眼见的乡村问题所刺痛：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了，村里老人无人照顾；村干部瓜分集体财产，贪污集体土地转让费；村民无可奈何，唯有将渺茫的希望寄托在年复一年的上访[4]。然而在

北京的上访村，年轻人看到有的农民上访已经42年了，仍然毫无结果。无论去到哪里的乡村，看到的状况都是如此。这触目惊心的现象对怀著理想和憧憬的年轻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他们心中凝成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壮情怀:我们的乡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如此衰败？

中国乡村的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热心于乡村建设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由于一系列军事外交的失败、国际市场竞争的失败、兵祸匪乱、苛捐杂税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没落等等原因，造成乡村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崩溃，乡村日趋衰败[5]。

今日乡村问题虽然呈现为种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但究其根源，乃传统秩序崩溃之后，新的秩序未能有效建立所致。[6]建国以后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更加彻底破坏了原有的乡村秩序，而国家政权直接深入基层建立的政治秩序，又无法有效回应乡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结果反而束缚了农村的自主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府逐步从乡村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淡出，并开始了党委领导下村民自治的尝试，但依然未能建立起良好的乡村秩序，整个乡村仍处于一盘散沙式的混乱无序，农民的原子化[7]与缺乏合作成为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焦点。

乡村一方面缺乏真正的自治组织来有效解决本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公共事务问题，一方面掌握著土地分配和政府资源分配的基层政权却日益成为腐败的温床，肆意侵犯村民权利，导致大量群体冲突事件。据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的群体维权事件有8,709起，2003年达到58,000起，2004年74,000起，2005年87,000起。其中2004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农民维权事件约占35%（温铁军等，2007）”[8]。

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村社会冲突的大量研究，充分揭示了基层政权自身行为的失范已逐渐成为冲突的根源。“美国学者Perry（1985）的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家庭经营制度普遍建立，农村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村庄之间、农户之间争夺公共资源，传统宗族活动和迷信活动重新恢复和发展。而随著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当前农村社会冲突不再主要是乡村内部农户之间、村社之间的民间性质的资源利益纷争，而是转换为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政治性冲突，表现为农民为了捍卫自身权益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抗争（赵树凯，2003；肖唐镖，2005）。同样，温铁军等（2007）认为，在乡村基层干部普遍消极怠工条件下，冲突的发生主体已经十分明显地转换为农民和那些因主客观原因没有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基层政府的直接对立。于建嵘（2000）认为：因利益分化和冲突及基层党政行为失范造成的农村权威结构失衡，是农村社会政治性冲突的基础性根源”[9]。

以城市化、市场化为主导的发展主义对乡村的伤害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和资本联手推动的以城市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裹挟之下，乡村日益成为城市的附庸，乡村的人才、资源、资金被不断抽空，全球化比以往时代更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村庄，乡村的生计、环境和文化变得更加脆弱。而建国后逐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经济和文化上亦束缚了乡村的自我发展，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从绿耕在广东从化和清远山区的调查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发展主义对农村带来的伤害。经过三个月的社区走访，绿耕的工作人员发现本地乡村传统的生计是互助和自给自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比较永续的状态，人与人之间靠宗族关系维系，村民都关心公共事务，接近于“传统经济”。但是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政府开始进入乡村推动市场经济，农业局引入青梅和柿子的种植，但都以失败告终。90年代末，市场化席卷，医疗和教育支出都需要现金，村民不得不更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政府接著又引入砂糖橘的种植，免费提供树苗，甚至给予补贴，然而给村民带来的却是更深的伤害，砂糖橘要投入大量农药化肥，造成水土污染，村民不能饮用自己村里的水，不能种植水稻和蔬菜，而市场价格的波动又让村民陷入更大的困境，使他们对生活感到无力、失去信心。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立的个案，在绿耕云南的乡村项目点，在很多乡村都在发生类似的故事。回到过去更接近“传统经济”那个时期已没有可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乡村如何能够实现更为永续的发展？

乡村本位的社区建设与城乡合作

面对一波又一波迅猛的城市化发展潮流，令我们深感焦虑的是，一盘散沙式的乡村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农民在这股汹涌的大潮中，如何把握自身的发展方向，重建对生活的信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认真思考，难道城市化是唯一的选择？难道乡村注定将消失在这股发展的洪流中么？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警钟越来越响亮的情况之下，乡村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耕、梁中心和蒲韩乡村社区[10]建设的尝试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随著对乡村了解的日益深入，虽然大的趋势无法逆转，但梁中心的年轻人逐渐发现乡村中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很多现实的需求需要回应，而这些事情可以透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去加以改变。于是他们劝说农民精英“哭著维权，不如笑著乡建”，一些年轻人也愿意长期做农村工作，于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分批到不同的乡村蹲点，和农民一起探索乡村建设之路，组织文艺队，建立合作组织，搞农民培训，发展生态农业，推动城乡互动。

尽管一开始困难重重，农民对生态农业缺乏信心，合作社的产品拿到市场销售，消费者不认可，只能内部消化。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又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爆发，中心的工作逐渐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农民则发现生产越来越自由，不再受种子公司的控制，合作社发展了起来，生态农业、手工业、服务业慢慢兴起，农村开始呈现百业俱兴的气象，越来越多年轻人希望返乡，各种力量的汇聚使得农村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中心的年轻人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连结这些不同力量的关键是人们之间彼此信任与相互支持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著人们对土地的重新认识，土地是有生命的，它不仅供给我们食物，也为我们提供情感和精神的滋养，所以才有越来越多城市人愿意带著孩子一起回到土地上耕作，去体会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或许，农村社区该如何发展，未来该怎么走，中心的年轻人仍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但他们和农民一同摸索，陪伴农民一同成长，一点一点去改变现状，一点一点去清晰未来的方向。

绿耕，作为一个依托于大学并有著研究背景的民间组织（NGO），他们的做法具有更强的实验性，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颇为全面和深入的乡村社区建设的图景。绿耕在行动中始终有著清晰的问题意识，即在发展主义的大背景下，怎样才能实现永续的社区发展，如何入手做农村工作？通过对大的发展背景以及社区现状和村民需求的深入分析，绿耕形成了关于社区经济的想象，从生计、文化、环境三个方面介入，培养社区合作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的主体性，利用社区资源创造本社区的福利，同时推动城乡合作，以更有效地应对发展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他们在广东从化山区开展的生计项目非常强调对环境的友善和文化的友善，如乡村旅舍项目中会鼓励村民保护老屋和本土文化，将老屋按原汁原味的传统方式修缮，布置成乡土旅社，由社区中低收入的妇女一起经营，所得收益公平分配，并提取10%作为社区公益金。此项目不仅提高了妇女的收入，也让农民增加了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自信。在种养殖项目中，绿耕鼓励农民以生态方式耕作，几户组成种植小组，既可相互交流种植经验，亦可在市场销售方面共同合作共担风险。

与此同时，绿耕还开展了大量文化和环境项目，如收集整理口述历史、恢复和营造乡村公共空间、建立乡村博物馆、保护农耕文化、修复祠堂，推动建立祠堂管理委员会，开展村庄环境建设、播放环保影片等，透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村民之间有更多情感和精神的交流，彼此信任得以增进，自信心得到提升，也有了更强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

为了让农户更有信心从事生态农业及各项社区建设，绿耕在城市开了一家店铺，还不定期在城市社区内组织市集，做消费者教育，帮助生态农户小组发展会员。店铺连结了不少城市资源，促进了消费者意识的提升，扩大了支持小农的消费者基础。

虽然这些年陆续有不少媒体从CSA的角度来报道绿耕的工作，但他们论述的角度仍侧重于帮助农民把农产品卖给城市的消费者，而看不到绿耕在农村做的大量工作，更重要更基础的是对文化的形塑、自信心的建立、组织的建设和主体性的培养，唯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区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无论梁中心在实践中的摸索还是绿耕带有试验性质的探索，都试图在为乡村寻找一条深深植根于本土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基础上的自主发展之路，重建城乡之间的信任、合作与相互支持，而不是盲目追随城市化的方向。

如果说他们的行动还是带有外来者的视角，那么在山西永济地区农民自发开展的蒲韩乡村社区建设则带有鲜明的乡村主体意识。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人郑冰看到村民种田科技意识低，增收困难，便毅然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在1998年创建为农民提供农资服务、科技培训的“寨子科技中心”，随后陆续自发成立各类农民合作组织，2001年建立妇女协会，2004年建立农民协会，成立红娘手工艺合作社，2006年创办农村社区发展学校，2008年成立有机联合社，从而形成一个综合的乡村社区合作体系。截至2011年，他们所服务的领域不断由寨子村向周边村庄扩展，截至2011年，共覆盖周围36个村，横跨蒲州、韩阳两个乡镇。他们还拟定了一个建设蒲韩幸福社区的十年发展规划，希望能够通过组织和动员本地村民的共同参与及合作，将蒲韩乡村社区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富裕、环境优美、文化丰富的幸福社区。

更为难得的是，在面对政府、市场甚至NGO等外部力量的介入时，他们不是盲目地跟随。比如在有机联合社发展起来之后，先后有很多企业找上门来，想与他们谈合作，甚至愿意投资办农场、办加工厂，但他们没有头脑发热引进大量企业投资，或是刻意迎合市场需求，而始终强调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发展多样化的种植，并非常谨慎地选择了一家对疗愈土地、乡村发展有兴趣，且尊重社区自主发展、尊重本土文化的企业与之合作，主要是解决大宗有机棉花的市场问题。而其它农产品，他们的想法则是透过城乡互动的模式在永济运城寻找认同他们理念的消费者，可以更方便地互相沟通交流，从而在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村民对手工艺合作社发展方向的调整也颇能体现社区本位的思考，经过几年发展，红娘手工艺合作社有了相对稳定的外部订单，如果加大宣传和市场营销的力度，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但协会放弃了这一发展方向，而鼓励合作社骨干去向老人学习传统手艺，并邀请芬芳田野文化书院[11]从事乡村文化建设的老师为合作社妇女开展“生活与审美”的培训，从民间美术、民间音乐、节庆习俗和生命礼仪等多个方面提升妇女的文化与审美素养。透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妇女们逐渐体会到手工艺与生活、与本土文化、与审美的联系，也由此打开了她们对手工艺发展、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空间。她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接外部订单机械地生产，而希望设计出更有本地文化特色、更能体现她们理念的产品，如手绘各种本地农作物的环保袋、制作给婴儿穿戴寓意避邪的五毒肚兜等。

文化视角的引入，丰富了协会对社区发展的理解，除了对合作经济、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的关注，她们也投入极大的热情成立红白理事会，希望透过对乡村红白喜事等生命礼仪的介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乡村的习俗，促进家庭的和睦、邻里的和睦，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她们还成立了乡村剧社，希望透过社区戏剧的方式来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创造的热情，传播共建美好家园的理念。每一位来到这个社区的人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里的农民精神面貌很不一样，她们对未来的生活、对自己的村庄是有信心有底气[12]的。

归根到底，乡村本位的社区建设就是要重建乡村的人文和自然生态体系，良好的自然生态体系是乡村可持续生计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上述所提及的三个案例都会不约而同选择生态农业。与本地生产生活方式及自然生态体系相适应的人文生态体系则能为农民提供情感和精神的依托，更好地凝聚社区认同，促进社区合作。城市化发展背后有一套城市文化体系在支撑，它适应于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乡村与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乡村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乡村的生产从种植到收获经历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乡村的生产和生活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生活中许多重要的节日与农时息息相关。因此乡村文化在精神层面必然更强调生活和生命的整全性，更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正是在与农民共同摸索乡建的道路过程中，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年轻人才会对人与土地的关系有深刻的体认。

而以大规模工业和资本生产和再生产为特征的城市文化与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相适应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城市强势文化的主导，使得乡村在文化、知识和审美方面都已趋同于城市，成为城市的附庸。这种文化自信的丧失，文化与生活之间的割裂不仅造成乡村人内心巨大的痛苦，也使得乡村失去了对自身发展方向的把握。因此重建乡村文化自信，即是在观念上、认知上摆脱对城市的依附，找到乡村自主发展的道路。这正是我们在蒲韩社区的农民身上所感受到的不一样的精神气质，也是绿耕为何在回应社区生计问题的同时，仍花费巨大精力开展文化与环境的活动以建立村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鼓舞她们对社区发展的信心。

但以乡村为本位的自我发展和建设，在今天这样的商品化经济时代，也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大环境，城市与乡村之间需要彼此理解、信任与合作。在城乡的良性互动中，城市对乡村有更多尊重和理解，而乡村经过与城市的比较才可进一步明确乡村本位的立场，从而增强自信，进行乡村的自我发展和建设。此外，可持续的乡村社区经济也有赖于与城市消费者之间建立公平的贸易体系，这也是为什么绿耕和梁漱溟乡建中心都不约而同从合作组织、生态农业走到城乡合作的CSA模式的缘故。

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城市消费者仍多仅仅停留在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上，而没有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的更深层的问题是乡村的根出了问题，城市是花，乡村是根，只有根变得壮实，花儿才能开得更灿烂。因此，落地生根，就是要在经济、文化与环境方面进行乡村为本位的发展，这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乡村方能重新在城市化市场化的潮流中在土地中扎下根，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结语：落地生根意味著社区的重建

在瑞士、日本，社区支持农业的兴起源自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农业的关注及反思，然而，在中国，我们发现对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探寻，构成了社区支持农业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梁中心、绿耕、蒲韩乡村社区都是在探索乡村持续发展之路的过程中建立了类似社区支持农业的城乡互动模式。这里的“社区”既指向有待重建的乡村社区，也指向对土地对农业有著共同关注的城市消费者社群，而生态农业和生态产品则起到了连结乡村社区与城市社群的纽带作用。透过这一纽带，城市消费者的理念和需求得以落地，乡村社区的自主发展得以生根，从而在市场化的潮流之中得以把握发展的方向，让农民的长远生计得到持续的保障，并在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之外提供另一种更亲土地亲自然的、低能耗的、更具人情味的生态乡村发展模式。

1.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介见附录一。
2.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介见附录一。
3. 国仁绿色联盟于2012年年底从梁漱溟中心独立出去，成为一家独立的营运机构，继续努力推动城市消费者支持友善耕作的农产品。
4. 上访，或信访，是中国大陆特有的政治表达形式，意即向上级政府反映意见并要求解决问题。
5. 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将当时破坏农村的力量归纳为三大类：(1) 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2) 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破坏乡村的助手；(3) 文化属性的破坏力——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所带来的种种破坏力，而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乡村秩序的崩溃。
6. 郭圣莉、圣丁等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的文章《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与重建》中指出“乡镇问题的实质是乡村共同体瓦解之后如何在现代国家体系下重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治理体系问题”。贺雪峰也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将革命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作为当前中国部分农村地区传统组织没落、农民原子化及农民合作能力低下的两大原因。20世纪近100年的反传统，从组织及制度层面彻底瓦解了农村传统组织，典型如宗族组织的瓦解：族田族产没有了，家规族法废止了，宗族组织也大都解体了。
7. 指农民在经济、文化、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缺乏有机联系与合作。
8. 摘自孙瑾、郑风发表于《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一期的文章〈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9. 摘自孙瑾、郑风发表于《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一期的文章〈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0. 蒲韩乡村社区的前身是2004年注册成立的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而寨子村是蒲韩乡村社区的核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第二年，中国的出口经济遽然受到输入型通货紧缩的打击，危机向“三农”转嫁。一位乡村小学教师郑冰站出来，试图改善家乡的状况。随后不久，正值中国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在民间如火如荼的展开，郑冰所发起的乡村社区建设试验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案例。
11. 芬芳田野文化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建构社区新文化新生活的民间组织，通过在城乡社区开展生态家园——可持续生活教育，推动妇女及社区合作组织共同创造有精神期待的美好生活。芬芳田野文化书院创办人为牛见春。
12. 泛指气力或劲头，也有学养、勇气、感觉和认识深度之意。

沃土有好米

※ 陈靖

作者陈靖为社区伙伴刊物《比邻泥土香》编辑

周三的下午，广州番禺官堂村大榕树下，有两间拉著卷闸的不起眼的小仓库，就像我们在无数的城中村见到的那样。从一扇卷闸开启的小门进去，左手边的柜台旁，沃土工坊[1]（下称沃土）的成员之一宏平正在称量著薄荷的重量，瓶子上贴著各式比例和记号——她在调配香草餐桌盐；中间的大长桌上，整齐地摆放著新鲜的青菜、茄子和另外几种蔬菜。这是标哥在中山五桂山种的生态蔬菜，昨天刚刚运到，已经通过团购卖出了过百斤；挨著墙壁排著一溜货架，有台湾里仁的肥皂、沃土自制的洗洁用品、金盏花工作室的手工护肤品、广西的红糖和腐竹、山东禾然有机酱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谷杂粮、干货，当然少不了南方人的主食——大米。

沃土米的一二三四五

一个坚持：	友善耕作
二个原则：	支持友善小农 推动健康消费
三个基地：	广东连山鱼稻米种植小组 江西稻香南垣生态水稻合作社 广西横县陈塘村生态种植合作社
四个种植原则：	自留老品种 自制有机肥 生态防虫 无污染环境
选择沃土米的五大理由：	支持小农生计 保护老品种及传统耕作方式 健康 美味 新鲜

大米的销售是沃土的重头戏，负责宣传工作的阿颜来后，还特意印了一本漂亮的小册子，这一二三四五就是出自于此。贯穿始终的是“友善”二字，对生态友善、对小农友善、对消费者友善。我想，这不光是沃土米的一二三四五，在整个沃土的运作中，也一直体现著“友善”这个核心价值观。

承继开拓传承

沃土的米主要来自三个地方：广西横县、广东连山和江西宜丰。

社区伙伴从2005年开始在广西横县陈塘村推广生态农业，支持当地以传统及友善方式耕作，并搭建与城市消费者之间互动的桥梁，发展可持续生计。推广初期，农户难免会有对于产量、收入的疑虑；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流，现在他们可以很自信：友善耕种的产量并不低，而且种出来的米口感更好。尽管售价比普通市场上的大米要高，但城市消费者愿意为此埋单。横县米在2008年已经开始通过沃土工坊在珠三角地区销售。

连山，位于广东西北部，连接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群山连绵之地，交通多有不便，但亦因此，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技术得以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依然沉积下来，没有重蹈珠三角桑基鱼塘消亡的覆辙。2009年，沃土工坊在连山寻找到第一个合作农户阿广，开始尝试用稻田养鱼的方式种植老品种。到2012年，已经发展到十个合作农户，预计今年（2013年）通过沃土工坊平台销售的大米将会超过六吨。

姚慧锋曾经是沃土工坊社区支持农业（CSA）实习生[2]，开朗活泼，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沃土的老主顾都很喜欢他。他回到家乡江西宜丰种出的第一批鸭稻米，2013年3月开始在沃土工坊销售。

横县——连山——稻香南垣，这三个合作伙伴的建立，也是沃土一步步成长的印迹。同样在起步时与社区伙伴有著千丝万缕的渊源，横县陈塘成为沃土的合作伙伴似乎顺理成章；在连山，沃土迈出了自行培育合作农户的第一步。一个承继，一个开拓，实习生慧锋回家后发起的稻香南垣，已是一种传承。

基于不同阶段，不同缘份建立起来的合作，方式自然也不一样。

广西横县因为几年前的探索生态农业项目的基础，合作起来好像水到渠成。但连山的农户是通过走访得来的，他们对于CSA、对于沃土，了解都不多。合作初期，他们对于这几个外地小伙子的信任还没有建立，种出来的鱼稻米能不能卖，能卖多少钱都将信将疑，沃土只能通过预付定金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信心。定期的走访，既是联络感情加深信任，也是一种出于对消费者负责的监督。慧锋是沃土出去的实习生，相互已经建立了足够的信任：沃土相信慧锋从选种到种植都一定会坚守对环境对消费者负责的原则；慧锋相信自己用心种出来的米一定会受到沃土消费者的认可。

类似的情况在沃土的其它合作中也同样发生著。现在小郝每年都要出去几趟，发掘和考察新的合作农户。早期以传统农户为主，这两年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返乡中年出现：曾经在深圳经营电子厂，2009年开始回到张家界的自然农人童军、桂林双山自然农场的CSA实习期满后回到云南鹤庆尝试香草种植提炼精油的雪梅[3]、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从化家里种地养鸡的郭锐、曾经任职华为现在回到湖北黄梅老家的知常……销售压力，和家人的不理解，在开始时都是很大的困扰。接受过大学教育经历过城市生活的他们，也许和土地相守的时日尚短，技术也不如传统农户，但却更坚定。

慧锋进入沃土做CSA实习生，已经是大学毕业六年后的事。原来医药代理的工作收入不错，也是父母乡亲眼中体面的工作。可慧锋并不满足。不是为了追逐更高的职位更多的收入，而是这样的工作远不如回乡种田能带给他内心的安稳和富足。“我的家乡山清水秀，土地丰饶，从小我就跟著父母一起种水稻，甚至到了大学期间，每年放假回家，我还是帮父母做田地的活。做农业很辛苦，尤其是水稻双抢的时候，累得想哭。但是我一直喜欢农业，我的心里一直有著一个回乡种田的梦。”2010年慧锋刚到沃土时说。梦想照进现实，并不全是阳光灿烂。主流耕作模式转为自然农法，考验的不光是作物，更是耕作者的心。面对比别人黄比别人矮的秧苗，不能放化肥；虫子来袭，也不能用农药。只能平静地面对这一切，静静地接受大自然的给予与创造。“对的事情只要你坚持，就能赢得各种帮助，克服各种困难。一年前从城市回来做自然农业，母亲天天唠叨，父亲形同陌路，亲人的反对，村民的讥笑。一年后，母亲不再唠叨，父亲积极的劳作，村民寻问合作。别放弃，别抛弃，坚持就能迎来一片新天地！”2013年5月，欣喜地看到慧锋发表的这条微博。播下的坚持已经收获了大家的认可。

寻米做有种的人

现在市面上的水稻，一般都是杂交品种。杂交水稻比传统品种水稻需要投入更多的肥料、农药，耗水也更多。慧锋说，一斤传统水稻种子大概五六块，杂交水稻则要去到30块左右，还不能留种。单从种植成本上看，杂交水稻比常规稻种高，容易让农民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再回到环境成本上，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更会对土地资源造成巨大的损耗。传统品种的水稻，也许亩产不如杂交水稻，但千百年流传下来，一定是适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地条件的。慧锋用爱农会[4]的口号“要做有种的人”来表达对自己寻找传统品种的执著。

消费者情感上愿意支持生态种植，经济上也愿意支付较高的价钱，可口感不被普遍接受的话，还是难以为继的。直接做过城市消费者工作的小郝和慧锋，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一方面，是发掘和保育传统水稻；另一方面，要在传统水稻里面挑选适合消费者口味的品种。慧锋农闲的时候就到处打听，一共找来五个传统品种。小郝则利用多年来积累的网路，分别在广西、广东找了几个品种，让慧锋试种。2013年还两赴江西，一是和慧锋一起找合作社的农户交流，给他们吃定心丸，二是到九江一个有二十多种传统水稻的朋友那里寻找合适的品种。

传统品种找回来后，慧锋就在自己的地里一样一样的试种。早稻的丝苗和中佳[5]早已经收割完，8月中的时候到广州组织沃土的消费者进行了一次品尝会。中稻的也很快要收成了，慧锋很希望沃土的消费者能够亲自到他山清水秀的家去一趟，就地品尝。

小郝的田园梦

沃土工坊的负责人郝冠辉，尽管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熟悉的人还是习惯叫他小郝。小郝高中时已确知乡村生活是自己的理想，大学毕业后成为社区伙伴的第一批CSA实习生。他这样描述他的田园梦：

> “高中时代到了思考生命的意义的年龄，我不断地思考著人生的意义，难道注定了人生的目的就是成为一个城市人，过一种上班下班的生活？我看不到这种生活的价值，于是我不断地思考著、寻找著……终于有一天看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里面对列文的描述，一个小的乡村农场主，过著对周围的人都很友善，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于是在高中毕业时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报考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农村的农业大学。
>
> 很快大学时光成为过去，然而回乡实现自己的梦想，依然很遥远，家人的压力，和家乡的资源匮乏，让我暂时看不到回乡的出路。还好这时候因为社区伙伴健康农业实习生的因缘，我得以来到位于河北定州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工作，从事自己喜欢的生态农业技术探索，又是在农村生活，似乎离自己的梦想很近了，然而一年后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不得不离开翟城，来到北京，寻找新的项目，‘我们是在农村的城市人，是在城市的农村人’……在北京的岁月，我常常这样自嘲道，到底哪里才是我们的根呢？

2008年因为个人的原因，再次转换工作地点，来到广州沃土工坊开始做一个帮助已经开始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户进行生态农产品销售的平台，广州炎热的天气，糟糕的环境，也有很多次打过退堂鼓，打算干脆搬到云南丽江这样的地方去过半农半X的生活，然而肩负的责任让我坚持留了下来，这个过程也让我慢慢明白：农村的城市人，城市的农村人这样的角色，不正好可以搭建城乡互动的桥梁吗？渐渐的，我们明确自己的使命：支持生态小农，推动健康消费，这样一个角色，在农村我们和农夫交朋友，支持他们开展生态农业，在城市我们和消费者交朋友，消费者们有管道可以购买到真正放心的食物。”

在不断的尝试中，小郝虽然没有回到乡村，但他的田园梦已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这个田园，比他原来梦想中的遥远，但更广阔。沃土工坊拨出10%的收入作为小农发展基金，为慧锋、雪梅这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提供小额免息贷款，缓解他们启动时的资金压力。产品出来后，又以近乎包销的方式帮他们解决出路。于是乎，慧锋们得以抛开对产品销路的顾虑，安心地照顾自己的田地。于是乎，小郝的田园遍布广东、江西、云南、湖南……

小的是美好的

当食物被当作纯粹的商品，仅仅用僵化的标准去衡量时，沉淀其中的人情与天地灵气也荡然无存。为追求稳定高效的产出，土地的呼吸可以忽略不计；为追求耕作采收的便利，那就大面积单一种植吧。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农业和工厂里面的流水线没什么两样。大部分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远远超过真实需求的商品，或将土地当作工厂生产只求经济效率不求社会效益的食物。不打农药，不放化肥，不施除草剂，这样的人在现今农村的日子往往并不潇洒：人家打牌看电视串人家的时间全都要花在土地上。可是，这样的农民知道土地的冷热，知道天地的可畏，知道食物并不只是用来糊口。中国传统农业的精髓在于小而美的种养结合：家里的剩饭剩菜可以用来喂猪喂鸡，牲畜的粪便可以用来肥沃耕种的土地，收获的农作物可以当作自己家的口粮，有富余的还可以拿到集市上交换其它需要的东西甚至换钱。沃土工坊坚持以小农户作为生产的主体，支付高于市场价的合理价格，既是帮助小农过上相对有尊严的生活，更是对小农友善耕作的认可和感激。

尽管小农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可能个头不一，卖相不如商业种植的光鲜，收成时多时少得看老天，每一户小农可能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沃土反而更喜欢这样的合作。农民都是朴实的，只要你用真诚去尊重，生活上也给到他们支持和出路，他们会加倍地用心来回报。直接和小农对接虽然繁琐，但从产地到餐桌的距离是最短的。生产者不需要为了长途运输的需要而在成熟期真正到来之前就采摘，消费者也不需要为层层流通的利润买单。消费者付出同样的价格，小农的收入却提高了数倍。

小郝前阵子到张家界拜访童军的时候，发现当地人有传统在房后种几棵桃树，用来自己吃。这些桃树基本上处于半野生的状态，虫子吃剩下的人才吃，也是不施肥、不打药、不除草，某个程度上颇符合自然农法的理念。于是就收集村民吃不完的桃子，于是广州的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加上张家界为了发展旅游，取消了所有的工业，机场的货运非常少，因此可以以超低的空运价发货到广州，而不用发汽运。因此这桃子和童军自种的杨梅得以早上五点钟从树上摘下来，搭乘9:50到广州的航班，十点半抵达广州，下午就能送到预订的朋友家里面。

消费健康vs健康消费

做城市消费者的工作，不比和小农打交道轻松。因为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准，他们和土地和自然的连结可能不太深，但对于营养学、传播学这些理论却头头是道。要让消费者信赖，就得比他们更专业。还好小郝本来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农业基础比较好，加上这些年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勉强算得上半个“专家”。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心，有能力的城市消费者愿意多花钱去购买安全健康的食品。这几年来有机食品店越来越多，从店铺陈设到产品包装都透著精英阶层的味道。“健康”的只是农产品本身，规模种植背后的规模养殖、世外桃源般的产地背后的长途运输、精美包装背后的废弃垃圾，都被“有机”“健康”的光环遮在了背后。

CSA所推崇的，则是在地生产、在地消费的小区域合作方式。健康消费，而不消费健康。沃土工坊是这样理解“健康消费”的：一是消费者可以吃到健康的食物；二是鼓励消费者有计划的理性购买，不过度消费，不浪费；三是希望消费者关心自身健康的同时，可以关心生态的健康、生产者的健康。定期的下乡探访，让城市消费者真实地参与到劳动中来，也更能体会农人的艰辛，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

里间的小屋子，是小郝、小谭和阿颜工作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更大的仓库，是2012年初租下的，小郭和另外两个新实习生正在忙著打包分装。眼下，他们又要寻找新的仓库，以迎接慧锋和乡亲们组建的稻香南垣生态水稻合作社今年100亩水稻的到来。

1. 2006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草创人员是一个城市的反思群体，关注“人身心健康与土地健康”之间微妙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来自商业社会中“城市——乡村、农夫——土地”之间的掠夺关系。沃土工坊的寓意是在行动中滋养心灵和土地，寻求健康、和谐的社会发展方式。
2. 沃土工坊参与社区伙伴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实习生计划，是一家接待平台，培养有志于此的年青人。
3. 桂林双山自然农场于2010-2012期间曾参与社区伙伴的CSA实习生计划，雪梅是2010至2011年度的实习生。
4. 爱农会简介见附录一。
5. 中佳是一种早稻米品种。

没有梦想，我们还能活得幸福吗？

※ 丁华明

作者丁华明是爱农会2006年社区伙伴健康农业实习生，2012年任职爱农会土生良品餐馆。

2010年，我和妻子明革在结束一年的CSA实习生项目后，选择离开爱农会[1]，到桂林双山自然农园和桂林山水涅槃健康中心追逐自己的农场梦，一年后再次归队。下面说的是我们俩2012年回去后一年之内发生的事。

已经记不得我们是哪一天从桂林回来的了，大概是2010年的这个时候，社区伙伴在桂林山水涅槃健康中心组办的创业培训，邀请了几乎所有的爱农会的骨干[2]一起参加，创业培训空闲时我们就一起闲聊。

那天晚上，我被两件事情所感动。同是老实习生的小伟[3]私下跟我讲，这次是百忙中抽空出来，到这里其实没有太多的事情，主要就是很久没见了，听说我们来桂林一年多，就来看看我们俩。我当时就忍不住落泪了。

活动结束后，我们跟爱农会的朋友还在客厅里闲聊，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这段时间赶上一些心里不快的事情，还有就是前阵子因梁漱溟中心[4]的刘老石老师突然离世的消息，心里也一直隐隐作痛，也多了不少的迷茫。我几乎是哭著问爱农会的周锦章会长：“您为什么愿意让我们这帮年轻人做‘老板’？”问这句话其实也是很苦闷，我们这时代的人，太饥渴于信仰和亟需精神领袖了。刘老师的离去让我觉得人生一下子空荡了许多，夜很深，面对眼前这位一直把实习生称作老板，并期待实习生能够做

老板的周会长，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愿意伸一把手拉我们走上有意义的轨道。我已经记不清楚当时会长是怎么回答的了。但那一句问与答已经让我心里有了轴，有了一位接下来可以追随的对象。

第二天，秋哥[5]开著新买的农用车载著明苹来接我回去了。

爱农会真的像一个家，我们又团聚在一起了，而且这个家比之前更大了。当时，爱农会旗下的土生良品饭店算起来有三家：柳州桂中老店、东环店，南宁望园老店。

实习生：饭店与农户的桥梁

> 社区伙伴在大陆推动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爱农会是其中一个接待实习生的伙伴机构；从2006年开始该计划培养了六届约50名实习生。在爱农会平台上完成满一年实习的实习生，都选择留在爱农会继续从事相关工作。

隐在巷子里的东环店让爱农会的人更自信，开这样的饭店是有前途的。也是从这个店开始，土生良品饭店的股东与员工的关系更像是一家人。饭店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保险[6]，给予老员工入股机会，之前在桂中老店一直干到现在的员工，差不多现在都成了老板。正如会长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老板，不管是给我们供应食材的农民还是跟著爱农会一起打拼的员工。现在，只剩下实习生了。

在我的印象中，实习生在饭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作为一个全能的前台工作人员，熟练基本的服务员工作是必须的，能够解答所有关于食材和农民的故事是必要的，组织消费者下乡进行农耕体验活动，在饭店负责海报宣传、文案写作、照片整理是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尽管会长有意让实习生参与饭店的日常管理，但实习生大都心向往农村多一些，不想被饭店的日常琐事锁住，而多游走于饭店与农户的家，是店里的自由人，担当饭店与农户之间的一座桥梁。

机会：从厨房罢工到饭店管理之路

一件事，让实习生开始进入饭店管理的角色。

胡佳[7]在柳州组织2011年农夫节，爱农会所有的实习生差不多都到齐了。丽芬[8]也回来参加。刚好丽芬的弟弟杨二红也在南宁，就跟春贺[9]一起过来。丽芬有意在昆明开饭店，想让我们开导他弟弟，让他在这边多学点东西回去好当把手。可是，跟其他“游客”一样，当时的二红似乎对饭店的事情不是很感兴趣。这个时候南宁忽然传来消息，南宁店厨房闹罢工！一直想对望园店进行革新的会长此时心里很著急，但苦于无人可用，从销售行业转来爱农会的胡主任初来步到，威信尚待建立，二红又一心想走。无奈之下，会长想把“消防员”胡佳拉去南宁救火。

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当春贺跟会长提起要把望园店的担子挑起来的时候，跟我们走完整个农夫节的二红，此时居然主动提出，很想留下来看看一个处于混乱状态的饭店，重新走上正轨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和学习这个过程对于未来在昆明开店肯定有帮助。

如此一来，春贺、二红成为望园店转折的管理骨干，胡主任做了店长，春贺则继续负责南宁店食材和农户网络的维护。一个新的管理小团队有了雏形：胡主任、有意在未来开饭店的杨二红和管理食材的李春贺，三个人一起来管理这个饭店。这是实习生开始参与管理饭店的开始。

探索：从实习生到饭店导赏员

在桂林的创业培训班上学到一个新名词叫“文化导赏”，这个来自港台的名词被会长的创新性思维给用上了。会长说，我们也可以在饭店安排一个CSA导赏员的岗位，专门为实习生而设。估计会长从望园店的教训得出的经验，要让土生良品饭店能够坚持CSA的理念一直走下去，必须让接受过CSA理念洗礼的实习生们参与饭店的管理，但这个参与又不会跟之前的管理层出现重复和冲突，在管理制度上必须有创新。但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导赏员跟之前的实习生有什么区别。会长说，这个不是想清楚了再做，而是有人去做了之后再慢慢总结出来一套导赏员的岗位制度，希望以后这个制度成为实习生在饭店承担部分管理职能的一部分。会长一直强调，爱农会既不是一个部门又不是一个机构，在爱农会是不可能发工资的，这里没有闲人，能发工资的地方就只有饭店。他不希望实习生在实习结束之后都离开CSA的发展领域，只是CSA的一名过客而已。实习生在饭店承担一个工作职责，生计才有出处。我们一直强调的可持续发展，是有了可持续的生计来源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此时，我和明苹刚从桂林回来，爱农会一下子多了两个“闲人”，会长问了好几次我们接下来想做什么，大家也有几个提议：在饭店做导赏员、和胡佳一起做农圩、在爱农会继续做泥巴坊[10]、在食材部做农户发展工作，由我们自己选。明苹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在大家一致认同下安排到东环店做爱农会第一名CSA导赏员。

尝试：首名CSA导赏员的诞生

尽管导赏员的设置在东环店是一个创新探索与尝试，明苹还是顺利的进入角色，成为爱农会在实习生方面的管理创新。导赏员主要负责饭店的文化和理念的发展工作，开展消费者教育和农户发展工作。日常工作有部分在饭店，有部分在农村，工资和社保都由饭店发放。至于我因之前在饭店待的时间不多，纯属体验式的志愿者[11]性质，连一个基本的服务员工作都算不上，自认为不适合在饭店待。所以我后来决定跟胡佳一起跑农村。

一个月下来，我决定去南宁。

我离开这里快一年多，爱农会在柳州经营的合作农户已经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合作趋势，合作农户网络趋于稳定，农民积极性都蛮高的，种养结合的模式呈现良性循环，我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跑了一圈下来，农场梦还是有一点点心动的地方：秋哥说可以跟他一起养鸡，同样是合作农户的飞哥说纳社有一块好山好水的地方可以一起搞种养，刘大哥那里好像什么都有了。王运才那里还是老样子，可以一起把种养发展起来。这些地方我都很向往。不过这个时候有了一年的桂林经验让我明白一点，在农村发展，作为外来人需要极大的定力和长远的人脉才能使得事情有发展的可能。我想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继续在一个只认识一两个农民的村庄安居乐业。最后我只是过了一把“参观瘾”而已。我想最需要人的地方不在柳州，那只有去南宁了。南宁望园店自上次厨房罢工事件之后百业待新，正值用人之际，或许我去那里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估计还可以帮得上忙。我的选择使得后面很多事情因此发生了改变。

第一个月，我在望园店做志愿者，会长给我发了1,000元人民币（下同）的生活补贴。第二个月，我开始尝试做CSA导赏员，会长给我发导赏员的标准工资，底薪一下子涨到1,350元，跟华荣[12]、春贺、明苹的工资一样。这两个月我都是睡在饭店的包厢里。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在南宁的城中村长岗村租了一个房。这个时候我基本已经定在南宁发展。

创意：农村经历丰富导赏工作

我有一句“名言”，离土地越近越有力量。在南宁横县差不多三年的农村工作和后来在柳州、桂林农村的经历，让我所积蓄的力量，可以在望园老店做井喷式爆发。饭店就像我的新家，我将我所学的所想的都拿来装饰这个精神的家园。几乎每一天的工作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将饭店门口的海报更新、摆弄桌卡、在明显的位置写字条、贴照片；购买投影仪在饭店拉幕布放幻灯片、播放相关视频，组织服务员学习CSA理念，推行饭店打包停止使用塑料袋；跟每一位有可能感兴趣的消费者聊起我们和农民的故事，派发宣传CSA理念的资料和发布有关的公益组织活动信息；坐上春贺的车走访所有的合作农户……似乎有用不完的力量在推动我去做导赏员的工作。而这工作是充满著激情和自信的，这些自信来自消费者和前台服务员的肯定，当然还有来自李明苹分享的工作心得和经验。有越来越多消费者好奇的问起和谈论我制作的桌卡、CSA导赏员胸牌、横幅所表达的意思、视频和幻灯片传达的信息，会长编制的最新《土生良品》册子和社区伙伴编制的《比邻泥土香》成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宣传刊物，并且成为我们赠送客人的礼物。文化营造的精神粮食，成为到来吃饭的消费者一大享受。

另外，实习生在饭店的角色也因此发生改变。对理念和文化的熟悉成为实习生在饭店一大优势并转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信。当客人问起CSA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服务员没办法完全解答，导赏员则成为最佳解说员，当客人就某一句话谈论时，导赏员成为最佳交流对象，渐渐有问题直接找导赏员。导赏员在饭店的影响力渐深，会长就开始鼓动导赏员兼任前台主管。明苹是一个没有多大官瘾的人，怎么说都不干。而我则觉得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不过导赏员跟前台主管的底薪水平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名份罢了，这个名份让我觉得更加有利于开展接下来的工作。紧接著会长恢复我在望园店的股份，跟明苹、春贺、华荣一样，我们都是各占2%的份额。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望园店开始形成由我和春贺、胡主任、杨二红一起管理合作的团队。

花开处处：开新店了！

不久就传来柳州桂中老店即将要搬迁，已经选好新址在龙城世家，而早之前已经确定的免租一年的盛天龙湾新店也在进入筹备的状态，对员工公开募股开始进行。另一则消息则是来自昆明丽芬，自上次农夫节回去之后就正式辞去项目工作，鼓足劲要寻找合适地方开饭店。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前台主管。望园店这个时候有传闻新房东可能收回铺面或者是另涨租金，因此望园店跟桂中老店一样需要寻找新址，在南宁开新店。经过管理团队的磨合合作，望园店的营业额差不多以每月10%的份额上涨，几乎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刷新。呈现出最为良性的运转。

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终于敲定新店店址选择在离老店不远的地方，即长湖路，面积比老店大差不多四倍。几乎与此同时昆明店也敲定地方，新店装修在即。龙城世家也进入装修准备期，听闻盛天龙湾也开始张罗了。一时间，爱农会旗下土生良品店一下子多出四家来。此时的会长，应是最忙的人。

而当柳州南宁昆明都要准备开新店的时候，向党[13]在中山也找到一位姓郭返乡青年，这位郭大侠已经依托自家的农地，尝试生产无农药化肥的农产品来经营一家小饭馆，有意借鉴土生良品的经营模式，并想邀请我们加盟。

而所有的情况当中，南宁集聚的实习生最多，似乎更有充足的人力开新店。我们想象中的新店应该是由实习生老板来主导，集中人力物力把新店开成功是我们达成一致的共识。柳州有之前的爱农会元老干事，具备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新店，会长可以不用多大操心，我们劝丽芬先等等再说，建议先来广西参与这边的新店，攒足经验和资本再回去；而向党尚处实习期，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也暂搁回中山开店的设想。

从稳妥的角度来思考，丽芬和二红在广西一起开新店，然后再回去，这样的把握会更多一些。可是看上去柔弱，也容易退让的丽芬，却非常坚定要在昆明开店的想法。几乎只要丽芬有一丝的动摇，就会让现在的土生饭店至少要推迟到2012年之后才可能诞生。

梦想：一家人吃上土东西、有事做

丽芬在回忆当时的想法时写道：记得当初说要开店，大家都是极力的反对的。但我已经做好了家人的工作，父母开始不用农药化肥种地。对饭店的期待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能吃得健康，并且有事情可做，能养好娃娃。二红也讲过不止一次，其实对于开店，不期待一天能赚个多少钱，只要一家人能够吃得上这些土的东西，有事情可以做就已经很知足了。

就这样，昆明店在所有人都觉得可以推后的意见中，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快！丽芬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参与这个饭店的建设。这就有了现在的农家乐式的土馆。相对于昆明店，实习生主导的长湖店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因为涉世未深，很多的事情，实习生显得经验不足，几乎处处碰壁。

家庭：内举不避亲

有消费者朋友时常问起爱农会一共有几个人？这个问题恐怕连会长都未必能给一个满意的答案。爱农会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好多个小家庭。

实习生里面就有至少三对夫妻一起参与爱农会的工作，员工之间是亲戚老表的则更多。会长经常开玩笑，丁家的势力最大，这句话确实不假，我的弟弟、堂弟、表弟、表妹、姐姐、姐夫还有我老婆明苹都在土生良品工作，实习生当中我们就占了三个名额。

在社区农圩，胡佳夫妻俩一起打拼，共同创造当时令实习生们羡慕不已的夫妻档，这是在2010年的时候爱农会在创办饭店之后，另一个解决实习生出路的创业平台。同时这也是解决农户食材另一个销售渠道，让社区低消费人群能够消费得起无农药化肥的土食材。当儿子小米出生之后，家庭一下子成为胡佳肩膀上的重担，他著手把社区农圩转手给新实习生管理，其后再转到另一名愿意继续经营的合伙人手上，而胡佳则挑起南宁新店筹备建设负责人的重任，夫妻都在长湖店上班。在胡佳没有转战南宁之前，妻子潘丽的两个弟弟已经在土生良品饭店厨房炒菜，大弟弟是东环店的厨师，小弟弟是望园店的新厨师，当长湖新店开张之后，相继都调到长湖店继续厨师工作。

亲人：付出最多
也往往是管理革新牺牲对象

当饭店急需补充人员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身边的亲人，把我们所认可的事业跟家人一起分享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虽说这种关系会带来管理上的不便，但在很多时候，付出最多和坚持最久的往往是我们最亲的人。有时他们也成了管理上革新的牺牲对象。

明苹在长湖店做前台主管，想改掉服务员上班时间站位和吃东西的问题，就把我的两个堂弟作为开刀的对象，扣他们的工资，还把处罚规定张贴出来，以此杀鸡儆猴。开了南宁店扣员工工资的先河。

饭店的厨师有时不听从指挥，进单的时候慢吞吞上灶，影响上菜速度。刚好我的堂弟撞到我的枪口上，因为没有重视进单造成客人退单，被我罚了款，遣回长湖店，公示警告。

土味：是健康的，是美好的

听起来好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而爱农会一直肯定和坚持认为，好东西应该先留自己吃，我们发展的合作农户的理念也一样，农民生产的土生良品不能全部卖给饭店，要留足自己的剩余才卖给饭店。我们坚信土的是美好的，这个信念让我们有使命去改变身边的人，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有时候真的感觉有点像传销，我们都在不遗余力的想身边的人跟我们一起抵制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一致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待员工也是这个，我们一直都很期待来土生良品饭店工作的员工能够受到影响，并藉著他们影响其家人和朋友。会长每次听闻员工家里有土货，都想去看看，尽管有时爬山路，上山要半个小时，下山也要半个小时，还是乐此不疲。所以在饭店工作的员工当中，不乏合作农户的子女和之前的合作农民。

现实：地沟油事件敲响
食物安全警号

当我们的脚步都停留在城市的时候，离乡土越来越远，力量也就随之减弱。格瓦拉有一句问毛主席的警言："假如我们都腐败了，怎么办？"

饭店在众人美好的期待当中如期开张，参与谋划的实习生老板们都在构想著未来的CSA土馆即将要展现给农民和消费者一个崭新的面貌：更多的城乡互动与支持活动，更宽范围的有缘合作农户，更丰富多样和当地当季的食材，更完善合理的管理制度，更紧密的CSA领域内合作……。

饭店真的开起来之后，琐碎的事情把实习生老板们都给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设想的海报、宣传的资料、开展的活动均因为饭店的日常琐碎事情占据太多的精力，而被一而再的推后延迟到最后变成“运气猪杂”，偶尔才有。实习生老板似乎不是全能型，既可以做好管理又可以兼顾文化。半年过去，大家都显得很疲惫，行动力下降到连回邮件的力气都没有啦。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每日的财务报表邮件群发，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文字介绍今日所发生的事。这时候，会长开始在邮件里面做些除了财务之外的简单回应。希望大家不要只顾看报表，也可写些关于客人的一些故事。新实习生李敏刚好有一个关于导赏员故事收集的小项目，也在鼓励大家能发些有趣的故事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时候的实习生老板基本上已经归位，负责不同的店面的管理要职。

也是这一年，社会上关于地沟油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借势宣传，我们所用的厂家生产的有机花生油一度被拿来做食材明显位置展示。但同时东环店传来消息称，有机花生油有大豆油的腥味！望园店也传来消息称，有机豆瓣酱跟之前的品质存在差异！厂家生产的有机产品受到我们的质疑！

小农：更体贴土地的需要

一连串的食品安全事件，让我们感觉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爱农会坚持跟小农合作，是因为我们更加愿意相信在地耕种的小农，也只有他们更能理解土地需要什么，更能呈现农耕文化的可持续性。在饭店前台工作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有意模仿的参观考察团老板想来取经学习或是寻求合作加盟，部分不乏自有生产基地，来推销“土”产品的。只是我们了解，不管老板怎么游说，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出来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个对抗土地的过程，绝不会带有土味的。我们也更加不愿意看到的是，农民将土地出卖，因此而变成农民工。在这种农场化有机农场的发展浪潮里，爱农会不愿意再往里面锦上添花了。所以只要有可能，爱农会就会放弃厂家生产的所谓有机产品。这些贴上有机标签的商品只是在我们所能寻找的合作农户还没有生产出来相同产品的情况下，寻找的相对安全的暂时替代品而已。一旦找到有缘农户，我们会首先选择合作农户生产的。

当长湖店的日常运营基本稳定之后，我们的脚步就开始往农村走。南宁合作农户跟柳州有些不一样，柳州大都以单个个体的形态出现，然后由单个农户发展身边的亲戚老表来参与跟饭店的合作。南宁的合作农户则以团体——合作社的形态出现，分布在马山、都安、横县的合作农户都相继成立合作社，由合作社骨干负责跟饭店联系，以合作社的形式发展愿意参与的合作农户。饭店只需要跟合作社的负责人联系就可以了。

传统：互信合作，过好生活

专门供应蔬菜给我们的马山妇女合作小组自成立合作社之后，骨干核心成员由之前的清一色妇女代表，开始有了男性面孔出现，而且是年轻的面孔。得力的成员里面是返乡青年。往年马山只是供应蔬菜，一直都是几位积极的妇女代表在跟饭店供应食材。经过爱农会土猪传递计划的实施，及后来大家合作的深入，马山开始朝著我们所期待的种养结合方向发展。长湖店有个包厢的名字被我们命名为上古拉，对联是这样写的：青青园边菜，美美上古拉。横幅：过好生活。马山上古拉成了养猪种菜过好生活的典型代表，可以持续供应南宁两个饭店的蔬菜和猪肉。有时还有土鸭、土鹅及黄豆、绿豆、玉米等杂粮。最新成立合作社的都安弄律，发展的势头也一点不逊色。他们自己设计的“弄律鸭米”米袋广告语就很清晰的采用我们的建议：向传统学习，不用农药化肥；农民互信合作，本地自留品种，传统稻-鸭-鱼共作。

后记

我在自己的手机开机语里面写道：没有梦想，我们还能活得幸福吗？把这句话写出来，跟我的团队一起分享，也想在这里引用一句写在明苹和丽芬做实习生期间合影的相框里面的话作为结语：“生命不在于获得多少的能力，而是在拼命的挣扎中选择成长。”爱农会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希望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怀著梦想，走在理想与现实结合的光明大道上。

1. 爱农会简介见附录一。爱农会是社区伙伴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实习生计划的参与机构。
2. 骨干是在群体中起主要作用的人。
3. 小伟叫梅红伟，曾参与社区伙伴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实习生计划。
4. 梁漱溟中心即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介见附录一。华明是梁漱溟中心人才计划的学员。
5. 秋哥是爱农会的合作农户，为爱农会的土生良品餐厅供应食材。
6. 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五险为：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一金：住房公积金。
7. 胡佳和华明同是梁漱溟中心人才计划的学员，也是社区伙伴第二届CSA实习生，到爱农会后，留下参与爱农会工作。
8. 丽芬是社区伙伴第三届CSA实习生，曾在爱农会当实习生。
9. 春贺也是爱农会的实习生。
10. 泥巴坊是华明和明苹在桂林跟当地一位返乡青年组建的小团体，按照爱农会的模式发展当地的社区支持农业合作网络。泥巴坊当年寄篱于桂林山水涅槃健康中心。
11. 香港称义工，台湾称志工。
12. 华荣是华明的弟弟，是社区伙伴2010至2011年在爱农会的CSA实习生。
13. 向党也是社区伙伴CSA实习生。

对学做“农人”的点滴思考

香港CSA研习会启示后记

※ 罗燕

作者罗燕为重庆合初人文化传播社“生态农业·新农人实习计划”项目工作人员

2012年10月我以会议记录员的身份参加在香港举办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那时，我是重庆合初人自然农园[1]CSA项目的配送人员。期间，我接到过消费者很不客气的投诉电话，遇到过农园蔬菜紧缺的时段，也碰到过合作农户对生态种植的摇摆心态。心想，这些疑问或许可以通过参加研习会来梳理清楚。然而超出我的想象，这次研习会的内容如此丰富，传递给我的力量如此强大，让我暂时抛开作为CSA配送人员所遇到的各种棘手问题，而更多的去寻找研习会上大家所讨论到的“农”的深刻内涵。在此，非常感谢研习会上的每位朋友，是你们给了我力量，继续著前行的步伐。

锄头，农人的一张名片

这次研习会，我看到了那么明显的“农人”的面孔，有来自四川攀枝花的刘占红大哥[2]，台湾湾宝的洪箱姐[3]，香港菜园新村的冯汝竹大姐[4]等等。他/她们的言行举止都体现著“农的价值”。我通过耳朵，眼睛和心感悟到了点滴。提笔时，我已是“生态农业·新农人实习计划”[5]的工作人员。于是又尝试著结合“新农人”[6]的故事去思考怎样学做“农人”[7]。

刘占红大哥跟我们分享了他从常规农民转变成生态农民的心历路程。刚发言，他就说："我拿著话筒，比拿锄头还要重！"锄头是刘大哥最熟习的工具之一，因为挖地，种植，除草都会用到，只是形状不同而已。长年使用后，他可以轻松挥舞有好几斤重的锄头了。话筒则与他做农活无关，用的次数少，甚至不习惯用。这也就造成他发出"话筒比锄头还要重"的感叹。而他的这个感叹，让我思索著农人与锄头的关联。记得一位老农曾经跟我讲过："看到用的锄头，就知道你这个农民勤快不勤快，合格不合格。"锄头经常使用，与土壤接触的部位就会发生摩擦，变得又薄又亮。如果闲置较长时间，锄头当然就变钝，甚至生锈。锄头俨然成为了农民的一张名片，铭记著他/她们辛勤劳作的风雨岁月。

而对于刚务农的新农人来说，要书写好这张名片又难，又不难。新农人张飞开始就觉得锄头很重，用不到两小时手臂就会酸痛。"举起锄头都有些费劲了，还要往地里挖。挖的深度和大小你还要好好控制。这个修地球的职业还没那么容易！"张飞说到的问题，新农人段清也同样遇到。全身有力量的段清使足了猛劲往地里挖，同伴还笑他是在为作物修又大又深的别墅呢！其实种不同品种的作物，需要挖不同规格的坑。而深度和大小的把握就在于你控制挥锄头的力量。你还要学会用不同型号的锄头，如长的，短的，宽的，平的。另外，修锄头，接锄把也是新农人需要学习的技术活。

想要像刘大哥一样用好锄头，只有多练习。几个月后，我去走访张飞。看到他已经很轻松地用锄头除草。我也前去试试。可没想到我挖得太深，把没有长草根的土层也挖了起来，当然很费劲。他笑话我连除草都不会，还叫我伸出双手来。"你的手都没有起茧，你看我的手，肯定是你太懒了，没有经常挖地。"看著这双起茧的手就知道，他用锄头的频率比我高多了。他的技术也就这样练出来了。我很惭愧自己挥锄头的次数少，可嘴上还要辩解说那是因为自己在尝试免耕覆盖法，根本就不需要用锄头。

正是因为免耕覆盖法不需要很费劲地挖地，因而受到了大部分新农人的推崇。做短期新农人体验的可曼就认为，用锄头翻地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耕种方式。她参与了安龙村高家种土豆的全部过程。期间，她尝试说服高阿姨采用免耕的方法来种，可没能得到采纳。她有些失望，觉得传统农耕需要去糟粕存精华。务农十几年的青年农人肖大哥则提醒："你们这些自称新农人的，刚开始学做农活就想著怎么省力又省事，用些从书本上学来的方法。我当然不是说这些方法不好，而是想说，你们应该先拿起锄头，去真实地体验挥锄头的感觉，真正体会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然你怎么当农民？"

锄头折射的不仅是务农的技术，更是农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这些新农人要玩转锄头，需要继承的便是锄头背后的这种精神。

守护心中的那亩田，那种生活

台湾湾宝的农民为保家护土长期抗争，最后终于抵挡住了政府征地的举措。洪箱姐作为代表就在会上分享了她坚持抗争的动力。她说："我觉得我很快乐，我做农四点钟去，那是我的权利，我可八点就回来，我可以主宰我自己，活得很有尊严……每个人要过自己的日子，我的人生不应该被政客和财团操作，我比较不甘心。"洪箱姐的这段话道出了"务农是一种生活的选择"。任何人，任何政府，甚至任何潮流都不能剥夺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湾宝农民长期抗争要守护的是土地，是家，更是一种生活。

如同洪箱姐所讲，做农的节奏可以自己调节，这种生活的自主性往往是大部分新农人曾经被剥夺的，又是最想拥有的。新农人李行以前的打工生活便是如此。李行在19岁中专电子专业毕业后，就跑到广东东莞开始了九年的打工生涯。刚读书出来时，没有什么技能，社会经验也少，只好当一线生产的工人。一线生产是流水线作业，要求人的精神高度集中，而且重复同样的动作达12小时。这些工厂讲究高效率，每位工人的速度都要与机器的步调一致。厂长总觉得李行的动作慢，就常常骂他。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把人也当成机器，根本是在消磨人的本性。而做农活，你可以根据今天的心情与身体状况，或是当下的天气条件来自主安排时间长短和速度。

为了守护湾宝那片土地，当地农民勇敢地拒绝资本，不顾生命安危多次前往政府楼抗议。新农人抛弃主流宣扬的都市生活，选择被亲人，同学和朋友都唾弃的农村生活，这不也是一种守护吗？他/她们在面对家庭反对时所做的种种努力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2009年李行决定返乡务农，可是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甚至被怀疑得了精神病。在家的那段时间，他过得很压抑，常常被家人往外赶，自己却又不想外出打工。在家庭的压力下，2010年他别无选择又到东莞打工。因为真的不喜欢，2012年他还是回到家，希望能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改善与父母的对立关系。正如他写到："今年3月再一次回到家，希望自己能突破内心的障碍，能以爱去面对家人和别人的质疑，过一种简单自在的农耕生活。但没有过几个月，我就又意识到了生活或自己的内心从来都没有按自己的预期发展过……我说我还是想出去，他们（父母）默许。一时悲观上涌，当时我想，可能回不了家了。"[8] 2013年1月，当我走访正在实习的李行时，我们谈起了他与父母的关系。他告诉我："那次跟张君聊到这个事情，说我心里面有一种压力感。他就说'还是这样过'。这句话把本来很乱的我理顺了。我把自己的重心找到了。不管父母压力怎么样，自己的婚姻怎么样，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能改变自己去实现认为适当的生活方式，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的。不会因为父母的压力去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因为惧怕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可见，李行对自己想过的生活非常明确，也非常的坚定。这也许就是新农人在前进路上最需要的内心力量吧！

然而这种生活又该如何过好呢？有些新农人想象的务农生活是简单的，慢节奏的。可是农是靠天，得赶季节，赶天气，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甚至先前的功夫会白费掉。2012年收割谷子的过程便让合初人自然农园的新农人对“抢收”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四五个新农人连续两星期每天早上八点就出工，割到中午十一点，下午三点半继续，等到天黑八点多才收工。这种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挑战了我们的极限，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想过的生活吗？天黑回来的路上，我们看见旁边田里还有打电筒收割谷子的老农。大家讨论著，都说新农人与老农就是不一样——我们更注意把握劳动的强度，不让自己累著。然而第二天的大雨让我们恍然大悟，老农打电筒不是因为不知道累，而是要趁下雨前抢收完谷子。这场大雨拖延了我们收割的时间，晒谷子的好天气也就错过了。到现在，我们还有几百斤的谷子没能晒干入仓呢！真后悔当时没有学老农打电筒，也更明白了农民那种任劳任怨的心境。要达到这种心境，新农人应该怀有谦卑的心，在实践中学会把握节气更替与农事安排，学会协助大自然来获得它给予人类的恩惠。务农的生活才会变得既能自主，又有收获。

改变，从自己做起

香港经过城市化发展，几乎没有了农村，农地和农人。可是在这次研习会上我们看到，香港菜园新村农业先锋队在建村初期便利用向附近村落借来的农地耕种，继续发展农业，并希望把所得盈利分给参与耕地的村民，或成为村中公共建设维修资金。我们还看到了新生活馆[9]农场的城市青年租地来务农，因为他/她们深刻认识到要保护农村，必须亲身学习和实践务农，重建与土地相连的生活。身处城市化程度如此高的香港，以冯汝竹大姐为代表的农人没有沮丧和抱怨，而是用实践务农来证明“农”的价值。香港农业处在消亡的边缘，新生活馆农场的城市青年没有做犬儒主义者，而是脚踏土地开始务农。他/她们用CSA模式联结起更多香港人与农，与土地的关系。

同样，新农人张明涛也是看到CSA模式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开始学生态农业。他在大学期间曾休学一年到基层支农，亲历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以前别人拍我的照片都说是愤怒像，是典型的愤青。以前的想法是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信心很大。但忽略了一点，在不改变自己的情况下是不能改变世界的，总觉得是世界的问题，自己没有问题。”张明涛告诉我，亲自做农民，干农活儿，是在弥补自己以前缺失的农村劳动教育。正如他说：“在种地过程中，人要对自然，对土地有基本的尊重，所以农民种地都是需要低著头，弯著腰。不能想象，一个扬著头，趾高气昂的人如何做到在地里耕地。”

新农人张桃则是因为对现有的教育制度不满意，选择了做生态农业。她认为学校教育不应该只看重成绩，而应该关注孩子的心灵成长。一些经历也让她很失望地发现，有些人即使是在私下交谈也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真诚。她开始在学校上课不能安稳，便看小说，玩手机，看自己喜欢的杂志。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青年文摘》上看到报道曾经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10]负责人之一的石嫣的文章，其中有介绍CSA。“我最看重的是CSA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人与人的关系。看了后我很激动，心想小毛驴在北京太远去不了，于是在网上搜索找到了做CSA的安龙村，就把地址抄下来。反正对上学也没有了兴趣，我就跟妈说不参加高考，要去种地。她很反对，但我当时对CSA的向往，有一种狂奔的感觉。管不了这么多了，拿著地址我就去到了安龙村，找到高家，开始种地。”怀著可以改变人际关系的期望，张桃两年后最大的收获却是改变了自己。她说：“以前我总想把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和自己的想法通通讲出来，现在我觉得没有好大必要了。有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标榜得太高了。当你怀著这个心态去给人家说，我自己好了不起，好伟大，做的事好有意义，其实在别人心头压根就不存在这样。”这番话，提醒著我们这群新农人，应该警惕傲慢的心态，懂得弯腰种地的谦卑。

四年前的我，何尝不是有些傲慢呢？那时我很有幸成为“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计划[11]的研究助理。我们研究团队跟著几位和平妇女在她们的社区推广生态耕种。我把从书本上学到的有关生态农业的知识相当自信地告诉村民，试图说服他/她们放弃使用化肥农药，尝试生态的耕种方法。他/她们反问我，一家人的口粮怎么有保障，我无言以答；他/她们细问我，具体的生态农业技术操作过程如何，我也说不出一二来。我还自以为是地在心里责怪村民，怎么不懂得环保的紧迫性，不知道健康很重要。当时，我脑子里装满了理论，觉得自己知道得比别人多，也比别人想得透彻，更有批判，甚至不能包容和理解别人做出与自己理念背道而驰的行为。经过研究团队的种种努力，两年后真正转变种植方式的村民很少。面对这个现实，我变得很无助，很无助——自己那么努力想要改变的世界却没有按自己想象的发展。我越来越没有了底气，开始反问自己：一点务农的经验都没有又怎么能说服别人？自己都没有改变又怎么可以责怪别人没有改变？经过痛苦的思想挣扎，我意识到自己太自负，应该放下所谓的“远大抱负”，寻找当下的著力点。唯有返乡学种地，才能让我真正明白推广生态农业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学种地，不是那么简单，比从书本上学习理论难多了。收谷子时，老农怎么就知道第二天要下雨呢？天气预报可没有说呀！老农很淡定地指著天空笑著说："天气预报没说，老天爷说了算不嘛？"我望著一样的天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原来观测风云变化也是务农所必须的智慧。其实做农需要掌握百科知识，包括天文学，植物学，生物学，土壤学等等，还需要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我之前了解的农业知识不仅是理论上的纸上谈兵，还是片面的，局部的，被分割的。现在我要突破自然学科的界限，用整全观去认识由无数生命联结的"自然"和"农"。而老农的智慧是多年务农所积累的经验知识，需要耳濡目染的传承，不可能一蹴而就。我想，拿到一个专业的大学文凭前前后后都花了20年时间，要学涉及多个专业的"务农"也许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才刚刚开始。

像香港新生活馆农场的朋友一样，张明涛，张桃和我通过务农正改变著自己。改变的是对农人的尊重，对自然的谦恭态度。

休闲农业 · 修行农业

这次CSA研习会上，我们讨论了农的多元价值，农的生活内涵。而新农人在实践务农中，又丰富著农的故事。

今年初春，我们到有二十几年生态种植经验的周诗禄老师那里去学旱地育秧。他弄的秧床，方方正正，对尺寸的要求如科学家一样精确。我们这些新农人在旁边观看，不知道应该如何插手。好不容易我鼓起勇气想帮周老师整理泡在水桶里的薄膜。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弄了半天也没有捋顺，还洒了一地的水。周老师很客气地说："你慢慢的，等一下我来。水很珍贵，要珍惜水。"没想到周老师做农不仅对技术和质量要求高，还会想到资源的可贵。而我却只为了怎么弄好薄膜，眼中却没了"水"。育秧的程序很多，弄碎土、洒碎土、浇水、洒种、盖膜。周老师对每个步骤都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我们脑子记不住，便用笔记。又怕自己操作时看文字记录找不到感觉，就用起了手机来拍照，还进行了微博直播。在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只能打打下手。也许是见识到我们连务农的基本知识都没有，周老师就叫我们干脆站在一旁观看就是。他重复好几次地告诉我们："种田很辛勤哟！要吃得苦才行。你们做做休闲农业算了。"休闲农业？我们几个新农人都哈哈大笑！周老师担心我们靠务农填不饱肚子，得找个糊口的工作，有空闲时间再来做做农活玩。我们可是想要用农来养活自己的，只是现在的技术很有限，也就默认了周老师对我们的定位。

务农与整个自然的生命体都有关联。在田间劳作，远处传来各种鸟儿们的合唱曲，身旁有很多你叫不出名儿的花花草草，脚下有蹦来蹦去的青蛙和蟋蟀，手边有被惊吓到的蚯蚓和蚂蚁。而我们种下的作物便在它们的陪伴下成长。这些生命体用非人类的语言互相沟通著，也与我们相通著。务农便是让你学会体察各种生命之间的联结。

我们走在做农后回家的路上，或是带著些许的疲惫，或是带著小小的成就感。看著身边的花草树木，它们大小不一，高矮不同，但是每一个生命都努力地往天空伸展。再细看，有的已经凋谢，完成了一个生命的周期。我们不再谈论，开始专注一路上所呈现的生命形式，不去想它以前是什么样子，以后又会怎样。在此刻，我们就是静静地在欣赏，如实地看著它们，没有由我们的头脑创造当下之外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务农生活，我们学著放下。放下担忧，放下恐惧，放下愤怒，放下埋怨，放下执著的某些观念……于是我们新农人自称是在做“修行农业”。

无论是老农眼中的“休闲农业”，还是自己心中的“修行农业”，那都是新农人演绎的农的内涵吧！

❶ 农园成立于2009年12月，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租用耕地50亩、闲置希望小学一所。农园是重庆民间科研公益组织合初人文化传播社推动的一个城乡互助平台，是一个集生态农业技术试验推广、CSA模式本地化创新实践、农耕体验教育、社区文化建设、青年志愿者培养的示范性教育基地。

❷ 攀枝花和心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简介见附录一。

❸ 湾宝社区发展协会简介见附录一。

❹ 冯汝竹积极参与土地正义联盟成立的八乡绿色生活社，机构简介见附录一。

❺ “生态农业·新农人实习计划”从2012年初开展，由社区伙伴资助，合初人实施，在川渝地区搭建返乡青年生态农业学习与实习的平台。该项目以有一定生态农耕经验的农户或非营利农场为实习点，招募有意愿返乡的年轻人作为实习生，帮助他/她们系统和深入地学习理解生态农业，以及学习如何构建自己未来在乡村的生活。

❻ “新农人”这个说法是社区伙伴四川生态农业团队在跟尝试返乡务农的年轻人一连串的讨论中产生的，特别是要回应长期以来对“农民”这个说法的偏颇和蔑视。人们骂人时会说你是“农民”，这个名词带著很多贬义，代表愚昧、无知、不科学等等。提出“新农人”是要为农民正名：农业本身是一门经长期反复实践验证的知识体系，内里包含的学问广大深博。一名称职的农民不但是农耕科学的理论家，更是实践者，应该像其他工作般，受到尊重。而“新农人”们，则肩负著总结和转递对农民和农业的这个理解和信息使命。新农人新在哪里呢？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新农人返乡后会有了从外面学来的新知识和经验；可以有更多可能过半农半X生活；有人认为他/她们具有反思主流发展主义和城乡分割的意识等。

❼ 大部分新农人对主流发展主义、城市化、乡村衰败和可持续生活有所反思。CSA是他/她们推动乡村发展，建立城乡联结的一个途径。因为通过CSA可以销售健康农产品，重建农村可持续生计；同时让城市消费者吃到健康食品，开始多关注农业。更重要的是，CSA的运作可以建立人与人的互信，改善人与土地越来越分割的关系。这些关系的重建正是新农人尝试可持续生活的基础。

❽ 摘自刊载于合初人网页上李行的文章：《大风农场实习感受——那些感动我的事》。

❾ 新生活馆的成立与菜园村的保育运动有关。一群来到元朗八乡支援村民的城市青年，认为要保护农村，必须亲身学习和实践农务，重建与土地相连的生活。他们跟随香港永续农业关注协会的袁易天老师学习永续农业，建立菜园村生活馆。2011年初，菜园村被清拆，他们在八乡谢屋村找到几万尺农地，建立起新生活馆农场。新生活馆在选择作物时会考虑如何令土地愈种愈肥沃，强调不能一味向土地苛索。

❿ 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位于北京西郊著名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下。小毛驴市民农园在种植方式上采用自然农业技术，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遵循种养殖结合的原理，重视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知识的传承；在经营模式上采取CSA的经营理念，为市民提供蔬菜配送和菜地租种服务；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乡村和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

⓫ 该计划于2008年开始，由社区伙伴部分出资，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部分出资并实施，邀请了11位在生态农耕，城乡互动，社区建设等方面默默耕耘的中港台和平妇女和组织参与，共同探索生态，生计，文化和可持续生活等范畴的关系，在妇女的日常实践中创造和建设可持续的和平和生活。

守住社区，做生活化的革命

与张和清教授的一席话

※ 郑依依

作者郑依依访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张和清，并整理其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上发言。郑依依为民间组织工作者。

从云南平寨的村子出来，这中年妇女在广州工作，也有三、四年了吧？目前，是化妆品用具厂里的女工。

她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哭得好不凄凉——腹痛已经好一段日子了，因为担心医疗费而一直硬撑著，实在熬不住了才过来求诊，怎料刚才检查映出子宫里一团黑影——是肿瘤？是癌症？要做手术吗？没有医疗保险，怎掏得出医药费？

她满脑子疑问和惊恐，可是，她只会说方言，听不懂操普通话和粤语的医生和护士喋喋不休的话。

又急又惧，胸口发闷，但她不敢细想——她工作的生产线制造著名化妆品牌的粉扑，每天在粉尘飞扬的车间15小时，胸口堵得要命。有人说，她肯定是患了尘肺病。

她不是没有后悔，为什么从云南老家千里迢迢跑来城市。以往和丈夫男耕女织，快快活活地一天一天的过，从不觉得所谓生活逼人。可自从出来打工后，每天都想著老家的一片土地。她也向一起来到广州的老公哀求过一同回家，但丈夫抱怨："当初还不是你说要出来的？现在地都荒芜了，怎么回去？"

对，当初是她说要出来赚钱，给孩子上学。以往，她的一家几口自己种地自己吃，钱不多可都够用，从没想到现金是这么重要。如今，孩子的教育变成了让她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了。

她多么羡慕同村出来的几个小伙子呢——他们比她晚一点来到广东打工，几年后发觉他们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只是被当成廉价劳动力，没有一点尊严，于是几人聚在一起，写了一份计划书，向社会工作机构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1]申请启动基金返乡创业。

2001：绿耕初进云南农村

在中山大学草坪旁边的咖啡座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张和清老师告诉我如上的故事。张老师是绿耕的创始人之一，绿耕是在大陆参与推动社区支持农业(CSA) 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自从2001年进入偏远的云南平寨，绿耕搜集村史、民俗，为妇女开扫盲夜校，兴建社区活动中心、组织妇女刺绣公平贸易的产品……等等，尝试重整村民对民族的认同，透过能力建设，带动这小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平寨，一如上千上万的中国农村，小农的经济模式，有限的可耕土地，农产品利润远追不上生产成本；而距今不过12年前，当绿耕初次进村的时候，更是交通与通讯都与世隔绝——却为平寨保留了一份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清洗前的简朴。

张和清珍之重之的，是中国小农以土地为生活之本的生产生活方式。

"而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就是八亿人口在农村，那种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保留著，不管是土改将土地给小农，集体化收上去，后来包产到户后又给了小农，还是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生计，家户没有解体。土地是生计的来源，不是用来赚钱，是用来养家糊口。农民依然维持农村的生活方式，不是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跟土地、自然的关系并没有断裂。"

这样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不能推动国家经济如火箭般猛力高速发展。可正因如此，张和清认为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之下，中国小农的可贵之处。

农民:有土地就有尊严

“小农的可贵在于，他们用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可以有尊严的活著。我是一个主人，我有尊严的活著。虽然这土地是承包的，但我还是个主人，是自由的人，自耕农，有自主性。我种什么，如何种，种多种少，什么时候种，都是自己说了算，不用依附于谁，有土地就有尊严，土地是尊严之所在。”小农是土地的主人，不是农场的工人，不出卖劳动力，而是掌握生产材料的主体，很有主体性。

此外，在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无止境地掠夺、耗用地球资源同时，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反而是保育生态、恢复生态，让人在其中能回复并得益于自然的生存方式。“这些小农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可持续的，恰恰是我们现在所需要所倡导去恢复过来的。它是非常强调永续的，人跟自然的关系，所以他不是大工业、大机器、大农场无限制地滥用自然，而是有限度地运用自然，尊重自然的规律。小农跟万物的关系都很和谐，强调六畜兴旺。他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很生态的。”

然而，经过这些年，这种简朴正被侵蚀。当电视、手机等通讯网络铺进像平寨这样的农村，当农村人民被农业政策左右、当农村的自然生态因城镇化发展而遭破坏，小农如此简单的生计模式，也被攫夺。原本可以依靠土地的生产供养一家，现在却变得清贫如洗。

大陆小农正经历三种“致贫之路”

张和清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上，提出中国小农正在经历的三种“致贫之路”。

“我们中国叫收入低导致生产性的贫困；生产已经变成全球化生产的一部分（市场化农业），小农在改种一种适应全球化需求的那个所谓的农作物的时候，他完全不自知。但是当那个价格突然暴跌的时候，许多小农血本无归，甚至喝农药事件不断发生。这就是全球化的‘生产性致贫’。”

“第二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发生在中国，就是钱不够花的‘消费致贫’。消费拉动内需，这是中国的一张王牌。我们在农村看到许多村民卖猪买手机，卖鸡充值（手机）话费。我们在（四川）映秀的时候，妇女做刺绣做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手上拿了一些钱，然后来一个家电下乡的政策[2]，然后这些妇女就买两、三台电视放在板房里。她说政府说的，我们以后要住别墅，三层，一层一个电视。结果，刚刚买了没过几个月，板房拆掉等待永久性住房，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许多家电要么被偷掉，要么搬不走丢掉。这个叫输入性的贫困。还有教育、学费等消费的需求使小农苦不堪言。”

“第三个是‘寅吃卯粮’的‘生态性致贫’，就是天灾人祸的恶性循环，导致底层民众生活的脆弱性不断加剧。许多发展计划不计后果，或者非常短视，以牺牲后代的资源带来暂时繁荣，但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GDP增长，会导致天灾——人祸恶性循环。比如高铁沿线，地震后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滑坡灾害，等等。”

“导致小农种种致贫之路，当然是资本主义成了全球霸权，垄断发展观念，蒙蔽其它各种可能——甚至身处其中的农民或城市人，仿佛也觉得没有其它出路。”

张和清认为，中国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本来就在抗衡资本主义的意识型态；可是一个不留神，本来过著纯朴农村生活的小农，也会跌进被广告等宣传机器所建构出来的虚幻图像之中：现代化、方便的城市与落后、闭锁的农村二元对立，对前者趋之若鹜，对后者避之则吉。

正如文首的故事里，那平寨妇女当初游说丈夫一起到广州打工，正是当全国经济越发进入深度的市场化、现金在农场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放弃了农村以土地为本的生活与生计，选择了进入城市谋生。当青壮的村民都走向城市当农民工，农村因流失劳动力而变得更为凋敝，成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的所谓“386199部队”[3]。

“人的主体性就在于人有一种本能，去寻找所谓的幸福，自己想要的生活，人是圆梦的动物嘛。但资本主义把我们的可能性都消灭掉，变成它的一个缧丝钉或工具。”张和清说。可是，当看不到意识型态操控下的社会结构和发展，人们对于何谓幸福生活是不自知的。

城市文化排斥小农
小农被他者化和妖魔化

“这涉及深一层的讨论，就是什么是幸福生活。农民是通过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去向往城市的：便捷、快速、光鲜亮丽，抱著这样所谓的梦想，而去否定自己已有的原来的谋生价值。但是当他真正来到城市，一般都是梦想破灭，光鲜亮丽背后有很多很多心酸的故事。”

反之，在判断分明的二元对比之下，城市人眼中的小农，也成了短视、愚昧的代名词。张和清对此非常生气。“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对小农的建构，是他者化和妖魔化。第一是城市人并没有很好地去了解小农，甚至都没有走进村庄，根本不知道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什么，是通过所谓主流的媒体、通过意识型态等等，被偏见包围，排斥小农。我觉得这种话语体系是很恐怖，恰恰是因为建构了这种城市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价值观，把小农妖魔化为没有文化。这有几种危害：优化了这套城市的生活逻辑，过份的美化了都市化、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合理化了你比别人高一等的价值；同时，否定农村和小农的存在价值。”

但，虽然小农不论是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或是承受著文化意识上的种种污名对待，张和清却并不悲观——也许，他的希望，正是由于一份从事著社会运动之中的人所抱的信念与坚持。

“我们这些年来，致力扎根于农村，慢慢去恢复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看到进展还是蛮大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去恢复种植、养殖，有些40岁以上、中年的村民，本来就是不离土的，就守住农村。城市人也有厌倦城市生活，他们也愿意加入到农村去。”

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 小农绝不会消失

虽然贬抑农村的主流话语是最大的危害与威胁，发展逻辑中以城镇化、消费主义，带来GDP更大的增长，就像推土机一样，不断向农村拓展，令人揪心；但是，张和清指出，“你一方面看到他很危机的一面，可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尽管我们的政策看起来很不理想，但如果深入到千家万户，小农完整保留的地方，人民群众的力量，你会看到很有希望。”

张和清确实有信心，甚至能鼓舞到说出“中国小农绝对不可能消失”这样的壮语。他条理分明的阐释著。

首先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多元化。“要把这片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农民消灭掉，是没可能的。中国的多样性是没办法消除的。例如云南，有不同的地域、民族、地貌、文化，它的差异性是极大的，哪怕是广东这样发达的地方，珠三角跟粤西、粤北、清远的少数民族，完全是两个世界来的。这些多元化的生活生态，不可能用一个价值去消除掉。”张和清最近去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越来越多牧民自言祖祖辈辈就是游牧民族，离不开草原，不可能住在单元楼房；“像四川地震以后‘被上楼’的农民，现在也为生计而不断抗争，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就是小农的生活习惯。”

其次是他认为小农的存在是中国最根本的价值，占了八亿的绝大多数人口依然是要依靠小农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来维持生计，此巨大的数字不可能一下子清零。“中国绝对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吃商品粮的，不可能都变成居民去吃工资饭的。”

愈来愈多人反思城市价值

可是更重要的，可能是眼见渐渐越来越多人在反思城市价值，令张和清切实地感到希望。这或者就是社会运动中人，每一步踏出时的力量之根本。“人民对所谓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一种反朴归真的梦想。原来就有小农保留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已经习惯；另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一方面对钱的依赖很大，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反弹，已经有很多人有返乡。”就像文首的平寨青年回乡创业，绿耕参与社区伙伴在大陆城市推行的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很多是有知识的青年愿意回到乡下，甚至是，农村的简朴生活，也吸引了城市的精英。“我们招聘工作人员驻村的时候，没想到一对深圳的夫妇，老公是法官，老婆是做外贸的，他们想把房子卖掉，把工作辞掉，愿意到农村去重新过另类的生活，活出自己。”这无疑是对推动生活文化反思的努力的鼓舞。

可是，绿耕还是清楚，已经破败多年的农村，要经过重整，才能凝聚住村民，以至建设成为理想实现之地：“乡村要再造，不再造怎会有吸引力？把村民组织起来，通过生态种植，生计有改善，但最重要的是要跟他们一起，将一些公共空间改造出来。”在平寨，绿耕兴建社区中心，修建公共广场；在广东乡村恢复大祠堂，经营乡村旅舍，坚持著一个使命，让农民的生计变得稳定而可持续，创造另类的、城乡联动的，没有中间商剥削的公平贸易。也是从自身开始，推广小农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拿健康食品来说，我们要自己先吃健康食品，那我们的精神状态就很好呀，然后带动周围的人来吃。我们早期不用化肥农药来种的米，但自己是不吃的，用好的价格卖给有钱人。后来我们很快就反思，我们不是搞特供，我们自己要吃，村民要吃，这就有用了，身体慢慢好起来，带动更多人吃不用化肥农药、老品种的大米。越多人吃这些农产品，那许多污染环境的化肥公司、农药公司就倒了嘛。”张和清笑说。

改造农村 打造公共空间

而且在改造农村之时，有其政治上充权的意义。“我们把公共空间打造出来，大家可以去参与，实现民主，发声，妇女充权，实现这些政治目标对乡村善治非常重要。还要去推动文化传承，他认不认同，要通过教育去做。我们要去做意识提升、充权等工作，让他们去重新找到自己，真正认同作为小农的价值。”

绿耕开始时在平寨守了五、六年，守不住，因为城市化、工业化甚至全球化不断把农村的内容掏空。隔绝农村与城市，想单纯地依靠农民的力量推动可持续发展是不足够的，因为农村的绝大多数问题是城市化、工业化造成的。因此必须推动城乡联动，恢复城乡共生的互惠关系。

2007年起，绿耕开始了城乡合作的项目，推动城市社区居民支持农村发展。例如在平寨成立“红米种植”、“土鸡养殖”、“刺绣”等三个农民合作社，向城市居民提供老品种大米、土鸡、土鸡蛋、民族绣品等农作物与手工艺。绿耕亦开始组织城市消费者，例如与具体的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合作，在屋苑社区以食品安全等相关主题的讲座向居民推介生态农副产品，亦借助网路或电台等传媒向社区居民宣传农耕体验活动，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入村寨体验生活，实地考察农作物生产状况。

其后，绿耕将云南、四川及广东项目的不同村庄，与昆明、成都、广州等城市社区对接起来，逐步形成复杂的公平贸易网路，一个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可供应多个城市社区；而同时，一个城市社区又销售来自多个农村的产品，城乡之间的社区支援网络互补互惠。绿耕并在广州等城市，尝试开设农副产品专卖店，以社会企业[4]模式经营的店铺为社区基础，直接销售农村社区的生态产品，通过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化的意识转化，逐渐建立“农村—— 城市社区支援网路”，甚至扩大城市网络，与城市另类生活团体如素食团体、志同道合的社会团体如环保组织等结成合作伙伴，定期在城市社区举办“有机小市集”，一起摆摊、一起推广环保、健康、惠农的理念。

“消费者除了吃，还有责任，我们希望他慢慢变成会员，建立起消费者合作社。我想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过以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5]坚实的网络为标杆，张和清谦逊地反省：“我们承认城市消费者这一块，我们没有力量，最重要是我们没有人力、资源和经验。”

城乡联动的主体，主要是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我们从一个村走出去，把城市跟村连接起来，很多奇迹就会发生。米不断有人买，就有机会跟小农谈合作的重要性，谈不用化肥农药，谈村怎么发展，村子怎么规划，妇女怎么参政，跟养殖合作社的妇女谈村子要不要修路，谁来修？选举一个小组，大家一起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这就是乡村公共治理。”

“缘耕先在村里找出最贫穷及最被忽略的人，让社工住在村子里，陪伴他们成长，相伴同行，一起思考，一起对话，慢慢改变。大陆的每一个村，每一个社区都是两极分化的，村里的穷苦人被大户看不起，甚至被大户剥削。秉持弱势优先的工作原则，我们通过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或访灾问难，先把最‘弱势’的人群拣选出来，然后通过个案、家庭、小组工作等，把这些底层民

慢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变成合作社后，目标是通向自助与互助的能力建设。当一个乡村出现另一支民众力量的时候，乡村的权力关系就在改变。 我们广东乡村的妇女刚开始连话都不敢说，现在面对民政部的司长的时候，都会介绍乡村旅舍。社会工作就是相信，每个人都能改变。”

“守住社区，做社区和社区支持网络，一个社区改变了，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大陆的社会就是这样，能够通过社区推动社会变革。从底层长出来的，自下而上的生活化的社会运动，就是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做起，在社区开花结果。”张和清说。

1.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介见附录一。
2. 因全球金融海啸导致消费性电子产品外销需求急速衰退，中国政府于2008年底宣布家电下乡，以扩大内需。按照规定，全大陆非城镇户口居民购买彩色电视、冰箱、行动电话与洗衣机等四类产品，补贴产品售价的13%，最高补贴上限为电视2,000元人民币。
3. 随著中国城市化快速的发展，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数量剧增，留守农村的妇女、儿童、老人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特殊群体，被戏称为“386199部队”(38妇女节，61儿童节，99重阳节)。
4. 参考见附录二：“社会企业”。
5.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简介见附录一。

当代中国的新乡村建设

※ 何志雄、张兰英、温铁军

作者何志雄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督导，张兰英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为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1]在全国各地兴起。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并转化为无数仁人志士的行动。随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当代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2]，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显得愈发深化和严重。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妇人之仁”且秉持历史先贤乡村建设理念的知识分子再次提倡新乡村建设运动，并激励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参与进来，历经十余年的艰难探索和发展，时至今日，影响甚众。

尽管新乡村建设运动为社会展示了鲜活的城乡互助案例、丰富的乡土实践经验以及多元化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但浸淫于发展主义久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此仍无法公正平和地反映，而受困于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界也未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纳总结。

作为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参与主体之一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理解自身实践行动并建构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仍然需要清理自身思想中的余毒残渣，反思“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

一、新乡村建设实践简述

新乡村建设运动，缘起于80年代中后期参与中央政府农村政策调研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虽然试验区在90年代初逐渐衰微，但留下了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深入开展“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经验教训。在九十年代后期一系列政策变化造成社会矛盾复杂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在世纪之交接受了“三农问题”，随之强调为国家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于是，就有了“税费时代”[3]下，民间社会有组织的开展支农调研维权行动的外部条件。

这种支农活动最早在2000至2001年出现，当时只是几家学生社团的零散下乡，主要是进行农村一般调查、生活体验、短期的支教和法律宣传等。2001年以后，一方面是《中国改革》杂志社介入，客观上成为推动高校大学生支农活动深入开展的平台。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为缓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造成的失业压力，扩大规模推行教育产业化。四年之后，学生陆续毕业，“毕业即失业”，高校青年前途渺茫却无以自救，遂使更多学生寻求另类思考和探索另类出路。由此，大学生开始通过下乡调研，借助《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平台帮助农民维权。大学生支农行动得到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回信支持，推动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受此影响，纷纷走出校园，参与下乡实践，了解社会，关注现实，塑造自我。

2004年是个乡建工作内容发生变化的年份。一方面客观上发生了《中国改革·农村版》被以资为本的改革主流关闭，同年乡建平台也从杂志社转移到中国人民大学。另一方面，免除农业税的国家政策开始实施，以“多予少取放活”[4]为内容的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随著社会宏观背景的转变和运作平台的调整，新乡村建设运动转向以培训农民合作社和建设推广农民组织为重点，亦是对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提倡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实践探索。

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转变，一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农民上访维权代价奇高却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二是国家已经开始免除农业税费，以往20年期间积累的很多基层矛盾相对化解。从此，大学生支农也不在农民上访维权上协助用力，而是借助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5]各项惠农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谋求发展。那些因维权而走到一起团结起来的农民，顺应形势开始纷纷转变为建立合作社，探索各种基于农民自我组织的自主发展模式。尽管那时外部环境不利，国家还没有出台鼓励农民合作社自主发展的法律和优惠政策，但经过新乡村建设志愿者[6]们几年的努力，各地合作社也总结出一些操作经验，如“文化建设收效最高，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等。同时，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志愿者们也组织免费的农民培训班推广“生态农宅、有机农业和环保农村”。

2005年，乡村建设志愿者确定了在工作中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简称3P。3P指人民生计为本（people's livelihoods），合作联合为纲（people's solidarity），多元文化为根（people's cultural diversity）。秉持3P工作原则，就能够实现3S，即可持续的社区资源主权（sovereignty）、民众合作联合（solidarity）和生态安全（security）。并且开始借助农民合作社实践传播“公平贸易”的国际经验。新乡村建设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按照公平贸易理念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在国际社会有所反映，在海内外逐渐形成影响。同年，组建了以既往乡建工作为内容的“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2006年以后，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成四大系统：发展高校大学生社团促进志愿者下乡支农、建立合作社和各种社会组织维护农民和乡村弱势群体的权益、建立新市民服务中心帮助流动打工者融入城市、发动市民加入公平贸易促进社会参与城乡互动网络。

其中比较新的、影响较大的工作，是第四个系统，重点在于推动基于农民合作社的生态农业试验与城乡互助探索。出现这个转型的主要背景有三个：一是在中国现有市场经济结构和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分配制度下，单纯的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农民的帮助有限。二是政策环境利好，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2006年提出“农业多功能性”观点，2007年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和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8年提出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三是社会需求迫切，就在同时期，社会普遍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推动了新乡村建设运动向生态农业和城乡互助探索转型。

其中，2006年国仁绿色合作社联盟（简称“绿盟”）由七家探索生态农业的农民合作社联合成立，旨在搭建生态农产品的销售平台。2008年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采用社会参与农业（CSA）模式经营的农场。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些先行尝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上大致反映了新乡村建设运动12年来多样化的尝试。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大学毕业生这样一个参与主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青年人的培养和成长，他们在不断的实践碰撞和自我反思中，逐步理解乡土社会及其自身参与乡建的行动。而乡村建设真正的主体是农民，这是一个规模巨大但又沉默的群体。

从上一次乡村建设运动到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完成工业化并正处于不可逆转的金融资本化趋势之中。青年知识分子如何从全球化资本扩张以及中国工业化历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数量巨大的村社农民，将是他们在未来的乡村建设过程中能否与“沉默的”农民融为一体，激发农民共同成为乡土文化复兴主体的关键。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三农”问题

中华民族以灌溉农业为主流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根据考古发掘，中国人7,000年前就驯养了野生蚕；6,400年前驯化了野生稻。因此，我们是以灌溉农业为主，并由此养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群体基因的文化内涵。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中，中国氏族部落的聚居社会就因不断向多样化的农耕文明进化，逐步发展成以“村社共同体（village-community）”为家族载体的小农经济社会。

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大体上世世代代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性财产，逐步形成了建基于其中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这种东方农业文明中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内部化处理合作交易成本和降低外部风险。这极大地不同于西方人历史上所表现出的“个体理性”和“资本理性”。如果对比欧美和中国的历史博物馆，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大规模杀戮的场面做过艺术表达，表明中华不是一个对外掠夺、扩展的民族，而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反观欧洲的壁画，乃至于雕塑、地毯，很多艺术品都在刻画战争。这也表明了一个客观事实：欧洲的长期分裂导致的战争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没打完，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是19世纪中后期才成为统一的政治国家。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由秦国完成统一，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直到近现代，中国人先是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后是参照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模式发展“跟进型”工业化；这些外部强势物种进入乡土社会，才使得村社共同体遭到彻底衰败的危险。于是乎，新乡村建设早在20世纪初叶就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1世纪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都因处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之中，而获得了空前机遇。其间的重大转折在于：中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七十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导致中国在亚太领域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上升，完成了对以往“偏军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若不能像其西方宗主国那样，透过搞殖民化掠夺来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的产生。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人口与资源关系相当紧张、农民高度分散、资本绝对稀缺的国家。随1950年冷战中爆发的朝鲜战争对中国工业化的强烈需求，国家采取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客观上促使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形成和延续，一方面有助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从农村集体提供剩余，另一方面农村集体则成为承担城市产业资本积累过程中遭遇经济危机时转嫁代价的载体。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7]，是将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20年里总计约2,000万在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劳动力，下乡到约九万个人民公社所属的约80万个生产大队的400万个生产队去“插队”的过程。而除此之外，还有大致相等规模的农村中学生（属于不列入政府就业统计的“回乡青年”）回到两亿社员农户家里去“插户”。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大陆型的农业国家，依靠此种真正的“比较优势”，成为全球唯一不留下“外债后遗症”而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最为难得的是：没有向外资出让或抵押本国资源主权。

当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再次遭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且表现为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时，在没有毛泽东无限威望号召青年人“上山下乡”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从不经济的农村领域退出，遂有人民公社被解体。

与此同时，与1950年完成土改以后城市危机得以缓解的情况类似，农村实行“大包干”[8]，农民再次恢复了村社小农经济。

但，这也是一次“政府全面退出不经济的三农”……自1984年全国推进集体化解体的同时，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从10%以上下降到不足3%；连同政府基层管理部门和人员经费在内的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农业生产方面的公共服务的各项开支都“摊税入亩”落到农民头上。只是这一次的客观条件不同：人地关系更加紧张，且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进一步固化。

这个时期利益上与农村相对立的大趋势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城市经济在完成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后，必然会进入到产业资本的调整和扩张阶段，占据主流话语权的城市产业资本利益群体，遂根据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要求相应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产业资本进一步要求农村继续成为提供剩余的来源；对外，则利用冷战终结后金融资本主义统一“两大阵营”市场的时机，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出口创汇，开放沿海引进外资。

直到1993年，中国再次遭遇“三大赤字”[9]的特大经济危机时，农村随即成为承担危机代价转移的“重灾区”，不仅农产品价格连年大幅下降，而且财政捉襟见肘、人员臃肿的地方政府，以强行征收各种不合理税费的方式剥夺农民。也因此，1996年“三农”问题被政策研究人员正式提出，但没有被接受。

随著金融全球化愈演愈烈，资本从核心国家自由流动到外围国家攻城略地攫取利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各种外围地区相继发生金融危机；也埋下了最终反制核心国家过剩资本的隐患。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自此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中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融入到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生产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也从内向型积累自我发展的模式，转变成出口导向型经济，过渡依赖外资外需。原本中国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就是以军重工业为主，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基本经济规律作用下，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城市保障体系之外，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一开始就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在随后的多次重大改革过程中，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使然的各级政府均选择了“排斥农村”的政策内涵。处于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中国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输入型通缩”经济危机时，在产业资本集体的要求下，以大规模的投资城市化基本建设拉动经济的发展。

整个九十年代，国家如此偏重于城市的政策，令八十年代因允许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显著缩小的城乡差别趋势逆转，不仅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也拉大了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三大差别加剧势必造成内需下降。于是，中国经济迅速转变为外需拉动。

由于沿海地区成为这种外向型经济的重心，于是，内地农村三要素：资金、土地、劳动力，被资本大量持续抽离进入城市，为依托城市的外部资本贡献剩余价值。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不断的去组织化，对城市资本的剥夺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力。这种对农村掐“草尖”式的剥夺，留给农村的是几亿的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由他们生产经营的农业必然会转变成节约劳动力的化肥农药农业。面对强势的资本，分散的小农农业相当弱势，农村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正规劳动力基本上都选择外出打工。

中国传统的“粮猪型”种养兼业的循环经济以亿万农户为载体，很大程度上是“半自给自足、半商品化”的，能够实现户内均衡外部市场风险。近年来随著全球化危机的爆发，粮食饲料价格的剧烈波动，稳定的传统“粮猪型”农户经济也基本上解体，农户养殖业变得极为不合算，市场风险极大。目前，如果仅仅单纯依靠农业收入，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是破产的，他们必须一手依靠打工收入，一手依靠农村提供的居住环境。遗憾的是，国家多年来对“三农”领域的欠账，已经使得农村不再有适宜的居住环境，无论是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还是传统农村社区文化的失落。

三、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再认识

中国6,000多年的农业史从来是生态环保的，是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境安全型的，因而是可持续发展的。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性，以及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

最近30年来，在以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倡导农业现代化，要让有限的资源来为农民增收，其结果是农业的化学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使农业变成立体交叉污染最为严重的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双重负外部性”，乃至于食品不安全。传统农业是自然过程合一的，不会造成污染，是创造正外部性的，但经营者可能收益低下；现代化的农业可能给个人带来高收益，但是必然造成污染，代价由全社会承担，造成负外部性问题。

以往，主流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逻辑认为传统农业是落后的代表，甚至说成是封建专制的基础，在现代化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若将传统农业与石化农业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的生态多样性以及文化多元性，它为社会带来的整体正外部性，表现为生态平衡、环境秀美、食品安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多功能性。农业本身的家庭分散经营在资本据其标准化、信息化、统一化优势而主导的市场里，必然是弱势的；同时，大部分的资本工业企业都会在获取自身利润的情况下带来整体社会的负外部性。

鉴于此，政府有理由通过对资本的税收转移支持乡村建设，这才是对全体人民的负责。

中国几千年来，除去因天灾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导致的战争破坏之外，小农村社社会一般都是平和稳定的。他们的社区生活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完全不需要为了生计而对外侵略殖民，他们大部分时候喜欢保守而安于现状。由此，中华民族为人类历史创造了无数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

正如前述，中国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依然成功实现工业化，而这也有赖小农村社发挥的独特作用。中国在工业化的各个阶段均遭遇过外来投资中辍或者资本短缺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农村村社多次起到承载并最终化解城市资本转嫁代价和成本的作用，避免了国家的动乱。而小农村社之所以能够起到化解外部风险的作用，必定有其内在的基因机制。在当今全球资本化的动荡年代，国际金融资本频繁转嫁危机的时期，一向被低估、被抛弃的小农村社制度所具有的某种优势，非常值得重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小农村社及其内在的“村社理性”。

中国地处大陆性季风气候带，水利是以地表灌溉为主的农业的命脉，而水利灌溉尤其需要上下游的接续与社区内几乎所有成员的合作和协调。因此，中国农村历史上就存在多种多样的合作经验。村社共同体，就是这些合作的一个基本单元。村社理性是乡土中国异于西方典型理论模式的一个核心机制。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村社理性，主要体现在单家独户之外、需集结众家之力才能办成的领域，如治安团防和水利灌溉。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生产生活互助也构成村社理性的重要内容。

根据一些研究，清朝乃至民国时期农村社区中公田平均达到20%至30%，而且越是资源短缺地区公田比重越高，最高者达80%，这种患难相恤的合作对于维护社区稳定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工业化早期，村社内部通过资源整合获取全村收益最大化的例子俯拾皆是。

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八十年代，那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村社集体，大都有赖于农村改革前人民公社集体时期仍旧保留下来的村社理性机制，顺利完成资本积累而跨入到工业生产阶段，从而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在当今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案例中，最成功的农民合作社依然可以通过打造社员集体共有财产关系、组织社员文化及学习活动来重新构建内在“村社理性”的社区有效动员机制。这样的机制一方面能够内部化处理村社内部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化解外部市场波动导致的进入风险。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农民合作社能够做到进退自如，基础稳固了，可以随时抓住市场机遇尝试各种手工艺项目、生态农业项目、金融服务项目等等，一旦成功就有收益，即使这一次失败了还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争取下一个机会；相反，有的却进去了一旦遭遇风险，就再也起不来，被重新打回原子化状态。

从农村生活的长时段来看，村社理性无疑有助于社区获取此类风险收益，抵消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机会成本。这既可以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也有助于实现整体社会的稳定，并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四、金融化时代的乡村建设

2008年源于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内爆的金融危机，必将影响深远，既是加快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转嫁危机代价的步伐，也是全球资源进一步资本化以及社会关系金融化的同步过程。

当前的全球危机，严重影响著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面对这一全面危机，主流话语下单纯的经济调整无济于事，更会加剧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族群和宗教等社会冲突；不仅威胁人类安全，而且加剧已经造成的生态灾难。

我们正站在关键的历史交叉路口上。人类应该提倡生态文明及其内在的多样性文化，促进包容、公正的可持续发展。

诚然，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主流：中国人在19世纪被帝国主义肆意侵略而主要记载了对抗性斗争的成败得失；由此把一个时期的激进精英引领斗争当做历史主流，并且成王败寇地把这种主流经验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于是，这种被动应对西方中心主义强暴浸淫的过程不仅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正确，而且内涵性地具有价值观和批判标准。

相对主流历史及其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而言，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的一种“建设性的改良”，是更为久远的民间社会史的延续。我们应该继承乡村建设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并提高自主性和自觉性，特别注重发掘整理大众广泛参与的民间社会史，据此推进海内外的合作交流；这会有利于人们在全球资本化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大乱局之中，更为平和地理解“3P和3S”所阐释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更为自觉地维护“多样化为内涵的生态文明”。

近年来，中国两岸三地汇聚了海内外一些思想界的同仁，指导、培训了很多青年志愿者，在中国各地开展了体现社会渐进改良思想的、内容广泛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参与者何止成千上万。值得欣慰的是，这与中国在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新农村建设”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于2007年10月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思想，完全呼应。2012年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国家大政方针的背后，是全球危机发生前后连续多年对“三农”领域高达几万亿的大规模投资。某种程度上，这种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投资拉动，有效缓解了2008年以来国内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未来中国在资本过剩的压力下若走城镇化战略，恐怕政府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将会带动更大量的资本下乡。一直以来农村“三要素”净流出的局面会得到改变，这对乡村建设既是历史性的机遇，又是极富挑战性。

我们说当前这样一个全球资本化的时代，所谓的发展无非就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新乡村建设无非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3P”和“3S”的理念和原则，即社区资源主权（sovereignty）、民众合作联合（solidarity）、生态安全（security）；以此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sustainability）。我们希望劳动者可以组织起来，自主的利用本地的资源，创造在地化的经济基础。

结语

过去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海内外广大志愿者和下乡支农的高校年轻人通过协助农村留守群体、进城打工者和市民参与式生态农业的多样化社会资本建设，已经摸索出了一定的组织经验。这个期间，我们已经带动了20万高校青年参与下乡支农，培养了数百位驻村锻炼一年以上的青年支农骨干和几十名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乡建知识分子；此外，我们举办了数百次大学生、农民和市民多元结合的培训和会议，还安排了多个国际交流项目，主办了两次相关的国际会议和两次与发展中国家做知识分享的“可持续实践南南论坛”[10]。

最近十年的乡村建设已经发展成当代中国最有包容性的社会网络，构建了志愿者“自由进退”的参与式体系，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青年和城乡群众自觉地参与其中。这些都表明，乡村建设是非主流的社会试验：这个系统不是NGO，没有领导者、没有总部、没有专门经费……相对于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NGO组织必须的高昂制度成本，乡村建设这个扁平化大系统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

面对危机四伏的未来，我们更需要重视东亚社会在维持生态文明中形成的村社理性的积极作用，构建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的多方合作框架；同时，在拓展“生态农业互助网络”的渐进改良之中，进一步推动城乡良性互动的、参与式的社会农业（CSA）的发展；以及在恢复农村的广义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乡村建设，本意是生态文明立足之基的“乡村文明复兴”。从上世纪20年代的前辈们在开展乡村建设中提出“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到当代乡建志愿者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3P和3S，都有一个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共同点，那就是要在这个乡土中国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坚持“四自”方针：一是要走“自下而上”的道路，深入发动基层群众；二是探寻“自主发展”社会资本的方式，维护民生所赖之资源和环境；三是形成“自我赋权”的制度条件，提高与社会可持续权益有关的组织化程度；四是发展“自治管理”，充分依靠丰富的民间力量降低社会成本。

1. 由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运动，旨在建设和复兴农村和解决农民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农民识字，以开启民智，改变农民愚、穷、弱、私的弊病；另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则主张，中国建设必须走乡村建设之路。
2.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概念由本文作者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熔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并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
3. 自1990年代开始，税费负担过重成为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关系恶化，以及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为此，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税费改革大致分三个阶段：1993至2000年地方自发改革阶段；2000至2002年种样试点；2003年全国推开，直到2006年1月1日废止。
4. 根据吉林师范大学网站张贴的一篇文章：“多予、少取、放活”的在1998年10月中国政府提出的“三农”工作方针。“多予”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少取”是减轻农民负担。“放活”是从政策层面让农民的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搞活农村。
5.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将资源向农村倾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农村的特点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6. 义工，志工。
7. 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为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及加强农业生产，全国近20万名城市青年加入垦荒队伍。但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则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和就业。
8. 也叫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俗称。让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根据合同规定的许可权，自主经营，在扣除缴交国家和集体的各项费款后，其余归己所有。农民把这种方式概括为“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其好处是提高农民积极性，让农民也能分享劳动成果。
9. 三大赤字为：外汇赤字、银行赤字和长期财政赤字。
10. 第一届南南论坛在2011年于香港岭南大学举行，以可持续实践为主题，会后发表了题为“生态文明与人类安全”的南南共识。第二届南南论坛移师中国大陆的重庆召开，聚焦“粮食安全与食物主权”，探索可持续实践与包容性发展等议题。

附錄一

落地生根

社區支持農業經驗研習會

分享機構簡介

主办机构

社区伙伴

社区伙伴是一个社区发展组织，于2001年5月由嘉道理基金会创办及资助（经由麦哥利夫人所管辖的基金部分）。嘉道理基金会成立于1970年，创办人贺理士嘉道理爵士一直秉持“助人自助”的信念。

社区伙伴相信，每个人不管物资如何匮乏，都有权利和能力与别人、大自然以至整个世界和谐共存，过有尊严而可持续的生活。要维持一个和谐而永续的社区，人身心的健康至为关键。社区伙伴相信，社区要团结起来，反思社区与大自然的关系，重寻传统文化的根。

网站:http://pcd.org.hk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于本出版中简称为嘉道理农场）位于香港最高山脉大帽山（957米）北坡下。园内清溪汇流，翠林环抱，还有不少果园和梯田，以及各种保育及教育设施。

今天的嘉道理农场是一间独特的公私营合作机构。在1995年1月20日，立法局通过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公司条例（第1156章），嘉道理农场正式成为保育及教育中心。嘉道理农场虽为公共机构，但经费是来自私营的嘉道理基金。

自1995年起，嘉道理农场致力于推广香港和华南地区的保育及永续生活，并推行各类计划促进动植物保育和有机农业。

嘉道理农场的使命是“致力提高大众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透过保育和教育，积极改善世界”。

网站:http://www.kfbg.org

大陆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绿耕）为广东省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绿耕的前身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早期创办绿耕的师生于2001年已开始于云南少数民族行政村平寨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团队长期关注城乡社区工作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时绿耕在云南、四川及广东三省皆有社工服务。

绿耕的工作包括借助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平台，通过与当地村民一同开展乡村旅舍、乡村生活体验游、农副产品公平贸易、公平贸易店销售等项目，协助农民改善生计，从而实现社会互助、文化传承、性别平等、生态保育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网站：http://www.lvgeng.org

爱农会

爱农会于2004年由一群城市消费者在广西柳州成立。爱农会以社区支持农业的手法尝试团结消费的力量，在农村鼓励小农合作互助起来，发展土生农业；在城市则透过餐馆、社区农圩等另类行销渠道销售土生农法生产的健康农产品。爱农会十分注重年轻人的锻炼，积极参与实习生的培养，并鼓励他们在社区支持农业领域里自主创业。

对爱农会来说，土生农业是指运用传统知识及经验种植或养殖家传土生品种，不使用农药化肥及添加剂饲料；他们认为这样的农耕方法对乡土文化，生产，生活及环境的影响既友善又照顾，也是一种可以循环的农业。除了传统农法、土生品种的保育以外，近年爱农会也致力保护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比如说土面条、手作腐竹、打油茶、传统餐具等。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前身为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梁中心）自2001年开始组织大学生支农活动，于2004年在北京市正式注册为民间组织。梁中心以推进新乡村建设为核心目标，以推动农民合作和城乡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致力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文化研究、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和推进工作、大学生行动教育与新文化研究及其推广工作。

梁中心在全国各地建立新乡村建设试验基地，与全国百余所高校的学生支农社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组织大量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大范围的支农调研和新农村建设行动。除了青年人培养外，梁中心也致力在农村推广合作社与生态农业，并透过生态农产品为载体推动良性城乡互动。

网站：http://www.3nong.org

攀枝花和心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攀枝花市是一个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城市，而攀枝花和心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则位于攀枝花市盐边县和爱乡新华村，距市中心约50公里。社区伙伴2007年开始在当地与政府合作，通过农民田间学校、外出交流学习等推动生态农业技术及理念培训。2009年4月，参与到培训中的刘占红及另外四户村民发起成立攀枝花和心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结合本土智慧、运用生态友好的方式开始实践生态农业。

合作社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与城市消费者互动支持，包括蔬菜配送、作为指导老师支持城市农耕种植的技术培训、接待城市消费者农场拜访等。现在参与每周两次常规蔬菜配送的城市消费者有65户，同时合作社也提供蔬菜之外不定期的农副产品及蛋肉配送。合作社希望与城市居民建立互助、平等、相互支持健康生活。

绿心田 · 生活汇

绿心田 · 生活汇由四川成都河流研究会的核心消费者与项目人员共同创办，于2011年在成都成立，以更生活化的方式如农友饭局、农户讲故事、身心灵健康的分享等活动开展小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活动，增进消费者与小农户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

该组织认为最理想的方式是城市和乡村的弱势群体共建生活共同体，探索其可能性和组织方式。绿心田透过团购、每月一次的农友饭局和身心灵整体健康和生活智慧分享、每三个月一次的农户回访、半年一次的农友市集以及团购、妈妈厨房等活动，一方面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食物的需求，传递对本土农产品本身内涵的理解，又能建立消费者与农友的关联，推广“利己利地球”的生活理念，搭建促进消费者之间、农户之间以及消费者和农户之间相互学习和沟通的平台。

网站：http://greenheartland.blogbus.com

成都华德福学校

华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是起源于德国、在世界各地已有90多年实践历史的一种完整而独立的教育体系。华德福教育以人为本，以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用健康、平衡的方式，追求孩子在意志（身）、情感（心）及思考（精神）三个层面能力的全方位成长。成都华德福学校为中国大陆的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学校现在已发展为幼儿园、小学、成人培训中心和活力农耕四部分，校园面积近30亩。

由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成都华德福学校像很多华德福学校一样都把农业劳动结合在学校的基本生活里。除此以外，成都华德福学校的师生与家长会直接从周边的生态农户购买食材，共同购买外地的有机或生态产品，也曾在学校举办小市场、针对老师与家长进行消费者教育活动等。迄今为止，华德福一直是成都以致全国其他地方社区支持农业的主要推动与参与群体。

网站：http://www.waldorfchina.org.cn

台湾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由一群关注生态农业和三农问题的消费者志愿发起，旨在搭建一个平台，让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能够和消费者直接沟通、交流，既帮助消费者找到安全、放心的产品，也帮助农户拓宽市场渠道，鼓励更多农户从事有机农业。市集现在以社会企业的形式经营，通过线上线下的媒体与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互动，并且通过讲座、聚餐、农场拜访等形式传播可持续农业的理念和实践，加深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

自2010年9月以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已经举办了100多届，直接服务农户和生产者超过40家，而通过同行网络市集也服务到全国各地农友100余户。刚开始时市集每周一场，现在因需求增加已办到每周两集、并开有网店与实体点以服务更多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市集上，消费者和农户除了有更多交流，各取所需之外，主办方也会因地制宜地组织一些活动，如儿童自然教育、亲子活动、庆祝传统节日（如端午和元宵节）、特殊纪念日活动（如世界粮食日、环境日等）。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918547924

微风市集

微风市集创立于2007年，最开始时是由高雄政府推动下举办的农民市集。后来当面对经营困难时，部分农夫主动提出组织自治会，著手准备农夫们自己去营办市集，并最终于2009年成立高雄县微风市集志业协会。协会设有监事会、理事会等架构，除了每月例会外，还不定期召开会议，商讨与市集相关的大小事项。微风市集是目前台南最大型的农民市集，也是台湾少数由农民组织、自给自足的案例。

微风市集以照顾小农、维护食物安全、坚持对土地友善及实践社区友善互助为宗旨，强调的理念包括“对土地友善”、“健康的/学习的”、“不恶性竞争”、“利益回馈社区”等。微风市集希望为在地农产与加工品提供销售渠道，也强调市集是生态农夫直接贩售农产品及与消费者交流的平台。现在微风市集每周末在高雄共有四场市集，并设有“绿色活力厨房”、“汗声学堂”等都市居民与农夫交流的常设活动。

网站：http://blog.breezemarket.com.tw

台湾农村阵线

为回应于2008年年底出台的《农村再生条例》，一群关心台湾农村的农民、农村工作者、NGO、媒体工作者、学者、作家、法律专家、工程师、艺术家、学生等以社群网络的形式相互连结，成立台湾农村阵线（简称农阵）。农阵秉持著“小农经济”、“永续农业”、“粮食主权”等理念，以其多元背景的成员，利用不同行动形式，从理论论述到实际的农村农务，唤起台湾社会正视农村的多元服务价值，立定在这块土地上永续生存的决心。

为此，农阵开展的工作包括农民组织、农村田野调查，并在网络发起农村议题的串联行动，透过媒体持续与社会展开对话。同时农阵坚持小农耕作，致力推动适地适种、多样生产、在地经济、合作协力的小农经济、小农承载的技艺与多元社会文化内涵，丰富厚实农乡社会，连结城乡关系。除了投入各样农业议题的探索，农阵也展开了与国际连结的活动，并积极的引领年轻学子投入农村工作。农阵也参与农民之路(La Via Campensia)的活动，学习各国的农业运动经验与农法。

网站：http://www.taiwanruralfront.org

合朴农学市集

位于台中、开始于2006年的合朴农学市集（简称合朴），是一个由农友、志工与消费者所组成，支持有机耕种的公益组织，希望透过合作，推动社区支持农业，以当地的生产资源满足当地的需求。合朴相信一个万物众生和谐相处、生态永续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美好生活的起点与根基。合朴希望透过一群人的交流切磋、互助支持，共同实践“合作、简朴”的生活，并推动与建立一个互助互惠、自给自在的小而美社群生活新形态。

除了举办每月一次的农夫市集以连接农夫与消费者以外，合朴也创造了多样化的学习可能，包括“好好务农”课程、“好好吃饭”系列的“豆腐农艺”课程、在合朴教育中心和公田的学习、“星期二沙龙”等。为了让一群理念相近的伙伴，以互助合作的形式组成自给自在的社群，合朴推出社群货币、部落（即以不同主题组成的小组，例如市集经营、推广公平贸易咖啡等）经营、学员志工社群经营等组成的合朴幸福学课程给农友、志工与消费者，以建立一个共有、共做、共享的幸福新社群。

网站：http://www.hopemarket.net/home

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

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简称旗美社大）由钟理和文教基金会承办，于2001年3月创校开学，为台湾第一所“农村型社区大学”。开办以来，以“向农村学习，让农村学习”为方针，并以“农村是一所学校”为发展目标。旗美社大扮演“学习 · 组织 · 结晶”平台，将学区内的九个乡镇视为合作伙伴与办学资源；除了以课程服务社区民众的“学习”平台外，亦积极创造社区的“组织”平台及结晶农村价值的“纪录”平台，透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串连旗美内部与外部社群，让“农村意识”得以在社会扎根。

除课堂教学外，旗美社大过去十馀年在社区的耕耘，积累了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在教育、生态农业、社区文化、网络搭建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及论述。旗美社大自2002年开始每年定期举办农村工作坊。2006年开始开办“农村远景会议”，希望把经年对于农村议题关注和实践累积的概念和行动经验，作进一步研习；并透过组织合作的方式予以推展，共同致力建立农村发展工作与城乡合作交流机制，以维护农村作为人类重要资产的承传和发展。

网站：http://cmcu.ngo.org.tw

穀东俱乐部

赖青松于2004年选择成为专业生态稻农，于台湾宜兰创立了穀东俱乐部，开创“预约订购、计划生产”的新型态农业产销模式。俱乐部在全台湾召募“穀东”，以预约订购付款方式认购一年田间的收成，赖青松自己担任“田间管理员”，为穀东们种植安全的作物。穀东每月会收到现碾的米；俱乐部全程公开田间资料，并随时欢迎穀东来访，重建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友善连结。

除了耕种及与穀东的联系以外，俱乐部定期会举办像绘画班、食物工作坊等不同活动促进穀东们的互动。为了守护宜兰被弃耕的农地，穀东俱乐部2013年开始尝试集体购地以供信托的方法，让穀东俱乐部以及其他希望尝试友善耕种的农友有地可耕。与此同时，赖青松也支持一批关心农村的年青人在宜兰学习种地，成为“宜兰小田田”的指导老师。

湾宝社区发展协会

2002年位于台湾苗栗的湾宝社区启动了社区营造的计划，因为想把社区经营为生态村而与主妇联盟建立合作，种植有机西瓜。2007年政府因为科学院的开发案要求征用土地，本身也是本地农民的湾宝社区发展协会主席洪箱大姐联通乡里以及社会各界积极抗争相关安排。

与政府展开长达四年抗争后，湾宝社区在得到广泛社会支持下于2011年成功挡下开发案，让湾宝地区的农田免于工业区开发的威胁。抗争成功后，湾宝人文艺术工作室发起“随波逐稻”计划，号召上百个家庭一起到湾宝种稻田，不仅能解决农业生产中农民难以突破的销售问题，还提倡完全无毒和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不洒农药与化肥。湾宝社区发展协会在湾宝抗争案子过后继续关注区内的土地征用以及农业发展，希望引起社会大众对台湾农乡的关注。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

1987年初，一群主妇有感于社会型态的急遽变迁，决定行动起来，改变周遭种种环境和教育问题，以“勇于开口，敏于行动，乐于承担”，要从自己做起，改善环境，提升生活素质。如是，主妇联盟诞生了。1989年，成立财团法人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期望以绿色消费，来守护土地和家园，并于1993年试办共同购买，直接向农户订购米和葡萄，这是合作社的雏型。

2001年主妇联盟中共同购买的功能从原有组织独立出来、正式创立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是台湾首个自发性的主妇生活消费合作社，社员都是合作社的股东，共同集资、合作思考、组织消费力量，同时游说农民和生产者，生产符合生态环保与家庭健康的产品。每位社员都拥有同样的权力与义务。合作社的理念是“珍爱环境资源，支持本土农业，力行共同购买，实践绿色生活”，并推广及发挥合作社精神。2013年合作社社员人数约5万人，与台湾约110位农友及六个产销班合作，为社员提供了600多种产品。

网站：http://www.hucc-coop.tw

香港

长春社——“禾·花·雀·塱原生态农社”计划

长春社为香港的环境保护团体，关注包括自然保育、文化保育等不同议题。2000年前后因香港一铁路开发方案的倡议工作让长春社介入到塱原这地方。塱原过去是种植水稻的基地，是现时香港鲜有未被发展、维持湿耕水田种植的平原，有无数野生雀鸟、两栖类生物在此留守、栖息，是本土重要的生态热点之一；塱原的生态价值与水田农业互相紧扣。

长春社近年于元朗塱原推行“禾·花·雀·塱原生态农社”计划。该计划邀请城市居民每年付费成为农社会员，支持塱原本地的农夫以传统、生态的方式种植水稻。会员除了可以分享水稻收成以外、也可以参与农社举办的不同类型体验计划。与此同时，农夫的生计得到一定保障，野生生态也因水田农业的继续运行得到保育。

网站：http://www.cahk.org.hk/lvecopaddy.htm

土地正义联盟

土地正义联盟是一个由关注不同土地议题的组织者及社群组成的团体，积极支持各区反迫迁及保育运动，推动本土农业和社区经济的发展及研究，培养新一代的民主社区营造者。该联盟有六大主张，包括城乡共存共生、保育生态环境、捍卫居住权利、打倒地产霸权、结束官商勾结及落实民主规划。在过去数年反高铁及菜园村保卫运动的基础上，土地正义联盟在菜园新村座落的八乡地区推动了地区组织八乡绿色生活社的成立。

八乡绿色生活社推动区内居民强化生活上的连系以重建社区、保育生态及复兴农业。现时生活社的工作包括菜园新村的社区营造工作，每月编印《八乡锦田地区报》，推动“八乡人食八乡菜”的地区蔬菜运销计划（包括以菜园新村农业先锋队为首，带动附近农户进行有机耕种），以及定期举办面对香港公众的各类型社区活动等。

网站：http://landjusticehk.org

土作坊

2007年圣雅各福群会社区发展服务部得到香港政府支持，以社会企业方式运作一项绿色生机店的项目，并于2008年正式将店铺命名为土作坊，寓意“身土不二”、“根连土地”、“人人平等”、“手作生产”、“街坊共营”等理想。从成立开始，已有超过30名街坊参与过店铺的营运、生产及管理。

土作坊和香港本地九家有机农场合作，消费者可透过土作坊定期订购本地生产的健康疏菜。除了蔬菜外，土作坊亦有寄售20余种对环境友好的干货，包括粮油、清洁用品等，让消费者有更多生活选择。由于店内有加工的设备，透过与有机农夫、公平贸易商铺合作拿取食材，土作坊会于店内根据时节加工不同的食品（例如中秋月饼、圣诞姜饼、新春年糕等）。土作坊的运作中结合了社区货币（时分卷），不管是对农友与街坊劳动的酬劳、还是消费者购买产品都可以以现金与时分卷结合付费，希望探索一种减少对现金及主流经济依赖的社区经济体系。

网站：http://greenshop.sjs.org.hk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

小组负责人李启娟在2002年参加了嘉道理农场的“有机大使”计划，得以与有机食物结缘。2003年开始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尝试推动共同购买，并于2004年正式与大埔运头塘仁爱堂社区中心合作、借用其场地，开始了八年有多的大埔共同购买小组运作。小组没有得到任何资助，运作靠义工支持；小组强调与本地生产者建立公平、友好的合作关系，支持本地安全生产的生产者，追寻可持续的生活之道。

迄今已有约700人次曾参与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现今约有50至60名活跃的组员。为顺利分配农友送来的蔬菜，小组每周四都需要八至十名义工到社区中心协助诸如布置场地、收菜分菜及收银核数等工作，八年下来曾协助小组运作的义工约有50名，现时的核心义工则有15人左右。新参加的会员必须参与一次共同购买分享会，以确保她们认同小组的理念；除此以外，小组亦会定期与会员探访农友，增进彼此的了解。

小组博客：http://1613.mysinablog.com

附錄二 词汇

城乡共好 / 城乡互助 / 城乡协作 / 城乡连结

这是与城乡二元对立观相反的发展观，著重城乡之间的共同发展以及互惠互利。许多地方在追求城市化及经济增长时，不管在政策或资源分配上都以牺牲农村来支持城市的观念，农村迅速被“发展”成为城市，农民随之失去生计。农田减少，粮食自给自足率亦下降，农村传统文化丢失。此外，城市化对天然资源造成破坏，危及人类的生存及延续。

城乡共好/互助/协作/连结等理念，提倡农民与城市居民相互依存互利共享的关系。城市和乡村居民通过不同层面的合作和协作：例如参与劳动、健康消费等等，共同建构一个更可持续、对环境友善的生活。农村不再是城市的附属品，其存在与城市同等重要，城乡互动，不单是货物的流动，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流，以及相互的理解。

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一词，最初只是指一种农业技术推广，以至后来改变了全球农业的方向，逐步走上依赖石化原料等外来投入的生产模式。20世纪，西方国家大规模投资农业科学研究，导致农业产量戏剧性的突破。现代化种植模式、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加速了提高产量的进程。

六十年代，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将这种农业模式，通过高产品种，与化肥、农药、灌溉的扩大利用相结合，推广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区，导致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威廉姆于1968年第一次用“绿色革命”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农业大发展的现象。

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在哲学上强调“与自然相和谐”，是一种兼顾维持土壤、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原则以生态规律，照顾本土生物多样性为本，绝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及转基因物质。在考虑农业生产的同时亦顾及社会公平及良好的生活质量。有机农业的概念其实源自于中印等国家的传统农业，以及西方的生物动力农耕。在四十年代的时候，经一些土壤科学家整理后提倡，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的农业运动方向。

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本质上跟有机农业接近，同样是基于传统农业中“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及以本土生物多样性及自然资源作生产基础。但是，生态农业更强调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性。生态农业与有机农业两种方法的提倡及实践者拥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也会一起合作。

中国对生态农业还出现一种独特的理解，泛指八十年代由政府跨部门推动的生态农业示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结合，著眼于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利用、及解决农村能源短缺等问题。

永续农业

“永续农业”是Sustainable Agriculture一词于台湾普遍流行的翻译，指一种农业系统，展现了人类劳动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关系，强调农耕生产关系与人类长远发展，以及自然资源使用的协调互动。基于这些思考，“有机农业”、“小农耕作”等农耕方式被视为最主要的方法，同时为了避免远端粮食供应运送所耗用的大量石化能源，永续农业强调缩减“食物里程”的重要性。

永续农业是当代人类反省工业发展、都市文明所形成的能源耗竭、极端气候、社会解组的反思，强调在地供应的永续农业，避免受制于少数垄断的国际农粮体制，并且脱离能源、人口等复杂难题所引发的粮食危机，透过在地食物供应支持和稳定民生。

无公害食品

无公害食品是中国大陆一套食品安全的监督系统，指有毒有害物质控制在安全允许范围内，符合《无公害农产品地方标准》的农产品，或以此为主要原料，按无公害农产品操作规程加工的食品。无公害食品是政府于九十年代初设立，针对当时农业现代化后，农产品上残留过量高毒化学品的问题。

粮食安全

根据1996年世界粮食高峰会（World Food Summit）的定义，粮食安全的意义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能实质且有效的获得充分、安全且营养之粮食，以迎合其饮食及粮食偏好的活力健康生活。”针对这个粮食安全之定义，其中合共包括六方面的要素：任何人，任何时候，充分，安全，营养和偏好。

粮食主权

粮食主权最早是于1996年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率先提出的概念，主张“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自己的食物”，由各地方决定本地的农业生产及相应的政策，以及保护本土的文化与环境的权利。农民之路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由世界70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农民运动。

粮食主权后来逐步形成一场民间全球农业运动，提供一个平台，挑战全球化和工业化粮食体系下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质量安全、贫困饥荒等等，强调本土与基层实践的力量以及社会正义。

绿色消费

早于七十年代末德国便开始有绿色消费的主张，随后环境运动相对发达的欧美、日本等地开始了相关讨论及倡议。绿色消费一方面提倡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减少对环境的伤害，同时亦鼓励消费者透过消费选择，推动产品的生产者保护环境。

及后绿色消费开始备受质疑，原因包括绿色消费只提倡消费者消费得更好却不是指出消费者应减少消费，而且环境友善的产品大多因价格高昂而成为有能力的消费者的消费风潮；不少例子更发现污染企业花更多精力打造其绿色形象而不是真正的采取行动，绿色消费仍然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却忽视了主流市场与环境破坏间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

21世纪伊始绿色消费慢慢从只关心产品的品质扩展至对生产方式、生产者、贸易方式的关顾，进一步与劳工运动、公平贸易运动有所结连，慢慢发展出道德消费 (Ethical Consumption) 运动。

返乡

“返乡”一词常用于中国大陆，指一群人离开城市，返回农村生活，可以指返回自己的家乡，也可以返到别人的家乡。这群人希望返回自己的家乡/农村生活，为其建设出力，推动其发展。在返乡的人群中，有一群不容忽视的新力军，就是近年在中国大陆逐渐冒现的“返乡青年”。

与政府助推的大学生村官或西部计划等项目不同，返乡青年更多源自自发主动的个体选择，逐渐得到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团体的关注或支持（如本文集谈到的梁漱溟乡建中心、柳州爱农会等），呼应近年的民间“乡村建设”运动。

进乡

2009年，台湾的农阵在美浓集结全台各地关心农村的青年学子，在三天两夜的培训和讨论反思会议之后，四散到台湾各地的农村进行访调。2010年，农阵动员来自各地的年青朋友，一起到农村实地进行草根调查工作。农阵用“进乡”一词来形容他们的调研，而不用“下乡”，因为“进乡”是有进入之意，是一种看城市与农村为平等的意思，而“下乡”则包含城乡地位高低之分。

“进乡”与“返乡”不同之处是在于“进乡”是短暂性进到农村生活或作研究，事情完结后，参与者是会返回城市生活；而“返乡”是指长期返回农村生活，把居住地迁移到农村。

社区营造和社区大学

社区营造是台湾政府自1965年开始推动的社区发展政策的核心理念和措施。这个名词正式在1994年出现，当时名为《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企图从“人”、“文”、“地”、“产”、“景”等面向切入，由外部政策带动“由下而上”、“民众参与”、“社区自主”、“永续发展”等运作原则与方式，培育和凝聚民主社会下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

社区大学是在社区营造政策下应运而生的。理念上是由县市政府主办，并由对地方经营熟悉的在地团体或大专院校经营。强调透过居民共学，达到学院知识解放与推动公民社会的目的，并同时让地区人士慢慢凝聚成一个新的生活共同体。由1998年成立了全台湾第一所“文山社区大学”之后，至今，已有83所社区大学在不同县市成立。

社群 / 社区货币

社群或社区货币是社群（即拥有共同身份的人群）或社区（地缘意义上的社区）为促进主流经济以外的经济活动所设立之另类交易系统，它可以呈现为印成钞票的货币或电子货币等不同形式。

社群或社区货币的设计，乃希望改造以资金积累为目标的现代货币体系，重新创造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货币和贸易关系，藉此扩大在地资源和就业机会、确保资源留在社区之内，并重建有别于消费主义、增长主义的价值。

消费合作社运动

消费合作社是由消费者携手合资、共同拥有及经营、民主管理的经济实体。作为经济实体，消费合作社不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标，而是要推动社员互助合作、回应社员的需要为首要目标。消费者合作社涉猎的经营范围可以很广，比如共同购买、食物供应、零售货品、住房、小额信贷等。除了服务社员外，消费合作社很多时都会秉承社会目标，比如追求社会公正、支持环境友善的生产者等。

消费者合作社运动源起于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的扩张严重影响了工人们的生计，于是当时的工人运动及社会运动组织者便尝试以推动消费者合作社运动作为回应的其中一种策略。

社区经济 / 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有时被称为“团结式经济”(Solidarity Economy) 或“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泛指一些在主流市场以外、挑战主流市场资本运作逻辑的另类经济实践。社会经济运动提倡以下的价值观：一、重视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反对经济活动只为个人利润及资本累积服务；二、经济公义与社会平等；三、注重合作及互惠互补；四、生态及环境的保护；五、参与者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六、多元发展及多样性。

社会经济的实践五花八门，包括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公平贸易、社会企业、社区货币、良心消费、集体购买、社区支持农业等等。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的“资本”（传统经济学视资本、土地和劳动为三大生产要素）演变而来的，“资本”首次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包含广义的、抽象的内容。意指处在网路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为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是透过社会网路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从英国兴起的企业型态，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它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社会力量，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或是企业本身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存在，利润需要用于相关或不相关的社会机构或事业，不是为了股东或者企业的拥有者谋取最大利润而运作。

今日，社会企业有了更广泛的含意。在英国，如何使用利润是区别社会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关键。在北美，重点在于营利以及解决社会问题。在欧洲则倾向强调“社区共有”，与“私人拥有”区分。

落地生根

社區支持　　之甦動

出版者　：社区伙伴
地址　：香港九龙佐敦西贡街20号志和商业大厦13字楼
电话　：(852) 2458-0011
传真　：(852) 2430-7099
网址　：http://pcd.org.hk

编辑委员　：邓文嫦、陈宇辉、林志光、萧依萍、陈惠芳
执行编辑　：陈惠芳、周玉珠
设计　：earnes
书法　：邓伟文
出版日期　：2014年3月初版
初版数量　：3,000本
国际书号　：978-988-99943-4-1

版权所有@2014社区伙伴
本书版权为社区伙伴所有。其他机构或团体如欲转载本书内容作为教育或农村建设推广等非牟利用途，请于转载前通知，并注明出处。

本书以100%再生纸印刷

社区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社区伙伴是一个社区发展组织，于2001年5月由嘉道理基金会创办及资助（经由麦哥利夫人所管辖的基金部分）。嘉道理基金会成立于1970年，创办人贺理士嘉道理爵士一直秉持“助人自助”的信念。

社区伙伴相信，每个人不管物资如何匮乏，都有权利和能力与别人、大自然以至整个世界和谐共存，过有尊严而可持续的生活。要维持一个和谐而永续的社区，人身心的健康至为关键。社区伙伴相信，社区要团结起来，反思社区与大自然的关系，重寻传统文化的根。

社区伙伴致力透过培训学习、社区项目、记录传播等不同手法，于大陆推动生态农业以及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而农业议题的实习生项目一直是重要的工作手法之一。实习生项目支持对生态农业或社区支持农业感兴趣的年轻人在相关的接待机构实习至少一年，项目中提供不同的学习机会以及实践支持。社区伙伴希望透过这手法培养人、支持接待平台、并最终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从2006年起，社区伙伴曾于成都、广西、广州、北京等地开展实习生项目，多年以来培养了超过120名实习生，当中有一半以上继续推动跟农业相关的事业。

大概是从梦想开始的。

因不同机缘在不同社区有不同人和机构在过去十多年，在中港台三地致力推动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长成一股奋力在主流发展主义中另创美好生活价值和实践的新生公民行动。

CSA离不开社区和社群，也离不开农。在外地最初出现时，CSA就不光是一个消费者权益的运动，不单指向生态和生活的永续关怀，而是对一整个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反思和重整。

中港台三地逃不出全球化的浪潮：急速的工业化都市化、生态灾难越来越频繁、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世界不应该如此，生活有另一种可能吗？梦想/希望/想望改变。三地开始有不断苦苦琢磨的，有毅然兹兹行动的……CSA的种子落地。造梦人包括香港大埔一群关心环境和健康的家庭妇女、从社会运动前线落户元朗农地的年轻人、在湾仔闹市让农让土让手作现身的街坊；包括台湾北部宜兰那个刚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年轻米农、南部旗美第一所以农村为学校的社区大学、台中以农、学和市集为本的社群；包括大陆北京关注草原沙漠化和人心荒漠化的组织、广西跟小农同行的餐馆、分散在大江南北努力实践城乡共好的年轻人…… 还有更多。

梦想有的成真，有碰了满身钉子，新的蹊径开辟了，林林种种不同的呈现。如是，继续践行，渐见热闹。路弯且长。十多年了，且看这颗种子的根扎得如何？长成怎样的枝茎？开出怎样的花果？

ISBN 978-988-99943-4-1
9 789889 994341 >